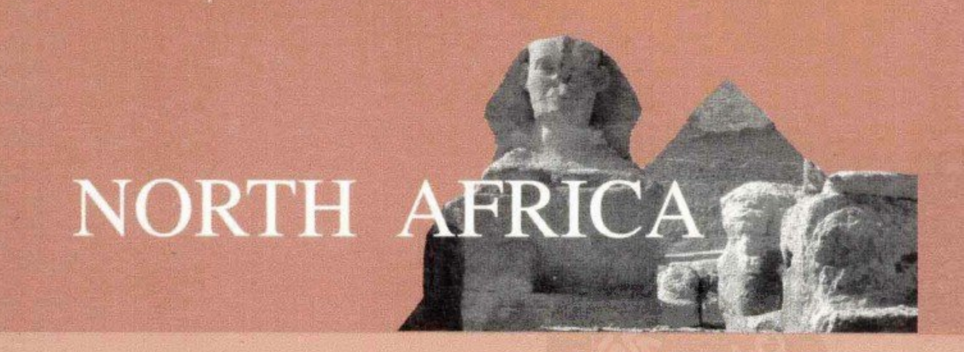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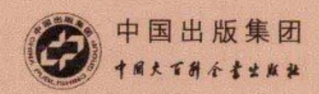


北非史

菲利普·C.内勒 著 韩志斌 郭子林 李铁 译





NORTH AFRICA


ISBN 978-7-5000-9196-7
9 787500 09196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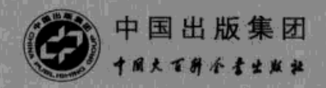
定价：48.00元



北非史

菲利普·C.内勒 著 韩志斌 郭子林 李铁 译

NORTH AFRICA



图字:01 - 2013 - 5592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edition,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非史/(美)内勒著;韩志斌,郭子林,李铁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5000 - 9196 - 7
(世界历史文库)

Ⅰ. ①北… Ⅱ. ①内… ②韩… ③郭… ④李… Ⅲ. ①北非—历史 Ⅳ. ①K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8672 号

责任编辑　曾　辉
责任印制　倪　亮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76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对读者的几点说明

由于本书的读者比较特殊，我尽己所能地把阿拉伯语翻译得既连贯通畅又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我将马利克·本纳比翻译成 Malik Bennabi 而不是 Malik bn Nabi。当 ayn 字母出现在单词或句子的中间时，我一般将“‘”放在它们的前面，如 Ya‘qub，但如果这些字母出现在单词或句子的开头或末尾，则不加。因此，Uqba bn Nafi 就没有翻译成 Uqba bn Nafi‘。《古兰经》中出现的闭锁音“’”，如 *ra’y*、*qa’id*、*Salah Ra’s* 以及 *a-mu’minin* 出现在句子中间，单词开头与末尾的闭锁音都忽略不计。我偶尔还不得不处理法语的直译或音译问题，它们频繁地出现在英文文章中。例如，我使用 Abd al-Hamid Ben Badis 而不是 Abd al-Hamid bn（or ibn）Badis。虽然从严格意义上，“国王”（prince）或“指挥官”（commander）应该被直译为“阿米尔”（amir，阿拉伯国家酋长的称号），但我使用更通用的名称“埃米尔”（emir）。一些诸如马德拉萨（madrasa）、谢里夫（sharif）、哈吉（hajj）和乌里玛（ulama）等词出现在英文词典并经常见诸于新闻媒体，因此阿拉伯语并没有将它们以斜体显示。附于书后的专业术语解释将有助于对这些特殊用语的理解。

前　言

北非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扮演着替补者的角色，这种情况必须改变。2007 年 11 月 18 日，中东研究协会（the Middle East Association）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召开学术会议。中东研究协会会长扎卡里·洛克曼（Zachary Lockman）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学者们需要关注并致力于研究北非。我在马凯特大学已经研究过阿尔及利亚，并从事西非文明的研究项目，因而深刻地意识到研究北非历史的重大意义。然而，教科书中对于北非对欧洲、地中海与非洲文明的强大影响都做低调处理或者隐去不写。北非对世界文明史的重大意义应该得到阐释，最起码应该得到肯定。

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找不到一本介绍北非的教科书以满足教学需要。例如，贾米尔·阿本－纳斯尔（Jamil M. Abun-Nasr）的《马格里布史》（*A History of the Maghrib*，1971）和《伊斯兰时代的马格里布史》（*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1987）都是质量上乘之作，但也引起大多数初学者的质疑。此外，埃及的文化与历史与众不同，大多数时间孤立于马格里布地区之外，处于自治状态，但我也将它囊括入马格里布地区，其原因我会在导论中加以阐述。本书有助于学生或普通读者简要了解而不是全面地考察北非的历史进程。希望本书将对那些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们有所帮助——几十年来

我一直钦佩他们，并曾从其著作中受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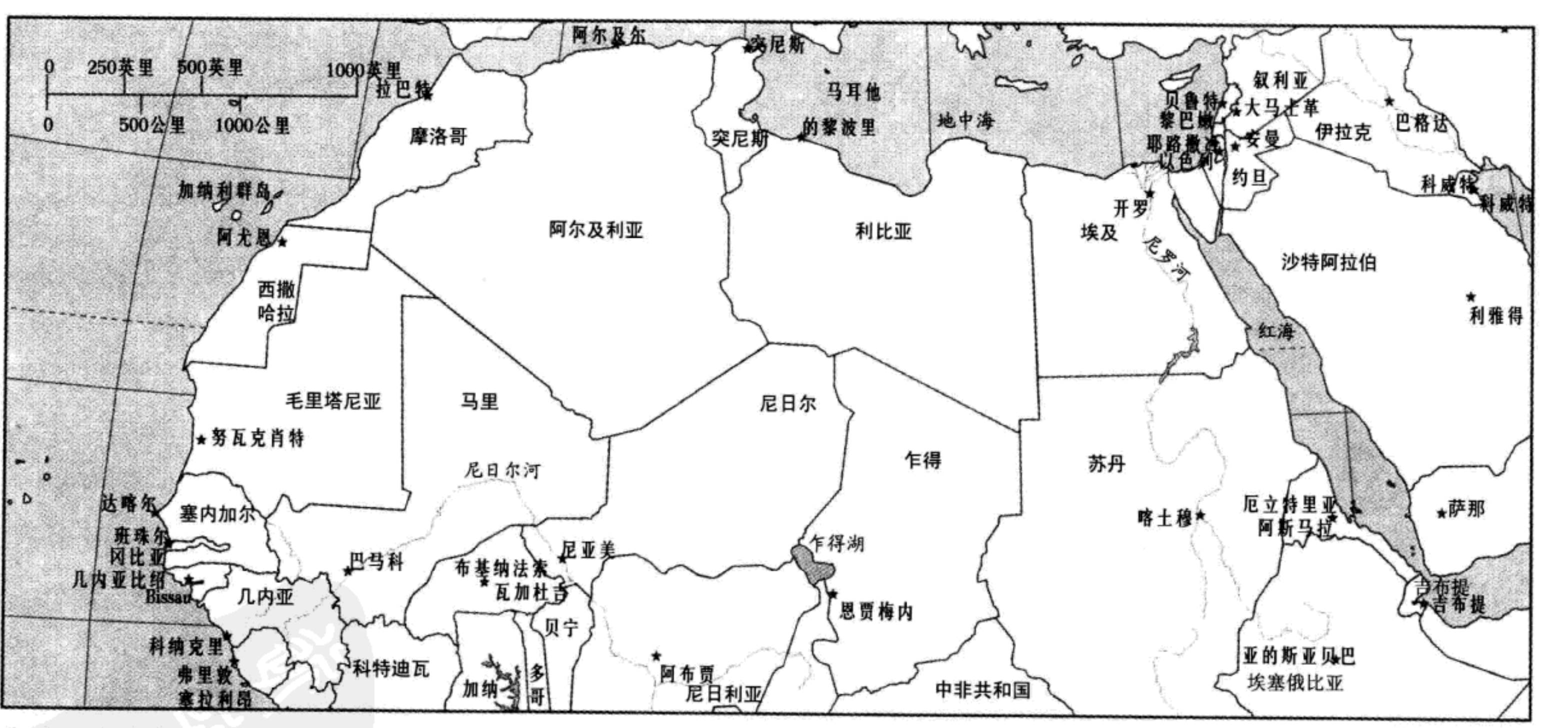
尽管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国内和马凯特完成的，但我要感谢我的堂兄康斯坦茨·克赖尔·埃克隆（Constance Cryer Ecklund），他殷勤好客，慷慨地将他在美国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住所提供给我住，本书的部分初稿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亚历克斯·内勒（Alex D. Naylor）教授居住在伊利诺伊（Illinois），我在他家里校订了书稿。期间，我们友好而激烈地讨论了从外交政策（需要理解历史和文化）到白袜队（投球手的地位）等相关话题。马凯特·雷诺纪念图书馆（Raynor Memorial Libraries）的诸位同事，威斯康辛－密尔沃基（Wisconsin-Milwaukee）大学美国地理协会图书馆（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的学界同仁在特殊时刻给予了我无私的鼓励和莫大的支持。我要特别感谢马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伊尔凡·奥马尔（Irfan Omar）、戴维·加迪尼耶（David E. Gardinier）、保罗·普鲁哈（F. Paul Prucha）、S. J.，罗兰·特斯克（Roland J. Teske）、特伦斯·克罗（Terrence Crowe）以及朱利安·希尔斯（Julian Hills）。穆罕默德·贝克尔·阿勒万（Muhammad Bakr Alwan）的兄长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勒万（Abd al-Hamid Alwan）比较爽快地对书中的阿拉伯语进行了校对。其他直接或间接提供帮助的学者还有：奥斯曼（Enaya Othman）、亚当·雷德（Adam Reed）、雷韦朗（Reverend Jon Boukis）、丹·约翰逊（Dan Johnson）、约普雷（G. Jon Pray）、尼克·施罗德（Nick Schroeder）、格雷格（Greg Shutters）、劳拉·林德曼（Laura J. Lindemann）以及鲁道夫（Rudolph A. Helling）教授、威廉·霍伊辛顿（William A. Hoisington）、约翰·恩特里斯（John Entelis）、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罗伯特（Robert）和米尔德里德·莫蒂默（Mildred Mortimer）。2008 年 4 月，朱莉亚克兰西－史密斯（Julia Clancy-Smith）教授将令人尊敬的亨利·卡斯珀（Henry W. Casper）先生在马凯特大学的年度演讲稿寄给我，还慷慨地允许我参考她即将出版的大作《地中海通道：19 世纪北非的移民与流动》（*Mediterranean Passages*：*Migrants and Mobilities in Nineteenth – Century*

North Africa）（参阅参考书目）中的一章。我还特别想感谢本书原稿的评审人。

我希望向城市之光书社（City Light Books）的罗伯特·沙斯伍德先生（Robert Sharwood）致谢，感谢他从《阿拉伯安达卢西亚诗歌》（*Poems of Arab Andalusia*）诗集中为我复制了《我的心上人来了!》（My Beloved Comes）这首诗歌。这首诗由埃米里奥·加西亚·戈麦斯（Emilio Garcia Gomez）在1989年由用班牙文写成，并由科拉·弗兰岑（Cola Franzen）将之译成英文。

为了我能在讲授北非课程时用上此书，马凯特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哲学系的安德鲁·塔隆（Andrew Tallon）教授在2005年加快速度出版了本书初稿的简本。目前该版已经修订并增加到三册，并纠正了其中的错误。我很享受与安迪（Andy，即安德鲁）在他家门廊里的交谈。得克萨斯（Texas）大学出版社的吉米（Jim Burr）和温迪·摩尔（Wendy Moore）满怀热情地参与了本项目的写作。技术编辑琳妮·查普曼（Lynne Chapman）也特别理解本书出版时间紧迫，以惊人的速度对我的质疑做了答复。莎莲娜·克鲁格（Salena Krug）仔细阅读了本书手稿，并提出了许多问题，做了注解评论，深表谢意。马凯特大学的学生，特别是那些选修北非史课程的学生，对我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激发并鼓励我完成本书的写作。我的妻子与孩子也不断鼓励和支持我。

就在写作本书期间，我的主人阁下（*sahib*），一条名为蒙塔古·弗朗索瓦·内勒（Montague Francois Naylor）的标准的贵宾卷毛犬，跳跃奔跑在我身边，感谢它长期以来从深夜到清晨的陪伴。



0
250英里
500英里
1000英里
500公里
1000公里
阿尔及尔
突尼斯
拉巴特
摩洛哥
马耳他
的黎波里
地中海
贝鲁特
黎巴嫩
叙利亚
大马士革
安曼
耶路撒冷
以色列
约旦
伊拉克
巴格达
科威特
加纳利群岛
阿尤恩
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
开罗
埃及
尼罗河
沙特阿拉伯
利雅得
西撒哈拉
红海
毛里塔尼亚
马里
尼日尔
努瓦克肖特
乍得
苏丹
尼日尔河
达喀尔
塞内加尔
班珠尔
冈比亚
几内亚比绍
Bissau
几内亚
巴马科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尼亚美
乍得湖
恩贾梅纳
喀土穆
厄立特里亚
阿斯马拉
萨那
吉布提
科纳克里
弗里敦
塞拉利昂
科特迪瓦
加纳
多哥
贝宁
阿布贾
尼日利亚
中非共和国
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

地图1　当代北非

导 论

我拿起一张激光唱片放入膝上的笔记本电脑，这是查柏·马米（Cheb Mami）的歌曲《梅利！梅利》（*Meli Meli*，1999）的光盘。查柏·马米是阿尔及利亚歌唱家，世人称之为“拉埃乐王子”（Prince of Rai）。[①]拉埃乐是北非地区一种与众不同的音乐流派，兴起于阿尔及利亚西部。该音乐将本地区的律动模式与欧洲流行音乐、美国通俗的说唱类型（Rap）混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色。拉埃乐使用的乐器样式繁多，包括传统的击鼓（*derbouka*）、架子鼓（*bendir*）、指钹（*Karkaba*）、三个高八度的弦乐器（*qanun*）以及现代电声吉他和低音乐器、合成乐器、小提琴、手风琴等。马米阿拉伯风格的谱曲，再加上阿尔及利亚—法国说唱音乐歌手的特色，使《梅利！梅利》这首歌曲具有了鲜明的个性。他在自己的音乐中融入了法国的抒情诗。此外，马米音乐中还含有说柏柏尔语的阿尔及利亚的伊迪尔（Idir）音乐。拉埃乐的基本结构是北非“跨文化”特点与历史的典型个案。

研究北非历史可以为大学生与学者们提供一个机会，欣赏跨文化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与创新中所起到的角色与作用，这是一个具有历

---

① 阿拉伯语“ra'y”意思是“意见、主张”。“拉埃（Rai）”通常出现在英文新闻媒体和出版社的作品中。“拉埃乐王子”（King of Rai）指的是查柏·马米（Cheb Khaled）。参见 Naylor，2006，p. 311，389—390. Schade-Poulsen，1999。

史意义的独特机会。[1] 跨文化历史研究强调社会与文明之间及其内部的偶然碰撞与交往。作为文明交往十字路口的北非，从地缘结构意义上意味着这里民众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物质财富、技术工艺、历史流变、多重认同以及文化结构都在交往的过程中进行了建构或解构（接受或者拒绝）。当考虑到跨文化历史时，这一点既意义重大又意味深长。由于跨文化的经验与环境会唤起对他者的想象（imagin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将他者的建构（construction）和表现（representation）认定为历史的主体，因此可以从认识论（epistemological）和存在主义（existential）的维度来考察这段历史。跨文化历史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使得历史研究更有深度。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北非在一个具有特殊文明和地理区域的茫茫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北非是世界历史上充当文化和文明轴心的少数地区之一。为了深入理解其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深思一个阿拉伯名词——“马格里布”（jazirat al-maghrib），意思是西部岛屿，暗指埃及以西的土地。[2] 北非如同一个两洋之间的岛屿，即地中海与撒哈拉沙海之间的陆地。人类文明交往的波浪横扫海岸，并塑造着这个文化底蕴深厚、历史生态多样的“岛屿”。因此，特殊民众与独特历史构建了北非的跨文化遗产，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历史上的北非在哪里?

历史学家在秉笔直书、著史立说时遇到的最头痛的难题就是历史

---

① 作者在马凯特大学为其学生设计的《广阔西部》（*Wider Weat*）项目中首次采用了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研究视角（参见 Naylor 2000b，2001）。

② “马格里布”（*al-maghrib*）一词也可以翻译为“西方”或“日落的地方”，还是摩洛哥的代名词。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认为马格里布东起马什里克（Mashriq，意思是东方或太阳升起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不吃米饭，而是吃蒸粗麦粉”（couscous），这是北非居民的主要食物。这条线穿过利比亚东部的德尔纳（Derna）（Parker 1987）。马格里布偶尔还有两层含义：一是马格里布阿克萨（al-maghrib al-aqsa），即北非西部更遥远的摩洛哥；二是马格里布阿德纳（al-maghrib al-adna），即靠近西部的突尼斯和利比亚。

分期（periodization）问题。以具有重大意义的突出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节点，可以较容易地叙述复杂的历史。即将北非史划分为古代时期、罗马时期、伊斯兰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殖民时期、后殖民时期以及当代时期。定位北非的具体位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学者对此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学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北非包括撒哈拉和接近地中海北部的陆地。但是，埃及属于北非吗？埃及历史悠远而辉煌，在许多学者看来，历史上的埃及是一个自治的区域，更接近西亚（或中东）。埃及处于非洲东北部，历史上一直是亚非两大洲文明跨文化交流的枢纽。埃及一般接受马格里布的文明，并将之传播到其他地区。鉴于本书的研究目标和主题视域，本书将意义重大的埃及纳入北非研究范畴。

然而，在界定北非的范围时也存在其他困惑，那就是北非向撒哈拉以南应该延伸到什么地方。本书认为北非的主要范围包括：沿着大西洋海岸的撒哈拉西部，向北延伸到摩洛哥，向东拓展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顺便涉及撒哈拉和萨赫勒（Sahel）。[①] 许多学者经常将北非等同于马格里布[②]，但我认为，鉴于历史考虑与宽阔的地理环境，“北部非洲（Northern Africa）”似乎是一个更精准的语汇。然而，我认为用“北部”（Northern）代替“北方”（North）将会使读者大惑不解（相应地，西非、东非都要改变）。我想反复强调的是，本书中的北非也包括埃及和撒哈拉地区。本书叙述的是在跨文化语境下，非洲北部（Northern Africa）的历史而不仅仅包括马格里布地区。

---

① 萨赫勒（又作 *sahil*）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海岸”或“海岸线”。地理学意义上的萨赫勒指的是撒哈拉与热带非洲中间的半干旱地带。一般来说，萨赫勒并不指苏丹（偶尔或指乍得）。但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海岸线一直伸展到撒哈拉“沙海”。因此，萨赫勒从西到东依次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乍得和苏丹。正如本书诸多地图所标注的那样，“北部的非洲”（Northern Africa）包括北非和萨赫勒。参见本书对此的阐述。

② 法国历史学家认为“马格里布”是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

北非的土地和自然生命

3

北非的地形轮廓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历史。北非环境与地理的差异化与多样性，造成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与交往结构。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利比亚的少许区域，是肥沃的沿海平原地带。几个世纪以来，北非凭借着丰产肥沃的土地成为地中海的粮仓，支撑着一个个国家与帝国的兴衰更替。深入北非内陆，东西走向的一座座山脉成为古老的柏柏尔人寻求避难、构建防御堡垒、抵御历史上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最著名的山脉是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阿特拉斯（Atlas）山脉，乍得境内的恩奈迪（Ennedi）和提贝斯提（Tibesti）山脉。从摩洛哥到利比亚，高原地形［利比亚境内的阿赫达尔高原（Jabal Akhdar）比较著名］随处可见。沙漠是北非的主导地貌。由于过度开发、放牧，再加上不规律的降雨量，土壤遭到侵蚀，最终造成荒漠化，特别是靠近满是沙石的撒哈拉“沿海”（萨赫勒）地区。当代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解决本国人口的食物供给问题。尼罗河是北非唯一一条适于航行的河流。此外，北非地区还有许多天然良港。走过这个区域，你就会发现非洲北部的半热带地中海气候向南变得越来越干旱。碳氢（石油、天然气及其副产品）、磷酸盐和铁矿石资源提升了该地区的战略地位。然而，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对当代政府构建可持续增长的经济模式构成严重挑战。

地中海和撒哈拉地区将这里的民众隔离开来，但也不影响它们的跨文化交往趋势。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北非的跨地中海（trans-Mediterranean）和跨撒哈拉（trans-Saharan）商业贸易促进了民众的思想交往与货物流通。地中海航路将北非与西亚、欧洲文明（和殖民化）联系在一起。撒哈拉贸易线路和尼罗河航道将北非与其他大洲的文明、文化联系在一起。此外，历史上埃及的红海将北非与印度洋的贸易网络、南亚的商业市场紧密地连接起来。

北非的野生动植物包括：豺（jackal）、巴巴里猿（Babary ape）、

瞪羚（gazelle）、跳鼠（jerboa）、野猪（boar）、茴香狐狸（fennee fox）、薮猫（serval）、狞猫（caracal）、僧海豹（monk seals）、非洲野狗（wild dog）、野山羊（ibex），以及各种各样的蜥蜴（lizards）和蛇。尼罗河里有令人生畏的鳄鱼和河马，以及各种各样的鱼类。尽管 4 受到滥砍森林、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但非洲北部山区还有松树（pine）、杜松（juniper）、雪松（cedar）、橄榄（olive）和栓皮栎（cork oak）存在。南部山区有金合欢（acacia）、小棕榈树（dwarf palm）、枣树（jujube tree），以及干旱地区生长的耐寒植物（xerophytic vegetation）。撒哈拉绿洲中，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米扎卜（Mizab）地区，较著名的植物有古老的棕榈树丛（date palm grove），这是一种地下水湿生植物（phreatophytes）。

北非的民族

从人类学特征来看，人们一直认为柏柏尔人（Berbers）是北非的原住民（indigenous population）。[①]他们主要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地区也有大量柏柏尔人。他们自称“自由民”（*Imazighen*）[②]，柏柏尔人的名字来源于“蛮夷”（*barbaroi*）一词，是希腊罗马人的发明，专指那些既不说希腊语，也不说拉丁语的民族。阿拉伯人采用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形容词巴尔巴利亚（*barbariyya*），意思是原始的、陌生的和外国的。古代埃及人是其东部的巴勒斯坦人，北部的叙利亚，南部的努比亚人（Nubians），西部的利比

---

① 我暂时将埃及排除在外。埃及人的起源似乎是西亚、非洲和柏柏尔人混合交往的产物。参见 Brett and Fentress 1996。

② 阿马塞（*Amazigh*）是男性柏柏尔人的名字，塔马塞特（*Tamazight*）是女性柏柏尔人的名字。塔马塞特（Tamazight）是柏柏尔语的通称，其特点是诸多方言的混合。“塔马塞特主义”（Amazighism）在今天等同于“柏柏尔文化民族主义”（Berber cultural nationalism）。

亚人混合交往的结果。[1]古希腊学者笔下的“利比亚人”指的是北非西部的埃及原住民。[2] 公元前 3 世纪，希腊人将现在的“利比亚人”（Libyans）称为“柏柏尔人”，即迦太基国家（carthaginian state）统治及其影响下的民众，以便与游牧主义（pastoralism）或集体放牧（herding）相联系的“努米底亚人”（Numidians）或游牧民（nomads）相区别。[3] 柏柏尔人为自己拥有独立地位而自豪。当面对危机或冲突时，他们经常在国王（*aguellids*）的组织下成立联盟，以渡难关。而且事实表明，柏柏尔人有能力适应并吸收其它文明的优秀成果。柏柏尔人的跨文化接受能力使得他们的历史卓尔不群。

尽管柏柏尔人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个谜，但学者坚持认为，他们是从非洲东北部和撒哈拉地区南部以及欧洲西部迁徙而来的——是种族融合和跨文化交往的产物。柏柏尔人的分裂是以部族关系，而不是语言结构为基础的。从语言学、方言土话角度（很可能源于含米特人的语言）很难描绘柏柏尔人的基本结构。其原因是，尽管柏柏尔人有口耳相传的历史，但缺乏通用字母和文学作品。[4] 柏柏尔人坚守并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语言塔马塞特文（Tamazight）。

除了柏柏尔人以外，北非另一重要族群（ethnic group）是阿拉伯人。他们在公元 7 世纪来到这里。随后几个世纪，一波又一波的阿拉伯部落潮水般的涌来导致北非文化的阿拉伯化（Arabization）。他们是 11 世纪的希拉尔部落（Banu Hilal）、苏莱曼部落（Banu Sulaym）以

5

---

① 古埃及前王朝时期（predynastic period）的埃及人骨化石显示，埃及人是“各种族［包括黑人（negroid）、地中海人种与欧洲人种］混合交往的产物”。另一方面，“古埃及法老时代的肇始”（the beginning pharaonic period）也标志着“叙利亚－巴勒斯坦不同人种”融入古埃及人。有争议的观点是，这些人群的到来是“逐渐渗透”（gradual infiltration），还是征服的结果（Shaw 2000a，315）。考虑到埃及在世界历史上文明交往十字路口地位，后一种观点似乎更值得信服。

② 利比亚一词源于 Libou，该人种是由来自东方的一支史前人群与马格里布原住民杂交的结果。（Abun-Nasr 1971，7）。

③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在与罗马的竞争中，控制了地中海西部。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

④ 含米特语（Hamitic）属于非洲东北部的亚非语系。柏柏尔方言、古埃及语与闪米特语都属于亚非语系。

及后来的马格尔部落（Banu Ma'qil）。阿拉伯人还把他们的伊斯兰教带到北非，柏柏尔人接受伊斯兰教，成为虔诚的穆斯林。随之，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推动了北非文化的统一。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外族征服，北非不断发生着跨文化交往与整合运动，这些征服者有希克索斯人［Hyksos，亚西亚人（Asiatics），可能是迦南人（Canaanites）］、腓尼基人（Phoenicians）、库斯特人（Kushites）、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希腊人（Greeks）、马其顿人（Macedonians）、罗马人（Romans）、汪达尔人（Vandals）、拜占庭人（Byzantines）、阿拉伯人（Arabs）、奥斯曼人［Ottomans，土耳其人（Turks）］、西班牙人（Spanish）、法国人（French）、英国人（British）和意大利人（Italians）。此外，一些重要而规模较大的犹太社区也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北非的发展。而且，各行为体的交往行为与征服活动使北非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融合在一起，其结果是，社会多样化这一突出特点丰富了北非历史的内容。

史前北非

考古发掘显示，北非一直是西亚和欧洲人进行殖民行为的中间站。例如，赛达（*Saïda*）、阿尔及利亚附近的人类［接近人类的直立人（*Homo erectus*）］遗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非以兴盛于公元前 3 万年前的“阿梯尔文化”（Aterian culture）为典型代表。“阿梯尔”（*Aterian*）一词源于其考古发掘地址——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阿纳巴）南部的阿梯尔（Bi'r al – ‘Atir）。阿梯尔人（Aterian）具有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oid）的体形特征，制作的工具精巧量轻。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Ibero-Maurusians）、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公元前 15000 年—前 10000 年）的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继承了阿梯尔人的基本技能，能制造较先进的工具。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从伊比利亚（Iberia）延伸到利比亚，因位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Oran）而以奥拉尼安（Oranian）著称于世。

约公元前 6000 年前，卡普萨文化（Capsians）完成了从中石器时

代（Mesolithic）到新时期时代（Neolithic）的革命性变迁。新石器革命表明了跨文化交往在北非历史的重要意义，其典型特点是开始了定居农业和动物驯养，这些技能来自西亚（参见 Diamond 1999，101—102）。卡普萨文化遗址遍及整个北非，特别是突尼斯。总之，沙漠化之前的撒哈拉地区（predesiccated Sahara）的沿海经历了新石器时代，表明了气候以及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参见下文）。[①] 约公元前 8800—前 6800 年，归属埃及的撒哈拉沙漠西部的纳巴塔河岸（Nabta Playa）和比尔凯塞巴（Bir Kiseiba）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Early Neolithic period）。其特点是，集中放牧牲畜（cattle herding），这也证明了水源的重要意义。现存的考古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始于下埃及（Lower Egypt），即公元前 5300 年的尼罗河流域北部，以农业见长。[②]

6

撒哈拉山区的提贝斯提高原（Tibesti，乍得）和阿哈加尔山（Ahaggar，阿尔及利亚）有一些著名的石雕。此外，约在公元前 6000 年—公元 100 年，撒哈拉地区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塔西里·恩阿杰尔（Tassili N' Ajjer）地区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石雕，生动地展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撒哈拉风貌。在成为沙漠以前，撒哈拉地区气候“湿润”（wet），适合大象、长颈鹿（giraffes）、犀牛（rhinoceros）、马匹和其他动物生存。[③] 高原绘画（Tassili paintings）描绘了狩猎者和牧人的基本情况，总体上体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前艺术的基本情况。考古学家（archaeologist）、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s）和历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些绘画作品。利比亚费赞地区的绘画作品是一些极具美感的历史文献，阐述了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革命性变迁的历史进程。[④] 此外，扬·万思娜（Jan

① 北非的地中海气候和地形与西亚的肥沃新月相互映射，从而促进了后来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参见 Diamond 1999）。

② 萨赫勒（Sahel）地区的牲畜驯养技术可能是独创，也可能是从西亚地区引进的（Diamond 1999，98）。

③ 恩内迪（Ennedi）高原的池塘里还可以找到小鳄鱼（Dwarf crocodiles）（de Villiers and Hirtle 2002，100，141）。

④ 20 世纪 50 年代，亨利（Henri Lhote）详细考察了高原绘画的细节，法布里齐奥·莫里（Fabrizio Mori）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费赞阿卡库斯（Acacus）山区的一个美术馆（gallery）进行研究。

Vansina）注意到“古埃及的绘画艺术应归功于先于自己或与自己同时代的撒哈拉地区传统”（Vansina 1984，6）。埃及人羡慕并吸纳了撒哈拉地区的艺术风格，这也证实了跨文化交往在北非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意义（primordial significance）。

北非文明：历史概览

埃及文明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文明之一。[①] 这里是北非通向西亚的关键锁钥，深刻地影响了苏丹［古代库施（Kush）或努比亚（Nubia）］的历史流变，在一定程度上对索马里［蓬特（Punt）］也有影响。在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era），埃及的贸易对象通常是南亚和地中海西部。位于今黎巴嫩的那些极富进取精神的腓尼基城市国家，构成了西亚的主体力量，对北非产生深刻影响。腓尼基人沿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a）沿海地区建立了贸易商站（trading post）。利比亚是希腊（后来是罗马）最大的殖民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费赞地区的撒哈拉拉曼铁司人（Garamantes）会使用碳氢和农艺学。前腓尼基人在突尼斯地区的殖民点迦太基（Carthage），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出现在地中海西部。迦太基对抗古希腊城邦国家（Greater Greece，即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波利斯（*poleis*），随后与罗马发生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被击败后，罗马统治北非，接管处于独立地位的柏柏尔王国［努米底亚（Numidia）和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以及希腊时代的埃及。罗马人修建了上百座城市，北非的罗马遗迹是世界上现存最闻名的历史古迹。北非在基督教的扩展与演变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最伟大的“教父”（Church Fathers）奥古斯丁（Augustine）就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

7

本书不可避免地要提及日耳曼人（German）的入侵，这也是西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日耳曼人到达北非，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汪达尔人，建

---

① 内勒（Naylor，2000b）认为，西方文明在地理上包括“三块大陆”（tri-continental），即西亚、北非和欧洲。

立了一个王国，影响范围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西部）到摩洛哥，统治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汪达尔人从北非派出一支军队，洗劫了罗马——因此，他们的名字与烧杀劫掠等破坏行为联系起来。533 年和 534 年，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发起了反攻，消灭了汪达尔王国。“罗马”帝国实现复兴，并在埃及（一直处于拜占庭的管理之下）西部的北非以统治者的身份再次出现，不过其统治力量在沿海和内地有所不同。拜占庭的统治基地主要在北非城市或沿海地区，如迦太基。

7 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北非。柏柏尔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终被征服。满怀伊斯兰信仰的阿拉伯人也深深浸染了这里的民众。北非国家的特点是，以王朝为首的穆斯林国家促进了商业发展和文化进步。这些国家有鲁斯塔姆王朝（Rustamids）、伊德里斯王朝（Idrisids）、阿格拉布王朝（Aghlabids）、图伦王朝（Tulunids）、法蒂玛王朝（Fatimids）、兹里德王朝（Zirids）、哈马迪德王朝（Hammadids）、阿尤比王朝（Ayyubids）和马穆鲁克王朝。两个柏柏尔人王朝，即 11 世纪的穆拉比德王朝和 12 世纪的穆瓦希德王朝是中世纪西方文明史上实力最强的国家。西方文明教科书中提及的伟大的哲学家伊本·鲁士德［Ibn Rushd，即阿威罗伊（*Averroës*）］曾在穆瓦希德王朝任职。之后的哈夫斯德人（Hafsids）、赞德人（Zayyanids）和马林人（*Marinids*）继承了穆瓦希德王朝在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

整个 16 世纪，除了摩洛哥以外，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都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在萨阿德王朝和阿拉维（Alawi）王朝的保护下，摩洛哥一直处于独立地位，免受奥斯曼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入侵和劫掠。奥斯曼帝国派往阿尔及尔的摄政王（Regency）名义上接受君士坦丁堡帝国苏丹的统治，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奥斯曼帝国是地中海西部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派驻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摄政官员也极力维持本地区的自治地位。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1] 之后，西班牙有计划地夺取了北非沿海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村落，控制了摩洛哥沿海与近海岛屿休达（Ceuta）和梅利利亚（Melilla），这里是流放犯人的场所。此外，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对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北非战役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步骤。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标志着欧洲人发起了大规模的入侵，开始关注帝国在北非的利益。1830 年，法国夺取了阿尔及尔。1848 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北部成立了 3 个部门。1881 年和 1912 年，突尼斯和摩洛哥中南部分别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西班牙分别在 1860 年、1884 年和 1912 年获得了摩洛哥与大西洋沿岸的伊夫尼（Ifni）、撒哈拉西部以及摩洛哥北部和塔尔法亚（Tarfaya）南部。1911—1912 年，意大利夺取了利比亚［当时叫“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1875 年，大英帝国购买并控制了苏伊士运河。1882 年占领埃及。欧洲殖民主义对北非民众产生多重影响。然而，到 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之时，北非已经进入非殖民化（decolonized）阶段，但西班牙的殖民地——西属撒哈拉地区、伊夫尼、普雷西迪奥（presidios）和沿海岛屿除外。与殖民主义在北非所引起的争议一样，后殖民时代的北非历史也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层面出现了重大问题。到了当代北非，西方化、现代化、全球化和伊斯兰主义等文化命题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走进北非历史：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马利克·本纳比（Malik Bennabi）和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

站在北非这块土地上，纵览北非的史前史，我们更认识到北非的

[1] “收复失地运动”一词指的是西班牙的基督教徒从穆斯林手中收回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人自发驱逐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穆斯林的活动持续了近一个世纪，1492 年格拉纳达（Granada）省穆斯林的投降标志着“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历史学家艾哈迈德·陶菲克·迈达尼（Ahmad Tawfiq al-Madani）将阿尔及尔与西班牙摄政国之间长达 300 多年的冲突命名为“收复失地运动”（al－Madani 1968）。

历史地位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如何叙述、解释和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recorded history）呢？从历史流变的进程来看，北非历史始于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运动，终于当代。查尔斯·安德烈·朱利安（Charles – André Julien）的《非洲史》（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出版于1931年，该著作不仅是一本重要的学术精品，还是一部英雄史诗。它打碎了法国殖民的神话，填补了前殖民时代北非（马格里布）历史的空白。1952年，罗歇·图尔诺（Roger Le Tourneau）重新修订了朱利安的著作，修订本于1970年被翻译成英语。贾米尔·阿本·纳斯尔（Jamil M. Abun – Nasr）的《马格里布史》（1971年）和《伊斯兰时代的马格里布史》（1987）比朱利安的著作更注重细节。[《马格里布史》（1971年）中有三章专门撰写前伊斯兰时代的北非]。朱利安和阿本·纳斯尔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自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以来的历史流变轨迹。阿卜杜拉·拉鲁伊（Abdallah Laroui）的《马格里布史：阐释性文章》（出版于1970年，1977年译成英语）以批判的视野对北非地区从古至今的历史进行了评估。

9

斯特凡·格泽拉（*Stéphane Gsell*）的《古代北非史》（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对古代北非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进行了考察。希罗多德（Herodotus）、波里比阿（Polybius）、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和李维（Livy）的著作都附带提及北非，成了研究北非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萨鲁斯特（Sallust）的《朱古达[①]战争》（*The Jugurthine War*）是一个例外，他的作品短小精悍、内容有限。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的普利尼（Pliny）和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用他们的“全球”视野，提供了北非的零星信息。奥古斯丁（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阐释了盛行于北非和欧洲之间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时任东罗马帝国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秘书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记录了拜占庭帝国与汪达尔人作战的情况。

① 古代努米底亚国王名。——译者注

9世纪的北非著作，首先应提及的是伊本·阿卜杜勒·哈卡姆(Ibn abd *al-Hakam*)的作品。他考察了埃及以及穆斯林征服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穆斯林的伊比利亚）的历史。11世纪，阿布·乌拜德·贝克利（Abu Ubayd al-Bakri)撰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关于地理和社会方面的旅游指南。伊本·伊达里·马拉库施（Ibn Idhari *al-Marrakushi*，13世纪末期）编撰了一部从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到穆瓦希德王朝（Muwahhidun）之间的北非史。16世纪反映北非的著作当属利奥·阿非里加努斯（Leo Africanus）［即哈桑·本·穆罕默德·瓦扎尼(Hasan bn Muhammad al-Wazzani)］的著作，使人回想起贝克利（al-Bakri）的作品。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Abd al-Rahman al-Jabarti*）的作品叙述了拿破仑入侵埃及，论述了东西方政治和文化冲突及其后果，这是相当珍贵的史料。阿尔及利亚的马赫福兹·卡扎什(Mahfoud Kaddache)、艾哈迈德·陶菲克·迈达尼（*Ahmad Tawfiq al-Madani*）和穆巴拉克·本·穆罕默德·米利（Mubarak bn Muhamad al-Mili）撰写了“国家”（national）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上述精品以及参考书目中列举的著作都很有价值。然而，这里应该提及以下三位声名卓著的学者，他们在北非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既具深度，又具广度。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

伊本·赫勒敦出生在今天的突尼斯。作为政治家和学者，他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足迹遍及整个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他担任埃及法院马利克（Maliki）学校的主审法官职位，即穆夫提（*mufti*）。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Muquddima*）一书中，[1] 对历史的“表层意义”（surface meaning）和“内在意义”（inner meaning）进行了区分：“表层历史（surface history）仅仅是政治事件、王朝更替以及遥远

10

[1] 《历史绪论》（*Muquddima*）介绍了基塔卜·伊巴尔（Kitab al－Ibar），即伊本·马特尔所著的世界史（*Universal or World History*），本书部分内容被翻译为《柏柏尔人史》（参见Ibn Khaldun 1968—1969）。

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它……使我们理解了人类所发生的事情。（它也表明）流变中的大势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变迁），某些王朝在世界历史中如何长时间的持续存在，以及他们如何解决世界难题，直到寿终正寝。”这就是帝王声望和时光流变的历史。他继续论述：“另一方面，历史的内在意义包括通过深入思索，获得事实真相，细致入微地解释事物发生的缘由，深入探索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Ibn Khaldun 1967，1：6）。那些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对历史的内在意义更感兴趣。

此外，伊本·赫勒敦对历史进行了多元化的解释：“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是一门拥有许多不同研究方法的学科，……（书写历史）需要无数的资料和各种各样的知识。”（Ibn Khaldun 1967，1：15）他以警告的口吻，强调了历史研究方法：

> 如果（历史学家）仅仅相信历史信息的表象，不清楚风俗习惯的前因后果、政治流变的基本事实、文明演进的本质特性，或者支配人类社会组织的条件，甚至不能通过与现代或当代材料进行对比研究，评估古代史料，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犯大错误，偏离历史的真相。（Ibn Khaldun 1967，1：15—16）

伊本·赫勒敦认识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气候学以及我们今天所称的政治科学对历史发展与解释历史的重要性。按照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的说法：“没有一个阿拉伯学者，实际上也没有欧洲学者，提出一个如此全面广泛、富有哲理的历史观。”（Hitti 1970，568）

他将北非国家势力与影响的兴起与衰落以及权力的兴衰更替归因于历史行为体（historical agent）的阿萨比亚（*asabiyya*），可以翻译为

群体情绪（group feeling）[1]。当一个王朝的社会凝聚力与政治整合力削弱后，它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编撰学和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北非的过去（包括现在）非常有价值。他所使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表明，伊本·赫勒敦作为饱学之士具有睿智的思维和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

马利克·本纳比（Malik Bennabi，1905—1973）

马利克·本纳比是第二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对北非和穆斯林文明史有着深入的洞察力。本纳比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曾居住在法国和埃及。他坚持认为，穆斯林，特别是马格里布人（伊斯兰世界西部）和马什里克人（伊斯兰世界东部）应该具有历史意识，这是一种既积极主动又值得认可的践行（praxis）。一位以法语和阿拉伯语写作的多产学者指出，穆斯林能“接受殖民”（colonizable）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不欣赏伊斯兰历史文化。他继续写道：“只有一个人不再‘接受殖民’（colonizable），他才可以免受殖民（colonized）：这是一个永久不变的规则”（Bennabi 1949，22）。[2] 在本纳比看来，北非和广阔的穆斯林世界或者说“伊斯兰王国”（Islamdom）（马歇尔·霍奇森的说法）的“受殖”，发生在13世纪穆瓦希德王朝崩溃之后，并不仅仅是欧洲帝国主义（imperialism）这一因素造成的。“后穆瓦希德”

11

① 参见弗兰兹·罗森塔尔（Franz Rosenthal）描述的阿萨比亚（*asabiyya*）（“译者前言”，参见 Ibn Khaldun 1967，1：xxviii）。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将阿萨比亚称为群体团结（group solidarity）或者党派精神（party spirit）（Hodgson 1974，2：481）。穆赫辛·马赫迪（Muhsin Mahdi）将阿萨比亚与“社区民族气质（communal ethos）、社区情感（community of sentiment）或者社会凝聚力（social solidarity）”联系起来（马赫迪更看重后者）（Mahdi 1964，196）。艾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补充认为，“阿萨比亚”是“一种获取或掌握权力的团体精神（corporate spirit）”（Hourani 1991a，2）。“阿萨比亚”将一个人的命运与另一个人的命运等同起来，例如，为了服务群体的利益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伊本·马特尔在研究“阿萨比亚”时，考察了许多社会变量，如宗教、人口统计学、环境，特别是游牧社会和定居社会的竞争与对抗。建筑样式（Architecture）被认为是显示群体情感力量和凝聚精神的重要指标。伊本·马特尔提出的“阿萨比亚”是政治和社会心理学和权力的特殊分析模式。

② 本纳比在他的著作《伊斯兰的使命》（*Vocation de L'Islam*，1954）中详细阐述了“殖民”（colonizablity）的相关话题。

(Post-Almohadean）时期北非的特点是：疲惫消极的穆斯林文明内部知识分子普遍的懒散厌世情绪。贾米尔·阿本·纳斯尔（Jamil M. *Abun-Nasr*）解释道：“‘受殖’作为一种道德麻痹（moral paralysis），将导致社会共同体接受一种被他者思想和价值观决定的生活方式。”（*Abun-Nasr* 1987，325）本纳比的批评既深刻尖锐又富有启发意义。

本纳比深受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以及伊本·赫勒敦的影响，对研究文明的发展和兴衰十分着迷。他将穆斯林文明史理解为一项通过精神的（spiritual)、理性的（rational）和本能的“心理波动”（psycho-temporal)，再加上三个因素［即人、陆地（土壤）和时间］的协同作用而完成的过程。他认为宗教是文明中最基本的因素（Bennabi 1949，33)。对本纳比来说，精神阶段具有特殊的影响和重要地位。本纳比认为，穆斯林文明的精神阶段结束于657年隋芬（Siffin）战役及其后伍麦叶哈里发王朝的建立。[①] 随着文明的“灵魂”（soul）或“精神”（spirit）达到平衡，理性阶段在一个较先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几个世纪后，随着伊本·赫勒敦的过世以及那一时代的结束，穆斯林文明停滞并衰落到“本能的原始阶段”（instinctual primitive stage)，这是一个以懒散（torpor）和迷信（superstition）为标识的返祖的、退化的时代。[②] 本纳比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复兴”（*Nahda*）或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标志着穆斯林文明的复兴。然而，他批评了现代主义者不能够“改变穆斯林精神”（transform the muslim soul)，意识到伊斯兰教的

12

① 隋芬战役象征着穆斯林乌玛（umma）或社区内部的战争（*fitna*）。战争双方是阿里哈里发（656年—661年）和其对手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参见第三章）。战争期间，穆阿维叶的士兵撕下古兰经的一页，放在长矛上，要求仲裁（arbitration）。阿里答应其要求，但战争继续。阿里遭暗杀后，穆阿维叶接管穆斯林帝国并开创了伍麦叶王朝，结束了哈里发的选举制度。参见第三章。

② 本纳比将这一时代比喻为耗光了动力来源的发动机（Bennabi 1954，26)。他认为，宗教而不是理性主义，是遏制文明退化的重要因素。本纳比的文明阶段论引发了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对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深入思考。但本纳比与黑格尔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历史流变是按周期循环的（cyclical)，他反对目的论（teleological）（参见 Boukrouh 2006)。

“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Bennabi 1954，56）。本纳比认为伊斯兰主义（Islamism）不仅能从精神上唤醒暮气沉沉的穆斯林世界，还可以使民众欣赏穆斯林文明对世俗社会的贡献。[①] 他并不想将穆斯林文明和西欧/美国文明割裂开来。此外，他认为精神和信仰（spirituality and faith）可以与理性和世俗（rationality and secularism）交融共处（参见 Naylor 2006a；Christelow 1992）。本纳比赞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永久回归”（eternal return）思想，希望穆斯林文明最终恢复到活力四射、生机勃勃的状态。

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

雅克·贝尔克是北非第三位重量级学者。与伊本·赫勒敦一样，贝尔克研究的学科涉及人类学（anthropology）、社会学和历史学，地域范围横跨北非的摩洛哥和埃及。贝尔克出生在奥拉尼（Oranie，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弗伦达（Frenda），深受其父奥古斯丁（Augustin）的影响。奥古斯丁是一名殖民官员，敏锐地察觉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社会关系。贝克尔继承了父亲天资聪颖的优秀基因。他在北非的法国军队中服役，并与摩洛哥士兵结成好友。对此，贝尔克很庆幸他们能拥有这种关系（Berque 1989，43）。例如，摩洛哥人允许他到本地部族村庄游走于左邻右舍之间。[②] 与他的父亲一样，贝尔克最终成为殖民地一名行政官员。此后，他为了保住自己在政府的职位，不再苛评法国殖民政策。然而，贝尔克的经历与博识使他的学术成就较为突出。他既可以讲述阿特拉斯山（High Atlas）的民族风情，也评论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的后果。[③] 贝尔克兴趣广泛，包括阿拉伯史和伊斯兰史。贝尔克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被任

---

① 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般来说，信仰者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其目的是改革、复兴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社会。

② 他的热情也反映了“Zohra”的美丽（参见 the autobiographical Berque 1989）。

③ 达勒·埃克尔曼（Dale F. Eickelman）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贝尔克的作品表明，他已经微妙而敏感地意识到他所经历的殖民过程的本质”（Eickelman 1998，42）。

命为法国知名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尖锐地批评了东方学者（orientalist）的傲慢态度，但对贝尔克的作品却另眼看待。萨义德钦佩贝尔克和他的同事马克西姆·罗丹松（Maxime Rodinson），称赞他们“在方法论层面的自觉意识（self-consciousness）……首先，我发现他们的作品总对资料有直接的敏感，然后是对方法论和实践不断地自我反省（self-examination），他们总是让自己的作品具有坚实的材料基础，而不是教条式地提出自己的偏见（doctrinal preconception）”（Said 1979，326－327）。贝尔克对返祖现象（atavism）加以质疑。

13

与伊本·赫勒敦和本纳比一样，贝尔克也是一位独立知识分子。[①]他交往的同事来自不同的学科，对他帮助很大。这些人有罗丹松（Rodinson）、路易·马西农（Louis Massignon）、莫里斯·梅洛—蓬蒂（Maurice *Merleau-Ponty*）、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②]、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乔治斯·马尔塞（Georges Marcais）、樊尚·蒙泰伊（Vincent Monteil）、罗伯特·蒙塔涅（Robert Montagne）、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以及克劳德·李维—斯图尔斯（Claude Lévi－Strauss）。尽管贝尔克对二元论的“他者”（othering）等哲学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如他者的描述、定位和背景分析，或者

---

① 威尔弗里德·罗尔曼（Wilfrid J. Rollman）指出，学者和学生都声称贝尔克偶尔“使用形象化的描述语言是一种家长式的作风（paternalistic），他们赞同贝尔克拒绝‘东方学者的臆断’（Orientalist assumptions）和‘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以及他对本土认同（local identity）和自我批评（self-critique）的观点”（Rollman 1997，xxii）。

② 布罗代尔的权威著作：《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1949年、1966年，1972年、1973年出版第2卷）重点论述了在此期间北非的重要作用。他区别了“显而易见”（conspicuous）、“紧要关头”（conjuncture）以及“内在”（submerged）和“结构”（structure）的不同，这与伊本·马特尔“表面意义”和“内在意义”的研究方法有密切联系。布罗代尔的历史是一种“结构和紧要关头的对话，这一时刻既可以短暂，又可以漫长”（Braudel 1972—1973，2：757）。此外，二人的研究方法也相同。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接受并发现了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的解释方法，将会垂直地从一个时空到达另一个时空。在每一个时空，它们都会有一些平面的联系与交往”（Braudel1972—1973，1：16）。如果伊本·马特尔当时还活着的话，他将很欣赏布罗代尔的观点。贝尔克也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安德鲁·埃斯（Andrew C. Hess）对布罗代尔提出的“统一地中海”（unitary Mediterranean）的构想提出质疑（参见 Hess 1978，1—10）（参见第五章）。布罗代尔曾于1923—1932年间在阿尔及利亚从事教学活动。

对相异性（alterity）条件的界定，但他的著作更多地研究诸如北非工业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后果。套用艾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的话："贝尔克教给我们区分历史的不同律动模式：外来统治者试图将他们的统治模式强加给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众却独自构建了治理方式"（Hourani 1991b，5）。贝尔克的作品充分表现了他对北非人（特别是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和埃及人）的同情与认同这一特点。贝尔克与北非的关系既亲密友好又富有理智。艾伯特·胡拉尼用钦佩且羡慕的口气写道："贝尔克的作品视野开阔、意味深长，读起来很有味道。他用他所有的感觉全神贯注地理解阿拉伯世界"（Hourani 1991b，132）。1991年，一位精通（口语和古典音乐）的阿拉伯学者出版了一本《古兰经》的精彩评注。贝尔克反映了伊本·赫勒敦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如果不考察历史深处的东西，那就不叫撰写历史"（Berque 1972，297）。他与伊本·赫勒敦和本纳比一样，对文明的流变十分着迷。

伊本·赫勒敦、马利克·本纳比和雅克·贝尔克深刻理解北非历史的教育意义。伊本·赫勒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表现了后现代时期方法论研究的创新。本纳比对"后穆瓦希德王朝"（Post-Almohadean）以及伊斯兰主义真正救赎功能的研究，在当代语境下显得极为重要。贝尔克尽管有法国殖民背景，但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北非各种文化之中，能够巧妙地处理个人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对我们颇有启迪意义。

本章较大篇幅地介绍了伊本·赫勒敦、马利克·本纳比和雅克·贝尔克，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成为本书篇章结构与构思框架的主角，不过正文还会偶尔提及他们。作为一本介绍性的著作，本书的目标较为适中：主要是纵览北非政治史的流变轨迹，阐释跨文化研究的影响和重要意义。学者们对科学探求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体现了北非跨文化研究的多层面魅力。上述三名北非知名度极高的学者对全球文明做出了 14

巨大的贡献。[①]

结论

北非显示了历史个性（historic personalities）、复杂文化以及先进文明的有机统一。再者，本地区跨文化特点和历史将之与三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赋予北非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最近，我观看了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知名歌手罗伯特·普朗（Robert Plant）演出的节目。[②] 普朗演奏的一首歌曲，其韵律源于北非。[③] 这一事实表明北非文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多么普遍和细致入微。普朗的兴趣也要求我们对世界上被相对忽视，但又值得细心研究的北非历史进行深入考察。

---

① 一位摩洛哥的社会学家、批评家和小说家阿卜杜勒—克比尔·哈提比（Abdelkebir Khatibi）继承了北非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做出贡献。他批评了伊本·马特尔、马利克·本纳比和雅克·贝尔克，但他在《多元化的马格里布》（*Maghrib Pluriel*，1983）里肯定他们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对北非地区和文明研究的巨大贡献。

② 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经常尝试使用北非/中东音乐的节奏韵律，如吉他演奏的“移民之歌”（The Immigrant Song）、“克什米尔”（Kashmir）和“越过山岗，走向远方”（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普朗与吉他手吉米·帕迪（Jimmy Pade）到摩洛哥，用磁带记录柏柏尔人的音乐。他们的考察活动受到两件事情的阻挠：一是“绿色三月”（Green March）；二是西班牙占领下的西撒哈拉的分裂（参见第 9 章）。军事封锁让他们的计划停止了（Davis 1997，253—254）。现代埃及最伟大的歌手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也对普朗出色的嗓音产生影响。（Davis 1997，309—310）。有关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的更多信息，参见 Danielson 1997。

③ 普朗在 2005 年发行了他第九张个人唱片，唱片名为《绝妙好辞》（*Mighty Rearranger*）。唱片中的两首歌曲《某些人的爆震燃烧》（*Somebody's Knockin*）和《塔卡姆巴》（*Takamba*）深受北非音乐的影响。普朗也聆听阿尔及利亚演奏家拉希德·塔哈（Rachid Taha）的作品，后者将摇滚乐（rock and roll）与北非音乐融合在一起（参见 http：//www.rollingstone. com/news/story/ – /id/7287549/ledzepplin）。塔哈的 *Tekitoi*（2004）是一张唱片，它将不协调的“摇滚和阿拉伯宫廷音乐”（Rock and Casbah）与布莱恩·伊诺（Brian Eno）款待贵宾的高雅音乐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音乐跨文化交往的特点。

目录 Contents

地图目录

第一章　古代北非及其文明扩张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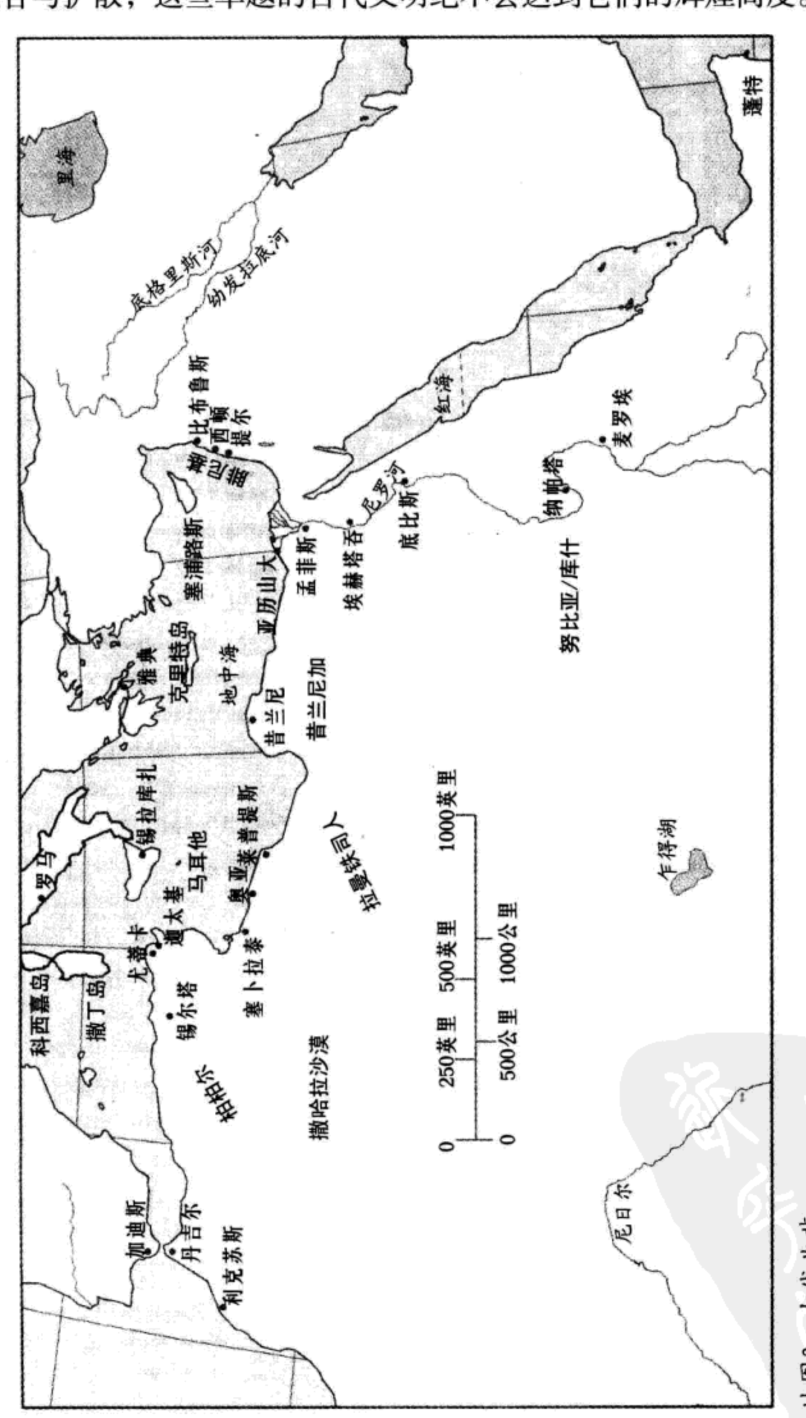
古代北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和扩张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前言所提到的，北非与西亚和欧洲一样，都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文明兴起的过程中，北非的重要性瞬间变得显而易见。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及其复杂的城市国家形成的几百年后，埃及文明才逐渐兴起。[①]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埃及的跨文化意义。埃及激发和影响了库什（努比亚）和希腊文明的发展。当埃及在公元前 12 世纪晚期衰落时，腓尼基文明占据了重要地位。腓尼基是西亚北部迦南地区沿海地带一条狭长的区域。腓尼基一些有抱负的海上城市国家，例如提尔，在地中海西部（包括北非沿海地区）建立了贸易殖民地。腓尼基人建立的这些前哨阵地之一便是迦太基，后者对北非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希腊一些有抱负的城市国家，为了地中海西部的海上市场和土地而与腓尼基人发生冲突。到公元前 7 世纪末，希腊人的殖民地散布于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法兰西和昔兰尼加或利比亚东部。后来，在公元前 4 世纪，希腊文明经过马其顿文化的侵染，产生了北非最伟大的王国之一，或者最伟大的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之一，即希腊化时代的（意思是类希腊文化的）埃及或托勒密时代的埃及。

本章有两个主题：首先，北非在规范西方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

① 学者们对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先后时间存有争议。

用，因而证实了其历史和地理意义的重要性。其次，从埃及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跨文化影响在北非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事实上，没有文化的融合与扩散，这些卓越的古代文明绝不会达到它们的辉煌高度。



地图2 古代北非

埃及：一种沉淀的文明

17

自古以来，埃及就处于北非历史上的十字路口。它把非洲与亚洲连接起来，是文化和商品的交往通道。埃及文明的历史发展具有“沉淀性的”（sedimentary）特点，埃及是多种文明层层叠加而成的国家。1863年2月，多夫·戈登（Duff Gordon）女士发现：“这个国家的历史是一个重写本（palimpsest），《圣经》以希罗多德的作品为基础重新梳理埃及历史，而《古兰经》又以《圣经》为写作基础，再次勾画了埃及历史蓝图”（Gordon 1969，65）。雅克·贝尔克是这样表述的：“（埃及的）坚固耐牢的黏土能够浇铸成任何形式，这种形式是其他人或她自己强加上去的，但其本质特征不会改变……她把所有这些关系都融入自身：她是这一切的产物”（Berque 1972，39）。在埃及的悠久历史上，埃及人保持并维持了一种身份认同——尽管曾遭受过几个世纪的外来统治，但一直没有改变。在本章里，我们将埃及文明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即金字塔和法老时代的埃及文明，以及后来的希腊化国王和女王时代的埃及文明。

埃及的永恒性

文明一般在大河流域孕育而成，这在全世界较为普遍。自然也赐予埃及一条母亲河——尼罗河。其他大河冲积文明主要生成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平原）、南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正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所说，尼罗河哺育了埃及，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赠礼”（Herodotus 1978，131）。

其他地理原因也可以说明埃及的面貌。东面、南面和西面的沙漠，尼罗河在库什（努比亚/苏丹）地区的几个瀑布，以及北面的地中海，都使埃及文明与外界隔离开来。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免受外敌入侵，并可以按照自己的社会演进规律自主发展。数个世纪里，埃及的政治秩序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大约几千年之后，西亚（特别是迦南

地区）的喜克索斯人[①]入侵埃及并取得成功，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喜克索斯人渗入埃及。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泛滥不仅沉积了很多用于补充土壤的营养素，而且洪水的发生是可预测的，这也强化了埃及人的永恒观念。除此之外，埃及坟墓建筑（例如古王国的金字塔）的持久性和（最重要的是）埃及多神宗教的来世论（强调来世生活的永恒性，而来世生活与现实世界的生活非常相似），都体现了永恒这一主题（thematic in Naylor 2000b，15—32）。

18

埃及文明是自信的、复杂的和连续的，它的复杂使得文字记录的发展成为必要，从而导致了图画文字体系的产生，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这是一个希腊文词语，意思是圣书体或雕刻体文字。古代象形文字在地下尘封了数个世纪。直到法国军队于1798年挖出“罗塞塔石碑”，人们才有机会阅读这种文字。这份文献蚀刻在一块玄武岩表面上，展示了托勒密王朝的一份文告，这份文告是用希腊文、世俗埃及语和象形文字镌刻的。[②] 19世纪20年代，弗朗索瓦·商博良（François Champollion）和托马斯·杨（Thomas Young）从希腊文开始，破译了象形文字。尽管学者们从希腊文和拉丁文记述中认识到了古代埃及的重要性，但破译象形文字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的发展，提升了我们对西方和世界上最早、最伟大文明之一的埃及文明的理解。

希腊化时代之前的埃及史

早王朝时期的埃及（约公元前3000—前2686年）[③] 把尼罗河北部的三角洲地区和两岸（即下埃及）与尼罗河南部的两岸（上埃及）统一起来。学者们一般将该成就归功于一个半神话领袖，即那

① 据当代地缘政治学的说法，迦南范围指从叙利亚南部到巴勒斯坦人占有的加沙地区。

② 这件事发生在拿破仑·波拿巴占领埃及期间（参见第五章）。

③ 古埃及的历史年代在各种史料中都不相同，应该是近似年代。我依据的是 Shaw 2000b 著作当中的年代划分法。

尔迈（Narmer），他有时被称为美尼斯（Menes，这是他的希腊名字）。据说，那尔迈在扇形的尼罗河三角洲前修筑了孟非斯城，修建地点显示出设计者的深谋远虑；他还构建了一套持续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早王朝时期，埃及开创了一个与东地中海和努比亚（库什）之间的贸易网络。这样，作为跨文化交往的埃及历史的肇始至少可以上溯到文明伊始（和这个时代之前，因为此前，新石器时代的埃及已经从外部世界接受了先进思想与技艺，如从西亚引进动植物的驯养、栽培技术）。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约公元前 2686—前 2160 年）以金字塔建筑为显著特征。金字塔，即国王的坟墓，旨在保存国王的尸体。根据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国王死后，是唯一能够获得永恒的人。左塞尔（Djoser 或 Zoser）是第三王朝（约公元前 2686—前 2613 年）的国王，他命令伊姆霍特普（Imhotep）为他设计和修建了丧葬纪念碑。[①] 伊姆霍特普忠实地修建了一座近 200 英尺高的阶梯金字塔，该金字塔时至今日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四王朝（约公元前 2613—前 2494 年）在吉萨修建了类似的巨型墓地，该墓地因雄宏的金字塔和马斯塔巴墓（*mastabas*）而闻名。国王胡夫的大金字塔从地面到顶点的高度大约是 480 英尺。高度位居第二的金字塔是国王哈夫拉（Khafre）的金字塔。大多数学者认为临近金字塔的那个斯芬克斯“面孔”雕刻的是国王哈夫拉的形象。国王门卡乌拉（Menkaura）（约公元前 2532 —前 2503 年）的金字塔是三个金字塔中最小的一个。古王国的统治者们最终被神化为“太阳神拉之子”，这不可避免地把精神与政治层面联系起来了。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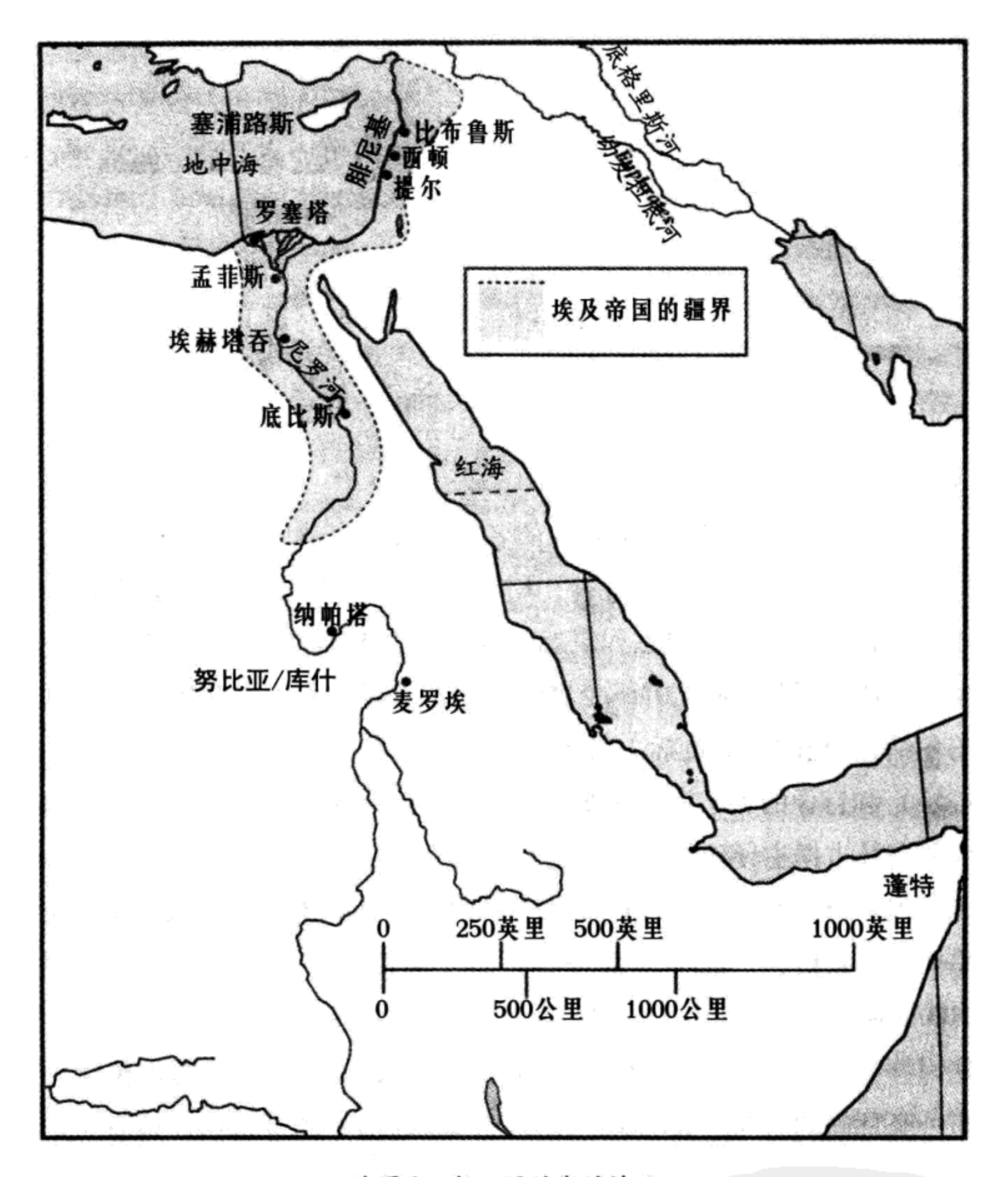
埃及文明遭受了一个无常而动荡的分裂时代，被称为第一中间期，即从公元前 2160 年持续到公元前 2055 年。历史学家们把这种状况归因于国王的孱弱、祭司集团与贵族之间的敌对斗争以及（低

① 伊姆霍特普（Imhotep）是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博学者（知识广博）。他是国王左塞（Djoser）的首席大臣，也是建筑师和医师。

洪水水位导致的）农业歉收和气候变化。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公元前2055—前1650年）社会秩序混乱，埃及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就此诞生。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国王们统治着埃及中部的底比斯，不断巩固中央集权。森努塞尔特一世（Senusret I，约公元前1956—前1911年）修建了一条人工水渠，把尼罗河三角洲与红海连接起来（Russell 2001，xiii；Hitti 1970，32）。在森努塞尔特三世（塞索斯特里斯）（约公元前1870—前1831年）统治时期，埃及的势力从叙利亚扩张到库什（到达了尼罗河第二瀑布）。中王国文学强调了社会伦理和道德责任，是埃及文学的黄金时代。埃及人强调来世无性别歧视的共同体情感与民族精神，把埃及人团结在一起。这种来世生活是对所有人的潜在奖赏。“亚洲的”迦南人，即施行暴政的喜克索斯人结束了中王国在埃及的统治，埃及进入了第二中间期（公元前1650—前1550年）时代。

喜克索斯人渗入而非侵入埃及。他们在埃及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最终控制了埃及北部。与此同时，库什王国也从南面打压埃及，迫使埃及人在地缘政治方面受到排挤，发生政治危机。喜克索斯人接受了埃及人的文化，并作为国王象征性地进行统治，但他们也与其西亚的同胞保持密切联系。由于这种跨文化性的统治，喜克索斯人能够向埃及引入新技术，尤其引入了与作战有关的复合弓、马匹和战车，当地埃及人接受并将之付诸实践。

底比斯民众难以忍受埃及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最终爆发了起义。卡莫斯和他的兄弟雅赫莫斯（约公元前1550—前1525年）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开辟了蓬勃发展的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前1295年），催生了一种汹涌澎湃的爱国精神。埃及人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把“亚洲人”（喜克索斯人）和库什人驱逐出埃及。结果，埃及的战争驱动造就了一个强大帝国的产生。这个帝国把埃及的边境向北沿着东地中海沿海扩展到北部叙利亚，往东南扩展到库什境内的尼罗河第四瀑布。新王国的国王们是强大的统治者，他们称自己为“法老”（pharaohs）。



地图 3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

王后哈特舍普苏特（Hatshepsut，约公元前 1473—前 1458 年）担任摄政王时，篡夺了继子图特摩斯三世的王位，并把自己装扮成法老的模样（戴着假胡须）。哈特舍普苏特完全称得上是西方和世界文明第一位伟大的女性统治者。她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尤其是帝王谷中的葬祭庙。神庙的一个柱廊用雕塑的方式展示了她统治时期的一项伟大成就，即对蓬特的商业远征。蓬特位于非洲一角（今天的索马

20

里）。尽管她的成就并不在于使埃及人第一次到蓬特冒险，[①] 但雕塑形象地描绘了埃及人的船只、进口物品，例如植物和动物，以及埃及人对蓬特人的看法。这份无比珍贵的档案，描绘了埃及自然、经济和跨文化的历史。埃及人到蓬特的冒险，说明了其在南方和东方的海上定位，这最终导致了希腊化时代印度洋贸易的蓬勃发展。

21

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479—前1425年）以其在亚洲发动的诸多战役而彪炳史册，他将埃及帝国版图扩展到了最大领域。同时，埃及海军还控制了东地中海，法老也培养了自己对植物学和文学的兴趣。阿蒙霍特普四世（约公元前1352—前1336年）进行的宗教改革活动引起了很多争议。法老将他的名字改成了埃赫那吞（Akhenaten），即信仰新宗教，并崇拜阿吞神，用图画将阿吞描绘成一个太阳圆盘。埃赫那吞的一神信仰困惑和震撼着埃及的多神教社会。[②] 另外，法老离开了他的行政中心，并下令修建新都，后者被称为埃赫塔吞（即阿玛尔纳）。他的统治也标志着埃及统治向自然主义（而非理想的静态描绘）和肖像的美学审美转变。他去世以后，埃及宗教和文化传统再度复兴并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把埃赫那吞描绘为叛教者。十几岁的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约公元前1336—前1327年）恢复了历史悠久的宗教信仰，放弃埃赫塔吞，回到底比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约公元前1279—前1213年）统治时间极长，达66年。他因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而名声大振，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位于阿布·辛拜勒的法老巨大雕像。他还与赫梯缔结了和平条约，结束了两

---

① 中王国的故事《海难水手的故事》（*The Story of a Shipwrecked Sailor*）证明埃及人已经在红海进行贸易活动。早在第五王朝时期（公元前2494—前2345年），从事红海贸易的埃及人就到达了索马里海岸。关于蓬特的确切位置，史学界存在争议。学者们认为蓬特可能在苏丹南部或者厄立特里亚。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后续远征行动，是从尼罗河通过陆路到达蓬特。埃及最后一次远征蓬特似乎发生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184—前1153年）（参见 Shaw 2000a，322—324）。更多信息参见 Tyldesley 1996，145—146；Welch 1972，24—27。

② 历史学家们经常把埃赫那吞的宗教视作一神教的一种形式，但一神崇拜（monolatry）的说法更准确，体现了法老的信仰。一神崇拜是指信仰一个神，但不否认对其他神的信仰。

个帝国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冲突。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约公元前 1184—前 1153 年）恢复了埃及人在迦南地区的统治，并把利比亚人从埃及西部驱逐出去，埃及北部神秘的“海上民族”也被驱逐出境。[①] 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结束以后，埃及开始了防御和衰落时期，它的衰弱导致了外来力量的征服活动。

新王国中央权威瓦解后，埃及历史进入第三中间期，即从公元前 1069 年持续到公元前 664 年。从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 1069—前 945 年）开始，利比亚人成为埃及的主要管理者。他们的出现使人想起了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他们渗透并在下埃及定居，经常在埃及军队中作为雇佣军服役。喜克索斯人越来越多，逐渐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破碎的埃及，尤其是在第二十二王朝时期（公元前 945—前 715 年）尤甚。[②] 库什人侵入埃及，并建立了第二十五王朝（公元前 747—前 656 年），但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勇猛善战，把他们逐回了努比亚。埃及人在被征服期间时断时续实现了独立，例如，第二十六王朝暂时恢复了埃及的地位和声望。然而，公元前 525 年，波斯帝国国王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推翻了埃及政权，开始了外国人统治埃及的时代。波斯人统治埃及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不过期间也偶尔中断统治。这两个世纪几乎与古代埃及国王、王后和法老进行高贵而神圣统治的时间一样长久。

22

埃及的宗教、社会和文化价值观

埃及的多神崇拜和宗教伦理确保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其主导信仰末世论认为人是永生不死的。埃及人相信冥世生活是现世生活的延续，现世生活是暂时的快乐。他们认为人本身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

① 海上民族毁灭了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

② 埃及学者们认为第二十三王朝（公元前 818—前 715 年）和第二十四王朝（公元前 727—前 715 年）的国王是共同执政的。甚至库什人征服埃及以后，利比亚人仍在该地区实施统治。

名字、影子、巴（*ba*）、卡（*ka*）和阿克（*akh*）。[1] 巴在人死亡时释放出来，被描绘为人头鸟，等同于人的个性。卡被描绘为人的（不可见的）双胞胎，象征着个人的生命力。卡从尸体上离开并回来，需要营养。我们在坟墓中发现的食物就是用来为其提供营养的。它在尸体（或死者逼真的雕像）里休息，尸体必须保持完整和新鲜。因此，小心翼翼地清洗和保存尸体等制作木乃伊的科学仪式就成为必要的事情。

要想冥世生活得美好，个人在现世要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是随波逐流。按照《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的说法，信仰者必须行为正直，并虔诚地坚持玛阿特（*maat*）原则，即坚持道德秩序，也要经受考验。埃及死亡文化认为，人在死后的关键时刻，豺头神阿努比斯（Anubis）把象征真理的羽毛与死者的心放在天平的两端进行称量。如果心是纯洁的（因此是“轻的”），那么死者便与卡和巴（卡和巴统一为精神上的阿克）一起受到奥西里斯的欢迎。奥西里斯是冥府之神，是生命复活的象征。

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埃及人的宗教很有吸引力。征服者喜克索斯人和利比亚人都接受了它。埃及文化经数个世纪的传播深深地影响了库什人。尼罗河第四瀑布北面纳帕塔附近的砂岩金字塔说明了埃及宗教和建筑的影响。[2] 其次，地方价值观和信仰也影响到了被俘的以色列人，他们或许最初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时就到达了埃及。埃及谚语把玛阿特与希伯来圣经的《箴言篇》（*Proverbs*）中的正义联系起来（参见 Ben-Jochannan 1991, 24）。埃赫那吞改变信仰并向阿吞神祈祷，23 这件事情与《诗篇》（Psalm）第 104 篇的情节相似（Wilson 1958, 226—230；也参见 Ben-Jochannan 1991, 24）。跨文化精神变化的迹象是依情况而定，并非一成不变的。然而，埃及人和希伯来人的相互影

---

① 我们在叙述中对末世论的解释（the eschatological explanation）太过简单。还有一些关于阿克（*akh*）等其他作用的解释。更多信息参见芝加哥大学网站 http://oi.uchicago.edu/OI/DEPT/RA/ABZU/DEATH.HTML，或许对你很有帮助。

② 纳姆迪·埃勒（Nnamdi Elleh）认为，埃及的建筑艺术风格已经传播到了阿克苏姆、埃塞俄比亚和西非，而非仅仅传播到苏丹和库什王国（Elleh 1997, 47—48）。

响达几个世纪。这在约瑟的故事和《出埃及记》（*Book of Exodus*）中得以证明。事实上，希伯来圣经是一部有关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

埃及的社会结构类似于金字塔。国王或法老位于顶端，自上而下地进行统治，下面的各个阶层依次是祭司和贵族、自由民、雇佣兵、农民和奴隶。这种等级社会阶层并不是封闭的，允许社会流动。提升社会地位的方式是拥有美德和优点（典型个案就是对玛阿特格言的追求）。另一方面，腐败和堕落者则被降职。丧葬艺术表明埃及妇女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与两河流域的情况不同。埃及妇女拥有自己的事业，而遗产继承是按母系进行的。虽然哈特舍普苏特作为一名女性，在政治上是过分自信的典范，但传统上埃及王后在宫廷中则拥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大多数埃及人耕种土地，并于洪水季节在公共工程中劳作，履行缴纳国家税和宗教税的义务。埃及人的房屋通常较为舒适，有的甚至很奢侈，配有洗澡池或游泳馆。

外来征服者经常被埃及文化所征服，如喜克索斯人、库什人、利比亚人和之后的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根据迈克尔·赖斯（Michael Rice）和萨利·麦克唐纳（Sally MacDonald）的观点，埃及文化所展示的力量极富吸引力且较典型，外来者容易接受（例如建筑）（MacDonald and Rice 2003，4—5）。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在其争议性的著作《黑色阿西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1987）中宣称，希腊文明源自埃及文明。伯纳尔认为“埃及人殖民了希腊”，尽管这个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遭驳斥，但也重新激发了历史学家对埃及跨文化研究的兴趣。[①] 事实上，尽管埃及衰落了，但荷马和希罗多德还郑重其事地谈论埃及。如在《奥德赛》中，荷马因为埃及人拥有药典而羡慕他们

---

① 参见 O'Connor and Reid 2003。关于跨文化主义，参见 Folorunso 2003，77—92 和 MacDonald 2003，93—106。19 世纪中期，达夫·戈登（Duff Gordon）夫人认为“东方人”与“西方基督徒”之间的“真正不同”（*real difference*）几乎难以从宗教中发现，而是由“所有种类的概念和情感表现出来的……我们根本不是从《福音书》，而是从希腊和罗马获得的这些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在这里（埃及）是完全缺乏的”（Gordon 1969，173）。这些同情伯纳尔思想的人将会发现戈登的观察既好笑又颇具讽刺意味。

(参见下文)。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二卷全部写了埃及的历史。

埃及在跨文化交流中不仅仅是给予，还有收获，尤其在疆域辽阔的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埃及收获颇丰。收获之物从前文提到的军事技能到音乐器具和服饰，不一而足。从技术上来讲，埃及人的农业受益于古代提水装置（water-hoist，这种装置在新王国时期非常出名），即依靠萨奇亚（saqia）增加提水力量。这是一种用牛推动的水轮，据说是波斯人发明的。后来，在希腊化时代，这种提水装置依靠阿基米得螺旋桨提水。(Ritner 1998，2—3) 另外，亚洲人和库什人也作为战士、工人、仆人和奴隶为埃及人服务。埃及人的艺术和物质文化为库什人、蓬特人和利比亚人提供了各种画像，后者经常被带有偏见地设定为被征服者的姿态。(参见 O'Connor and Reid 2003，13—16)

24

埃及既独立又相互依赖的经济

埃及国家掌控经济体系，开发矿产资源，发展商业网络。因为拥有尼罗河，所以埃及在农业上是自给自足的，还把过剩的食物作为有价值的货物出口到国外。这些出口货物包括纸草纸、亚麻布、珠宝和玻璃。埃及国家还开采矿石并从事黄金和绿宝石的商业贸易。尽管埃及拥有这些有价值的产品和资产，但自然资源极为缺乏。由于埃及经济依赖于国外市场，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相互依赖型的商业网络。提供雪松的比布鲁斯位于迦南北部［始于埃及第二王朝（公元前 2890—前 2686 年）］，疆域辽阔的埃及能够消化这些雪松。埃及也从克里特进口木材，从塞浦路斯进口铜。从埃及人坟墓中出土的纺织品也表明，埃及与中亚和东亚之间存在贸易交往。天青石来自阿富汗，是埃及人特别喜欢的次等宝石。

在非洲内部，蓬特为埃及提供植物和动物，这在哈特舍普苏特葬祭庙里的绘画有所显示。此外，蓬特还出口末药和乳香，埃及人将之用于宗教仪式。库什的资源财富包括黄金、黑檀木、象牙、树脂（用作香水）和野生动物。另外，商人穿越辽阔的撒哈拉沙漠，运送西非的黄金。当然，文化交流也是商业活动的补充。历史环境限制了埃及

的文化影响范围，然而，在其他人看来，埃及享有并始终拥有这种特殊威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征服者把他们的重重遗产保留在埃及的固有文明之中。然而，庞大的古代遗产和神秘的纪念碑令人想起古埃及早期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象形文字的释读和埃及学的发展使古代历史以奥西里斯崇拜的方式得以复兴。在20世纪，当地精英和民族主义者认同了显赫的古代王国（见第七章）。今天，古埃及物质文化的展览在博物馆大为流行。准确地说，贝聿铭（I. M. Pei）在巴黎卢浮宫建造的玻璃金字塔便是古埃及永恒性的见证。

25

迦太基：西地中海的强国

迦太基的历史始于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商业民族，讲闪族语和印欧语，居住在迦南北部，即今日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南部。他们的书面语言最终影响了希腊人的书面语言。腓尼基人在被驱逐到沿海地区以前，在迦南内地种植农作物。他们在沿海地区建构了城市国家，例如比布鲁斯、西顿和提尔，并发展海上运输。腓尼基人也沿着地中海甚至沿着伊比利亚和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建立了殖民据点和殖民地。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850年，这些地区繁荣昌盛，且处于独立地位。甚至当他们臣服于强大的西亚诸国时，这些城市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治。腓尼基人以其卓越的贸易才能而声名卓著，他们是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地中海中间人。商人尤其看重腓尼基人的紫色纺织品，这种纺织品用颜料染色，而这种颜料则是从一种小软体动物骨螺的分泌物中提取的。迦南的雪松是另一种重要的出口货物。商人也从酒、武器、玻璃器皿、珠宝、纸草、象牙和其他货物的转运中赢得厚利。

腓尼基人特别重视他们的北非殖民地。据说，约公元前1100年，他们在今日的突尼斯建立了尤蒂卡（Utica）和盖德（Gades）殖民地，

后者即西班牙的加的斯（Cadiz）。[①] 目前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殖民地建立的时间较晚，兴盛于公元前 8 世纪。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分散在阿尔及利亚，包括伊克希姆和希伯，分别是今日的阿尔及尔和安纳巴。利克苏斯（Lixus）是大西洋海岸附近摩洛哥的一个重要殖民地。腓尼基人也冒险进入大西洋。据说，他们到达了不列颠和爱尔兰。[②] 希罗多德非常羡慕腓尼基人的航海事业，宣称他们也进行了环球航行并到达非洲。腓尼基人最著名的殖民地——迦太基——的居民继承了腓尼基人的船舶驾驶技术和航海事业。

布匿战争（Punic Wars）之前的迦太基历史

26 迦太基位于今日的突尼斯。据说，迦太基是由一个叛变的腓尼基王后在公元前 9 世纪晚期建立的，这个王后名为艾丽萨［Elissa，也被称为黛朵（Dido）］。[③] 历史学家们目前认为它实际上是由城市国家提尔在公元前 8 世纪中期到晚期发展起来的。几个世纪过去以后，迦太基最终变成了独立国家，吞并了古老的腓尼基商业殖民地，控制了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到伊比利亚的地中海沿海地区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广大区域。迦太基也统治了马耳他、巴利阿克群岛（Balearic Islands）、科西嘉和撒丁岛。正如沃明顿（B. H. Warmington）所提到的那样："作为城市国家的迦太基试图像一个帝国那样进行统治，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Warmington 1969，47—48）。迦太基人与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都对西西里岛领土怀有野心，并先后发生冲突。

由于柏柏尔人（Berbers）的力量虚弱，迦太基人最初几乎不费吹

① 腓尼基人及其殖民地继承人迦太基人对西班牙的自然资源，例如锡、银、铅、铜和铁颇感兴趣。

② B. H. 沃明顿质疑腓尼基人到达了不列颠（Warmington 1969，77），尽管他在早期著述中认为伊比利亚西海岸的"塔特西安人"（Tartessians）与不列颠和爱尔兰存在贸易关系（ibid.，24）。

③ 史蒂法纳·格赛尔（Stéphane Gsell）认为迦太基建立的时间为公元前 814 年至前 813 年（Gsell 1920—1928，vols. 1—2）。参见 Warmington 1969，26—31。

灰之力就征服了北非内地的柏柏尔人部落。不过，他们对附近怀有潜在敌意的部落征收贡赋。迦太基人寻求贸易交换机会，尤其是诸如金、银、铜和锡等金属贸易。迦太基人在充当柏柏尔人和地中海商人中间商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随后，柏柏尔人也参与跨撒哈拉贸易，从而为迦太基人提供了额外的商品（包括战士和奴隶）。迦太基人认识到与柏柏尔人维持亲密关系的政治和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柏柏尔人不仅仅是重要的商业伙伴，还是迦太基人骑兵的辅助力量。[①] 在迦太基的影响下，柏柏尔人也发展起来，如突尼斯西部和阿尔及利亚东部的马赛利人（Massyli）和马萨赛丽人（Masaesyli）以及西非和摩洛哥的毛利人（Mauri）。[②] 这些部落发现迦太基人的文化富有魅力，很适合他们——这是跨文化交往的突出个案。

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迦太基人在麦格尼德王朝（Magonid dynasty，很可能是君主选举政体）的统治下变得更自信了。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迦太基人受到希腊人的威胁与日俱增，后者同样富有进取心。公元前580年，二者因争夺西西里岛而爆发战争。同年，希腊人试图在迦太基人控制的地区修建一座城市。迦太基人驱逐了希腊人的入侵，但其他地方的冲突仍在继续。希腊人威胁到莱普提斯（Leptis，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莱普西斯）和加迪斯（Gades，伊比利亚的加迪斯）。他们也排挤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的地位。公元前480年，迦太基国王哈米尔卡（Hamilcar）入侵希腊，但凶猛的暴风雨摧毁了执行任务的军队。在希莫腊战役中，西西里岛城市国家锡拉库扎（Syracuse）的僭主格罗（Gelo）和希腊人战胜了人数占据优势的迦太

27

① 马匹或许来自埃及和利比亚，这是最重要的跨文化交往个案。

② 被同化的柏柏尔人有时被视作“利比亚腓尼基人”（Libyphoenicians）。

基人。[1] 希罗多德所引用的一份迦太基人传统文献记载，大灾难导致国王哈米尔卡在向神献祭时自杀了。（Herodotus 1978，499）然而，沃明顿认为哈米尔卡“是在执行一次献祭活动时被刺杀的”（Warmington 1969，53）。

这场灾难以后，哈米尔卡的儿子汉诺（Hanno）改变了迦太基人的政策。他与柏柏尔人作战，把迦太基人的势力从的黎波里塔尼亚推向北非内陆，扩张到摩洛哥。[2] 这次政策转变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也是经济层面的。经济体系从主要以商业和海运为主，逐渐转向越来越多地包含农业成分。精明狡猾且富有进取精神的迦太基最高统治者通常与柏柏尔人合作，而非压制他们。[3] 从战略层面来说，这种友善的关系既促成了二者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也在经济补偿方面有利可图。为了补充迦太基人的国库，汉诺实施财政紧缩政策。迦太基人始终关心的事情是希腊人是否给迦太基人造成威胁，首当其冲的就是锡拉库扎。但是，到公元前 5 世纪末，迦太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并重新在西西里岛保持强大的优势地位。

公元前 4 世纪，迦太基和锡拉库扎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公元前 311 年，为了铲除敌人，迦太基人发动了另一场重要战争。然而，迦太基人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锡拉库扎僭主阿加索克利斯。当迦太基人围困这座城市时，阿加索克利斯聚集他自己的军队，秘密地离开锡拉库扎，入侵北非，迫使迦太基人停止进攻。他打败了迦太基人及其与

---

① 公元前 480 年在希腊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恰恰在这一年，希腊人在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波斯人。考虑到腓尼基人在波斯军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历史学家们想知道迦太基人与波斯人是否协同作战，共同对付希腊人。沃明顿认为：“人们相信与像迦太基这样一个遥远而弱小的国家反目不会对波斯人的计划产生任何影响。”（Warmington 1969，52）古代的“僭主制度”意味着个人统治，这个人通常公正而非残忍地实施权力。

② 希腊人大败波斯人，导致雅典建立提洛同盟，后者控制了东地中海，因此限制了迦太基人的商业机会。据公元前 1 世纪的历史学家狄奥·克里索斯托姆的观点，汉诺（Hanno）对非洲的再定位具有转变民族性质的意味。迦太基人“从提尔人演变成了非洲人”（Raven 1993，11）。

③ 这对于被同化的柏柏尔人来说是不争事实。另一方面，迦太基人经常为了从邻近部落那里获得贡赋而诉诸暴力。

柏柏尔人的联盟（从公元前310年至前307年），随后包围了迦太基。尽管阿加索克利斯获得了胜利，但他没有把柏柏尔人集结到自己一边，更没给自己带来战略上的优势，这也验证了迦太基人与柏柏尔人发展友好关系的深谋远虑。[①] 阿加索克利斯在迦太基城墙外面被打败，撤离迦太基，返回锡拉库扎。在公元前258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见第二章）期间直到雷古拉斯（Regulus）入侵之前，迦太基没有任何直接威胁。[②]

迦太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几乎没有文献详细描绘迦太基的基本情况。据估计，迦太基人口在最多时可能达到了40万人。它在很多方面保持、承继着西亚国家的特征与遗风，例如布匿语言和字母的使用，对诸如巴力—哈蒙［Baal-(Hammon)］、阿施塔特（Astarte）、梅尔卡特（Melqart）、尤其塔尼特（Tanit）等迦南诸神的热情崇拜。迦太基宗教仪式包括儿童献祭。[③] 迦太基人最初实施君主制。到公元前4世纪，国家权力交给一个富人组成的公民大会（也被称为法庭或“元老院”）。公民大会每年选举两名行政官员或地方官员，后者被称为“苏菲特”（sufets）。[④] “三十人委员会”是从元老院中选出来的，也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迦太基的商业和农业富豪控制了国家。亚里士多德赞扬迦太基的“政体”，这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寡头制政体。雇佣兵由柏柏尔人和伊比利亚的辅助兵补充，构成了贵族政府的武装力量。[⑤] 在战争时期，公民大会也选举将军来领导国家（见第二章）。将军们没有固定的任职期限，有

28

① 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说服昔兰尼加的马其顿总督奥弗拉斯（Ophellas）与他结盟，矛盾的野心导致了奥弗拉斯被谋杀（参见 *Abun-Nasr* 1971，19）。

② 布匿（Punic）一词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对腓尼基人的称呼。

③ 据说，当阿加索克利斯进军北非时，迦太基人将几百个孩子作为祭品献给太阳神，以获得保护（Baal）。

④ 就领袖而言，苏菲特（Sufet）等同于希伯来的“先知”（shophet）或士师（judge）（《圣经·士师记》描述的情况就是这样）（Warmington 1969，140）。

⑤ 他们的希腊敌人也集结了军队，后者是由“来自不同地区的男士组成的”（Gsell 1920—1928，2：389）。

能力者（例如哈米尔卡·巴卡）能够长期垄断权力。

迦太基的主要贸易商品是人造纺织品、珍稀金属（尤其银和金）以及粮食（谷物、橄榄和酒）。它的商业交往范围延伸到西方文明及其之外的地区。灾难性的希莫腊战役（battle of Himera）之后，汉诺凭借聪敏睿智统治迦太基。他率领一支拥有60艘船只的舰队向西驶入大西洋，可能在到达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或者加蓬以后返回迦太基。[①] 与汉诺同时代的迦太基人西米尔克率舰队向北驶入了大西洋。[②] 他可能已经到达了布列塔尼半岛。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怀疑，他是否到达不列颠和爱尔兰这样遥远的地方。由于缺乏考古证据，沃明顿认为“西米尔克航行到不列颠”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Warmington 1969，77）。尽管如此，迦太基的战略据点还是出现在今日葡萄牙的大西洋沿岸。此外，迦太基人雇佣加拉曼替人，后者控制了撒哈拉贸易，用马匹驼运货物。[③] [单峰驼是在公元前1世纪和前4世纪（或许前5世纪）之间被引入马格里布的][④] 据说，迦太基人马格·巴卡（Mago Barca）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发动了几次跨撒哈拉的贸易远征。

希罗多德对北非人与次撒哈拉非洲人之间进行贸易的正常方式进

---

① 汉诺可能对重建或复兴大西洋沿岸的腓尼基殖民据点感兴趣（ibid.，1:507）。

② 这些事情或许发生在公元前500年和前450年之间。

③ 当时的撒哈拉并不像今天这样干燥。

④ 公元前7世纪，随着亚述人的征服，埃及出现了骆驼。（Hitti 1970，22）理查德·布列特（Richard W. Bulliett）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骆驼引入北非的详细信息。（Bulliett 1975，111—140）很多学者支持他的说法。这些学者相信主要是罗马人把骆驼用作托运货物的工具而引入北非的。他区分了文献证据说明的较早期“遭遇”和骆驼是如何引进的两个问题。例如，文献详细记录了公元前3世纪骆驼出现在利比亚西部这件事情（ibid.，113）。他写道：“或许从公元1世纪或2世纪开始，当罗马人的骆驼增加到一定量时，他们不得不决定用它们去做什么，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源自埃及和叙利亚的思想或许在把动物用作载重动物方面产生了影响，而且阿拉伯南部鞍状物与阿拉伯北部鞍状物一起被采用，或许推进了这种做法。”（ibid.，139）布列特提醒读者，柏柏尔人把骆驼用作产奶动物和交通工具，而在当时没有“重要的沙漠贸易”。他认为加拉曼替人的隔离状态限制了他们对骆驼的使用。（ibid.）然而，一旦他们意识到了骆驼能够提供军事和经济优势，那么他们就会在把骆驼引入较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并发挥作用。韦尔奇（Galbraith Welch）评价了骆驼的重要性：“在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动物起到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骆驼创造了一个大陆，或者说骆驼把一个大陆带给了全世界”（Welch 1972，137—138）。骆驼加速了商业发展，但是也“使游牧民族能够进行破坏性的活动，使他们不停地对定居土地施加压力”（Hillenbrand 1976，41）。

行了解释。据报告，那些与“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南”（beyond the Pillars of Heracles，即直布罗陀）的人进行贸易的迦太基人来到海滨，展示他们的商品。然后，当地人带着金子与价值相当的货物交换。他解释说：“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公平交易……那么他们就交付金子并带着货物离开；相反，如果他们认为金子太少了，便回到船上等待，而当地人返回来并增加金子，直到满意为止。双方都极为诚实”（Herodotus 1978，336）。迦太基也与它的西亚先祖居住地保持着的情感交往。这样，与腓尼基相似，迦太基在整个地中海及其以外的地方传播商品和文化。[①] 另外，迦太基与西西里岛希腊人的冲突，及其与希腊化埃及的商业竞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使迦太基人希腊化了。[②] 数年后，迦太基发现了希腊货币。尽管迦太基人有重商主义传统，但他们逐渐使用外国货币，并且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才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③]（Gsell 1920—1928，2：324）。此外，迦太基人非常看重他们与意大利的伊特鲁利亚人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与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相似，迦太基的跨文化特征使它变成了一个国际都市，一个世界城市。

大希腊和希腊化的北非

大希腊是指超过希腊大陆的广大地域，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我们思考一下以下有威望的名人：荷马、泰勒斯（Thales）、赫拉克利特（分别来自爱奥尼亚、安纳托利亚西南地区、土耳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古希腊哲学家）以及阿基米德（来自西西里岛）。希腊文明还深深地影响了马其顿人。他们居住在希腊北部，成为准希腊人或希腊化人。国王腓力二世（约公元前359—前

① 据说，迦太基人曾派遣远征军到阿拉伯地区和南亚，尽管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商人垄断了这些航线和商业。

② 在哲学领域，有迦太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公元前2世纪中期，迦太基人哈斯德·鲁巴尔（Hasd rubal）在雅典学院师从卡尔涅德斯学习。哈斯德·鲁巴尔以克里托马库斯的名字而为人所知，并最终成为一个著名学派的领袖（Moligliano 1975，5）。

③ 根据阿本—纳斯尔的观点，迦太基人经常进行物物交换，而且当他们确实要购买商品时，交易是用“他们销售商品获得的金钱”完成的（Abun-Nasr 1971，21）。

336 年)、亚历山大三世（或亚历山大大帝，约公元前 336—前 323 年）统治时期，希腊文化传播到西亚、中亚和南亚，也传播到埃及（参见下文）。

希腊人是腓尼基人的海上商业竞争者。公元前 14 世纪和前 13 世纪，《荷马史诗》中著名的“迈锡尼的希腊人”或许与“海上民族”（Sea Peoples）结成联盟。海上民族威胁到了埃及。在《奥德赛》（*Odyssey*）中，风暴把斯巴达国王墨涅俄斯（Menelaus）驱逐到了埃及。《奥德赛》的主人公返回斯巴达以后，谈及埃及的土地肥沃和医药神奇。荷马把埃及描述为“一个岛屿，这里肥沃的土壤可以生产世界上的所有药草……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治病术士，比世界上任何人更熟悉医药”（Homer 1996, 131）。这些描绘阐释了希腊人与埃及人长期密切交往的特点。从迈锡尼时代开始，希腊人就与埃及进行广泛的贸易。此外，《奥德赛》里面提到的吃人莲花岛（Lotus Eaters）“确信是……杰尔巴岛（Jerba、Djerba），后者位于（突尼斯海滨）的加贝斯湾（Gabès）”（Raven 1993, 8）。《荷马史诗》也提到了腓尼基人。

30

大约从公元前 1000 年开始，多里安人（Dorian）入侵希腊。随后几个世纪的社会和文化“融合”被称为“黑暗时代”。文字消失了，后来又以字母的形式出现，改编自腓尼基字母，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跨文化变迁（希腊人把元音加入到字母表中）。充满活力的希腊城市国家在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伊奥利亚和爱奥尼亚海岸发展，然后在希腊大陆繁荣起来。然而，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出现了。资源匮乏加上人口增加，引起了希腊城市国家之间冲突不断。二者两败俱伤，也推动了希腊殖民化进程。希腊殖民运动始于公元前 8 世纪早期，主要兴起于人口稠密的黑海地区和南部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岛。

北非的希腊人

据希罗多德记载，“利比亚人”（非洲人）与希腊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我看来，希腊人手持‘羊皮盾’，他们用利比亚妇女的衣服装饰阿西娜的雕像……希腊人从利比亚人那

里学到的另一件事情是驾驭战车（表明了希腊人与加拉曼替人的交往）”（Herodotus 1978，334）。希腊人也把北非作为他们建立殖民地的目标。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腓尼基人已经拥有重要战略地点，如迦太基。然而，小岛屿色拉（圣多里尼）遭遇了经济萧条和干旱，派殖民者到东利比亚沿岸。公元前631年，他们建立了昔兰尼城，而且利比亚东部被称为昔兰尼加。最终，希腊人在昔兰尼附近又修建了另外四个城市，建立了一个地域性的“大城邦”（Pentapolis）。[1]

尽管迦太基和昔兰尼东部的希腊人关注迦太基人，但迦太基和昔兰尼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和平地划分了疆界。[2] 昔兰尼的弱势促使它实施一种附属性的消极政策。在君主的统治下，昔兰尼繁荣起来，最终被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所控制。 31

希腊化时代的北非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击溃波斯人后，到达并占领埃及。[3] 他在位于埃及沙漠西部的锡瓦绿洲被祭司们宣布为“法老”。亚历山大大帝把希腊世俗主义与埃及宗教进行跨文化融合。公元前331年，他离开埃及继续征服亚洲诸国之前，修建了亚历山大城，这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他的将军们瓜分了他的庞大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之一托勒密狡猾地成

---

① 这四个城市包括欧里庇德斯（Euesperides，即班加西）、巴尔切（Barce）、乌切拉（Teuchira）和阿波罗尼亚。希腊人在今日被称为绿山（Jabal Akhdar）的地方定居，这是一个由高原和丘陵组成的地区，而且是利比亚最湿润的地区。

② 据说两国界线是这样设定的，奔跑者从迦太基和昔兰尼出发，朝着对方城市奔跑，并确信他们的会面之所便是两国边界。迦太基方奔跑者的范围令昔兰尼人大为惊骇。奔跑者为迦太基两兄弟，他们宣誓没有进行欺骗，并要求将他们活埋在疆界上，这是个荣誉问题。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两兄弟也变成了迦太基美德的榜样，赢得了希腊人的尊敬（参见Sallust 1967，111—112）。

③ 鉴于波斯与其西方总督（即希腊人）存在问题，公元前404年至前343年间的埃及独立并不稳定。在阿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III，公元前343—前338年）统治时期，波斯人直接控制埃及。在艾伦·劳埃德（Alan B. Lloyd）看来，亚历山大大帝结束了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没有人对此惋惜”（Lloyd 2000，395）。

为了埃及、昔兰尼以及塞浦路斯的保护人。[1] 托勒密及其子孙从政治和艺术层面把自己描绘为传统的法老和王后。埃及宫廷讲希腊语，首都从孟菲斯迁到亚历山大城，后者逐渐演变成一个国际都市，一个全球性的城市。

托勒密一世索塔尔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前285年），亚历山大城修建了博物馆和图书馆。[2] 博物馆有很多实验室。据说，图书馆藏书达60万至70万卷。国家资助这些"智囊库"式的机构，吸引着希腊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这里饱览群书。亚历山大城引领了西方文明，兴起了第一次"科学革命"。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0—前23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来自萨摩斯（爱琴海的一个庞大岛屿），在亚历山大城从事学术研究，提出了太阳系理论。医学家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公元前335？—前280年?）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卡尔西登（Chalcedon）来到亚历山大城，从事解剖学研究。他认识到大脑在管理神经系统和智力方面的重要性。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约死于公元前250年）成立了一所解剖学学校，被称为"解剖学之父"。欧几里得（Euclid，约死于公元前300年）在亚历山大城教学，并撰写了《几何原理》（*Elements*），这是一部几何学经典文献。前面提到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212年）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尽管他是锡拉库扎的公民，但也在亚历山大城进行学术研究。他提出了关于杠杆、滑轮和螺旋桨的原理，并证明其实用性。他后来撰写的关于流体静力学的著作提出了"阿基米德定律"，阐述了浮力和重量（即特殊的重力）的关系。阿基米德计算出 π 值约等于3.14159，即一个依靠直径划分的圆周的圆周率（the circumference of a circle）。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85—前194年）来自昔兰尼，是亚历山大科学革命的典型个案。埃拉托色

32

---

① 据说，托勒密成功地保护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后者被制成木乃伊，并存放在一个玻璃棺里面。亚历山大大帝的遗骸增强了托勒密统治的合法性。

② 在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和亚里士多德学会的启发下，托勒密王朝构建了国家的制度体系。博物馆位于图书馆里（Lloyd 2000，405）。

尼被任命为博物馆和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在诸多学科都很有造诣。他的学术旨趣包括天文学、文学、批评学和历史学。他在地理学方面造诣颇高，应用经线和纬线，计算出地球周长的近似值。希腊化时代其他重要的地理学家包括波西杜尼斯（Posidonius，公元前135？—前51年？）和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3？—公元25年？）。此外，萨莫色雷斯岛的阿里斯塔克（大约公元前217—前145年）是一个图书馆员和文法教师，擅长于文学批评研究。[①]（公元前3世纪的）诗人提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被认为是锡拉库扎的当地人）和昔兰尼的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以及（公元前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罗德斯岛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都在亚历山大城创作诗歌。

希腊化时代的埃及经历了辉煌和繁荣时期。大批移民来自希腊世界，尤其是小亚细亚和希腊诸岛。埃及还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犹太人社区。埃及人口增加的速度令人惊奇，可能到公元前1世纪末已经达到800万（这个数字直到现代才再次达到）。托勒密王朝积极地参与希腊化世界的“商业革命”。埃及船只有规律地往来于红海和印度洋之间，开辟了印度洋贸易的国际化。亚历山大灯塔被称为法罗斯（*Pharos*），高达400英尺，人们在25英里之外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亚历山大城街道广阔，商业繁荣。人口总和约为50万。在帝国时代的罗马城兴起之前，亚历山大城是希腊化世界的特大城市。然而，彼得·格林（Peter Green）警惕性地说道：“亚历山大城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从另一层面来看，也是消费主义的纪念碑。一个不稳定的、热爱奢华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宫廷和官僚体系耗光了全国的物质财富。”（Green 1990，158）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操纵和专制主义导致了财富的不均衡分配。另一方面，希腊人的统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埃及人将托勒密国王们视作法老，反过来，托勒密国王们也对其臣民表现出了极强的敏感性。

---

① 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编成24卷书。

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是北非历史上跨文化主义的典型个案。马其顿人的宗教信仰与埃及的宗教信仰交融在一起。例如，马其顿神塞拉皮斯（Serapis）变得更像埃及人。崇拜塞拉皮斯象征着希腊化时代埃及的宗教融合。希腊人的微妙影响还表现在埃及人的故事叙述中。正如罗塞塔石碑所表明的，希腊文、象形文字和世俗埃及语（时至今日仍在使用）形象地说明了希腊化时代埃及的世界性以及当代埃及的合作特性。托勒密三世奥厄葛提斯（Euergetes，公元前 246—前 221 年）在战斗中打败了塞琉古王国，找回了波斯人掠走的神像并将其返还给神庙，从而赢得了当地埃及人的尊重。尽管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成为埃及社会的精英，但埃及人也有机会从下层流向上层。埃及人和犹太人试图使自己希腊化，学习希腊语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把希伯来圣经的前 5 卷《托拉》（Torah）翻译成了希腊语，即《摩西五经》（Pentateuch）。

在政治上，埃及与它的希腊化邻居，尤其与前面提到的西亚塞琉古王国不断发生战争。希腊化时代的王后名声卓著。阿尔西诺二世（Arsinoë II，死于公元前 270 年）是一位即令人生畏又受人爱戴的军事领袖，证据是阿尔西诺二世与她的丈夫托勒密二世菲拉戴尔弗斯（Philadelphus，约公元前 285—前 246 年）的肖像一起被铭刻在货币上。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公元前 69—前 30 年）把希腊化时代埃及的跨文化特征更具体化了。她能够讲多种语言，其睿智令罗马最有势力的两个人物凯撒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神魂颠倒。她的故事将在第二章叙述。到克娄巴特拉时代，碎裂的埃及王朝依赖于罗马而生存。事实上，托勒密·阿皮安（Ptolemy Apion）曾统治昔兰尼，并于公元前 96 年把这座城市遗赠给罗马。

结论

就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命运而言，本章叙述的灿烂文明强调了北非的重要性。埃及的各种贡献，如数学、建筑学和农学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世界观影响到了西方文明的三大世

界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尽管马利克·本纳比的思想以穆斯林文明为核心，但古代埃及的宗教是以埃及文明为基础的，即人、土地和时间创造性、合作性的典范。人们对埃及的兴趣世代不减，一再证明了古埃及的永恒特性。从地区环境来看，除了与利比亚人有 34 接触并偶尔发生冲突外，古代埃及几乎未在马格里布产生直接影响。然而，埃及作为亚洲和非洲的枢纽，提升了马格里布地区的战略地位，推动着北非诸文明的流变。

迦太基作为大马格里布地区第一个文明单元而出现在北非舞台。它在地中海的力量表明了北非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和扩张中的重要性。跨文化敏感性强调了迦太基表层历史及其重要意义。迦太基人掌握了理解和欣赏不同民族文化的能力。另外，迦太基的复杂文化是通过其宗教万神殿和语言来表达的，给善于接受文化的柏柏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希腊人适时地出现在昔兰尼加。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它把北非与欧洲紧密联系起来。迦太基人和希腊人之间的西西里战争便起到了这样的桥梁作用。特别重要的是，希腊化时代埃及以开拓印度洋贸易和南亚市场为特征的“全球化”也将北非与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了。希腊化时代的宗教融合是跨文化主义的典型个案，巩固了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既是希腊化时代商业革命的中心，也是西方文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中心。罗马通过占有这些北非遗产而获利颇丰。

第二章　罗马和北非

35　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和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征服柏柏尔部落，统一了北非。北非的沿海与内陆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罗马化了，变成了一种都市化的儒雅文明。城市设计引人注目，城市规划者受到格外尊重。罗马特别看重北非经济的重要意义。马格里布盛产谷物和橄榄油。埃及出口谷物、玻璃和各种商品，希腊化的商人把这些商品运送出去，他们辛勤往来于厄立特里亚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网络之间。很多北非人对罗马文化和基督教传播做出了贡献。事实上，北非的省份比西欧地区更早地皈依了基督教。

日耳曼的入侵者，如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加速了罗马的衰落和西方帝国的终结。汪达尔人侵入北非，则结束了罗马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和突尼斯的统治。公元 6 世纪，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拜占庭人——征服了汪达尔人，恢复了帝国政府，但没有恢复昔日罗马帝国（Pax Romana，公元前 27—公元 180 年）统治下的和平。曾经拥有繁荣、稳定、富足和世界地位的拜占庭治下的北非，政治分裂、文化衰败，处于危险而虚弱的境地。

罗马与迦太基的对抗：布匿战争

公元前 509 年，迦太基与罗马签订条约，承认罗马摆脱伊特鲁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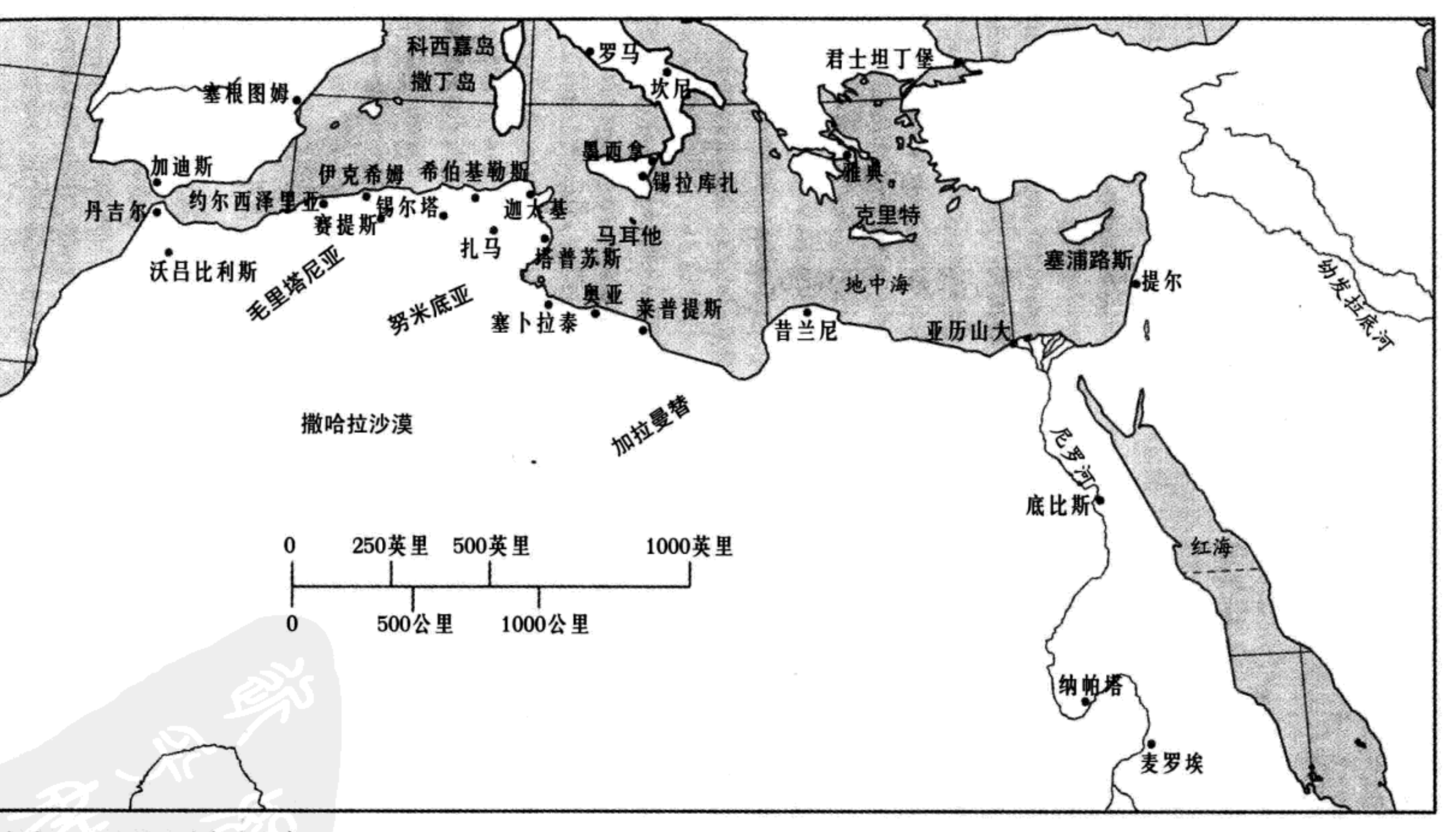
37

人（Etruscan）统治之后的独立地位。随后，双方签订一系列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关系。迦太基允许罗马在意大利自由发展。作为交换条件，罗马不干涉迦太基在地中海的贸易。公元前4世纪，他们还结成联盟，以对抗锡拉库扎有勇无谋的统治者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的进攻。公元前3世纪初，伊利里亚的国王皮拉斯（Pyrrhus）代表希腊人干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国家的内部事务，威胁罗马和迦太基的利益。罗马和迦太基再次结成攻守同盟。当伊利里亚国王撤退时，罗马占领了意大利最后几个处于独立地位的希腊城市国家。结果，西西里岛的希腊城市国家与崛起的罗马以及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迦太基人之间发动战争。不过罗马和迦太基也互相猜疑。

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起因是罗马保护海盗，后者夺取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之间）墨西拿海峡的一个战略要地墨西拿。迦太基人和希腊人反对罗马的这种做法，战争随之爆发。迦太基与罗马之间共进行过三次布匿战争，前两次战争决定了将由哪个国家控制西地中海。最后一次战争显然是由罗马首先发动的。战斗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物，例如汉尼拔（Hannibal）、西庇阿（Scipio）和马西尼萨（Masinissa）。三次史诗般战争最终使罗马在马格里布地区平稳立足。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

罗马同希腊爆发战争，前者获胜，后者是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盟友。迦太基海军袭击了意大利海岸线。公元前256年，执政官雷古拉斯（Regulus）率领一支庞大的陆军突袭迦太基，但斯巴达人克桑提波司（Xanthippus）和他的迦太基雇佣军在第二年摧毁了入侵者。战争期间，罗马创建了一支以迦太基人战船为模型的海军。为了增强罗马军队的海上作战能力，善于创造的罗马人拓宽了甲板，这种甲板被称为“鸭嘴板”（crow）。尽管罗马在海战中屡战屡败，但仍坚持不懈，并在公元前241年的埃加特斯群岛（Aegates Islands）战役中获得决定性胜利。双方缔结了和平条约，迦太基放弃了它在西西里岛的领土，并同意赔款。



地图4　罗马统治时期的北非

随后，迦太基爆发了“雇佣兵战争”（Mercenary War，公元前241—前237年），发动者是那些没有获得薪金的雇佣兵。此外，遭受残酷剥削的农民也揭竿而起并与雇佣军联合起来，冲突更加激烈。尽管情势危急，但迦太基仍幸存下来。政府重新组合，将军大权在握。[1]更重要的是，将军哈米尔卡·拜尔盖（Hamilcar Barca）在马赛利（Massyli）柏柏尔人同盟的帮助下，镇压起义。但是，罗马趁迦太基国内空虚，撕毁条约，占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并要求缴纳大额赔款。罗马的进攻引起了迦太基人的不满，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 38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

迦太基因遭受被罗马打败和悲惨的雇佣军战争的双重打击，向北扩张的势头有所收敛。不过它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伊比利亚南部（西班牙），以确保能够获得铜和银等资源。哈米尔卡·拜尔盖和他的养子哈斯德鲁巴尔（Hasdrubal）构想了一个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并付诸实施，显示了设计者的聪颖。迦太基重振雄威使罗马担心其对塞根图姆（Sagentum）的控制程度，后者是一个处于偏远地区的伊比利亚（和希腊）城市，处于罗马的保护之下。冲突不可避免地在迦太基和罗马的新盟友塞根图姆之间发生，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了。

汉尼拔指挥着这场战争。他既是哈米尔卡的儿子，也是罗马不共戴天的敌人。汉尼拔携带着西班牙的家族财产，这样可以不依赖迦太基的国库了。他募集了一支5.9万人组成的军队，但在途中损失了一多半。[2]他先与南部高卢（法兰西）的凯尔特人部落结盟，后在公元前218年穿越阿尔卑斯山，率领2.6万名战士侵入意大利。骁勇善战的柏柏尔骑兵是汉尼拔远征的“优势”（Livy 2006，47）。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战略家。公元前216年，他在坎尼将罗马军团重重包围，彻

① 迦太基昔日敌人锡拉库扎和罗马为迦太基提供了援助。

② 这个数字显然估计得过低，但原因还不得而知（参见Livy 2006的“引言”）。严寒刺骨的冬季和阿尔卑斯部落的袭击或许起到了重要作用，削弱了入侵者的力量（Dupuy and Dupuy 1977，63）。

底歼灭。据李维估计，罗马人损失了4.55万名步兵和2 700名骑兵(Livy 2006, 118)。但军事史学家认为，迦太基人损失了约6000人，而罗马损失了约6.2万人（Dupuy and Dupuy 1977, 66)。这次震惊于世的军事大捷鼓舞了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反叛罗马，并说服马其顿与迦太基结盟。尽管罗马遭受挫败，但还是从重重围困中恢复过来，反败为胜。罗马人阻止马其顿军队与汉尼拔军队的联合，这无论从战略层面、政治层面还是军事层面都是明智之举。此外，罗马人对希腊人或镇压或使其保持中立。公元前209年至前206年，杰出的罗马将领西庇阿（Scipio，公元前236？—前183年）在西班牙成功地打败迦太基人及其伊比利亚盟军。公元前204年，西庇阿从西班牙入侵北非，迫使汉尼拔从意大利撤出，并去保卫迦太基。公元前202年，西庇阿在扎马打败汉尼拔。双方签署和平条约，规定迦太基支付巨额赔偿金，把西班牙交给罗马，把大片领土交给罗马盟友“努米底亚”（突尼斯西部和阿尔及利亚东部以及阿尔及利亚中部）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

39 汉尼拔仍然是迦太基的领袖人物［也掌握着苏菲特（sufet）的职务］。尽管这座城市的政治地位降低了，但很快繁荣起来。罗马领导层再次感到恐惧，图谋对付汉尼拔。汉尼拔逃离迦太基，试图集结希腊化的东方人［即安提奥古斯三世（Antiochus III)］进攻罗马。与此同时，罗马人无情地蹂躏了迦太基人。汉尼拔被罗马人重重包围，被迫自杀。

汉尼拔军事才能的特点与伟大之处在于：跨文化敏感、战略敏锐以及英勇无畏。他知道如何与士兵沟通，理解并欣赏别人独特的价值。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他是西庇阿的家臣）在评价汉尼拔的生涯时，注意到迦太基人的领导才能：

> 有充分证据表明：汉尼拔的性格令人钦佩。他是一个天生的统治者，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尽管17年来他身经百战，尽管他不得不依靠无数野蛮部落开辟

道路，不得不雇佣不同民族的士兵冲锋陷阵，尽管他的事业令人失望且危险重重，但他从未成为任何人谋害的目标。他的追随者没有抛弃他，甘愿接受他的领导。（Polybius 1962，2：331）

李维描述汉尼拔特殊的跨文化意识时，引用波利比乌斯的慷慨评价：

> 汉尼拔军队是由各类人组成的，就语言、文化、法律、服饰、体貌特征和战斗的理由而言，这些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他根据情况给出各种勉励之词……高卢人会因为他们对罗马人特别本能的憎恨而被激励的意气风发。从崎岖不平的山里被驱赶下来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希望获得意大利的富饶平原，为胜利而战。汉尼拔告诉摩尔人和努米底亚人，马西尼萨的统治是如何的残忍而使他们心存恐惧。他既向这些人描绘战争的美好前景，又讲述不参与战争的恐怖后果，从而让这些士兵为他效力。（Livy 2006，602）

尽管波利比乌斯和李维钦佩汉尼拔的跨文化主义，但迦太基人的敏感性格是由数个世纪以来他们的重商主义和征募雇佣军的需求造就的。[①] 他们意识到迦太基的幸存依赖于积极而有耐性地与不同社会交流。迦太基人的跨文化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然的。 40

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

迦太基保持了独立地位，但已经不能对罗马构成任何威胁了。相反，努米底亚逐渐成为迦太基最大的威胁，前者国王马西尼萨渴求将

① 尽管汉尼拔（Hannibal）在罗马人中间营造恐怖气氛，但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认为“罗马人从来就没有忘记，汉尼拔是他们平生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劲敌。几个世纪后，他的雕像仍然矗立在罗马城”（Holland 2005，8）。

马格里布地区统一起来。努米底亚势力的发展，再加上罗马人担心迦太基再次复兴的病态恐惧，引发罗马对其竞争对手的另一次远征。[①] 在努米底亚盟友的帮助下，好战的罗马人在西庇阿的养孙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Scipio Aemilianus）的领导下，最终攻破迦太基的城墙。罗马人沉溺了幸存者，并毁掉了城市。据说，罗马人把迦太基城的地基犁为碎石，并象征性地给土地撒了盐，以阻止其复活。罗马人在北非成立新行省，设立非洲地方总督，并长期定居下来。

罗马占领北非

随着罗马人打败迦太基，特别是努米底亚，势力强大的柏柏尔人王国的影响日益剧增。此外，毛里塔尼亚（毛利人的国家）的西部与努米底亚接壤，包括摩洛哥。罗马人为了共同对付迦太基，已经与柏柏尔人，特别是马赛利人结盟，但随后他们的关系也恶化了，并爆发了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公元前1世纪，罗马司令官争权夺利，北非卷入其中，其结果是柏柏尔人王国和希腊化的埃及都寿终正寝。罗马帝国第一次统治北非的地中海沿岸以及从埃及到大西洋的内陆地区。

马西尼萨（Masinissa）和努米底亚王国（Kingdom of Numidia）

精明能干的马西尼萨（公元前240？—前148年）是马赛利部落的王子，曾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里服役。[②] 马西尼萨的父亲去世后，本部落中一位名叫赛法克斯（Syphax）的对手在迦太基人的支持下推

① 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前149年）结束了他在元老院臭名昭著的讲演，他的结束语是“我们必须毁掉迦太基”。

② 关于柏柏尔人和马西尼萨（Masinissa）的更多信息，参见 Kaddache 2003，37—52。

翻了他的统治，后者被迫流亡异乡。[1] 接下来，罗马支持马西尼萨。他重组军队，打败了赛法克斯。在公元前202年的扎马战役中，马西尼萨与西庇阿联盟，攻打汉尼拔。罗马的胜利确保了马西尼萨在权力继承方面拥有更多优势。罗马承认马西尼萨为“努米底亚”的国王，并把迦太基的一小块土地赠予他作奖励。

41

波利比乌斯亲眼见过马西尼萨，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国王中最好的人……身体最强壮的人”（Polybius 1962，2：511）。在波利比乌斯记述这些事件的约两个世纪后，李维仍不断地称赞马西尼萨是天生奇才。在他统治期间，马西尼萨王国成为一个从突尼斯西部延伸到阿尔及利亚中部的强大国家。他定都锡尔塔（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扩建陆海军，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推动农业繁荣。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后者的“成就最伟大、最神圣”（Polybius 1962，2：512）。他将自己设计为希腊化的统治者，在希腊化世界颇有威望。马西尼萨雕像成为洛斯岛的一道风景，洛斯岛是爱琴海上阿波罗神和阿耳特弥斯神的神岛。

尽管马西尼萨有领土野心，但他统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迦太基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当迦太基人试图支持努米底亚叛乱时，马西尼萨作出回应之举，在公元前154年夺取迦太基部分领土。迦太基唯恐版图尽失，试图与毛里塔尼亚结盟，保卫西部的努米底亚边界。这种战略主动姿态导致努米底亚与迦太基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公元前150年，努米底亚初战告捷，马西尼萨的下一计划就是吃掉迦太基。

---

① 据说，赛法克斯（Syphax）投靠迦太基的原因之一，是他与迦太基首领哈斯德鲁巴尔（Hasdrubal）的女儿索福尼斯巴（Sophonisba）陷入了爱河。哈斯德鲁巴尔出于战略上考虑把女儿嫁给了这位柏柏尔首领。李维描绘索福尼斯巴是一位“非常漂亮而又极富青春魅力的妇女”（Livy 2006，576）。罗马人捕获了赛法克斯后，索福尼斯巴进了马西尼萨的宫廷，成为后者的妻子。罗马人鉴于索福尼斯巴在迦太基人的巨大影响，要求马西尼萨将她交给罗马。马西尼萨尊重索福尼斯巴的意愿，并未将她交给罗马人，而是派仆人送去了毒药，她欣然地接受了毒药。据李维记载，她说：“我接受并欢迎这个订婚礼物。如果我的丈夫不可能给他妻子更好的礼物，请转告他：如果我的婚礼不与我的葬礼同时举行，那么我会无怨无悔地死去”（Livy 2006，580）。李维用文学色彩渲染了这个悲剧，但这也可能是个真实的故事，揭示了迦太基—罗马—柏柏尔人瞬息万变的政治复杂性。

努米底亚人的进攻促使罗马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北非国家迦太基的再度繁荣让罗马元老院心急如焚，感觉有麻烦了。

马西尼萨再次派出努米底亚军队支持罗马。迦太基的毁灭将更多的罗马人带到北非和非洲总督管辖区。无拘无束的罗马人对前迦太基地区巧取豪夺，努米底亚人寝食难安。另外，野心勃勃的罗马人还在努米底亚蠢蠢欲动。罗马成功地削弱努米底亚，并成为努米底亚的代理人。

朱古达与罗马的对抗和努米底亚的结局

努米底亚王室的继承问题与持续变化的地缘政治事件搅合在一起。才能卓著的马西尼萨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们实行联合统治，直到麦希普萨（Micipsa）控制国家大权。麦希普萨生有两子，即阿赫巴尔和希姆普萨。但麦希普萨的兄弟也生有一子，即朱古达。萨鲁斯特将这位努米底亚王子描述为“天赋神力，外表俊朗，更重要的是智慧超人”（Sallust 1967，39）。或许出于恶毒的嫉妒（正如萨鲁斯特所表明的那样），麦希普萨派朱古达率领努米底亚骑兵，去西班牙帮助罗马人对付凶猛的伊比利亚部落。期间，他担任罗马辅军，在执行危险任务时表现得十分英勇。麦希普萨被迫承认朱古达与其两子为共同继承人。公元前118年，麦希普萨去世，一场权力之争接踵而至。朱古达下令将希姆普萨处死，并打败阿赫巴尔。阿赫巴尔乘船驶往罗马，请求元老院的支持。朱古达效仿阿赫巴尔贿赂罗马。罗马元老院最终决定，将保护国一分为二，交给两位野心勃勃的王子统治。但战争并没有避免。朱古达围困锡尔塔，因为后者为阿赫巴尔提供庇护所。朱古达军队制服对手，杀死阿赫巴尔，屠杀平民，包括罗马人。朱古达重新统一了努米底亚，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罗马元老院迅速作出反应，调兵遣将攻打朱古达。努米底亚国王打败了罗马军队。随后，罗马人与朱古达签订了和平条约，以示安抚。该条约激怒了元老院。罗马元老院又派遣了另一支军队。尽管罗马人成功地占领了努米底亚的城市，但朱古达的大部分军队仍驻在乡村。

42

公元前106年，朱古达被罗马人打败，其岳父毛里塔尼亚国王巴克斯叛变，与罗马媾和，在一次伏击战中抓获了朱古达，后者死在罗马监狱。朱古达抵抗罗马帝国主义及其祖父的英明统治，在阿尔及利亚人的记忆深处产生了共鸣，并激励20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打击法国殖民主义。[①] 朱古达被捕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努米底亚君主国开始没落。

罗马把努米底亚大部分地区分给巴克斯（Bocchus），以报答他的合作之恩。与此同时，朱古达的同父异母兄弟高达（Gauda）成为傀儡国王。公元前88年，高达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兄弟阋墙，卷入了罗马的马略与苏拉之间的敌对斗争，各支持一方。苏拉获胜后，希姆普萨掌握了努米底亚。[②] 后来，希姆普萨及其后继者朱巴一世支持庞培对抗凯撒。公元前46年，凯撒率军到达努米底亚，削除了庞培—努米底亚同盟的威胁。[③] 朱巴一世在对抗凯撒军团的同时，国内民众也对其统治不满，不断爆发起义。在塔普苏斯战役中，凯撒以较小的伤亡击败了敌人，大获全胜。[④] 凯撒成立了新非洲行省，由努米底亚的大部分地区构成，是罗马的第二个非洲行省。非洲总督更名为非洲维图斯（Vetus）。凯撒对朱巴一世的儿子朱巴二世象征性地表示特殊的善意。朱巴二世在凯撒家长大成人，并成了屋大维的好朋友。屋大维是凯撒的外甥，即后来的奥古斯都。

43

罗马征服克娄巴特拉和希腊化的埃及

凯撒在追逐庞培的过程中到达埃及，遗憾地发现他的敌人已经于

---

① 著名的诗人和随笔作家让·安鲁什（Jean Amrouche，1906—1962）在《永恒的朱古达》（*L'Eternal Jugurtha*）（1943年）中认为努米底亚国王具有现代阿尔及利亚人的特征。

② 忠于苏拉（Sulla）的庞培（Pompey）的军队处死了失败的希尔巴斯（Hierbas）兄弟。

③ 凯撒的自传体著作《非洲战争》（*African War*）表达了他的观点。与汉尼拔相似，凯撒有能力统领“叙利亚人和不同种族的人们”（Caesar 1955，175）。

④ 据凯撒估计，他的军队“杀死了1万名敌人，并击溃了大量敌军”，而他仅仅“损失了50名战士，少量士兵受伤”（ibid.，281）。即使凯撒的估计夸大了他的成就，但他在努米底亚获得的辉煌战绩是不容置疑的。军事史家记录，凯撒损失了不到1000人，而6万人的庞培—努米底亚军队则死亡1万人，受伤和被俘者约1万人（Dupuy and Dupuy 1977，111）。

公元前48年被杀死。接着，凯撒卷入托勒密国王继承权的争夺战之中。凯撒支持克娄巴特拉和他的弟弟。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冲突中，埃及博物馆和图书馆遭到了严重毁坏，这对于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来说都是重大损失。[1] 凯撒被当时埃及的女王克娄巴特拉迷住了，带着她（和他们的儿子）一起回到罗马。克娄巴特拉到达罗马首都引起了一场轰动。公元前44年，元老们刺杀了凯撒，迫使克娄巴特拉返回埃及。在随后的内战中，克娄巴特拉支持凯撒复仇者的军队进攻擅长阴谋诡计的罗马元老院。马克·安东尼是凯撒的部下，也被克娄巴特拉的美貌迷住了。他与妻子离婚，并娶了埃及女王。

民间传说和好莱坞电影都把克娄巴特拉的形象打造为美丽绝伦、性感诱人的女性。正如普鲁塔克评论的那样，她不漂亮，并不是无与伦比的美人。相反，她的吸引力却在于她的智慧和跨文化个性：

> [她] 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她讲话的仪态和说服力以及对待其他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的特征都增强了她的魅力。她的语气和蔼可亲。她的舌头就像很多乐队的弦乐器，她能够轻易地讲出她喜欢的任何语言，她在与野蛮人会面交谈时，很少需要翻译员帮助，就可以回答大多数问题。无论野蛮人是埃塞俄比亚人、特罗格罗迪特人（Troglodytes）、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米底人，还是帕提亚人。

---

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撒的《亚历山大战争》（*Alexandrian Wars*）是这样开篇的："亚历山大几乎是防火之城，因为他的建筑物没有任何木制材料，是由拱形建筑物固定在一起的，屋顶是用粗灰泥或泥瓦建造的。"（Caesar 1955，11）当然，房屋内部是有易燃物质的。仓库或图书馆里面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极具珍贵价值的书籍"，可能被毁掉了。正如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指出的那样，"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因为这场无可估量的损失而受到谴责"（Holland 2005，319）。公元389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颁发敕令，导致了亚历山大"姊妹图书馆"被毁。菲利普·赫梯（Philip Hitti）指出，阿穆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将图书馆中所藏书稿付之一炬的故事"使美好的虚构变成了恶劣的历史……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征服的时代，亚历山大根本没有重要的图书馆"。（Hitti 1970，166）约翰·保罗·鲁索（John Paul Russo）也反驳了穆斯林有罪的观点，并指出"图书馆是因为疏忽，在第二、三个世纪毁掉的"（Russo 2005，66）。亚历山大学者索斯琴尼（Sosigenes）帮助推算了凯撒的"朱利安"历法（"Julian" calendar）（Ritner 1998，3）。

据说，她会讲很多民族的语言。(Plutarch 1988, 9: 197)

简单讲，克娄巴特拉能与任何男人周旋。她知道如何运用权力，如何有效地实施权力。她致命的政治缺陷就是野心勃勃，而这种野心也是安东尼所拥有的。 44

后三头政治集团指的是屋大维（Octavian）、马克·安东尼和马库斯·雷必达（Marcus Lepidus）。他们在成功击败了元老院军队后，开始了为控制罗马而进行终极对抗。雷必达退位后，屋大维统治了罗马西部，马克·安东尼、克娄巴特拉统治罗马东部。狡猾的屋大维将安东尼描绘成为一个没有能力、不称职的领袖，后者已经放弃了罗马的美德，这个男人已经被狡猾的克娄巴特拉东方化了。[①] 而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梦想着统一从亚历山大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创建一个庞大的希腊化帝国。双方的竞争引发了一场内战，对北非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公元前31年，屋大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在亚克兴角（Actium）决战，前者在这次重大海战中获胜。这对眷侣双双殉情，埃及成为罗马共和国的一部分。屋大维意识到了埃及的巨大财富，把埃及省置于罗马的直接统治之下，并把昔兰尼加并入克里特和爱琴海的管理体系之中。

朱巴二世和罗马最后代理人柏柏尔王国的终结

精明的屋大维接受了国家元首（*Princeps*）或第一公民的头衔，巧妙地为自己无可竞争的权力罩上了合法面纱，并隐秘地将共和国重组为帝国。公元前27年，元老院宣称屋大维为奥古斯都。屋大维对北非的规划牵涉到了朱巴二世，后者在屋大维的家内长大成人。奥古斯都安排朱巴二世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女儿克娄巴特拉·塞丽妮

① 安东尼在对抗强大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即帕提亚人时，遭遇惨败。而公元前53年，帕提亚人摧毁了克拉苏率领的军团。

（Cleopatra Selene）结婚。考虑到毛里塔尼亚王朝已经结束了，奥古斯都选择朱巴二世和克娄巴特拉·塞丽妮为北非代理君主。他们以约尔西泽里亚［Iol Caesarea，阿尔及利亚的舍尔沙勒（Cherchell）］为中心，重组并治理毛里塔尼亚，包围了阿尔及利亚中部和摩洛哥。[①] 国王夫妇在首都修建了金碧辉煌的王宫。[②]

朱巴二世（约公元前25—公元19年?）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博学之人。他用希腊语撰写了一些历史、地理著作以及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论文和文学戏剧。不幸的是，这些非凡大作完全遗失了（他对科学也很感兴趣，特别是植物学）。朱巴二世创建了一座著名的图书馆。据说，图书馆藏有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作品（Roller 2003，158）。普鲁塔克非常钦佩朱巴二世，称其为“最有成就的国王”（Plutarch 1988，9：31）和“希腊最有修养的历史学家之一”（Plutarch 1986，7：571）。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吸收了朱巴二世的许多学术成果。作为一位“文化地理学家”，朱巴二世担任罗马帝国的顾问，准备帮助罗马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开疆扩土。

45

朱巴二世的统治开创了马格里布地区的繁荣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罗马的前辅助军塔克法里纳斯人（Tacfarinas）领导的柏柏尔人叛乱才结束。这场叛乱始于公元17年，结束于公元24年。另一个柏柏尔人首领马兹帕（Mazippa）与塔克法里纳斯人结成联盟。罗马人费了很大力气才镇压了叛乱，塔克法里纳斯人被打败。

当时，托勒密已经继承其父的王位，当上了毛里塔尼亚国王。他在罗马受到民众欢呼，激怒了善变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约公元37—41年）。卡里古拉下令将托勒密处死。考虑到皇帝声名狼藉的日常个性，这一残忍行为或许纯粹是由于嫉妒。另一方面，为什么要保留代理国王呢？事实上，公元40年托勒密去世以后，柏柏尔人再次叛

① 公元前33年，毛里塔尼亚国王巴克斯（Bocchus）去世，该王朝结束了。罗马人统治毛里塔尼亚，直到朱巴二世（Juba II）作为罗马的代理国王行使统治权为止。

② 他在沃吕比利斯（Volubilis，现在的摩洛哥）建立了第二个宫廷。

乱（由埃德蒙领导），罗马解散了王国，并将其分成两个行省：毛里塔尼亚丁基塔纳（Mauretania Tingitana）和毛里塔尼亚凯撒里希斯（Mauretania Caesariensis）。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沿海地带更名为非洲总督区。

尽管罗马人镇压了努米底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但利比亚费赞地区的加拉曼替人始终保持独立，并经常对邻居怀有敌意。我们确信加拉曼替人把文字带到撒哈拉沙漠，也将马匹和车载运输技术引进该地区，他们提供了非同寻常的跨文化服务。此外，他们还构想出引人注目的农学，可以从撒哈拉地下蓄水层挖掘地下灌溉通道（*foggaras*）[1]（参见 Keys 2004，Introduction）。然而，罗马人认为加拉曼替人是对其北非领地的威胁。在科尼里乌斯·巴尔巴斯（Cornelius Balbus）的率领下，一支罗马远征军行军 400 英里，深入撒哈拉沙漠，并于公元前 19 年占领了加拉曼替人的首都加拉马（基尔马），这是一场非常突出且符合逻辑的军事成就。[2] 尽管罗马人渗入到了北非撒哈拉地区，即今日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但除了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外，他们从未征服这个地区。[3]

罗马人与库什人沿埃及—努比亚边界在北非南部展开冲突。公元前 25 年，罗马军队在普布利乌斯·佩特罗尼乌斯（Publius Petronius）的率领下，在一次攻打女王“坎迪斯”（Candace，约公元前 41—前 12

---

① 此水文地理特征也与穆阿迈尔·卡扎非的当代“大人工河”（Great Man-Made River）项目相关（见第八章）。

② 巴尔巴斯（Balbus）是一位来自加迪斯（Gades）的伊比利亚人，他因战斗功绩突出而获得罗马公民权（Pliny 1942，245）。巴尔巴斯胜利后，他在罗马举行凯旋庆祝活动，这种礼遇，对外国人来说还是第一次（参见 Wellard 1967，66）。

③ 除了巴尔巴斯而外，苏维托尼乌斯·鲍里努斯（Suetonius Paulinus）横跨阿特拉斯山脉，进入西撒哈拉地区。到公元 1 世纪末，塞普提姆斯·弗拉库斯（Septimius Flaccus）和朱利亚·马特努斯（Julius Maternus）也进入了撒哈拉地区。弗拉库斯可能已经到达了今日乍得湖地区的提贝斯提山脉（Raven 1993，63；也参见 Pliny 1942，229—231）。罗马人也听说过尼日尔河（参见 Pliny 1942，251）。

年）的战争中，毁掉了库什首都纳帕塔。[1] 在皇帝奥古斯都的外交斡旋下，罗马人与库什人把疆界确定在希拉·塞卡米诺斯，后者是托勒密埃及的疆界，位于阿斯旺以南大约 80 公里的地方（Jackson 2002，149）。这个疆界持续了 300 年。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两国贸易繁荣起来了。库什王国内陆的麦罗埃地方的一个亭子表明罗马的商人曾到过那里，也展示出了罗马对跨非洲和跨撒哈拉贸易的兴趣。（参见 Elleh 1997，54—55）另外，罗马人在埃及的沙漠东部开采石料，还在沙漠西部的绿洲定居下来（参见 Jackson 2002）。普林尼指出罗马人还沿着大西洋探险。西庇阿任命“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率领一支探险队沿着大西洋海岸探测矿藏。西庇阿曾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指挥罗马军队。尽管罗马人没有冒险往南进入汉诺地区，但普林尼后来提供了关于沿海地区的大量信息（Pliny 1942，Book V，225）。

46

罗马统治下北非的生活状况

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北非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北非农业的发展，罗马对北非谷物的依赖日益增强。[2] 再者，几百个新城市迅速崛起。罗马统治时期的北非也为柏柏尔人融入社会提供了机会。很多柏柏尔人吸收并擅长使用拉丁语。另一方面，边境上难控制的柏柏尔人部落偶尔会造反。奥古斯都在边境上部署了第三支奥古斯都军团，这是一支令人敬畏的军队。从历史上来看，这支军团是一个跨文化群体，最初由高卢人和意大利人构成，后来由安纳托利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以及努米底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包括军团士兵生下的孩子）操

① 坎迪斯这个词的发音与麦罗埃语（Meriotic term）中用于表示女王的词语坎达克（kandake）相近（参见 Ritner 1998，11）。关于麦罗埃，普林尼还说：“它由一位妇女进行统治，这个妇女的名字是坎迪斯，这个名字由后来继位的女王使用了很多年（Pliny 1942，477）。在 Acts 8：26 中，坎迪斯被称为“埃塞俄比亚人的女王”。

② 努米底亚人和其他北非农民也在地窖里储存谷物，旨在保护或保藏谷物，以备战争之需（Caesar 1955，247）。

控。[①] 在伊比利亚人、色雷斯人、达尔马提亚人和地方辅助军的支持下，罗马军队在300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威慑者的角色。另外，一排排被称为古罗马边境城墙（*limes*）的前哨阵地，也确保罗马统治时期的北非免受外来力量的掠夺。

一个都市化、温文儒雅的北非

罗马统治时期，古老的城市繁荣起来，例如埃及的亚历山大、利比亚的昔兰尼、莱普提斯、奥亚和萨巴拉塔。公元前29年，屋大维重建了迦太基，罗马人长达一个世纪的恐惧结束了。迦太基再次变成了地中海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②] 迦太基成为著名的文化和学术中心。[③] 罗马人设计了一座辉煌的城市，例如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提姆加德（Timgad）和杰米拉（Djemila）。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其他重要罗马城市包括提帕萨（Tipasa）、伊科锡温（Icosium）、赛提斯［Sitifis（Sétif）］、约尔西泽里亚［Iol Caesarea，舍尔沙勒（Cherchell）］、希伯基勒斯［Hippo Regius，今日的安纳巴（阿纳巴）］和泰贝萨［Theveste（Tébessa）］。泰贝萨是奥古斯都第三支军团的几个驻点之一。[④] 摩洛哥内陆的沃吕比利斯继续繁荣发展。罗马城市以竞技场[⑤]、商业区、运动比赛地点和浴室为建筑风格。[⑥] 军团士兵修建公路，把这些城市连接起来。复杂的水利设施，尤其是沟渠（例如突尼斯乡村那些沟渠）

47

① 公元2世纪，军团越来越多的从地方征募新兵。这样，柏柏尔人最终在第三支奥古斯都军团里占据主导地位（参见 Albertini et al. 1937，1955，66—67；Ayache 1964，49）。

② 迦太基在复杂程度和规模上堪与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相匹敌。据估计，迦太基大约有30万至40万居民。它再次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城市。

③ 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学习，他说："我发现自己的学习环境充满活力"（Augustine 1961，55）。几年后，他在迦太基开办了一所学校（ibid.，120），这是他皈依基督教以前多彩生活的一个舞台（参见下文）。很多北非富人也送孩子到雅典或罗马学习。相较于帝国的其他地区，北非妇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机会。

④ 皇帝涅尔瓦（Nerva，96—98年在位）授权成立杰米拉（Djemila）和赛提斯［Sitifis（Sétif）］军团。罗马人在图拉真（Trajan，98—117年）统治时的公元100年建筑了提姆加德（Timgad）。今日的提姆加德是给人印象最深的罗马废墟之一。

⑤ 突尼斯的帝斯德路斯（Thysdrus）拥有一个堪比罗马圆形大剧场的竞技场。一些城市还有表演团队。提姆加德的剧场约有3700个座位（Ayache 1964，65）。

⑥ 提姆加德具有先进的用水供给系统，包括13个公共浴室和冲水公共厕所。

和暗渠（*qanats*）（与 *foggaras* 相似）（从上坡蓄水层引出的地下水道）（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建筑的那些地下水道），提供水源。（Reebs 2006，14）据估计，马格里布地区（不包括埃及）有500至600座城市。

优美的镶嵌画装饰着上流社会的家园。普通城市家园的特色是一面面没有窗户面向街道的外墙，内庭被很多房间环绕。这种空间构造将通过跨文化交往传播给阿拉伯人。居民可以使用的公共设施，城市设计者给穷人提供了浴室和其他娱乐设施。城市居民是最罗马化的：他们讲拉丁语，为帝国政府服务。外围或更远地区的柏柏尔人部落使用的布匿语言、字母以及当地方言都留存下来。

发达的农业为城市提供给养。罗马人鼓励谷物生产，北非成为罗马帝国的粮仓。据估计，从公元1世纪始，埃及每年出口50万吨粮食（Raven 1993，81）。橄榄油生产和葡萄栽培（酒的生产）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柏柏尔人游牧民提供牲畜和毛织品，而撒哈拉部落制造皮革制品，在撒哈拉以南地区贩卖奴隶。[①] 此外，北非还通过海上运输为罗马竞技场和马戏团运送野生动物。[②]

埃及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行省，以玻璃生产和谷物出口为主要特征。另外，厄立特里亚海（红海和印度洋）的贸易繁荣起来。南亚的产品，例如丝绸，到达罗马。[③] 斯特拉博（Strabo）观察到这一点：

> 在当时……庞大舰队被派遣到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最南端那些遥远的地方，将最有价值的货物带回埃及，然后再运送

① 北非存在大规模的奴隶经济。卢修斯·阿普莱斯（Lucius Apuleis）的妻子留给她的孩子们400个奴隶（参见下文）。据说，梅勒妮（Melanie）在公元5世纪初开始修道生活（并最终变成圣徒）之前，释放了她的北非地产上的几千个奴隶（Ayache 1964，55）。

② 尽管埃及也是一个重要的野生动物贸易市场，但在此期间马格里布地区仍有大象和“大型猫科动物”，如狮子和豹子（Raven 1993，5）。事实上，（根据华盛顿特区国家动物园提供的信息）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阿尔及利亚仍然有印度豹。

③ 从中国到西方的丝绸之路包括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希腊化时代的商人利用了这条道路，并从中获益。普林尼担心印度的支付平衡问题，因为他估计“印度每年吸收我们帝国的财富超过5000万塞斯特斯（sesterces，古罗马货币名），然而返回给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卖的价格是其最初价格的上百倍”（Pliny 1942，417）。然而，考虑到帝国经济的规模，这种贸易失衡是无关紧要的。

> 到其他地区。结果，埃及可以收取双重关税，即出口关税和进口关税。而且，价值越高的货物，关税也越重。亚历山大不仅接受这类货物，还为外部世界提供其他资源（Strabo 1949，53—55）。

世界大都市亚历山大是除罗马之外的帝国第二大城市，仍然保持着希腊化文明的跨文化国际大都市的声誉。①

48

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 年）将埃及形象地称为跨文化通道，体现了埃及的重要地位。他在埃及出生，对波斯和印度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影响到他对柏拉图思想的反思。他变成了新柏拉图派哲学的首倡者，最初在亚历山大教学，后来在罗马教学。他用神代替了传统的柏拉图思想或关于美的形式。根据普罗提诺的观点，通过融合理性和精神力量，与神融合起来，人们便能够探求绝对的形式（真理）。这种哲学与宗教的混合说明了西方文明的变化过程和思想状况（Naylor 2000b，127—128）。普罗提诺的思想对北非基督徒的精英产生了深刻影响（参见 Brown 1967，88—100，425—426）。

著名的罗马化北非人

北非人在整个罗马历史上，特别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Pax Romana，公元前 27 年至公元 180 年）声名卓著。罗马的柏柏尔族奴隶特伦斯（Terence，公元前 185—前 159 年）由于善于哄诱主人，最终获得自由，并被允许接受教育。特伦斯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也是西庇阿的朋友。图拉真皇帝（约 98—117 年）统治时期，来自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卢修斯·昆图斯（Lucius Quietus）成为享有威望的军事指挥官和元老。他曾被视作皇帝的候选人，后来被政敌哈德良

① 斯特拉博（Strabo）还说：孟菲斯“是由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与那些曾居住在亚历山大的人颇为相似。”（Strabo 1949，89）尽管埃及局势一般较稳定，但在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统治时期，埃及的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爆发了骚乱。从公元 115 年至 117 年，社区暴力一再发生，随之而来的严厉镇压几乎使那里的犹太人灭绝了。

（Hadrian）的支持者处死。[1] 出生于锡尔塔的马库斯·科尼利厄斯·弗伦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100—160 年）成为罗马执政官，也是罗马帝国时期斯多葛学派著名的修辞学者之一。他还是皇帝马可·奥利略（约 166—180 年在位）的老师。卢修斯·阿普莱斯（约公元前 2 世纪）来自今天的阿尔及利亚，是小说《金驴记》（*The Golden Ass*）的作者。本书体现了高度凝练的拉丁语风格，对那些与伊西斯崇拜有关的仪式进行详细描述，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在“罗马治下的和平”时期，北非人占罗马元老院的三分之一，这证明了北非的重要性。

“罗马治下的和平”时期最后一位“优秀皇帝”（good emperor）马可·奥利略去世以后，帝国慢慢地衰落了，危机和冲突持续不断。北非出现了一个塞维鲁王朝，后者来自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莱普提斯。塞普提姆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 年在位）暂时阻止了帝国的衰落，但罗马成为一个军事化的帝国。在其妻子朱利亚·多纳（来自西亚）的帮助下，塞普提姆斯·塞维鲁平稳地让他的儿子卡拉卡拉（Caracalla）继承了王位。不幸的是，卡拉卡拉平庸无能，难堪皇帝大任。217 年，卡拉卡拉被谋杀，柏柏尔人马克里努斯称帝，但到 218 年就被废黜了。222 年，卡拉卡拉的堂兄亚历山大·塞维鲁称帝，但于 235 年同样被谋杀，塞维鲁王朝也随之结束。然后，从 235 年到 284 年，罗马的政治继承混乱无序，皇帝被称为“士兵皇帝”（包括北非的戈尔迪一世和戈尔迪二世），26 位皇帝中有 25 位都是暴病身亡。危急关头，帕尔米拉（Palmyra，叙利亚）的女王季诺碧亚（Zenobia）发动叛乱，反对罗马政权，并于 271 年控制了埃及，但随即便被打败。皇帝奥勒利安（Aurelian，270—275 年在位）和后来的皇帝普罗布斯（Probus，276—282 年在位）在打败帕尔米拉和重建埃及权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突袭见长的布莱米耶（Blemmye）部落再三袭击埃及的南部边境，罗马对埃及的控制减弱了。

49

① 我们可以从图拉真的功劳柱上看到奎耶图斯（Quietus）率领着不戴帽子的柏柏尔人骑兵。

此外，柏柏尔人周期性地发动叛乱，例如法拉森（Faraxen，253—262 年）、菲尔穆斯（Firmus，372—375 年）和吉尔多（Gildo，397—398 年）的叛乱，削弱了罗马权威。363 年至 367 年，撒哈拉的奥斯图里尼部落（Austuriani tribe）一再毁坏莱普提斯（及其周围的肥沃土地），不可抵抗的毁坏行为使这座曾经伟大的城市变成了不毛之地。

北非的基督教

由于诸多原因，基督教对北非人和罗马帝国的民众很有吸引力。基督教普世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教义深深吸引着追随者。耶稣基督的化身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与那些遥远的、神秘的和反复无常的神灵传统宗教有所不同。基督教的跨文化特性反映了希伯来人的一神论、埃及人的永恒观念和希腊人的哲学思想。[①] 在很多方面，基督教都综合了西方文明的信仰体系，尤其接受了北非丰富而有争议的表达方式。

北非的基督徒

基督教强调来世生活的“理想世界”（otherworldliness），与罗马帝国的社会现实发生冲突。再者，基督徒背离和拒绝尊重帝国信条，例如拒绝崇拜皇帝和服军役，引起了罗马人的猜疑。人们认为北非基督徒的炽热情感是破坏性的，从而激起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运动。北非最著名的殉道者有：公元前 203 年的珀培图亚（Perpetua）和公元 258 年迦太基的主教赛普里昂（Cyprian）。

50

北非出现了许多基督教早期的倡导者和理论家。[②] 特图利安（Ter-

---

① 查尔斯·芬奇（Charles Finch）认为埃及宗教极大地影响了“历史上基督教”的发展，例如体现复活思想的奥西里斯崇拜（参见 Finch 1991）。无论芬奇对基督教非洲根源的解释是否被接受，但基督教信仰与埃及宗教传统的联系，确实值得注意。

② 克里斯廷·默尔曼（Christine Mohrmann）意识到“基督教的拉丁文学首先出现”在非洲。她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认为下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即基督教社区的拉丁化过程不可能在罗马开始。”（Mohrmann 1961，109—110）北非人放大了拉丁文的基督教化过程，也大范围地传播了这种语言。当然，在埃及，科普特语和希腊语对基督徒有着深刻意义。北非在早期基督教历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tullian，160？—230 年?）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学家和著名的基督教辩论家。公元 197 年，他出版了诫勉性著作《辩解书》（*Apologia*）。米努西阿斯·费利克斯（Minucius Felix，大约生活在公元 3 世纪）写了一部著作《屋大维》（*Octavius*），这部名著被视作最早用拉丁文书写的基督徒对话集。迦太基人奥利金（Origen，185？—254 年?）把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哲学与他的基督教信仰混合在一起。他的神学方法论以“经院哲学”为例，应用并混合了哲学和基督教圣经。基督教会的高级教士最终宣布奥利金的作品为异端邪说。马略·维克托利努斯（Marius Victorinus，生活于公元 4 世纪）是一位重要的文法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最终皈依了基督教，对奥古斯丁产生了深刻影响（生活于公元 4 世纪的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是另一位基督教皈依者，是皇帝康斯坦丁之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的家庭教师。犹太学者斐洛（Philo，公元前 20？—公元 50 年）来自亚历山大，把柏拉图思想灌输到了他的希伯来圣经和犹太教的研究之中。

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成为基督徒的发源地。按照基督教的传统，福音传道者马克在亚历山大鼓吹和劝诱下改宗。安东尼（250？—350 年?）拒绝唯物主义和世俗生活，并在沙漠中寻找孤独的生活方式。他的遁世修行激发了修道院制度。公元 4 世纪初，阿里乌斯（Arius）质疑三位一体（Trinity）的统一性，从而产生了基督教影响范围最广的异端，即阿里乌斯教（Arianism）。阿塔纳修（Athanasius）是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反对阿里乌斯的基本主张。大主教因坚定地维护教义，著作颇丰，在教会内赢得了尊重。

值得关注的是，妇女在埃及的基督教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 380 年出生在亚历山大的阿玛·赛克雷提喀（Amma Sycletica）非常有魅力。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富有，但选择了修道的生活方式。她的作品预示着公元 7 世纪约翰·克里马库斯（John Climacus）作品的问世，后者是生活在西奈的修道士，也是东正教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神学家提升的阶梯》（*The Ladder of Divine Ascent*）的作者。公元 5 世纪，一名叫做玛丽的妓女从埃及旅行到耶路撒冷。据说，她在进入圣

棺教堂之前一度成了残疾人。她深感罪孽深重，后悔莫及，过着孤独而圣洁的生活。通过这种方式，她赢得了尊重并成为圣徒。

尽管基督徒通过忏悔和牺牲使自己声名远扬，但他们也毁坏了异端神庙和雕像，或者使神庙转变为教堂。① 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的冲突在亚历山大非常激烈。391 年，亚历山大的大主教提奥菲洛斯（Theophilos）下令毁掉了塞拉皮姆（Serapeum）神庙，这个神庙是最受人尊重的希腊化神庙之一，还是一个著名的图书馆。此外，公元 415 年，基督教的极端主义者谋杀了亚历山大的希帕蒂亚（Hypatia），后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异端哲学家、科学家和教师。她的遇害通常被解释为野蛮宗教狂热的表现和对人文科学研究的偏狭，而且她的遇害也与本地区政治动荡有关。她在亚历山大社会的突出地位，尤其对国家支持教会（政府官员支持主教）这种现象的洞察，引起了这次暴行。除了宗教问题，希帕蒂亚卓越的社会地位对占主导地位的大主教构成威胁。基督教作家们后来对她的遇害表示哀痛（参见 Dzielska 1995）。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来自亚历山大的基督教修辞学家，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凯瑟琳，被异教徒折磨致死。后来，基督徒们对凯瑟琳的殉难和圣徒身份大加赞美。

51

到公元 5 世纪中期，北非和西方文明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发生了变化。基督徒或资助或加入到几千座修道院。这种现象缘自巴库缪斯（Pachomius）榜样的力量。公元 4 世纪早期，巴库缪斯在尼罗河沿岸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并制定了基本制度。公元 6 世纪，圣凯瑟琳修道院在西奈地区成立，前者成为那些有才气的基督徒肖像和手稿保存之地。② 诸如亚历山大附近的圣美纳斯之类的教堂，成了重要的社会和宗教中心。

325 年，尼西亚大公会议拒绝了包括阿里乌斯教（Arianism）在内的其他宗教。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而非人性的基督一性论（Mono-

① 391 年的一份帝国敕令宣布异教信仰为非法宗教。

② 埃及的基督徒普遍喜欢肖像研究（iconography）。彼得·布朗注意到“科普特人修改了伊西斯（Isis）哺育幼儿荷鲁斯的肖像画”（Brown 1971，143）。

physitism）也吸引了埃及的基督徒。这一精神运动产生了重要的世俗后果。它不仅抗议国教（established Church），还再次引起了埃及人对希腊人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仇视，这些特权是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2年到达埃及后赋予希腊人的。451年，卡尔西登大公（Chalcedon）会议把基督一性论者（Monophysites）谴责为异端，而由拜占庭人（参见下文）对其实施惩罚。由于东正教/天主教会和基督一性论/科普特教会（后者或许是第一个“新教”教会）产生分裂，希腊语逐渐取代科普特语成为埃及教会的语言。

52 与此同时，多纳图派（Donatism）出现在马格里布地区，这个教派宣扬教会领袖的圣洁、美德和奉献精神。多纳图派是根据努米底亚的主教多纳图的名字命名的。多纳图派信徒坚信神父是无罪的。他们坚决谴责那些在大迫害期间（persecutions）尤其是303年至305年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迫害时期（参见 Frend 2004，260—261）进行妥协的神父。教会反对多纳图派信徒，倡导者希尔库西良的足够热情，都使多纳图派具有了反对正统派的特征。[①] 前面提到的菲尔穆斯和吉尔多的叛乱获得了多纳图派的坚决支持。

阿里乌斯教和多纳图派由于罗马帝国另一次内战而兴起，这场内战结束了戴克里先的“四头政治”（tetrarchy）。[②] 324年，康斯坦丁再次统一罗马。313年，支持基督教的康斯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对基督教实施宽容的政策。康斯坦丁的系列举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即支持基督教、主持尼西亚大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基

---

① 叛教者和护教者提出的要求经常导致基督教内部的恐怖行动，而且这些暴力事件使我们联想到了当代北非伊斯兰主义的争论和冲突。

② 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为了结束长期以来的继承危机和冲突，设计了这个复杂的制度。它实际上增加了继承困难，权力之争变得更为激烈。另外，它导致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分裂。内战时期，竞争对手毁掉了锡尔塔城（Cirta），但君士坦丁重建此城。为了纪念后者而更名君士坦丁堡。但它对于以穆斯林为主的阿尔及利亚来说，是基督教罗马皇帝的第一份遗嘱。戴克里先也从行政区划上重组了北非，把埃及西部划归到缩小了的毛里塔尼亚、丁基塔纳（Tingitana 很快就被放弃了）、恺撒里希斯（Caesariensis）和西提菲斯（Sitifensis）。罗马人治理努米底亚北部的锡尔滕斯（Cirtensis）和南部的米利坦纳。非洲总督北部行省更名为兹格特塔纳（Zeugitana），中心地区更名为拜扎卡纳（Byzacena），东部地区更名为的黎波里塔尼亚。

督教总部以及他在临终前皈依基督教。这说明了罗马国家是如何认同基督教的。康斯坦丁的统治在西方文明史上具有决定意义。正如伯纳德·路易所说："康斯坦丁在公元4世纪早期皈依基督教（公元4世纪末期），并确立基督教为国教，这引发了双重变化：即罗马的基督教化和耶稣基督的罗马化。"（Lewis 2002，98）

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作为教会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塔加斯特城［Tagaste，今日的桑克阿拉克（Souk-Ahras）］的本土居民。他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图解式地详述了自己曲折的心路历程，这本书导致他皈依了基督教。《忏悔录》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杰出的自传著作之一。奥古斯丁带领读者领略了罗马帝国后期的精神迷惘和宗教狂乱。根据克里斯汀·默尔曼（Christine Mohrmann）的观点，"作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忏悔录》的本质是（它）既是历史叙述，也是沉思录"。（Mohrmann 1961，381）彼得·布朗（Peter Brown）钦佩奥古斯丁的宗教混合主义："《忏悔录》是一部独特的心灵历史，展示了一个人对拉丁语的精彩运用。这个人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能够把维吉尔、普罗提诺和《圣歌》的韵律结合起来"（Brown 1971，118）。康斯坦丁皈依基督教，并于公元387年在米兰接受高级教士安布罗斯（340—397年）的入教洗礼，之后返回北非，成了希伯基勒斯（Hippo Regius，今天的安纳巴）的主教。奥古斯丁的作品很多，包括《上帝之城》（*City of God*）。这本书是一部有价值的基督教哲学史。[①]《上帝之城》主要叙述了410年日耳曼部落西哥特人对罗马骇人听闻的掠夺。他宣称罗马异教徒的唯物主义导致了这场大灾难。奥古斯丁的作品对多纳图派信徒构成挑战，411年的迦太基大公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谴责他们为异端。[②]

53

① 奥古斯丁主张历史目的论的观点，本书结束于耶稣再临。他写作《上帝之城》的时间是413年至427年间。

② 君士坦丁于314年召开阿尔勒大公会议，旨在处理多纳图派（Donatists），但没有成功。

汪达尔人的到来和拜占庭恢复“罗马”的势力

公元430年，就在日耳曼人的部落汪达尔人围困罗马城时，奥古斯丁去世。在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当中，汪达尔人数量有限。[①] 他们没有沿着通常的路线前进，即穿过意大利进入罗马，而是绕过半岛，向西南挺进，于409年到达西班牙。429年，在雄心勃勃的国王盖塞里克（Gaiseric）的率领下，汪达尔人带领约5—8万名追随者从西班牙进入北非（Pohl 2004，38—39）。他们在康斯坦丁去世一年以后占领了希伯基勒斯。几年后，迦太基陷落。

汪达尔人敢于冒险，英勇无畏。与其他外来入侵者一样，他们对柏柏尔人的跨文化特征极为敏感。柏柏尔人联盟推动汪达尔人向北非内陆扩展权威。刚刚在北非立足的汪达尔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由柏柏尔人指挥的舰队控制了西地中海，汪达尔人占领了撒丁岛、科西嘉岛、西西里岛和巴利阿克群岛。455年，在盖塞里克的领导下，汪达尔人掠夺罗马达两个星期之久，“比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对罗马的进攻更彻底”（Pohl 2004，40）。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屡次将汪达尔人驱逐出北非，但都失败了。[②] 在拜占庭人看来，汪达尔人对阿里乌斯教的忠诚、多纳图派的宽容和官方教会的迫害加剧了野蛮人在“罗马人统治下”的北非造成窘境。

汪达尔人的臭名昭著需要修正。“汪达尔人的作风”（Vandalism）一词出现在18世纪晚期。其实，汪达尔人的破坏性并不像其他野蛮人严重。例如，对罗马的掠夺是有计划、成体系的，而非混乱无序的。掠夺的战利品和财宝均被收集起来，并运载到北非。与散布于地中海的其他日耳曼部落相似，汪达尔人也罗马化了，并表现出强烈的文化

54

---

① 至此，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前者的首都是罗马城，后者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罗马城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马格里布地区的谷物，因为埃及谷物主要供给新首都君士坦丁堡（Warmington 1954，59）。

② 君士坦丁皇帝将拜占庭（Byzantine 或 Byzantium）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

混合特征。根据朱迪斯·乔治（Judith W. George）的观点，“汪达尔人统治下的北非……为诗人和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诗歌这一证据间接表明罗马统治时期的文化生活仍很丰富并将继续下去。它或许因为汪达尔人的出现而放慢了脚步，或者改变了发展轨迹，但仍在发展”（George 2004，143）。尽管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将汪达尔人描绘为“奢侈者”和颓废者，但一本经细心考证的著作表明这些“野蛮人”拥有文雅气质和巨额财富：

> 自从汪达尔人拥有利比亚以后，他们每天泡在浴室里，沉溺于美食、豪饮，他们的餐桌上摆着陆地和海洋里出产的最佳美食。他们佩戴黄金，在剧院和竞技场以及狩猎等娱乐活动中穿着昂贵的丝绸。他们有舞者、哑剧演员等观赏剧目，这些剧目具有音乐性，或者有值得他们关注的地方。（Procopius 1953，257）

然而，拜占庭人认为汪达尔人公开侮辱了他们的政治理念、文化认同和历史情感。正如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指出的那样，“皇帝们从未放弃收复（北非）行省的希望”（Diehl 1966，1：3）。普罗科比（Procopius）重申（并夸大）地说：“利比亚人在较早时候就是罗马人，且处于汪达尔人的统治之下。这绝不是他们自己的愿望。利比亚人在野蛮人的控制下已经忍受了很多暴行。出于这种原因，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投身于汪达尔人的战斗之中”（Procopius 1953，175）。查士丁尼皇帝（公元527—565年在位）残酷无情，是拜占庭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一心想恢复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雄风。

公元533年，拜占庭军队派遣了能力非凡的贝利撒留（Belisarius）并最终打败了汪达尔人。普罗科比（Procopius）是贝利撒留的秘书，陪同出征。尽管普罗科比对贝利撒留存有偏见，但他以跨文化的敏感把贝利撒留描述为具有汉尼拔和凯撒遗风的将军。贝利撒留指挥一支

由不同国籍的人组成的军队，包括勇猛的“匈奴”部队。[①] 534 年，拜占庭人消灭了汪达尔人残余，捕获了国王格力梅尔（Gelimer），后者被送到安纳托利亚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在地方长官所罗门的统治下，拜占庭人在北非沿海地区和内陆站稳脚跟。543 年，所罗门在阿尔及利亚多山的奥勒斯地区在与柏柏尔人的战争中去世（Procopius 1953，397—401）。拜占庭人的一些防御工事至今仍矗立在北非。[②]

“吃苦耐劳的”（hardy，普罗科比的描述）柏柏尔人经常承担沉重的税赋，并长期发动叛乱，挑战脆弱的拜占庭王国。拜占庭的外交和军事活动旨在确保各部落之间的合作。拜占庭人建筑了教堂和修道院，而传教士改变了柏柏尔人部落的宗教信仰（参见 Diehl 1966，2：527—528；Frend 2004，265）。然而，多纳图派由于坚持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这更加深了柏柏尔人的怨恨。

在拜占庭统治下，作为联系北非、西西里以及埃及商业中心的迦太基逐渐繁荣起来。与亚历山大一样，迦太基城也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海军基地。与罗马时的作用一样，北非重新发挥了为君士坦丁堡供给谷物的重要作用。恰如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强调的那样，拜占庭人在很长时间内维持并延续了罗马人的成就，尽管他们的政府常常是腐败和贪婪的[③]（Diehl 1966，2：594—595）。

602 年，莫里斯（Maurice）皇帝的遇害惹怒了赫拉克勒斯（Heraclius），后者是北非势力强大的总督或地方长官。他派遣自己的儿子（也称赫拉克勒斯）去鼓动北非民众反对新皇帝福卡斯（Phocas）。拜占庭北非行省的叛乱成功地推翻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

---

① 拜占庭人征服汪达尔人后，便把后者编进了前者的军队。军队有一个特殊的单位，被称为“查士丁尼的汪达尔人”（Procopius 1953，333）。另外，拜占庭人招募柏柏尔人，令其在北非边境线上巡逻（Diehl 1966，1：323）。

② Diehl 1966（vol. 1）提供了拜占庭围墙的详细图表。此外，突尼斯的拜占庭镶嵌画较为典型。

③ 北非在拜占庭时代的“再罗马化”（re-Romanization）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新生罗马政府的语言是希腊语，这种外国语以前从未在这个地区大范围地使用过。这种现象使帝国的权威人物看上去更像外来入侵者，而非历史辉煌的恢复者”（Kennedy 2007，202）。

阻止了埃及谷物的运输。610 年，小赫拉克勒斯称帝。随后，他率领拜占庭人多次对抗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当波斯人和阿瓦尔人围困君士坦丁堡时，赫拉克勒斯考虑把拜占庭的首都迁到迦太基。公元 617 年到 629 年，萨珊人占领并统治着埃及。然而，到 630 年，赫拉克勒斯聚集帝国力量，绝地反击并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位皇帝非但不能品尝其苦战获得的成果，反而将其耗尽。同一年，先知穆罕默德进入麦加，毁掉了在克尔白（天房）（Ka'aba）的偶像。伊斯兰教日益显示其强大的力量，而力量源泉源自一个非同寻常的、至高无上的“启示”。

结论

56 尽管罗马的政治权威和文化影响没有深入到北非内陆，但它的成就始终是令人惊叹的，这在其城市废墟中可见一斑。北非为罗马的强盛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对罗马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贡献颇多。北非范围广阔，从厄立特利亚海（Erythraean Sea）的商业到马格里布沿海平原的粮仓，不一而足。另外，在这个时期，尤其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北非罗马化的民众显得与众不同。

北非民众皈依基督教是宗教信仰跨文化传播的突出事例。尽管如此，宗教信仰变得颇有争议。阿里乌斯教的出现、基督一性论和多纳图派时北非基督教发生分裂，削弱了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马利克·本纳比在其研究成果之中宣称宗教巩固了文明。然而，在此时期，基督教的分裂和长期辩论破坏了曾经把传统的异教徒团结起来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力［或者如伊本·赫勒敦所说，是破坏了社会和文化的群体感（*asabiyya*）］。我们也将看到，这种凝聚力强化和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伊斯兰教将拥有自己的教派和“异端邪说”，但它为统一并创造跨文化的、宽容的和变化的新北非文明奠定了强大基础。

第三章　中世纪的北非——从伊斯兰教传入至柏柏尔人帝国

57　在上古时代晚期（late antiquity），北非和欧洲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境遇。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入侵欧洲，把他们的身份嫁接在基督教的希腊－罗马文明之上。正如第二章所述，日耳曼部落汪达尔人到达并在北非定居，控制西地中海沿海地区达一个世纪之久。比较而言，作为欧洲部族亲缘的汪达尔人在欧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在北非的短暂统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身份认同和深刻印记。随着罗马或拜占庭恢复在北非、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统治，地中海和北非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传统潮流似乎实现回归。这是一种幻想，因为就二者在北非的势力来讲，拜占庭从来就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

然后，阿拉伯人入侵并蹂躏了北非，导致了北非历史的分裂和中断。他们也带来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宗教，即伊斯兰教。尽管埃及人和柏柏尔人培育和参与的文明历史悠久，但阿拉伯人在北非遇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于西亚复杂。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注意到的，许多北非人，尤其马格里布地区的北非人，避免定居生活，处于“文明”生活的边缘地带，保持着他们的部落和游牧的原始生活方式。伊斯兰教在北非人中的传播，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融合，是北非和西方文明史中两件最复杂的跨文化交往事件。

伊斯兰教改变了北非。顺从真主意志，承认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从

北非出发，在西班牙、法兰西南部和西西里岛定居。当欧洲综合吸收了罗马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并发展出了一个新文明时，势力强大的、融合型的伊斯兰教文明与其伍麦叶、阿拔斯政权以及分裂的埃米尔国也出现在中东大地。北非在整合伊斯兰教现世和精神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非出现的自治独立国家，为穆斯林文明增加了亮点。目前，西方国家的教科书越来越关注这一点（参见 Peters 1972）。

58

伊斯兰教：服从真主意愿

610 年，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成功商人被告知去“诵读”启示。据说，这种“启示”（message）由天使贾卜里勒（Gabriel）传达。这件事情发生在麦加附近的希拉山洞，麦加是阿拉伯半岛的西海岸和内陆汉志地区的一个国际性城市。穆罕默德不断地获得真主启示，第三个伟大的一神教和亚伯拉罕宗教——伊斯兰教——从西方文明中诞生了。[1]

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很相似。宗教信仰的基本教义是一神（安拉，意思是“真主”）信仰，这个神与犹太人的耶和华（Yahweh），基督徒的上帝、天使是相同的。穆罕默德是“使者”（*rasul*），因为他提供启示，是最后的先知与封印万圣，摩西和耶稣（他们也被视作信使）也是先知。《古兰经》的意思是诵读，是由穆罕默德诵读真主之言（kalam）组成的。对于穆斯林而言，《古兰经》代表了真主的启示。《古兰经》与基督徒的《新约》篇幅相当，讲述了很多熟悉的故事，例如诺亚、约瑟、摩西和耶稣等（尤其与《马太福音书》相似，参见 Hitti 1970，125—126）。《古兰经》也被称为《圣书》（*al-kitab*），它并没有否认以前经典的启示，而是加以阐释和纠正。真主是至高无上的、仁慈的。《古兰经》的各章或节（共有 11 节）都以这样的话开头：“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反对任何将其他神或个人与真主相提并论或有所联系（即多神教的罪

[1] 亚伯拉罕被视作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与哈吉尔（Hagar）生下的儿子为伊斯玛仪。

孽)。对于穆斯林来说，三位一体思想与耶稣为“上帝之子”的概念都是不能容忍的。然而，伊斯兰教非常尊重耶稣和玛利亚。耶稣被视作信使和先知，而玛利亚不仅受尊重，她在《古兰经》中被提及的次数比在《新约·圣经》(*New Testament*) 里还多。《古兰经》提及“世界末日”或“末日审判”以及肉体复活思想。在伊斯兰教里没有“原罪说”(original sin)。《古兰经》规定了个人和公众的社会行为和伦理道德，以及诸如反对吃猪肉与饮酒的饮食禁忌，并因为它的简朴、实用而闻名于世。但伊斯兰教非常神秘，典型例子就是充满感情且美丽的真主神秘之光。[(Sura) 24:(*ayat*/verse) 35—36][①] 伊本·赫勒敦对此思考说：“我们的先知创造的奇迹，没有比《古兰经》更伟大的了，它把阿拉伯人团结起来，完成了它的使命。”(Ibn Khaldun 1967, 1:193)

59

“五功” (*ibadat*) 或“五根支柱” (*arkan*) 揭示了穆罕默德的启示：

1. 念清真言 (*Shahada*)：穆斯林相信真主为唯一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这是是否信仰伊斯兰教的证言。

2. 礼拜 (*Salat*)：穆斯林每天必须礼拜五次（日升、中午、下午三时左右、日落、晚上）。礼拜是法谛哈 (*fatiha*)，是《古兰经》（诵读）的第一节。

3. 天课 (*Zakat*)：穆斯林必须是仁慈的，对其他人慷慨施舍。这可能意味着提供宗教基金和施舍或者简单地给某人提供饮食。

4. 斋戒 (*Sawm*)：穆斯林必须在斋月的日升与日落之间禁食。斋月是伊斯兰历法的第九月。斋月还包括心理上的沉思。

5. 朝觐 (*Hajj*)：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位穆斯林应该到麦加朝圣，并执行与穆罕默德的生活和启示有关的仪式。到麦加朝圣把穆斯林世界的信仰者统一起来，增强了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吉哈德“圣战”的思想偶尔被称为“第六根支柱”，捍卫伊斯兰

① 参见 verse (*ayat*) 24:36；“光明惠顾光明，真主指引他的光明惠顾他所希望之人”。

教是穆斯林的神圣义务。先知穆罕默德把圣战划分为“较低层次的圣战”和“较高层次的圣战”。前者是与伊斯兰教的敌人进行的外部防御战，而后者是为成为更优秀的穆斯林而进行的内心斗争，或者像萨义德·侯赛因·纳斯尔所解释的那样，内心斗争是“与灵魂深处的消极倾向作斗争，这种消极倾向破坏我们的尊严，让我们难以达到真主所要求的至善至美”（Nasr 2003，34）。

穆罕默德未能吸引麦加人接受伊斯兰教。不过，他有几个重要支持者，即妻子赫蒂彻（死于619年）、表兄弟及女婿阿里·本·阿比·塔里布（Ali bn Abi Talib）和他最要好的朋友阿布·伯克尔（Abu Bakr）。另外两个皈依者，即未来的哈里发奥马尔·本·哈塔布（Umar bn al-Khattab）和奥斯曼·本·阿凡（Uthman bn Affan）。622年，穆罕默德及其信徒被迫迁离麦加，这个事件被称为希吉拉（Hij-ra）。他们受到了麦加北部城市叶斯里布民众的欢迎。[①] 叶斯里布城后改名麦地那，即先知之城，后者众人皆知。麦地那人接受了“五功”与其他教义信仰。事实上，伊斯兰教主张信仰者人人平等，不管他们的种族或社会背景。穆罕穆德继续在麦地那传播伊斯兰教，不仅为个人救赎提供指导，也为乌玛社区（umma）提供了发展方案。如伊斯兰教大大提高了妇女和孤儿的地位，给予妇女财产权。而欧洲妇女直到19世纪才获得这种权利（Esposito 2005，95）。[②]

60

穆罕默德曾希望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部落能够接受他的启示，但遭到拒绝。犹太人质疑穆罕默德的先知身份，而基督徒反对穆斯林否认耶稣基督为“上帝之子”以及“三位一体”的说法。穆斯林把犹太人和基督徒视作“有经典的民族”（People of the book）和“受保护民”（*dhimmis*）。[③] 穆斯林最终把犹太人驱逐出麦地那，这与其说是因

---

① 希吉拉也是穆斯林历法开始的标志。

② 阿拉伯社会内部的父权制主要源于返祖现象（atavisms）和传统，而非源于伊斯兰教。

③ 穆斯林认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经典。然而，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看来，穆罕默德的启示是以往经典的补充。但穆斯林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

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与麦加进行政治勾结。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为穆斯林社会和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欧洲基督徒相比，阿拉伯的基督徒在更为宽容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宗教信仰得到认可。尽管受保护民通常得到保护，但他们偶尔也要交纳税赋，甚至遭受迫害（参见下文）。尽管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社会中处于第二等级，但仍然有机会获得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萨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id Hossein Nasr）写道："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明……它还是一种精神的和无历史记载（metahistorical）的真实，这种真实已经改变了那些处于不同时空环境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和外部生活"（Nasr 2003，xi）。伊本·赫勒敦、马利克·本纳比和雅克·贝尔克都赞同纳斯尔的观点。他们深入研究了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兴盛与衰落历程，认为北非是伊斯兰教的庇护所，对西方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伊斯兰教不仅带来了亚伯拉罕的第三个宗教，还带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文明。

公正的引导者哈里发

61 630年，在穆斯林控制下，麦地那统治了麦加。穆罕默德进入麦加城，并毁掉了在克尔白（天房）（Ka'aba）的偶像，但保留了神圣的"黑陨石"，后者代表了真主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全知全能。[①] 两年后，先知去世了，穆斯林世界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穆罕默德生病期间带头礼拜的阿布·伯克尔继承并接管了先知权力，被称为哈里发（*khalifa*），意思是继承者或代理人。

在阿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担任哈里发期间，他镇压了叛乱，确保了阿拉伯半岛"乌玛"的安全。奥马尔（634—644年在位）继承了阿布·伯克尔的职位，命令既有精神支柱，又有世俗利益驱动的穆斯林军队北上进攻拜占庭和萨珊王朝，后者经历多次战争已经筋疲力尽。636年，阿拉伯人打败拜占庭人以后，占领巴勒斯坦和

① 穆斯林相信伊普拉欣（即亚伯拉罕）修建了天房，以纪念真主。

叙利亚。[①] 一年后，他们征服了萨珊王朝，伊拉克和伊朗接受伊斯兰教。639 年，阿穆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入侵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根据沃尔特·凯基（Walter Kaegi）的记载，穆斯林入侵时间较“合适”（propitious），因为拜占庭帝国内部正好因为继承问题而发生分裂（Kaegi 1998，54）。埃及也国力衰微，其原因有二：一是埃及国内东正教与基督一性论者因分歧而争权夺利；二是受拜占庭帝国的剥削。642 年，穆斯林占领了埃及，这对君士坦丁堡来说是重大损失。645 年，拜占庭人收复亚历山大，但在 646 年初便被击退了。当地埃及人对穆斯林的反应是不同的。尽管基督一性论者视伊斯兰教为异端，但穆斯林宗教信仰自由的许诺却对他们很有吸引力。[②] 而且，埃及人欣赏阿穆尔的政治才能和社会责任感，例如禁止劫掠。[③] 埃及再次从地理上将非洲与西亚连接起来，变成了阿拉伯人沿北非海滨向西进攻的基地。阿拉伯人于 642 年占领昔兰尼加，并于 643 年进入的黎波里塔尼亚。阿拉伯人在征服期间修建的城市较为分散，如在埃及修建了福斯塔特城（Fustat），后来在突尼斯修建了凯鲁万城。[④] 这种精明的城市战略将阿拉伯人的力量集中起来，但面对广阔的统治区域，阿拉伯人的统治方式也经常进行适当调整。尽管阿拉伯人具有游牧传

---

① 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占领圣地标志着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开始。事实上，1099 年，欧洲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之前，穆斯林就统治圣地达 400 年之久了。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及其造成的灾难对拜占庭势力的影响（1071 年的曼吉克特战役）是十字军东侵的重要原因。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Alexius I，1081—1118 年）向西方请求援助。

② 624 年，赫拉克勒斯（Heraclius）皇帝为调和东正教和基督论的矛盾，提出了“基督一志说”（Monotheletism）。基督一志说试图调解东正教和基督一性论基督徒的矛盾，主张基督有人性和神性，但只有一种意志。双方都不接受基督一志说，并在 680 年的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谴责了这种学说。

③ 公元 7 世纪晚期，约翰是埃及尼基尤（Nikiu）地区科普特的主教，几乎不可能为穆斯林征服埃及进行辩护，但他在提到阿穆尔的遗产时说：“他征收的税务在很久以前就决定了，但他没有拿走教堂的任何财产，没有实施任何劫掠行为，他在自己的任期内保护教堂的所有财产”（John 1916，200）。

④ 几个世纪后，埃及人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不过，基督一性论者或科普特社区仍大量存在。公元 10 世纪，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后，修建开罗城（参见下文），并包围了福斯塔特（Fustat）。穆斯林也进入了苏丹地区，并于 652 年与信仰基督教的努比亚签订条约（参见 Hitti 1970，168）。

统，但他们迅速地适应了定居生活。

到奥马尔（被一个神经病人刺杀）去世的时候，穆斯林“乌玛”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在奥斯曼（644—656 年在位）统治时期，帝国继续扩张，并巩固占有领地。奥斯曼是实力雄厚的伍麦叶家族成员，也是先知的伙伴。更为重要的是，他命人校定了《古兰经》定本。奥特曼被叛乱者杀死后，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一个堂弟和女婿阿里成为哈里发。

阿里（656—661 年）担任哈里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的个性或者赢得尊敬甚至敬畏，或者煽动叛乱。“乌玛”面临着第一次穆斯林内战，这场内战部分是由阿布·伯克尔的女儿和先知最年轻的妻子阿伊莎（Aisha）挑起的。阿里暗中控告阿伊莎背叛信仰。阿里成功地镇压了这次叛乱，但麻烦接踵而至。叙利亚总督、伍麦叶人穆阿维叶声称阿里曾经阴谋对付奥特曼，并发动叛乱。657 年，阿里和穆阿维叶发动隋芬战役。穆阿维叶士气低落，他撕下《古兰经》的几页纸并将其贴在武器上，请求仲裁。阿里接受了仲裁，这激怒了很多追随者，后者希望让真主去决定战争的胜负。这些人抛弃了阿里，被称为阿瓦利吉派（*kharaja* 的意思是离开或分离），被列为叛教者。阿里派兵镇压并取得成功，但哈瓦利吉派报复性地刺杀了阿里。哈瓦利吉派在未来的北非政治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马利克·本纳比（参见前言）看来，隋芬战役使穆斯林内部发生分裂，从心理上限制了穆斯林文明的发展。处于较高水准的穆斯林文明变得平和下来了，并进入了理性阶段。这个理性阶段一直持续到博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 年）去世，我们将在第四章更详细地讨论这个人。

伍麦叶王朝（661—750）和阿拉伯人向马格里布地区的扩张

穆阿维叶继承了阿里的衣钵，并建立了世袭君主制体系，后者被称为伍麦叶哈里发政权。阿拉伯人垄断了哈里发职位，但昔日在拜占庭人或萨珊人王朝的为官者仍能谋得一官半职。伍麦叶王朝的征服方式与构

建政府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对其他宗教持宽容态度（尽管对不同族群并不宽容）。[①] 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会减少改宗行为。非穆斯林要支付人头税（*jizya*），大量的改宗必然会减少国家收入。另一方面，阿拉伯人会歧视非阿拉伯人，即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非阿拉伯穆斯林被称为麦瓦利（*mawali*）（释奴），他们痛恨这种自相矛盾的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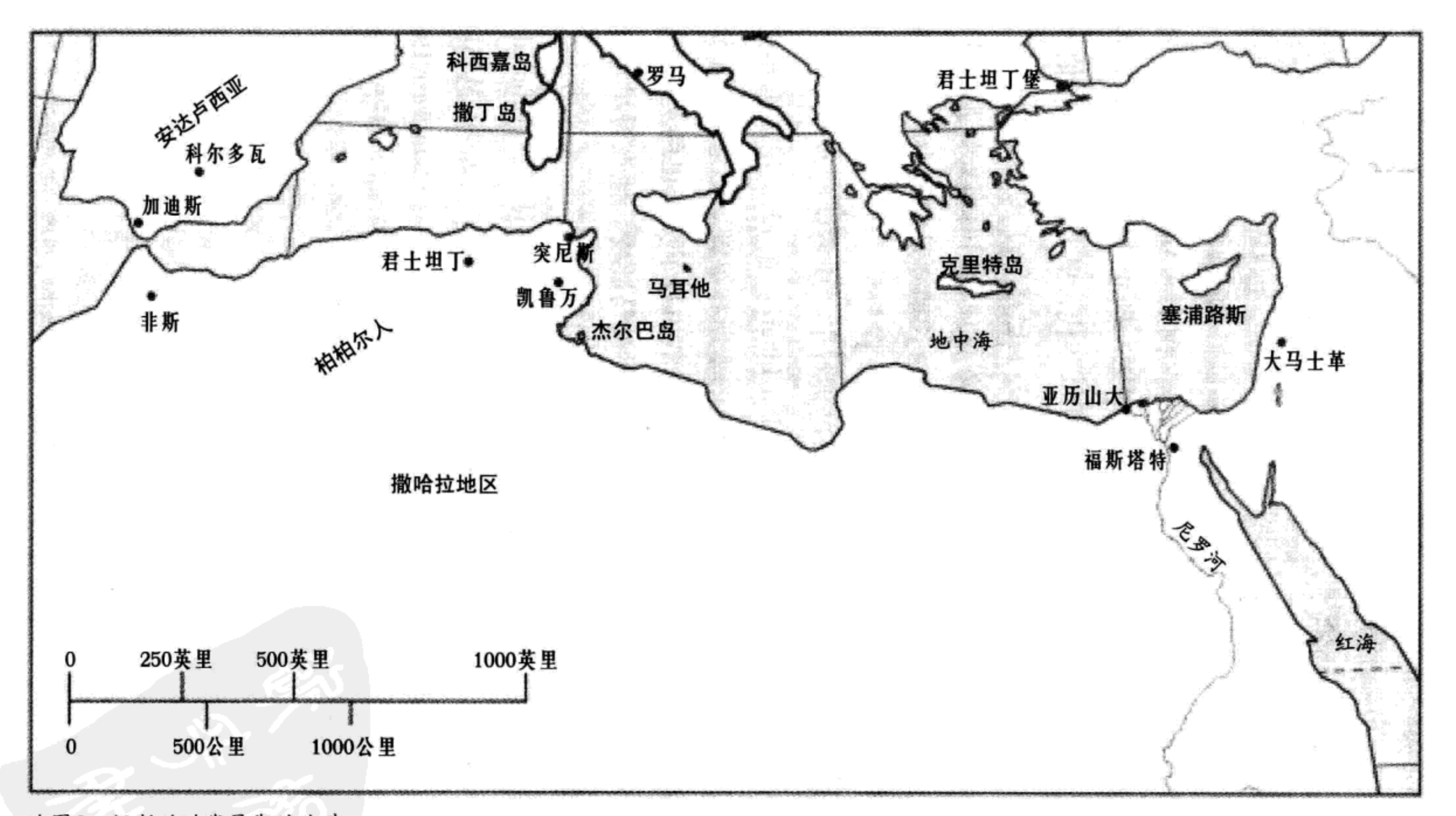
64

埃及的征服者和总督阿穆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对昔兰尼加发动袭击，但他的外甥奥卡巴·本·纳菲（Uqba bn Nafi）在埃及和北非西部声名卓著。公元7世纪40年代，奥卡巴指挥阿拉伯人袭击马格里布以便永久立足。669年，奥卡巴接管了的黎波里塔尼亚。670年，突尼斯建立了凯鲁万城，成为阿拉伯帝国向西方扩张的基地。奥卡巴深入阿尔及利亚腹地，可惜却没有长期立足的能力。他也进入了费赞。

根据不确定的史料证明，奥卡巴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西部探险，据说到达过大西洋。伊本·伊达里（Ibn Idhari）在13世纪的编年史把奥卡巴描绘为全身心地传播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英雄。无论伊本·伊达里的编年史是否真实，但他用精彩的文笔描写了奥卡巴的英勇事迹："他策马扬鞭狂奔至大西洋，惊涛骇浪吞没马肚皮。他在海里举起臂膀，昂首向天大呼：'真主啊！若非大海阻我，我将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驰骋大地，捍卫你的宗教，打败那些异教徒！'"（Ibn Idhari 1948—1951，1：27）。贾米尔·M. 阿本－纳斯尔（Jamil M. Abun-Nasr）认为奥卡巴夺取了摩洛哥南部的苏斯（Sus）（Abun-Nasr 1987，30）。[②] 查尔斯－安德烈·朱利安（Charles-André Julien）认为，他可能最远到达阿尔及利亚中部（Julien 1970，9—10）。可以肯定的是，奥

① 穆斯林在南亚扩张时表现得并不宽容。印度人的偶像崇拜使穆斯林感到胆战心惊。在西方伊斯兰历史上，当享有特权的"有经典的人"遭受迫害时，它通常是源自经济萧条或战争，而非宗教政策（参见 Hourani 1991a，118—119）。

② Abun-Nasr 1987，30。尼韦尔·巴伯尔（Nevill Barbour）赞同传统解释，即奥克巴（Uqba）到达了大西洋（Barbour 1966，41）。伊本·阿布德·哈卡姆（Ibn abd al-Hakam）认为奥克巴到达了摩洛哥。他也叙述了当奥克巴等人饥渴难耐时，祈求真主的帮助。然后，他的马匹开始用蹄子刨地，掀开石头，水从下面喷了出来（al-Hakam 2004，222—223）。



地图5 伊斯兰时代早期的北非

卡巴体现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向西方征服与扩张的势头，而且他的野心疏远了柏柏尔人。奥卡巴虔诚信仰宗教，但个性偏执，特别是对麦瓦利（*mawali*）持歧视态度。麦瓦利坚信并希望奥卡巴践行穆斯林的平等原则。如柏柏尔人的杰出领袖和改宗伊斯兰者库塞拉（Kusayla）蔑视奥卡巴的歧视政策。680 年，在拜占庭盟友的帮助下，库塞拉领导的柏柏尔人在（阿尔及利亚）比斯科拉附近的塔胡达伏击奥卡巴及其军队，杀了这位阿拉伯首领。

库塞拉进入凯鲁万城，暂时成为城市之主，被柏柏尔人奉为英雄。但是，伍麦叶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调派由祖哈尔·本·凯斯·巴拉维（Zuhayr bn Qays al-Balawi）为首领的阿拉伯雄兵。[①] 库塞拉被迫向西败退，并于 686 年被阿拉伯军队彻底击败。阿拉伯人大获全胜，但柏柏尔人和拜占庭人的骚扰并没有停止。哈桑·本·努曼（Hassan bn al-Nu‘man）接到命令，要求他确保这里的安全。哈桑·本·努曼占据并洗劫了迦太基，拜占庭人逃往西西里岛。他也与加拉瓦部落令人敬畏的女首领作战，她可能是犹太人，被称为迪亚（Dihya）或卡西纳（al-Kahina，女先知）。她动员柏柏尔人对抗阿拉伯人，并打败了哈桑，迫使他撤出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东部和突尼斯。为了收复卡西纳，哈桑与女首领重启战火，后者于 698 年死去。[②] 与此同时，拜占庭人继续收复失地。697 年，拜占庭军队夺取迦太基。一年后，穆斯林又夺回此城。

65

阿拉伯人在镇压了柏柏尔人、驱逐了拜占庭人后，将利比亚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以及阿尔及利亚东部组成一个行省，即“伊

---

① 公元 688 年或 689 年，祖哈尔（Zuhayr）被拜占庭人杀死在（利比亚东部的）拜尔盖（Barqa）。

② 伊本·伊达里（Ibn Idhari）把卡西纳（al-Kahina）视作马利卡（*malika*）或女王。就同时代的柏柏尔－阿拉伯文化冲突而言，库塞拉（Kusayla）和卡西纳的对抗始终意义重大，如柏柏尔语使用塔马塞特文（Tamazight）。参见 El-Aroui 1990。

弗里基亚省”（Ifriqiya）。[1] 穆萨·本·努萨尔（Musa bn Nusayr）代替了哈桑·本·努曼（Hassan bn al-Nu‘man）出任省长。他在得力助手，也就是富于冒险精神的柏柏尔人军官塔里克·本·齐亚德（Tariq bn Ziyad）的帮助下，开始向西远征（*maghrib al-aqsa* 或摩洛哥），沿途镇压了拜占庭的残余力量。塔里克在穆萨之前踏上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或者安达卢西亚岛。这实际上是西哥特人的土地，不过，地名指的是汪达尔人的土地“安达里斯”（可能是“al-Andlish”或“al-Andlis”）。塔里克穿过北非与欧洲之间的海峡，到达欧洲一海角。为了纪念塔里克，这个海峡被称为直布罗陀海峡，即“塔里克山”（*Jabal Tariq*）。伊比利亚半岛矿产丰富（有金、银、铁和铜），具有悠久的矿石开发历史，因而吸引着入侵者的眼球并成为争夺目标（参见第一章）。从政治上来讲，西哥特人（Visigoths）内部的分裂也削弱了日益衰弱的日耳曼王国。

711年，塔里克的军队在伊比利亚速胜西哥特国王罗德雷克[Roderic（k）]，并获得了巨额财产。释奴穆基特·鲁米（Mughith al-Rumi）夺取科尔多瓦。穆萨统领了一支18 000名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士兵加入塔里克的军队。他们协同作战，征服并夺取了萨拉戈萨（Saragossa）。713年，安达卢西亚岛落入了穆斯林之手。穆萨选择海军基地塞维利亚为首都。随后，穆斯林大军横穿比利牛斯山脉，突入法国（西哥特王国包括法国南部）。725年，穆斯林军队攻打到北方的勃艮第。732年，当法兰克王国（Frankish kingdom）的宫相查理·马特尔（Charles Martel）打败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加菲奇（Abd al Rahman al-Ghafiqi）时，另一支北上的穆斯林军队在图尔斯/波伊提尔（Tours/

---

[1] 菲利普·赫梯认为阿拉伯人与腓尼基人存在闪族血缘关系（根据语言而非种族划分），这推动了他们与讲布匿语言的柏柏尔人的关系。“这似乎无法解释伊斯兰教在（柏柏尔人）语言阿拉伯化、宗教伊斯兰教化，以及把柏柏尔人的地方用作他们进一步征服活动的基地所发挥的奇迹”（Hitti 1970，214）。另一方面，在征服之后的三百年里，北非仍存在大量基督教主教区（ibid.，361）。关于阿拉伯化的内容，也请参见本章论述希拉尔（Hilal）部族的那部分内容。穆萨对塔里克的信任说明了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之间非同寻常的情感，这显然加速了阿拉伯人在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内地的战争。

Poitiers，今日的巴拉特·舒哈达地区）止住了前进的步伐。[①] 尽管穆斯林受挫，但他们在跨越比利牛斯山脉撤出法国之前，仍停留了几十年。 66

伍麦叶王朝的大规模扩张也在北非制造了一些麻烦。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敌意更加强烈。特别是安达卢西亚等地为阿拉伯人的成功做出贡献的柏柏尔人，要求穆斯林实现平等。阿拉伯行政机构对柏柏尔人强征税务，奴役柏柏尔穆斯林，甚至把他们发配到东方去，不过法律禁止他们这样做。著名的阿拔斯历史学家塔巴利（al-Tabari）叙述了柏柏尔人如何质疑哈里发和伍麦叶的权威："他们让我们将最漂亮的女儿嫁给他们。我们说：'我们没有在《古兰经》或圣训（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参见下文）里发现这一点。我们是穆斯林，而且我们希望知道：这是否得到了真主的认可？'"（Lewis 1974，2：57—58）[②]后来，柏柏尔人发动叛乱。741 年，在哈里发梅塞拉的领导下，柏柏尔人打败了凯鲁万的阿拉伯军队。尽管梅塞拉最终被杀死，但柏柏尔人叛乱扩展到阿尔及利亚和安达卢西亚岛。但此时，哈里发政权

---

① 历史学家们，例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都把这次战役视作欧洲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实际上，拜占庭人面对着更大的冲击。669 年，穆斯林对君士坦丁堡进行第一次围攻。这种围攻在公元 7 世纪 80 年代周而复始地进行着。717 年和 718 年，伍麦叶王朝开始了对拜占庭首都的大规模进攻。如果拜占庭人未能阻止穆斯林，那么欧洲历史必然会发生变化，就像 1453 年 5 月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欧洲人的反应，那是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从政治上来讲，巴尔干半岛的人们已经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之下。关于图尔斯战役，瓦特的结论是："这次战役显示了穆斯林的远征活动已经达到的极限，尽管这种袭击还有利可图。他们能够派往法国中部的兵力不足以抵制他们在那里可能遇到的抵抗力量"（Watt 1972，9）。还有一种解释，即穆斯林［尤其穆萨·本·努赛尔（Musa bn Nusayr）］试图蹂躏西欧（参见 Karsh 2007，60—61）。军队在波提尔斯北部的莫塞斯（Moussais la Bataille）作战（Kennedy 1996，22）。伯纳德·路易把"图尔斯和波提尔斯的战役"与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相比较（Lewis 1982，18—20）。他说："毫无疑问，穆斯林历史学家们漠视普瓦捷战役，强调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比后来的西方历史学家们看待问题更真实。法兰克人在普瓦捷大捷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群远离家园达几千英里的袭击者，而是离家几英里的入侵者（ibid.，19）。

② 伊本·卜特兰（Ibn Butlan，公元 11 世纪）的著作中引用伊丽莎白·萨维奇（Elizabeth Savage）的话："柏柏尔人妇女是理想的奴隶。她们从 9 岁开始，在麦地那度过 3 年，在麦加度过 3 年，然后在伊拉克度过 9 年"，她在这些地方接受音乐和文学教育。萨维奇说："尽管一些柏柏尔人妇女变成了著名的歌唱家，但她们仍然因擅长做家务、两性关系以及分娩生育而受到重视"（Savage 1997，68）。

在东方面临着更大的问题。

日益壮大的阿拔斯王朝成为伍麦叶王朝的心腹大患和抵抗力量。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们声称其叔父与先知穆罕默德有血缘关系。日益壮大的什叶派穆斯林群体支持阿拔斯王朝，他们视阿里为殉教者，并谴责穆阿维叶及其家族是背信弃义的篡权者。680 年，阿里之子侯赛因（Husayn）错误地认为他能够接管哈里发一职，但伍麦叶王朝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杀死了他。他的殉难是什叶派教义中一件重要事件。什叶派继续寻找伊玛目（*imam*），即与阿里家族有关的宗教领袖。在什叶派看来，伊玛目代表了伊斯兰教的真正领袖。什叶派承认圣训（*hadith*），然而，伊玛目的言行记录也具有明确而重要的意义。大多数穆斯林是逊尼派，拒绝伊玛目的影响、权威和解释权。什叶派与阿拔斯王朝以及麦瓦利（*mawali*）结盟。麦瓦利蔑视那些自命不凡、颇具优越感的阿拉伯人，这些人包括高傲的波斯人和受剥削的柏柏尔人。750 年，阿拔斯王朝及其盟友打败伍麦叶王朝。伍麦叶王朝仅有一名王子逃过了大屠杀，他就是阿卜杜勒·拉曼·本·穆阿维叶（Abd al-Rahman bn Mu‘awiya，马瓦尼德（Marwanid）支系）。756 年，他到达安达卢西亚岛，并建立了政权。

阿拔斯王朝（750—1258）接受分权帝国

67

尽管阿拔斯王朝担任了哈里发，但其做法与伍麦叶王朝截然不同。他们相信穆斯林，而非阿拉伯国家。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公元 754—775 年在位）迁都巴格达，这一举动使哈里发政权更具波斯人的特征。阿拔斯王朝加重了什叶派的痛苦，不认可伊玛目的精神领袖地位和政治合法性。什叶派成了阿拔斯王朝确定无疑的敌人。然而，麦瓦利（*mawali*）享受着阿拔斯王朝提供的自由和机会，阿拔斯王朝的

跨文化宽容和大力支持在各个领域都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学者。[1]

伍麦叶－阿拔斯王朝的对抗导致骚乱频发，帝国的某些地区已经宣布独立，如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阿布·卡西姆·米德拉利（Abu al-Qasim al-Midrari）保护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贸易中心西吉勒马萨（Sijilmasa）及其周边地区，并开创了一个持续了两百多年的王朝。[2] 阿拉伯帝国四分五裂，但阿拔斯王朝接受了分权化的现实，前提条件是他们能够获得贡赋以及作为名义宗主国的身份认可。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几乎对商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一个从安达卢西亚岛到中国的全球商业网络扩展开来。据9世纪伽兹（al-Jahiz）的一份记录簿记载，北非有许多珍稀动植物，如“豹子、阿拉伯树胶、毛布和黑猎鹰”（Lewis 1974，2：154）。然而，在这几个世纪里，北非发展出各种截然不同的复杂经济体，支持着各种类型的国家。

图伦王朝（Tulunids，868—905）和伊赫什德王朝（Ikhshids，935—969）对埃及的统治

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埃及以高税收和桀骜不驯的民众为特征。公元868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交给突厥将军艾哈迈德·伊本·图伦（Ahmad ibn（bn）Tulun）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他以阿拔斯王朝的名义统治令人苦恼的埃及。尽管伊本·图伦承认阿拔斯王

---

① 北非和安达鲁斯（al-Andalus）也对伊斯兰王国的文化成就做出贡献（参见下文和第四章）。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下面这些来自马什里克的著名学者：即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年），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出生在布哈拉；拉兹（al-Razi，865—930年?），中世纪西欧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家，来自波斯；花拉子密（al-Khwarizmi，780—850年?），杰出的数学家；奥马尔·哈亚姆（Umar Khayyam，1038—1123年），诗人和数学家，来自波斯；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u Hamid al-Ghazali，1058—1111年），最著名的穆斯林神学家；博学者比鲁尼（al-Biruni，973—1048年），来自中亚，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印度史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分子来自不同民族。阿拔斯王朝时期是西方文明史上取得文化成就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这是对跨文化主义的重要证明。

② 罗马人可能曾经在西吉尔马萨（Sijilmasa）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了居民点。（Howe 2005，41）这里提到的城市建立于758年。米德拉利（Midrarids）王朝就是哈瓦利吉派的王朝。

朝为他的宗主国，但他及其子孙在本土埃及人官僚体系的帮助下自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5 年。图伦王朝通过开发和分配国内资源，实行内向型的经济政策。他们鼓励发展农业（尤其是灌溉修复项目），并促进商业发展。因此，埃及地位再次突出，并拥有了巨额财富。公共工程迅速兴起，如876 年至879 年之间修建的伊本·图伦清真寺（Mosque of Ibn Tulun），占地面积6.5 英亩，是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Williams 1993, 52）。很明显，其螺旋式的尖塔受到伊拉克人的影响（尤其是萨马拉清真寺）。878 年和879 年，伊本·图伦吞并叙利亚，焦躁不安的阿拔斯王朝以伊克塔或封地（Iqta）的形式承认其合法性。伊本·图伦的儿子胡马拉瓦耶（Khumarawayh）的统治也处于独立地位，势力较为强大。然而，尽管胡马拉瓦耶是卓越的军事领袖和精明的外交家，但他奢侈浪费，鲁莽地大兴土木，兴修宫殿，[1]搞得国库空虚，后继者也软弱无力。阿拔斯王朝借机重新控制埃及。

然而，阿拔斯王朝再次发现维持埃及稳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哈里发命令另一位突厥人穆罕默德·伊本·图吉［Muhammad ibn（bn）Tughj（g），后来被称为“伊赫什德”（Ikhshid）］统治埃及。[2] 与伊本·图伦一样，伊本·图吉改革政府，消除腐败，统治效果极佳。[3]伊本·图吉在埃及立足后，重新控制叙利亚，治理阿拉伯人的圣地（麦加、麦地那及其周边地区）。然而，伊本·图吉之子被卡福尔（Kafur）篡权。随后，伊赫什德王朝被严重削弱了，其原因有二：一是王朝内部的权力之争；二是尼罗河洪水的低水位和地震毁坏。尽管如此，他们多次击退了什叶派法蒂玛王朝占据埃及的企图。969 年，乔哈尔（Jawhar）率领的柏柏尔军队打败伊赫什德王朝，开创了埃及的新时代（参见下文）。

---

① 宫殿里一个水银池，池上漂浮着膨胀的皮革垫子（Hitti 1970, 454）。

② “伊赫什德”（Ikhshid）指的是穆罕穆德·本·图吉（Muhammad Ben Tughji）在中亚的家族，国王的头衔。

③ 正如罗伯特·希伦布兰德（Robert Hillenbrand）指出的那样：“从伊本·图伦时代开始，一支突厥人的军队将长期驻扎在埃及的土地上”（Hillenbrand 1976, 24）。

马格里布地区的鲁斯塔姆王朝（Rustamids，777—909年）、伊德里斯王朝 789—920 和阿格拉布王朝（Aghlabids，800—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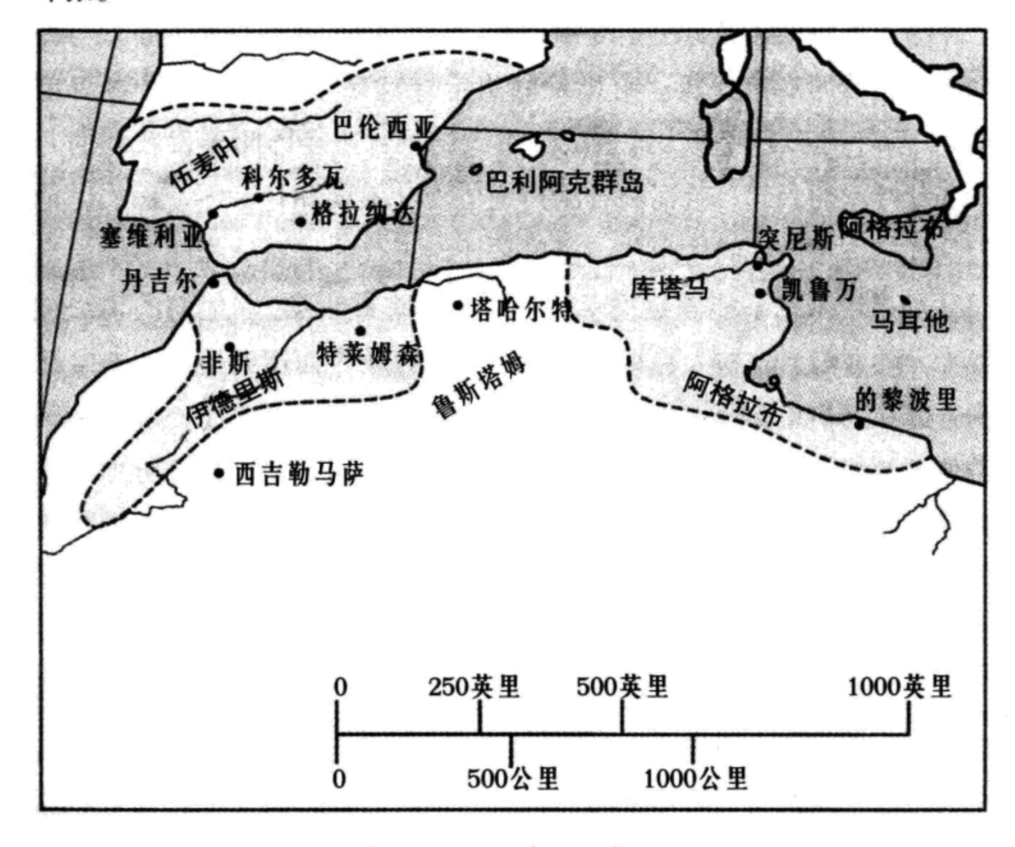
为了理解鲁斯塔姆王朝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追溯到阿里同意与穆阿维叶仲裁的隋芬战役。哈里发的决定疏远了哈瓦利吉派（参见前文），后者刺杀了阿里，这造成了重大结果：伍麦叶哈里发政权的开始和什叶派的兴起。哈瓦利吉派拒绝伍麦叶王朝和什叶派。相反，他们信任经选举产生的埃米尔，意思是任何正直的穆斯林都能够统治乌玛（如果埃米尔不能满足民众的期望，他将被废黜）。他们的说法被视为异端邪说，这些人被视作危险分子和背教者而遭到迫害，但哈瓦利吉派在马格里布地区具有独立思想的柏柏尔人那里立足。罗伯特·希伦布兰德（Robert Hillenbrand）在哈瓦利吉派那里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因为哈瓦利吉派“在伦理道德方面不妥协，关心权威与合法性，更在乎信仰与职业的不同价值，与多纳图异端有明显关系”（Hillenbrand 1976，43）。

哈瓦利吉派的平等主义与伍麦叶王朝阿拉伯人的优越性形成鲜明对照，为柏柏尔人提供了一种吸引人的伊斯兰教替代选择方案。哈瓦利吉派选举诚实正直的信徒为伊玛目，即政治和宗教领袖。在阿尔及利亚，具有波斯人血统的阿卜杜勒·鲁斯塔姆（Abd al-Rustam）在塔哈尔特（Tahart）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伊巴迪教派（哈瓦利吉派的一个分支教派）的国家。塔哈尔特城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可以控制撒哈拉的贸易。[①] 直到公元10世纪，鲁斯塔姆王朝一直统治北非，塔哈尔特成为哈瓦利吉派的文化和知识中心。鲁斯塔姆王朝的势力范围从阿尔及利亚中部扩展到了伊弗里基亚。在西方，另一个王朝也迅速崛起，其政治遗产至今仍存在于摩洛哥的政治文化之中。

---

① 它们与马什里克，特别是伊拉克巴士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塔哈尔特（Tahart）毗邻地区的巴士拉商人和库夫商人颇有声望（Savage 1997，40）。伊巴迪教派也因为其经商的敏锐性而声名显赫。

阿拔斯王朝在推翻伍麦叶王朝期间获得了广泛支持，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与享有声望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存在某种联系。他们对抗任何宣称具有类似血统的人。伊德里斯是谢里夫或圣裔，但不是什叶派。[①]



地图6　马格里布地区和安达卢西亚岛：9世纪至11世纪

70　对抗的结果是伍麦叶人被迫逃往西方。他到达摩洛哥后，仍然鼓动柏柏尔人叛乱，对抗伍麦叶王朝。伊德里斯作为圣裔所拥有的威望和魅力深深吸引了柏柏尔人，尤其是阿沃拉巴（Awraba）部落。伊德里斯王朝逐渐发展起来。791年，阿拔斯王朝派人暗杀了伊德里斯。然而，正如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那样，阿拔斯王朝最著名的统治者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788—814年在位）“有足够的

① 伊本·赫勒敦认为他是什叶派教徒（Ibn Khaldun 1967，1：49）。伊德里斯宣称自己是阿里和法蒂玛的儿子，哈桑的后代，后者是殉道者侯赛因的兄弟。

权力去毒害（伊德里斯）”，但阿拔斯王朝“不再……想控制偏远地区（Ibn Khaldun 1967，1：49）”。伊德里斯的柏柏尔人情妇坎扎（Kanza）生下了伊德里斯二世（803—828 年在位）。据说，他在 808 年修建（或重建）了非斯城。[1] 这座城市成了文化中心，其标志是由法蒂玛·穆罕默德·法哈里（Fatima bint Muhammad al-Fahari）授意并建筑的卡拉维因（al-Qarawiyyin）清真寺。法蒂玛是公元 9 世纪中期的杰出女性，是来自凯鲁万（清真寺大学的名字源于此）的政治和宗教反对派。卡拉维因宣称自己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大学清真寺（Williams 1993，166）。此外，科尔多瓦冲突中的难民也在非斯城定居，修建了安达卢西亚清真寺（the mosque of al-Andalusiyyin）。公元 10 世纪，伊斯玛仪·达拉斯（Isma‘il al-Darras）在非斯和摩洛哥创立马立克派（Malikism）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 城市网状的供水系统令观察者感到吃惊。非斯城战略性地利用了撒哈拉、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商业，伊德里斯及其继承者们为日后存在的谢里夫国家奠定了基础。

伊弗里基亚行省的动荡不安，迫使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派遣易卜拉欣·本·阿格拉布（Ibrahim bn al-Aghlab）去恢复阿拔斯王朝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与艾哈迈德·伊本·图伦相似，阿格拉布也想本家族统治伊弗里基亚，只要“阿格拉布王朝”认可阿拔斯王朝的宗主权就可以了。阿格拉布王朝国内发生叛乱。事实上，易卜拉欣在凯鲁万南面成立了一个行政中心，被称为卡斯尔·卡迪姆［al-Qasr al-Qadim 或称阿巴希亚（al-Abbasiyya）］。不可否认，阿格拉布王朝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

阿格拉布王朝的统治时间是 800 年到 909 年。在“阿格拉布世纪”里，伊弗里基亚繁荣发展起来，并变成了另一个知名文化中心。凯鲁

---

① 据说，789 年，他的父亲伊德里斯一世修建此城。（参见 Brett 1999，59）809 年，伊德里斯二世把首都从沃吕比利斯迁到了非斯城，他在这里修建了密集的社区，建立了一块新殖民地。

② 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提供了一份关于中世纪非斯城市的简短但信息丰富的调查报告（参见 Berque 1974，35—47）。

万变成了辉煌灿烂的首都，阿格拉布建造了著名的大清真寺。阿格拉布王朝的建筑混合了罗马、拜占庭和马什里克地区（阿拔斯王朝）的风格（参见 Hillenbrand 1976，44）。856—864 年间，阿格拉布王朝在突尼斯重新规划并修建赞图纳清真寺（al-Zaytuna），后者是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1] 巨大的储水池和天然湖泊确保了水供给的安全。阿格拉布王朝信仰逊尼哈乃斐派学派，马利克学派在伊弗里基亚也特别流行。其原因是：谢赫阿卜杜勒·萨拉姆·萨赫努恩［Shaykh Abd al-Salam Sahnun，《穆达瓦纳》（*Mudawwana*）的作者，本书是马利克思想的摘编］的宣教和多产作品伊本·扎耶德（Ibn Zayd）的宣传。阿格拉布王朝资助伊本·拉什克（Ibn Rashiq），后者是一位重要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伯克尔·本·哈马德·提哈尔提（Bakr bn Hammad al-Tiharti）成为这个跨文化时代的缩影。他是鲁斯塔米德·塔哈尔特（Rustamid Tahart）本地人，在凯鲁万向谢赫萨努恩求学，然后在马什里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生活。他后来返回到马格里布，因其宗教和世俗诗人以及宗教教师的身份而获得尊重。与之前的迦太基人、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相似，阿格拉布王朝控制西地中海，占据撒丁岛和意大利南部，最终夺取了西西里岛。

652 年，阿拉伯人对西西里岛发动第一次进攻，并洗劫了锡拉库扎。827 年，阿格拉布王朝在拜占庭总督的邀请下，干涉西西里岛的事务。该总督当时已经被解除职权并伺机图谋报复。831 年，巴勒莫（Palermo）陷落。843 年，墨西拿陷落。878 年，锡拉库扎陷落。902 年，阿格拉布王朝完成了对西西里岛的占领。随后，阿格拉布王朝在意大利立足。837 年，阿格拉布王朝经过长期围困，征服了那不勒斯城的基督教公爵，进驻该城。随后十年里，阿格拉布王朝在亚得里亚

---

[1] 人们都认为，这些著名建筑物的修建时间是 698 年或 732 年。

海港口城市巴里（Bari）建立居点。[①] 846 年，阿格拉布王朝到达罗马，并袭击了周边地区。据说，教皇约翰八世（Pope John VIII872—882 年在位）向其支付贡赋（Watt 1972，4）。法蒂玛王朝后来继承了阿格拉布王朝的领土（参见下文）。

复兴的拜占庭人入侵意大利南部，并驱逐了法蒂玛人，后者通过古尔布甲地方王朝（Kalbids，948—1040 年）进行统治。古尔布甲王朝结束后，国家陷入内战。内战席卷了西西里岛，从而削弱了穆斯林对那些岛屿的控制力量。公元 11 世纪上半叶，诺曼底公爵在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的领导下，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取了意大利南部。1060 年，其弟罗杰（Roger）入侵西西里岛。1091 年，诺曼底人完成了对诸岛的征服。他们带着敬佩的心情接受了穆斯林文化。诺曼底建筑的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和装饰风格清晰地说明了这些建筑受到马什里克和马格里布的影响，如罗杰二世（1127—1154 年在位）的帕拉丁大教堂（Cappella Palatina）和帕勒莫的王室宫殿。罗杰二世及其孙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215—1250 年在位）被视作“西西里岛两个受过洗礼的苏丹”。（Watt 1972，5；Hitti 1970，609）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把跨文化主义具体化了，并获得了“世界奇迹”（*stupor mundi*）的赞誉。他讲阿拉伯语，在帕勒莫修建的华丽宫廷令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感到震惊。[②] 地理学家伊德里斯（al-Idrisi，1100—1166 年）从罗杰二世及其儿子威廉一世（1154—1166 年在位）的赞助中受益匪浅。公元 1146 年，诺曼底人占领的黎波里。1148 年，占领马赫迪亚、苏斯和斯法克斯。1153 年，占领安纳巴、加贝斯湾和杰尔巴。诺曼底人在伊弗里基亚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王朝，后者遭内乱

72

① 埃夫拉伊姆·卡什（Efraim Karsh）提醒我们，阿格拉布（Aghlabids）王朝在同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斗中经常获得基督徒的支持。在这个事件中，阿格拉布王朝帮助击退了公爵的竞争者。随后，那不勒斯人与阿格拉布王朝联盟，共同对付墨西拿（Messina）（Karsh 2007，70）。

② 腓特烈二世提倡学术和发展教育。根据菲利普·赫梯的观点，“这种以调查、实验和研究为主，近乎现代化的研究方式是腓特烈宫廷的主要特点，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始”（Hitti 1970，611）。

削弱，被强大的穆瓦希德王朝（Muwahhidun or Almohads）驱逐（见第四章）。威廉二世（1166—1189 年在位）也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结盟，对抗萨拉丁。

法蒂玛王朝（909—1171）

由于领导无方，柏柏尔人的不安定，特别是什叶派教徒阿布·阿卜杜勒·阿拉·什叶（Abu Abd Allah al-Shi'i）传教士的到来，强大的阿格拉布埃米尔国家被削弱了。阿布·阿卜杜·阿拉（Abu Abd Allah）让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库塔马（Kutama）部落皈依了什叶派，尤其是法蒂玛人的伊斯玛仪派。[①] 法蒂玛王朝先后活跃于伊拉克南部和叙利亚，宣称自己是先知的女儿法蒂玛（阿里的妻子）的后裔。

阿布·阿卜杜勒·阿拉另一个政治目标是接管阿格拉布王朝埃米尔，为法蒂玛伊玛目和领袖奥贝德·阿拉（Ubayd Allah）的到来做准备，后者梦想着什叶派教徒主导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地区。阿布·阿卜杜·阿拉（Abu Abd Allah）和库塔马部落毫不留情地打击阿格拉布王朝。909 年，凯鲁万陷落，阿格拉布王朝结束。之后，伊斯玛仪派传遍了马格里布、埃及以及马什里克（包括汉志）。据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伊德里斯的回忆，奥贝德·阿拉在一系列冒险活动后，从马什里克出发，在马格里布止步。他最后成为米德拉利王朝（Midrarids）的西吉勒马萨的俘虏。[②] 阿布·阿卜杜·阿拉向西进军，释放了他的

---

① 伊斯玛仪派追随第七伊玛目伊斯玛仪家族，他在其父亲第六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Ja'far al-Sadiq）之前就去世了。大多数什叶派教徒承认伊斯玛仪的弟弟穆萨·卡齐姆（Musa al-Kazim）为第八伊玛目，但第十二伊玛目穆罕默德·穆恩塔兹尔（Muhammad al-Muntazar）却神秘失踪。而根据穆斯林的说法，他还会作为马赫迪（即正义引导者或救世主）出现。法蒂玛人是法蒂玛的后代。法蒂玛王朝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派驻使团，传播教义。他们建立了大量社区，范围涵盖从信德（巴基斯坦）到马格里布地区，从戴拉姆（里海南部）到也门（尽管载德派控制着也门）。

② 据伊本·赫勒敦的记载，阿拔斯王朝命令阿格拉布王朝和米德拉利德王朝的代理人抓捕奥贝德·阿拉（Ubayd Allah）（Ibn Khaldun 1967，1：42）。他伪装成一名商人，并与阿布·阿卜杜拉·什叶（Abu Abd Allah al-Shi'i）保持密切联系（Halm 1997，9—10）。

主人。他的军队所向披靡，挫败并在 909 年结束了鲁斯塔姆王朝。[①] 阿布·阿卜杜·阿拉到达西吉勒马萨，释放了奥贝德·阿拉，法蒂玛人接管了这个城市。奥贝德·阿拉耀武扬威地回到伊弗里基亚。910 年 1 月，他正式宣布自己为马赫迪（即救世主），并宣布自己为埃米尔（*amir al-mu'minin*），即信士们的长官，或称哈里发。[②] 阿布·阿卜杜·阿拉越来越质疑马赫迪的特权和自负，他与其兄阿尔·阿拔斯（Abu-l-Abbas）以及库塔马部族的领袖们一起，密谋对抗奥贝德·阿拉。911 年，哈里发下令处决了忠诚的阿布·阿卜杜·阿拉兄弟。保罗·E. 沃克（Paul E. Walker）在法蒂玛王朝编年史中，指责阿布·阿拔斯应为这场悲剧负责，但他也指出：“尽管这种解释或许官方认可了相关事件的基本情况，但与事件本身一样，这样的解释始终令人大惑不解”（Walker 2002，24）。 73

法蒂玛王朝的国王将自己既视作伊玛目，又视为哈里发。他们最重要的战略就是将马格里布作为占领埃及、推翻巴格达的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基地。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在马格里布地区的政治活动是一种临时战略。913 年和 914 年，法蒂玛王朝进攻埃及失败后，决定巩固在马格里布地区的地位。[③] 他们修建了一个更具防御能力的首都，被称为马赫迪亚（Mahdiyya，位于突尼斯），这个城市以一个清真寺为特征，未来伊斯玛仪清真寺以这个清真寺为设计的建筑模型。巴克利把新首都描述为海军基地，从亚历山大、西西里岛和安达卢西亚的船只到这里汇聚（al-Bakri 1965，30/67）。他们征召和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西方与柏柏尔人英勇作战，后勤补给是安达卢西亚的

---

① 由继承问题带来的分歧也削弱了伊玛目政权。伊巴迪教徒迁往撒哈拉北部，并成立新社区，修建新城市，这些遗迹至今仍存于阿尔及利亚的米扎布（Mizab）。

② 地理学家巴克利（al-Bakri，来自安达卢西亚）说，正如奥贝德·阿拉激烈对抗阿格拉布王朝那样，法蒂玛王朝的领导者羡慕他们的工程和建筑。就阿格拉布王朝在突尼斯修建的水利工程和拉凯达城（Raqqada）军事要塞而言，马赫迪宣称：“我在伊弗里基亚看到了两个我在东方从未见到过的、无与伦比的事物。”（al-Bakri 1965，26—60）

③ 919 年，法蒂玛王朝再次入侵埃及，直到 921 年仍在作战，后被阿拔斯王朝驱逐。904 年至 905 年，阿拔斯王朝推翻图伦王朝，并恢复了他们在埃及的权威。

伍麦叶人（Umayyads）（参见下文）。921年，非斯城落入法蒂玛军队之手。法蒂玛王朝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北非帝国，这个帝国直到穆瓦希德王朝和穆拉比德王朝兴起之后才衰落下去（参见第四章）。他们也确保穆斯林在西西里岛立足，并在934—935年、1004—1015年两次对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和比萨之间）发动袭击（Walker 2002，53）。[①]

即使考虑到伊本·豪卡尔（Ibn Hawqal）对法蒂玛王朝的偏爱，穆斯林在意大利的基业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著作成书于公元10世纪，对他那个时代的法蒂玛王朝统治西西里岛的情况进行了描述："那些由穆斯林掌控的地区，西西里岛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可能被置于与西班牙同等重要的级别……在巴勒莫和［相邻的］哈利萨（Khalisa）及其城墙外面的地区，有300多座清真寺。"关于巴勒莫－哈利萨地区的经济，伊本·豪卡尔提到了"波斯甘蔗、植物园和优质黄瓜地。在这些地里，有长满纸莎草的小树林。纸莎草用来制作纸草卷。除西西里岛的纸草卷外，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里的纸草卷堪与埃及的相比。大多数纸莎草都被编成绳子用于船锚，只有小部分纸莎草用来制作纸草卷"（Lewis 1974，2：87，89，91）。伊本·巴塞尔认为，西西里生产的棉花堪与11世纪晚期西班牙生产的棉花相媲美（Lewis 1974，2：147）。

934年，一位没有任何威信但善于鼓动的老人——哈瓦利吉派的阿布·耶齐德（Abu Yazid）发动叛乱，阻碍了法蒂玛王朝向埃及扩张的野心。阿布·耶齐德被称为"骑驴之人"，动员哈瓦利吉派反抗受人蔑视的法蒂玛王朝，并获得了逊尼派马利克，特别是受到压抑的乌里玛的坚决支持。944年，法蒂玛王朝的北非帝国已经四分五裂。马赫迪亚（Mahdiyya）加强设防，构筑防御工事，然而哈里发伊斯玛仪·曼苏尔（Isma'il al-Mansur）集结军队，在公元947年8月决定性地战败了哈瓦利吉派。法蒂玛王朝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哈瓦利吉派的政治力量。之后，曼苏尔仿照巴格达的建筑模式在凯鲁万南部修建新都

74

① 934年，穆斯林洗劫了热那亚。

萨布兰·曼苏里亚（Sabra al-Mansuriyya），其储水池引人注目。该城对开罗城的规划有极大的启发（参见下文）（Halm 1997，13—14）。对于法蒂玛王朝来说，恢复马格里布疆域就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遑论对埃及再次进攻了。此外，法蒂玛王朝也面对着另一个强大对手所带来的威胁，这个对手就是来自西方安达卢西亚的伍麦叶王朝。

安达卢西亚：从伍麦叶王朝到派系王国（Party Kingdoms）

随着安达卢西亚被征服，穆萨·本·努赛尔（Musa bn Nusayr）和塔里克被召回大马士革。[①] 穆萨把安达卢西亚的管理权留给了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但阿齐兹于716年遭哈里发苏莱曼（Sulayman）暗杀，这表明了伍麦叶王朝的图谋不轨。此后，安达卢西亚处于一段缺乏强大中央集权政府管理时期。阿拉伯人由于未能穿越法兰西比利牛斯山而遭受重大挫折。732年，阿卜杜勒·拉赫曼·加菲奇（Abd al-Rahman al-Ghafiqi）在图尔斯/普瓦捷（Tours/Poitiers）被法兰克人打败，但这并没有结束穆斯林在法兰西的政治活动。阿拉伯人返回纳尔博纳（Narbonne）之后，向普罗旺斯（Provence）进军。737年，查理·马特尔打败了由奥卡巴·本·哈贾吉（Uqba bn al-Hajjaj）率领的另一支穆斯林军队。751年，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第一君主矮子丕平占领了纳尔博纳。尽管穆斯林在公元9世纪发动了一次袭击，但上述事件几乎结束了前者在法兰西的活动。

到公元8世纪末，安达卢西亚的乌里玛捍卫了马利克学派，引领

① 哈里发瓦利德（al-Walid）命令穆萨与塔里克一起返回马什里克。穆萨任命他的儿子担任高官，即任命阿卜杜拉·阿齐兹（Abd al-Aziz）担任安达卢西亚的总督，任命阿卜杜拉担任北非总督。瓦利德在穆萨到达后不久死去，他的兄弟苏莱曼为哈里发。新哈里发质疑穆萨在北非和安达卢西亚的政策，指责他在财务上有不检点行为。穆萨支付了一大笔罚金，与哈里发达成谅解。他们决定前往麦加，但穆萨死于途中。另一方面，休·肯尼迪（Hugh Kennedy）写道：穆萨或许在“被关禁闭期间”死亡（Kennedy 2007，314）。阿卜杜拉·阿齐兹被暗杀，职位由阿卜杜拉取而代之。塔里克被视作安达卢西亚总督职位的候选人，但正如阿布杜尔瓦希德·塔哈（Abdulwahid Taha）所解释的那样，“伍麦叶哈里发唯恐柏柏尔人在西班牙扩大影响”（Taha 1989，101—102）。塔里克在马什里克的生活一直无人知晓。

了一个特殊的学术规范和法学传统。[1] 人们之所以很乐意皈依伊斯兰教，部分是为了获得穆斯林身份而享受经济特权。[2] 安达卢西亚人成为一个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内的独特的跨文化群体。一般来说，他们能和平共处，这种特殊社会状况被称为文明共存秩序（*convivencia*）。基督徒被称为"阿拉伯化的人"（Mozarebs 或 Arabizers），他们发现穆斯林世俗文化非常具有吸引力。犹太人在促进阿拉伯人与欧洲、北非和西亚的商业交往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他们的跨文化倾向也导致了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获得重要的政治认同。犹太人也在安达卢西亚的文化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阿拉伯化的其他北非居民有：来自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马什里克的移民，尤其是叙利亚阿拉伯人；苏丹（西非）黑人，最初作为奴隶输入这里。另外，穆斯林在同欧洲人的战争中俘虏了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后者成为安达卢西亚多元社会的又一群人。然而，在加利西亚（Galicia）和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以及佩拉亚（Pelaya），基督徒宣布抵抗穆斯林，由此引发了基督徒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收复失地运动"是一场持久的"十字军东侵"，用了750年的时间才达到目标。基督徒成功战胜穆斯林，与后来马什里克的"圣地"、埃及和伊弗里基亚所发生的"十字军东侵"形成鲜明对比。

75

阿卜杜勒·拉赫曼·本·穆阿维叶开创了安达卢西亚的一个辉煌时代。作为埃米尔（emir），他极尽全力地保住王位，对抗那些从阿拔斯王朝控制下的马什里克来到安达卢西亚的亲属。他还成功地抵挡住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68—814 年在位）的强势入侵。他的战斗旨在向穆斯林证明他的力量，这是权力政治而非"十字军东侵"（crusading）（参见 Buckler 1931）。他最后在比利牛斯山南部

---

① 叶海亚·本·叶海亚·莱斯（Yahya bn Yahya al-Laythi）在这次成就的取得中，发挥了重要角色（参见 Berque 1974，41—42）。

② 皈依者不用支付人头税。犹太人和基督徒仍受到某些社会限制。然而，皈依也是真实的。伊斯兰教热心地欢迎皈依者。

建立了一个名为“西班牙三角”（Spanish March）的缓冲地带。[1] 阿卜杜勒·拉赫曼开始在科尔多瓦修建一个巨大的清真寺，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修建了首都，后者在数个世纪里都是西欧最大的城市。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科尔多瓦以跨文化关系为基础而繁荣发展起来。费迪南德·布罗代尔认为科尔多瓦是“西班牙和西方世界的学术中心”（Braudel 1972—1973，1：83）。与此同时，塞维利亚发展成为地中海的商业中心。

788 年，阿卜杜勒·拉赫曼去世，伍麦叶埃米尔国遭遇继承难题。基督徒国家乘机在北方崛起。除了受到西班牙基督徒和法兰克人的威胁，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822—852 年在位）必须对付并击退掠夺成性的北欧海盗。埃米尔命令他的军队在法兰克人控制的西班牙三角地带和比利牛斯山边的塞尔达尼亚（Cerdagne）作战，镇压了阿拉伯化基督徒在科尔多瓦的起义。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和拜占庭帝国皇帝提奥菲洛斯（Theophilos）建立了密切关系，后者渴望创建一个对抗阿拔斯王朝的联盟。

76

随着埃米尔国家趋于稳定，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不再惧怕阿拔斯王朝的阴谋。他鼓励输入马什里克地区文化，如音乐家扎里亚卜（Zaryab）从伊拉克来到安达卢西亚。扎里亚卜孩童时期就在哈伦·拉希德的宫廷里表演。从 822 年至 857 年间，他生活在科尔多瓦。这样，安达卢西亚不可避免地与大综合的跨文化穆斯林文明联系起来，这种文明把希腊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埃及人的影响融合在一起。事实上，伍麦叶王朝在科尔多瓦修建大清真寺，其拜占庭的玻璃镶嵌图案受到罗马以及西哥特人的影响（Parker 1981，14）。考虑到科尔多瓦的人口越来越多，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扩建了清真寺。[2] 从马什里克引入的农学也帮助了安达卢西亚农业的发展（Hourani 1991a，42）。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去世以后，伍麦叶王朝由于埃米尔的继承问题而爆发

①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也与阿拔斯王朝有重要关系，尤其与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关系密切（参见 Einhard and Notker 1969）。

② 关于清真寺及其几个世纪演化的详细描述，参见 al-Makkari 2002，1：217—231。

内战。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912—961 年在位）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统治者。[①] 他宣布科尔多瓦对北方基督教国家进行统治，并迫使这些国家缴纳贡赋。他在马格里布对付法蒂玛王朝的威胁，占领休达，并与扎纳塔（Zanata）柏柏尔人联盟，后者是伍麦叶王朝的政治和军事代理人。伍麦叶王朝干预马格里布地区，特别是摩洛哥，分散了安达卢西亚人的思想与实践，这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往。公元 955—956 年，伍麦叶王朝和法蒂玛王朝的舰队先后发生冲突。[②] 阿卜杜勒·拉赫曼积聚力量，宣称自己为哈里发（*amir al-mu'minin*）。这样，埃米尔国家成为哈里发政权。为了表达自己日益增强的权力和影响，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下令修建行政首都，实际上是一座被称为马蒂奈特·扎拉（Madinat al-Zahra）的王宫。尽管它在公元 11 世纪一再遭受洗劫，但其废墟仍然表明了王宫对石头、大理石和砖块的精致使用。几何图案也表明该建筑受到了拜占庭艺术的影响。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儿子哈基姆（Al-Hakim，961—976 年在位）继承了其父的政策。据说，他的图书馆藏书有 40 万册。[③] 势力强大的首领穆罕默德·本·阿比·阿穆尔（Muhammad bn Abi Amar）被称为曼苏尔（胜利者），在哈里发长大成人之前，保护和护卫希沙姆二世（Hisham II，976—1009 年在位）。哈里发在曼苏尔的监督下，扩建

---

① 在欧洲，只有势力强大的马其顿王朝的拜占庭皇帝的成就才能够与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相匹配。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公元 936—973 年在位）在德国开创了神圣罗马帝国，但它没有表现出伍麦叶伊比利亚或拜占庭的先进程度。与此同时，主导阿拔斯哈里发并控制西亚的白益王朝（945—1060 年）和北非（以及西亚）的法蒂玛王朝也随之产生重要影响。

② 据伊本·赫勒敦的记载："舰队……持续地彼此进攻对方国家……并……彻底毁坏了沿海地区"。他注意到，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统治下，伍麦叶王朝和法蒂玛王朝的舰队规模达到约 200 艘船只（Ibn Khaldun 1967，2：40）。尽管拜占庭的势力在公元 9 世纪和 10 世纪达到巅峰，其标志是再次征服克里特岛，但穆斯林控制了地中海。

③ 前法国大使马塞尔·佩鲁东（Marcel Peyrouton）引用雅克·里斯勒（Jacques Risler）的著作《阿拉伯文明》中（*La Civilisation arabe*）（第 80 页）的话，指出：4 个世纪以后，国王查理五世（智者）（1337—1380 年在位）拥有约 1000 卷书籍。（Peyrouton 1966，113）关于这个学术型哈里发的详细内容，参见 al-Makkari 2002，2：169—170。

了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他聘请到了拜占庭的镶嵌画艺术家。附加的拱形圆屋顶表明了清真寺受阿拔斯和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影响。到1031年，伍麦叶王朝的势力已经崩溃，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纷纷兴起，这些国家被称为派系王国（*Muluk al-Tawa'if* or Party Kings或许可以称为派系国王）。这些小国互相争斗，两败俱伤。基督徒利用了穆斯林的这一弱点。1085年，卡斯提尔国（Castile）的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占领托莱多（Toledo）。[①] 尽管这些穆斯林国家处于混乱的政治环境下，但令人羡慕的是，他们保存并推进了安达卢西亚的智力成果和文化成就。

77

安达卢西亚的医学、文学和诗歌繁荣起来。著名的科尔多瓦籍外科医生阿布·卡西姆·宰赫拉威（Abu-l-Qasim al-Zahrawi），为公元9—10世纪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穆赫辛·马赫迪（Muhsin Mahdi）将萨义德（？—1040）的《国家的等级》（*Classes of Nations*）与比鲁尼（al-Biruni）的《印度》（*India*）进行了比较。伊本·哈扬（Ibn Hayyan，987？—1076）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史学家"。马赫迪宣称"伊本—哈扬满怀忧郁之情，叙述科尔多瓦的衰落，理解统治者和民众的心理思维，分析了西班牙穆斯林国家衰落的原因。……他始终是穆斯林史家当中最杰出的"（Mahdi 1964，143—144）。伊本·阿卜杜·拉比（Ibn Abd Rabbih，860—940）是著名诗人，他编辑的《独一无二的项链》（*al-'Iqd al-Farid*）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博学多才的伊本·哈兹姆（Ibn Hazm，994—1064）是伍麦叶人，堪称伊斯兰世界和西方文明中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伊本·哈兹姆在心理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研究领域均享有声望，他还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和逻辑学。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法学、文学和历史学。他创作了《鸽子的项

① 尽管中央政府缺乏权威，但独立王朝的政治精英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能力。伊本·赫勒敦曾提及，1014年或1015年，来自德尼亚（Denia）的穆贾希德·阿米里（Mujahid al-Amiri）占领了撒丁岛（Ibn Khaldun 1967，2：41）。

链》（*Tawq al-Hamama*）和《菲沙尔》（*Fisal*），后者是一部宗教历史书。[1] 伊本·哈兹姆的诗歌对法国宫廷爱情产生影响。现在欣赏一下他的诗歌《我的爱人来了》中的人物形象"：

> 你刚好走到这个基督徒面前，
> 他正在敲着巨钟。
> 半轮明月升起，
> 恰似老人之眉，
> 或似一只狭窄的脚背。
> 尽管仍是夜晚，
> 但当你来到的时候，
> 犹如一轮彩虹闪过高空，
> 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光彩，
> 就像孔雀开屏。
> （Franzen 1989，2）

78 伊本·扎伊敦（Ibn Zaydun，1003—1071）是伊本·哈兹姆的同龄人，展现了安达卢西亚诗歌的情感。

在自然科学方面，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上半叶，作为数学家或天文学家的马斯拉姆·迈里提（Maslama al-Majriti）、伊本·萨姆（Ibn al-Samh）和伊本·萨法尔（Ibn al-Saffar）享有较高的威望。这些欧洲穆斯林是安达卢西亚杰出学者、作家和诗人的代表。这股"信息流动"（information flow）在公元12世纪加速发展起来（参见第四章）。另外，马格里布与马什里克之间的商业网络也发展起来，推动

---

① 马利克乌里玛，如教法学家阿布·瓦利德·巴吉（Abu al-Walid al-Baji，1012—1081年），视伊本·哈兹姆（Ibn Hazm）为异端，并坚决反对他（Berque 1974，42）。

了商品的交换速度。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仍在有规律地进行。[①] 越来越多的交往也包括技术传播，如造纸术。以西班牙和西西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为通道，伊斯兰世界的高级诡辩术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文明共存秩序（*Convivencia*）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这种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有价值的。

文明共存秩序是西方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跨文化交流成果之一，它将伍麦叶国家凝聚在一起。伊本·赫勒敦认为，尽管单独的部落或群体保留了群体感（*asabiyya*），但文明共存秩序使得不同群体分享的"群体感"松散了。[②]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在其统治时期对文明共存秩序进行了富有魅力的阐释。卡斯提尔的基督徒国王胖子桑乔（Sancho，955—967 年在位）因为过度肥胖被废黜。他到医学中心科尔多瓦寻求帮助。阿卜杜勒·拉赫曼命令最好的医生去治疗这位国王。这位医生是犹太人，名叫哈斯代·本·沙普特（Hasdai ben Shaprut），也是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外事大臣。尼维尔·巴伯尔（Nevill Barbour）讲道："桑乔再次看到了自己的体形轮廓，并重登王位，但他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因为他不得不将几座边界要塞作为报酬交给阿卜杜勒·拉赫曼"（Barbour 1959，21）。奥利拉克（Aurillac）的格伯特（Gerbert）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999—1003 年在位）。据说，他在安达卢西亚与穆斯林学者研究数学（ibid. ,21—22）。18 世纪的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马卡里［Ahmad bn Muhammad al-Maqqari，或称马卡里（al-Makkari）］引述了伊本·加利卜（Ibn Ghalib）对安达卢西亚人加以跨文化特征的描述：

> 安达卢西亚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骄傲自负、性情

---

① 然而，伊本·赫勒敦写道，这里有一些旅行限制："西班牙伍麦叶王朝……禁止国民到国外完成朝觐义务。他们担心民众可能会投入阿拔斯王朝的怀抱……直到伍麦叶王朝的统治结束后……朝觐才重新开始"（Ibn Khaldun 1967，2：100）。

② 西班牙学者朱利亚·里韦拉（Julian Ribera）计算出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具有 0.39% 阿拉伯人血统和 99.61% 的西班牙人血统！韦尔弗里德·克纳普（Wilfrid Knapp）认为"异族通婚一定是特殊情况，那些非常富有且拥有奴隶的人们除外"（Knapp 1977，20）。

> 高傲、智力非凡、心地善良、意念纯洁……他们是印度人，热爱学术，也专注于科学，坚持原则，小心谨慎，一丝不苟，他们将这些无价秘密传递给后代……他们是土耳其人，喜欢战争，谙熟战争策略的每个细节，熟练地为战争准备武器和装备，并热衷于预测与战争相关的事情。他们甚至堪与中国人相媲美（伊本·哈兹姆的说法）。他们的作品非常雅致，他们的手工制品非常精巧，他们能够灵巧地模仿各种人物形象。最后，基本上可以确信：他们像所有民族，但最像希腊人。他们了解物理学和自然科学。(al-Makkari 2002，1：117—118)

伊本·霍卡尔（Ibn Hawqal）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统治时期访问了安达卢西亚。尽管对法蒂玛王朝怀有偏见，但伊本·霍卡尔注意到：

> 人们能够在那里找到未开发的土地，虽然大部分都被开发了，而且人口稠密。每个地方都有流水、森林和果园，而河水是甜的。富饶和舒适是生活的特点，甚至工人和手艺人都能够享受生活，并具有获取幸福的条件。这得益于低税收、肥沃的土地以及国君未对其臣民施加沉重的赋税要求。(Kish 1978，205)

尼维尔·巴伯尔认为安达卢西亚文明是“西方世界最先进的”文明（Barbour 1959，138）。

法蒂玛王朝实现梦想

969 年，法蒂玛王朝的将军——一位基督教皈依者乔哈尔（Jawhar，或称卡提布），率领柏柏尔军队从衰弱的伊赫什德王朝手中夺取埃及。乔哈尔修建了一座新城，被称为卡西拉（al-Qahira，开

罗)，意思是“胜利者”。这座城市最终合并了阿拉伯古城福斯塔。乔哈尔巩固了法蒂玛王朝在埃及的地位以后，哈里发穆伊兹（al-Mu'izz）于973年迁入开罗。法蒂玛王朝最终实现了占领埃及的梦想。哈里发将法蒂玛王朝的马格里布地区分给桑哈加柏柏尔人（Sanhaja Berbers）的兹里德王朝（Zirids）管理，他们忠诚于埃米尔。乔治·马凯斯（Georges Marçais）提到了法国著名的东方主义者路易·马西农（Louis Massignon）的观点，即公元10世纪是“伊斯兰教的伊斯玛仪世纪”（Albertini et al. 1937，1955，157）。①

法蒂玛王朝的什叶派没有对埃及的逊尼派人诉诸武力，但很快同阿拔斯王朝订立和约，随后处于什叶派白益王朝（Buyids）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落入法蒂玛王朝的控制下，从而造就了一个堪与图伦王朝和伊赫什德王朝相媲美的“大埃及”（greater Egypt）。公元11世纪中期，波斯人纳西尔·胡斯洛（Nasir al-Khusraw）对法蒂玛王朝加以描述，可以看出，令人敬畏的军队护卫着跨文化的各种群体，这些人包括柏柏尔人［尤其库塔玛人（Kutama）和玛斯穆达人（Masmuda，来自摩洛哥)］、贝都因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黑非洲人。他注意到： 80

> 步兵团包括来自所有国家的战士。他们拥有关照自己的首领……还有一些军团，是由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君主们的儿子组成的，这些地区已经并入埃及……他们来自北非、也门、拜占庭（鲁姆），斯拉夫地区、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德里国王的儿子们及其母亲也来到埃及，乔治亚国王们的儿子、戴拉姆（Daylam，里海以南地区）的王子们和土耳其

① 尽管伊斯玛仪教徒拥有很大的权利，但白益王朝在西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控制了逊尼派的阿拔斯哈里发，后者成为傀儡。白益王朝的统治者也是什叶派教徒，但不是十二伊玛目派（*Ithna Ashari*）。

斯坦哈干（Khaqan）王朝的儿子们也是如此[①]（Lewis 1974，1:217—218）。

法蒂玛王朝的“终极梦想”是占领巴格达，结束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不出意外的话，这似乎是能够实现的。与图伦王朝和伊赫什德王朝不同，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埃及变成了一个独立而非自治的国家。除了兹里德王朝控制的西部地区［和卡尔比德王朝（Kalbids）控制的西西里岛］之外，法蒂玛哈里发政权控制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南部、非洲红海岸、也门和阿拉伯汉志（包括伊斯兰的圣地），成为一个伊斯玛仪帝国。

在法蒂玛王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埃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获得了成功。犹太皈依者伊本·吉利斯（Ibn Killis）是当时埃及第一任维齐尔（Arabic，*wazir*）或首席大臣，制定了效率高效的行政管理制度，[②] 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法蒂玛王朝表现出了跨文化特点，犹太人（和基督徒）在政府中位居高官。苏亚提（al-Suyati）记录了同时代诗人［里达·伊本·苏瓦卜（Rida ibn Thawb）］的说法：“噢！埃及人，我建议你们，成为犹太人吧，因为天堂已经属于犹太人了！”[③]

法蒂玛王朝鼓励埃及发展农业，保护商业，确保市场的低关税。11 世纪初，穆卡达西（al-Muqaddasi）把亚历山大描述为“一座高贵的城市，住着正直且虔诚的民众”，在这里“有着各种各样想象中的产品……周围的乡村地区极为繁华，出产优质葡萄等水果”。（al-Muqaddasi 2001，166）此外，法罗斯（*Pharos*）灯塔仍在工作，“牢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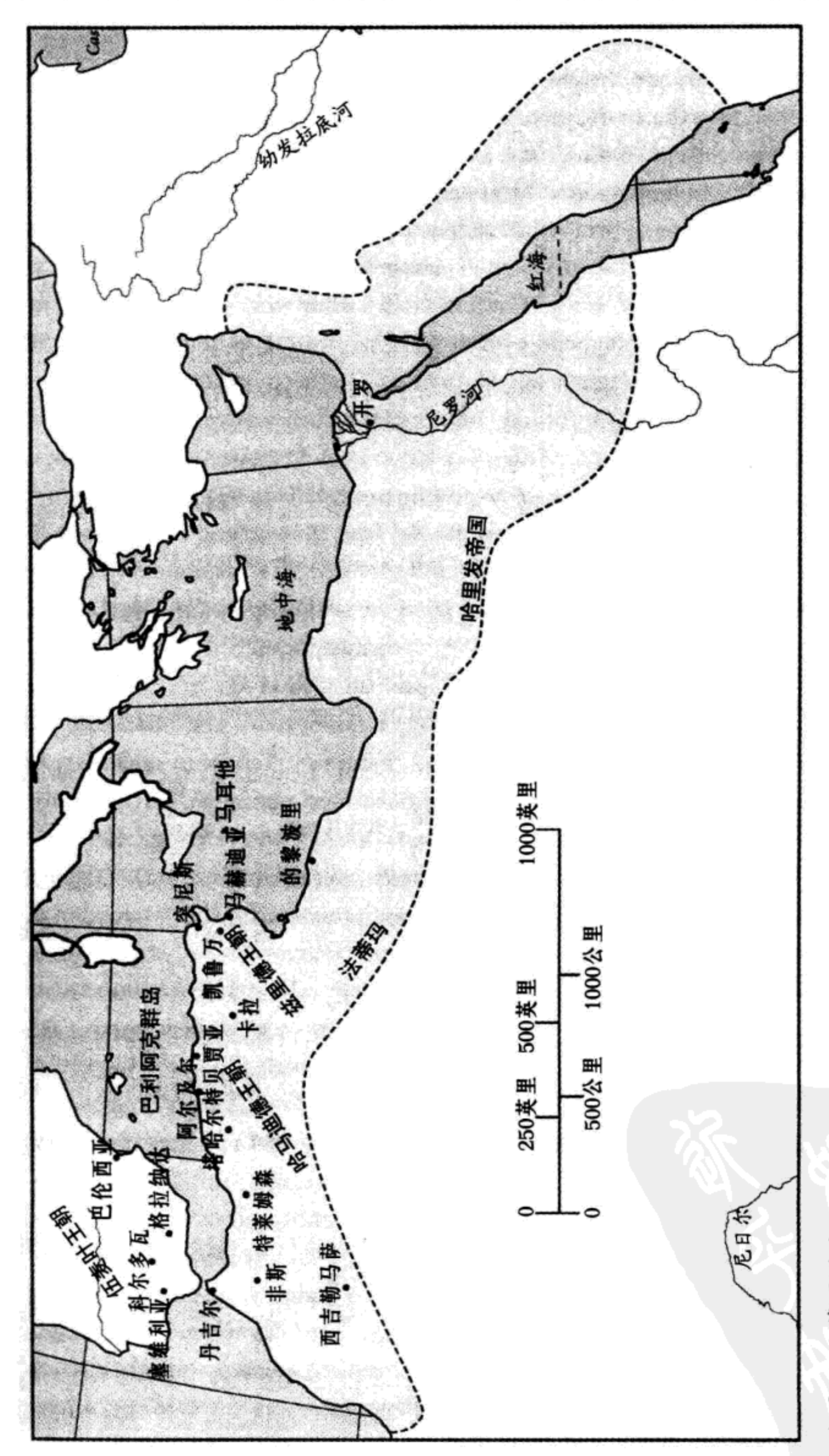
---

① 乔哈尔（Jawhar）是法蒂玛王朝成功入侵埃及的指挥官，具有斯拉夫血统（参见 Walker 2002，35）。

② 诺曼·A. 斯提尔曼（Norman A. Stillman）写道：“直到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公元 972 年哈里发政权在……开罗建立起来以后，埃及才成了犹太人聚集的中心，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Stillman 1998，201）。

③ 犹太人在法蒂玛王朝控制下的伊弗里基亚行省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著名的医学家伊斯哈格·本·苏莱曼·伊斯拉里（Ishaq bn Sulayman al-Isra'ili 卒于 932 年）就生活在凯鲁万。公元 10 世纪和 11 世纪早期（法蒂玛王朝尤其繁荣的时候），欧洲的犹太人，尤其意大利的犹太人，在当地与北非和西亚的商业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固定在一个小岛上”。穆卡达斯发现：“看守人日夜光临，只要有船只



地图7　法蒂玛时代

82 进入他的视野，他便让鸟飞到海滨，告知指挥官，船上的人可能随时处于准备状态。”（al-Muqaddasi 2001, 178）基督徒和穆斯林商人都参与了法蒂玛王朝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将亚麻贸易销往世界各地。法蒂玛王朝也从贸易中间站中获利匪浅。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贸易不仅将非洲和西亚联系起来，还在红海和印度洋的贸易再次繁荣时，把欧洲与南亚市场联系起来。[①] 亚历山大有一个巨大的马格里布社区，方便与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交流和商业交往。同时，法蒂玛王朝保护西亚和北非地区的意大利商业殖民地，并从中获利（Karsh 2007, 70）。[②]毫无疑问，法蒂玛王朝的跨文化交往和资助活动使哈里发权力强大起来。

为了促进和推广什叶派教义，法蒂玛统治者依靠他们作为哈里发和伊玛目的双重身份，修建了爱资哈尔清真寺（al-Azhar）[辉煌（the resplendent）]。这是开罗著名的大学清真寺，时至今日仍保持其宗教和文化优势。事实上，其他埃及王朝，如马穆鲁克王朝和近代的阿里王朝，都为爱资哈尔清真寺添砖加瓦。法蒂玛王朝试图培训传教士[如阿布·阿卜杜·阿拉·什叶（Abu Abd Allah al-Shi‘i）]到世界各地传播教义。法蒂玛王朝也修建清真寺、马德拉萨（madrasas，二级或学院水平的宗教学校），并常常对陵墓加以修缮。另外，资助者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寻找法蒂玛艺术家和工匠。[③] 就装饰艺术而言，西比勒·马佐（Sibylle Mazot）提及埃及跨文化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罗取代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成了贵重工艺品的重要生产中心。埃及首都巧妙地利用其地中海沿岸的地理优势，发挥经济优势和艺术潜力。地中海沿岸活跃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Mazot 2004, 154）。光滑亮泽的瓷器、

---

① 作为通往印度洋和南亚的通道，红海的复兴对法蒂玛王朝的竞争对手白益王朝及其在波斯湾的贸易网络起到了消极影响。

② 关于意大利贸易，卡什（Karsh）提醒说：“威尼斯变成了中欧最大的奴隶市场，甚至基督徒奴隶被卖给穆斯林”（Karsh 2007, 69）。

③ 诺曼底西西里国王们委任法蒂玛王朝的艺术家为巴勒莫帕拉丁大教堂屋顶做绘画装饰。这座建筑物反映了诺曼底人的跨文化倾向，也是拜占庭镶嵌工艺的写照（Hillenbrand 1976, 28）。

玻璃器皿和陶器是法蒂玛王朝的特有之物。

什叶派法学体系调解着司法制度，但范围有限。相反，法蒂玛王朝允许传统的逊尼派法官（Qadis）审理案件。科普特人继续控制着财务，并位居高官。在反复无常而又神秘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996—1021年在位）统治时期，逊尼派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忍受着迫害，包括毁坏犹太会堂。[①] 然而，保拉·A. 桑德斯（Paula A. Sanders）却指出："他经常朝令夕改。"（Sanders 1998，152）[②]据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的观点，哈基姆将自己想象为"宇宙的智者，把上帝与其创造物联系起来"（Esposito 2005，47）。[③] 公元1005年，他修建了达尔·伊尔姆（Dar al-'Ilm，知识之屋），后者几乎与伊斯玛仪教的说教或改宗没什么直接关系。此外，哈基姆还补充逊尼派教徒充当学者—传教士（scholar-teachers）的职位，"这一事实令历史学家们迷惑不解"（Walker 2002，44）。马克里齐（al-Maqrizi）引用了哈基姆（al-Hakim）的朋友穆萨比（al-Musabbihi）对达尔·伊尔姆的评价：

83

法理学家在那里定居下来，王宫图书馆的藏书被移到那

① 偶尔的迫害和阿拉伯化促使埃及的基督徒逐渐皈依伊斯兰教（参见 Wilfong 1998，183—187）。

② 虽然如此，但海因茨·哈尔姆（Heinz Halm）写道："人们都指责哈基姆（al-Hakim）行踪神秘莫测、性格古怪无常，习惯于撤销自己刚刚下达的命令，但上述指责并没有史料证实"（Halm 1997，35）。总之，哈尔姆属于那些对哈基姆报以同情态度的学者，强调了他在调解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所做出的努力。哈尔姆宣称，哈基姆下令毁坏基督教建筑（包括圣陵教会），旨在"遏制穆斯林中反基督教情绪的蔓延"，"他没有大规模地迫害基督教，但这种错误说法被再三提及"。（ibid.，37）阿拔斯·哈姆达尼（Abbas Hamdani）认为："怀有敌意的作家所考虑的是他的精神错乱，这可能怀有狂热的目的性。他们所说的狂热盲信可能是他想推进伊斯玛仪派发展的真正渴望。迫于巩固政权的压力，法蒂玛王朝当时还没有正式信奉伊斯玛仪教……不管是如何错误的行为，但他的残忍和冷酷可能都反映了他渴求根除腐败、应对饥馑、消除瘟疫和叛乱威胁的真正意图"（Hamdani 1962，38—39）。

③ 在哈基姆统治时期，两个伊斯玛仪派传教士，达拉齐（Darazi）和哈姆扎·伊本·阿里（Hamza ibn Ali），在黎巴嫩南部劝诱马什里克的人们改变信仰。他们最终将哈基姆设计为"神的化身"。当哈里发神秘地消失（或被谋杀）的时候，他们的解释是隐退了。德鲁兹派就是在这种哈里发崇拜中产生的（参见 Esposito 2005，47—48）。

> 里。人们能够访问它，任何人可以复制自己感兴趣的书籍；任何人可以阅读他想拥有的任何史料……《古兰经》的读者、天文学家、文法家和语言学家以及医学家在这里演讲……人们可以把哈基姆的信徒首领带到这里，所有书籍都摆放在这间屋子里，也就是说科学和文化所有领域的手稿都藏在这里，之前这些手稿从未被收集在一个国王那里。他允许各行各业的人们接触这些手稿，无论他们想浅尝辄止，还是要深入专研……他付给自己任命的服务人员大笔薪金，这些人包括法理学家等人……他也捐赠人们所需要的文化用品，如墨水、芦苇笔、纸张和墨水瓶（Halm 1997，73—74）。[①]

哈基姆也雇佣中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思想家（尤其在光学方面）哈桑·本·海赛姆（Hasan bn al-Haytham）去研究尼罗河洪水。胡斯洛（Al-Khusraw）写道：在国家的支持下，“文学家、诗人和法理学家”“定期获得薪金”。（Lewis 1974，1：218）哈里发以伊本·图伦的清真寺为模型，修建哈基姆的清真寺，也表现出了马格里布建筑风格的影响。

公元11世纪60年代，两次灾难深深地影响了法蒂玛王朝的势力和繁荣。一次稀有的、水量极小的尼罗河洪水毁坏了埃及。此外，法蒂玛王朝的军队曾经是跨文化组织与合作的典范，但由于职位之争和效忠对象的不同，分裂为不同族群。这种竞争使得王朝内部矛盾重重，导致了暴力冲突和政治动荡。[②] 这些危机破坏了法蒂玛王朝的辉煌成

---

① 根据伊夫·拉科斯特（Yves Lacoste）的说法，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们都是藏书家，他们在开罗著名的图书馆里藏有200万卷图书，包括1200卷塔巴里（al-Tabari）历史书的复制本（Lacoste 1969，232）。

② 不幸的是，到1068年末，未得到报酬的官员和士兵抢劫了达伊尔姆（Dar al-‘Ilm）等图书馆。尽管很多作品幸存下来了，但其他作品都被毁掉了，其损失堪与希腊化时代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相比。1132年，一座新达伊尔姆图书馆落成开放。但在宗教人士的控制下，限制了图书馆的图书收集活动（参见 Halm 1997，84—85）。幸运的是，伊本·图瓦尔（Ibn al-Tuwayr）——一位法蒂玛王朝晚期和阿尤布王朝早期的编年史家（正如马克里兹所言）——关注这一问题，再次收集了大量图书。小宫殿（西宫）有一个大厅，据说藏书有20多万（Halm 1997，91—92）。

就，特别是埃及的独立地位。此外，一系列重大事件也震撼着马格里布地区。

当法蒂玛王朝向埃及迁移时，他们将马格里布地区留给了前面提到的兹里德王朝（973—1148 年）。布鲁金·本·兹里（Bulukkin bn Ziri，973—984 年在位）充满活力。在他领导下，兹里德王朝向西进攻。到 980 年，占领了非斯，暂时控制了摩洛哥的大部分地区。此时，马格里布地区继续繁荣发展。尽管穆卡达西（al-Muqaddasi）抱怨凯鲁万“水（靠蓄水池收集起来的水）质低劣”，而且民众“没有文化”，但他仍然描述了兹里德王朝统治下的凯鲁万城：

84

>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广阔的地方，这里有甜美的面包和鲜肉；这里出产各种水果……这里社会安定、学术繁荣、物价低廉……它是旅行者西行的起点，是两洋之间的商业中心。这里城镇繁多，居民过着惬意的生活。除了哈乃非和马利克学派外，这里没有其他宗教派别。老百姓和睦相处，没有派系之争……这个城市是马格里布地区的骄傲，是权力之基，是王国的支柱之一。它比内沙卜尔（Naysabur）更令人愉悦，比大马士革更历史悠久，比伊斯法罕更壮丽辉煌。(al-Muqaddasi 2001，186—187)

兹里德王朝的首都阿希尔（Ashir）具有酋长宫殿（palace complex）的特点。然而，兹里德王朝内部冲突与桑哈加柏柏尔人内部的斗争同时出现，他们的堂兄弟建立的哈马德王朝（1014—1152 年）乘势兴起，该王朝的首都是在阿尔及尔以霍纳山脉（Hodna Mountains）为基础修建的卡拉城（Qal‘a）。[1] 卡拉城包括宫殿和一座清真寺，清真寺尖塔受到了马什里克和马格里布文化的影响。

---

① 哈马德·本·布鲁金（Hammad bn Bulukkin，公元 1014—1028 年在位）建立了这个王朝。尽管有希拉尔部族入侵，但王朝幸存下来了，并在纳赛尔（公元 1062—1088 年在位）和他的儿子曼苏尔（1088—1104 年在位）的统治下繁荣起来。

兹里德王朝与法蒂玛王朝的关系逐渐恶化，后在埃米尔穆伊兹统治时期（al-Mu‘izz，1016—1062 年）分化瓦解。[①] 在马利克乌里玛的压力下，穆伊兹于 1048 年宣布自己为阿拔斯王朝的支持者，与法蒂玛王朝断绝关系。马利克教派强调，埃米尔渴望摆脱开罗哈里发的控制（与此同时，哈马德王朝也与法蒂玛王朝断绝了往来）。法蒂玛王朝对这次羞辱做出回应，劝服阿拉伯什叶派部落向西进军。这些什叶派定居在尼罗河沿岸，经常无事生非。这些阿拉伯游牧民在希拉尔部族（Banu Hilal）和苏莱曼部族（Banu Sulaym）的率领下，进入马格里布地区。这是名副其实的“阿拉伯人二次入侵”。（Welch 1972，278）这次入侵产生了重大的后果。

希拉尔人的入侵及其后果

苏莱曼部族最初驻留在昔兰尼加，后来才取得进展。公元 1052 年，希拉尔部族到达伊弗里基亚，并打败了兹里德王朝。成功的喜悦鼓动其他阿拉伯部落在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发动征服活动。伊本·赫勒敦用最悲惨的语汇描述了这次入侵：“希拉尔部队曾经是阿拉伯贝都因人，他们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也毁灭了国家。”（Ibn Khaldun 1967，2：289）后来，赫勒敦在《伊巴尔》（*Ibar*）中称这些人为“一群蝗虫”，并阐述了他们在“毁坏”凯鲁万的商铺、住宅和公共纪念物所带来的后果。（Ibn Khaldun 1968—1969，1：34，37）尽管学者们对阿拉伯部落造成的毁坏程度存有质疑，但马格里布地区发生了深刻转变。阿拉伯部落把内陆草场用于放牧和季节性游牧，而不是发展种植业。土地使用方面的变化对土壤和农作物生产产生了巨大的环境效应，并造成了重大的历史后果。没有了农业的支持，马格里布的内陆城市，尤其哈马德王朝的卡拉城，不得不被放弃了。为了挽回经济损失，哈马德王朝迁移到了沿海的贝贾亚城（Bejaia）。从此，哈马德王

---

① 穆伊兹（Al-Mu‘izz）资助并保护敌方诗人伊本·拉什克和伊本·色拉夫。据说，他们后来成了穆伊兹的密友。

朝转向海洋商业。兹里德王朝抵挡住了希拉尔部族军队的冲击，但在1148年，他们被诺曼底人征服。[①] 另一个重要的阿拉伯群体是马格尔部落（Ma'qil）。他们起源于也门，穿越北非，在13世纪早期到达了摩洛哥南部和大西洋。13世纪末，马格尔部族或者阿瓦德·哈桑进入了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对这些地方产生深刻影响。[②]

从文化层面来讲，如此多的阿拉伯人的到来增加了阿拉伯语的使用率。韦尔弗里德·纳普（Wilfrid Knapp）等人认为阿拉伯化"受到如下事件的推动，即在阿拉伯入侵时期，人们在讲一种具有血缘关系，被注入了闪米特文化的语言"（Knapp 1977, 16）。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之间开始通婚，如马格尔部族的阿瓦拉德·哈桑（Awlad Hassan）与桑哈加柏柏尔人之间的通婚。事实上，桑哈加人采用了口语式的哈桑尼亚（Hassaniyya）阿拉伯方言。希拉尔部族、苏莱曼部族和马格尔部族的入侵属于马格里布地区历史中最重要的跨文化事件，其长远影响堪与罗马帝国入侵日耳曼人媲美。以上两种情形，均发生了跨文化融合。

阿尤布王朝（Ayyubids）

由于尼罗河洪水、军队内部的分裂以及马格里布的困扰，法蒂玛王朝大丧元气。就在他们准备恢复昔日雄威之时，却遭受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打击。这次打击不仅影响到了法蒂玛王朝，也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099年，西欧的十字军从法蒂玛王朝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好战的西欧人继续进攻法蒂玛王朝的领土，后者因内部派系冲突而耗尽国力，哈里发政权短时间内成为十字军的傀儡国。由于法蒂玛王朝的虚弱，埃及很难抵抗穆斯林指挥官萨拉丁·本·阿尤布（Salah al-Din bn Ayyub）的进攻。萨拉丁是一位库尔德人，忠诚地为

86

---

① 入侵的贝都因人并没有建立国家。

② 哈桑尼亚（Hassaniyya）在西撒哈拉的主要人群是阿瓦德杜莱姆人（Awlad Dulaym）。西非的萨赫勒地区（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也有哈桑尼亚人定居（参见 Norris 1986）。

阿拔斯王朝服务，成功地战胜了十字军。他在法蒂玛王朝官员的邀请下，处理内政，接管了维齐尔一职。1171 年，他推翻法蒂玛王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阿尤布王朝。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恢复其逊尼派传统，什叶派统治埃及的时代结束了。

萨拉丁以阿拔斯王朝的名义管理着埃及包括汉志的圣地、也门和叙利亚在内的大帝国。萨拉丁做了两件事，即公元 1187 年，夺取耶路撒冷；抵抗了英格兰理查德一世（狮心王）率领的第三次十字军。[①] 他减少埃及人的税赋，但不削减宗教税。[②] 爱资哈尔清真寺从什叶派的高级教育机构转变成了逊尼派的高级教育机构，开罗文化重心的地位更加突显。萨拉丁也资助马德拉萨（madrasa）教育制度，其特征是在中等和学院级伊斯兰学校中消除什叶派的影响，并传播逊尼派教义。[③] 他还在开罗修建了一个城堡，成立了穆斯林（Maristan，Bimaristan）医院，医疗设备较为先进。[④]尽管萨拉丁公开反对基督教徒在西亚活动，但他慷慨地容忍科普特教徒。科普特教徒掌握着财政大权，积极地与意大利商业城市开展贸易活动。犹太社区繁荣起来，著名博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是萨拉丁的私人医生。迈蒙尼德的家人离开安达卢西亚是因为这里不容异端。人们认为，迈蒙尼德是西方文明培育出来的中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经院哲学著作《对困惑者的指引》（*Guide of the Perplexed*）证明了这一点。

---

① 1194 年，萨拉丁向强大的穆瓦希德王朝寻求海军援助，以便打击十字军的要塞，如阿克里和提尔（见第四章），但他并没有获得帮助。（参见 Ibn Khaldun 1967，2：44—45）另外，据《伊巴尔》（*Ibar*）记载，穆瓦希德王朝最后派战舰帮助阿尤布王朝。（Ibn Khaldun 1968—1969，2：215—216）（参见第四章）（此外，穆瓦希德王朝的兴起阻碍了埃及获取西非黄金的传统途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萨拉丁耗尽了他的黄金资源。）实际上，十字军在与萨拉丁的角逐中取得了成功，保护了巴勒斯坦－叙利亚沿海地区和塞浦路斯，尽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未能夺回耶路撒冷。

② 尽管埃及整体上繁荣起来了，但萨拉丁的自由财政政策致使国家收入大为减少。对抗十字军的战争及其通过新货币和教育机构消除法蒂玛王朝文化影响的努力，导致国家几乎接近破产。

③ 正如前文提及的，法蒂玛王朝也建立了马德拉萨宗教学校。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大力推进这些教育机构的发展。萨拉丁及其继承者们也资助宗教机构或瓦克夫（*waqfs*），后者接下来资助逊尼派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教育（参见 Chamberlain 1998，231—232）。

④ 阿赫迈德·伊本·图伦统治早期，一些大医院也建立起来。

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促进国家稳定和社会繁荣，这种局面的获得还得益于被十字军驱赶而来的穆斯林移民所做出的贡献。从 1218 年至 1221 年、1249 年至 1250 年，萨拉丁及其继承者为维护埃及的优势，屡次击退十字军的进攻。1229 年，苏丹卡米尔与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签署协议，实际上是缔结同盟。为保证腓特烈二世援助阿尤布王朝对抗外来威胁，卡米尔把耶路撒冷还给了基督徒。[①] 教皇谴责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抚行为，而非怪罪好战的“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因为腓特烈早就被逐出教会了。然而，在此期间，穆斯林—基督徒的和解仍在进行。尽管十字军东征也留下了一些遗产，但阿尤布王朝从与欧洲国家（如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贸易中获益匪浅。事实上，十字军东征［包括西班牙基督徒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应该视为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复杂、矛盾关系的一部分。阿尤布王朝通过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组织“卡利米”（Karimi）继续控制着印度洋的贸易，使自己闻名遐迩。[②]

87

与此同时，阿尤布王朝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突厥奴隶军队，后者被称为马穆鲁克（即被拥有之人）。经过专门训练的马穆鲁克的职责是保卫王朝，在战场上进行有效的战斗。1249 年至 1250 年，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东征给阿尤布王朝造成政治危机，但被马穆鲁克成功解决，并在 1259—1260 年驱逐了蒙古人对叙利亚的入侵。马穆鲁克最终推翻了这个动荡不安的王朝。1260 年，当最后一个阿尤布国王去世时，国家权力已经被马穆鲁克军队掌控。

结论

如果考虑一下穆斯林征服了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岛的历史事实，那么阿拉伯人的到来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决定性地将北非与西亚联系起来。阿拉伯 - 柏柏尔人的融合产生了复杂的哈里发政权，出现了阿

---

① 在蒙古西征的驱赶下，克瓦利兹人［Khwarizmis（Khwarizmians）］入侵伊朗，并威胁到了两河流域。此外，塞尔柱突厥人也威胁到了阿尤布王朝在北方的统治。

② 卡利米（Karimi）或许是在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组织起来的。

拉伯埃米尔国。而且，这个时期开启了地缘政治学的“三边主义”（trilateralism）。突尼斯出现阿格拉布王朝，阿尔及利亚出现鲁斯塔姆王朝，摩洛哥出现伊德里斯王朝，这种政治三边主义将在马格里布地区流行起来。[①] 随着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统治，埃及为自己的沉积文明添加了新的层级。最重要的是，跨文化主义的作用揭示了它在政治发展和社会繁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毫无疑问，文明共存秩序（*convivencia*）是所有文明所必须经历的跨文化思考和合作的最重要事例之一。事实上，跨文化主义增强了安达卢西亚人伍麦叶王朝的繁荣和法蒂玛哈里发政权的势力。本纳比的历史观认为，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可以产生异常的政治和社会。这里也有一些重要教训。除此之外，这些文明国家还将穆斯林庞大的知识宝库和先进技术，通过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岛向欧洲其他地区扩散与传播。伴随着这些信息传播路径，如安达卢西亚（例如造纸术），两个伟大的马格里布柏柏尔帝国——穆拉比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迅速崛起。

88

① 就西方伊斯兰世界来说，安达卢西亚的伍麦叶王朝、马格里布地区和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和马什里克的阿拔斯王朝（白益王朝）是穆斯林三角形权力结构的典型个案。与此同时，基督徒的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如公元 10 世纪，我们能够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构想出西方文明极为复杂且国家之间密切相关的四边权力结构。

第四章　穆拉比德和穆瓦希德帝国及其继承者

从公元 11 世纪开始，北非的阿拉伯游牧民席卷北非，决定性地改变了马格里布地区格局。在这个动荡不安、四分五裂的时代，两个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出现了，即穆拉比德帝国和穆瓦希德帝国。这两个柏柏尔人帝国在伊斯兰教的激励下，所铸就的统一遗产至今仍鼓舞着当代马格里布地区的人们。 89

公元 13 世纪，穆瓦希德帝国瓦解后，其他三个柏柏尔王朝——哈夫西德王朝（Hafsids）、赞德王朝（Zayyanids）和马林王朝（Marinids）接管了马格里布地区，并重塑了另一个马格里布三边政治（Maghribi trilateralism）关系。按照马利克·本纳比的说法，其他一些事情也在“后穆瓦希德”时代发生了，如诡辩学说（sophistication）逐渐消失，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伊本·赫勒敦去世了。[1]昔日以充满生机、视野开阔为特征的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的知识分子，变得颓废荒谬，目光狭隘。后穆瓦希德时代的几个世纪里，北非地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缓慢衰落，这使穆斯林很容易接受“殖民地化”（colonizability）。

---

① 伊本·赫勒敦也在《穆卡迪玛》（*Muqaddima*）中意识到了当时社会的衰落和颓废（参见后文）。

穆拉比德王朝

充满趣事的雷姆图纳（Lamtuna）柏柏尔人属于桑哈加部落联盟。这个对宗教十分虔诚的民族居住在今日的毛里塔尼亚和西撒哈拉地区。他们考察伊斯兰信仰，想知道自己的信仰是否正确。一群牢记这种思想的雷姆图纳朝圣者，在麦加朝圣后返回的途中，找到一位名叫阿布·伊姆兰·法西（Abu Imran al-Fasi）的摩洛哥著名的马利克学者。随后，阿布·伊姆兰将这些雷姆图纳人介绍给了一位聪明的年轻学者，这位学者来自摩洛哥南部，名叫阿卜杜·阿拉·伊本·亚辛（Abd Allah ibn Yasin）。伊本·亚辛受部落信仰的感染，决定与这些朝圣者返回他们的部落领地。

90 伊本·亚辛很快成为雷姆图纳人的精神领袖。他亲临麦加朝圣，以此举巩固自己的权威。他在一个阿拉伯堡垒（*ribat*）鼓动追随者，耐心劝导柏柏尔人（和黑人），用严格的马利克教派解释伊斯兰教。他们被称为穆拉比图人（al-Murabitun），意思是堡垒中的人，或者被称为“穆拉比德人”。“穆拉比德”（Almoravids）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派生词。他们的穿着就明显表明穆拉比德人的身份。他们戴着一块里萨姆（*litham*）或者脸上罩块布，被形象地称为穆拉萨姆（*al-mulathamun*），即蒙面人。

1055年，穆拉比德王朝夺取西吉勒马萨，王朝的撒哈拉贸易有利可图。在叶海亚·伊本·奥马尔（Yahya ibn Umar）和他弟弟阿布·伯克尔·伊本·奥马尔（Abu Bakr ibn Umar）的领导下，穆拉比德王朝强大起来。他们成功地打败了摩洛哥中部的巴伽瓦塔（Barghawata）柏柏尔人，这个部落被视为异端部落。[①] 1058年或1059年，伊本·亚

---

① 巴伽瓦塔［Barghawata（Berghawata）］是马斯穆达柏柏尔人（Masmuda，另有人认为他们是扎纳塔柏柏尔人）。他们将哈瓦利吉派和什叶派、基督教、犹太教和万物有灵论（animism）融入柏柏尔人文化。他们的精神领袖是萨利赫·本·塔利夫（Salih bn Tarif），他在约公元744年宣称自己为先知。巴伽瓦塔人以他们自己的启示传统和经典为信仰特征（参见Ibn Khaldun 1968—1969，2：125—133）。他们被视为异端，在几个世纪里随时面对伊德里斯王朝、伍麦叶王朝、法蒂玛王朝、兹里德王朝的战争行为。理查德德·B. 帕克称他们的信仰为“柏柏尔化的伊斯兰教”（Parker 1981，3—4）。

辛去逝，或许死于与巴伽瓦塔部落的战斗，但他的学说继续激励着穆拉比德人。他们以《古兰经》、逊纳、马利克乌里玛（*fuqaha*）对教法学的注释为基础，严格遵守马利克教义（Abun-Nasr 1993，84）。1062年，阿布·伯克尔修建马拉喀什城，该城成为穆拉比德王朝的首都。[①] 公元1069年，非斯城陷落。[②] 阿布·伯克尔的堂兄弟优素福·伊本·塔舒芬［Yusuf ibn Tashfin（Tashufin），1006—1106年）］担当最高首领，被称为穆斯林的指挥官，也是穆拉比德人的最高领导者。[③] 他将穆拉比德王朝的权威扩展到阿尔及利亚中部，占领了特莱姆森、奥兰和特内斯（Tenès）。公元1082年，阿尔及尔陷落。哈马德王朝坚决抵抗，阻挡了穆拉比德势力范围的扩张。[④] 然而，穆拉比德帝国也削弱了希拉尔部族军队的扩张势头。

除了向东扩张以外，穆拉比德王朝也在撒哈拉或萨赫勒以及安达卢西亚作战。他们进攻加纳的索尼克（Soninke）王国，后者以金子著称。1076年，阿瓦古斯（Awdaghust）陷落。尽管加纳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但穆拉比德王朝的袭击大大削弱了这个王国。穆拉比德王朝入侵是为了控制撒哈拉地区的贸易。[⑤] 然后，安达卢西亚的派系王国邀请穆拉比德王朝干涉和对抗前进中的基督教卡斯提尔王国（Castilians）。伊本·塔舒芬（Ibn Tashfin）当时已经是八旬老人，于1086

---

① 优素福·伊本·塔舒芬也经常被认为是马拉喀什城的创建者。

② 穆拉比德王朝后来在非斯城修建的灌溉系统令人印象深刻。

③ 阿本-纳斯尔（Abun-Nasr）认为使用这个头衔意味着“强调他们权威的宗教特性”（Abun-Nasr 1987，xiv）。头衔也暗示他们信仰的真实性。

④ 哈马德王朝向西拓展疆土，并在公元1102—1103年占据了特莱姆森。

⑤ 几个世纪后，西吉尔马萨——塔加扎（Taghaza，盐矿地址）——瓦拉塔的撒哈拉贸易线路逐渐闻名起来。盐兑换金子成为这条贸易路线的主要交易（参见第一章）。尽管穆拉比德王朝和后来的萨迪人（16世纪）入侵这里，但未能垄断这些贸易。葡萄牙人也到西非寻找黄金。巴克里（Al-Bakri）提供了关于阿瓦古斯国际性城市的信息，这是一条非常珍贵的史料。尽管阿瓦古斯忠诚于信仰万物有灵论的加纳（Ghana）王国，但该城仍然有一些自由精神。巴克里提及这里有很多清真寺。此外，该城市吸引了来自伊弗里基亚和其他重要穆斯林城市的人们。他赞扬妇女们制作的美味佳肴，菜肴包括带有坚果和蜂蜜的油酥糕饼（*qataif*）和其他甜点（al-Bakri 1965，158/300）。巴克里谴责穆拉比德王朝对阿瓦古斯的袭击（ibid.，168/317）。而且，他也对伊本·亚辛的道德和行为提出了质疑（ibid.，169—170/318—320）。巴克里或许从未访问加纳，他是依赖安达卢西亚看到的资料得出上述结论的。

年在扎拉卡（Zallaqa）成功地驱逐了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的卡斯提尔王朝军队。伊本·塔舒芬厌倦了穆斯林国家之间的争吵和背叛，策略性地吞并了它们。穆拉比德王朝继续发动对基督徒的战争。他们到达了托莱多（Toledo），但基督徒进行了激烈而成功的抵抗，尤其是罗德里格·迪亚兹·德·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1043？—1099年）领导的战斗。此人通常被称为埃尔·西德（El Cid）。[①] 穆拉比德王朝攻克托莱多，然后在1102年夺取埃尔·西德占领下的巴伦西亚，并从1090年至1145年一直控制着安达卢西亚。此外，穆拉比德王朝的战略方向还从撒哈拉地区转移到海上，以适应海上生活。这支强大的舰队（formidable fleet）沿着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地区的海岸线游弋，确保穆拉比德王朝对巴利阿克群岛（Balearic Islands）的控制。

根据伊本·赫勒敦等人的观点，在安达卢西亚文化的浸染下，穆拉比德王朝逐渐衰败，即使达不到颓废的程度，但群体感（*asabiyya*）消失了。正如罗伯特·曼特兰（Robert Mantran）所说："这些极为野蛮的'蒙面人'很快成为安达卢西亚文化的传播者。这不同于希拉尔人，他们始终在身体和精神方面保持着牧羊人的本色。"（Mantran 1970，223）罗纳德·A. 麦希尔对穆拉比德王朝的衰落给出了不同的评价。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场"两个前线的战斗"，在马格里布地区对抗穆瓦希德王朝，在安达卢西亚对抗基督徒。他们还对自己的资源收取重税。麦希尔认为，穆拉比德王朝不准备统治"一个遥远的、以城市为基础的帝国"（参见 Messier 2001）。穆拉比德王朝的瓦解导致了

---

① 埃尔·西德（El Cid）因为捍卫瓦伦西亚，对抗穆拉比德王朝而获得美誉，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为穆斯林服务，而非为基督徒服务。《西德诗歌集》（*The Poem of the Cid*，）是在他死后几十年里由别人编辑而成的，揭示了"收复失地运动"时期十字军的精神（参见 *The Poem* 1975）。

各分裂王朝试图恢复实力，并促使无情的西班牙基督徒再次发动战争。[①] 根据尼韦尔·巴伯尔（Nevill Barbour）的观点："如果没有穆斯林西班牙的干预，作为穆斯林统治者的穆拉比德王朝，在 200 多年后才可能屈服于基督徒"（Barbour 1966，60）。

他们入侵安达卢西亚，削弱或过分提高了这些撒哈拉斗士的战斗力。但从审美观点来看，穆拉比德王朝也传播了安达卢西亚文化，美化了马格里布地区。大量建筑作品，例如马拉喀什（Marrakesh）的库巴特·巴鲁蒂荫（Qubbat al-Barudiyyin）和非斯城的卡拉维因（al-Qarawiyyin）清真寺的装饰和扩建，证明了安达卢西亚王朝的兴趣和动机，表明了与伊拉克、波斯和科尔多瓦建筑类型上的细微差别。[②] 特莱姆森和阿尔及尔建起的"大清真寺"，体现了前安达卢西亚的古朴风格。后来，穆拉比德王朝再次造访并装饰了特莱姆森大清真寺。

历史学家们认为穆拉比德王朝严格的宗教信仰巩固了马利克教义在马格里布的地位，这是一个持久的贡献。另外，矛盾冲突也影响到了穆拉比德王朝。矛盾的安达卢西亚文化情感与宗教严格性共存，产生不和谐声音。他们的教条主义（dogmatism）经常导致残酷的宗教迫害，后者威胁着安达卢西亚社会文明共存秩序（*convivencia*）的稳定。 92

然而，他们重视基督徒军队，尤其雇佣基督徒对抗穆瓦希德王朝。穆瓦希德王朝也公开谴责伊斯兰著名教法学家、马什里克的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u Hamid al-Ghazali）的作品为异端，并公开焚烧。他们从未将定居的生活方式与沙漠游牧传统协调起来，或者说，从未解决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穆拉比

① 彭内尔（C. R. Pennell）对梅西耶（Messier）的解释加以补充："帝国的腐败不仅因为其核心区域的力量软弱，还因为其边缘地区存在问题。从 11 世纪晚期开始，撒哈拉和马格里布与帝国隔离开来，剥夺了马拉喀什的人力，尽管贸易仍然不受干扰，但安达卢西亚的人力和财力都进一步被榨干"（Pennell 2003，47—48）。

② 安达卢西亚艺术和建筑风格在马格里布地区传播的主要标志是"马蹄铁形状的、尖形的、叶片状的拱门，这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是摩尔人的建筑标志"（Parker 1981，14）。穆拉比德王朝的建筑物也是用砖和混凝土修建的。

德王朝的经验体现了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地图 8　柏柏尔人帝国

穆瓦希德王朝

穆拉比德王朝饱受诟病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上的顽固不屈和世俗生活中的“伤风败俗”。这对摩洛哥南部山区的土著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阿拉·伊本·图马尔特（Muhammad bn Abd Allah ibn Tumart）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安达卢西亚、伊弗里基亚、埃及和马什里克学习之后，开始鼓吹宗教改革，强调先验的“一神教”和真主独一。[①] 他质疑穆拉比德王朝拘泥于从字面意义上解释经典，后者将人类的属性归因于真主。他拒绝人神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

① 历史学家们认为，伊本·图马尔特与安萨里之间的见面虽已被信以为真，但事实上是伪造的。当然，伊本·图尔马特熟悉后者的思想。另一方面，伊本·赫勒敦认为伊本·图马尔特已经会见了安萨里（Ibn Khaldun 1968—1969，2：163）。

phism)，认为这种观点是有罪的，号召回归《古兰经》，在司法实践中放弃以个人观点和社区共识（community consensus，*ijma*）为立法依据。伊本·图马尔特的追随者，尤其阿特拉斯高地的马斯穆达柏柏尔人（Masmuda Berbers），视自己为穆瓦希德（Muwahhidun），意思是信仰真主或一神论的人们；他们或者称自己为“穆瓦希德人”。Almohads这个词源自西班牙语。伊本·图马尔特最终不仅把自己视作一个改革家，还称自己为马赫迪（救世主）——指引人们创新和恢复伊斯兰教的救世主。[①]他引人入胜的思想和超凡魅力的个性也吸引了扎纳塔人（Zanata）。扎纳塔人是桑哈加人的首要对手。伊本·图马尔特采用伊本·亚辛的战略，在阿特拉斯修建了一个防御性的城堡。穆瓦希德王朝准备在这里挑战穆拉比德王朝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力。阿布·哈夫斯·奥马尔（Abu Hafs Umar）保护穆瓦希德王朝的领袖，他的后代在伊弗里基亚建立了哈夫西德王朝。

伊本·图马尔特在他的追随者中发现了一个青年才俊，此人是扎纳塔柏柏尔人（Zanata Berber）阿卜杜勒·穆敏（Abd al-Mu'min，1094？—1163年）。阿卜杜勒·穆敏是摩洛哥土著人，是伊本·图马尔特的得力助手或代理人（*khalifa*）。约1130年，伊本·图马尔特战死。阿卜杜勒·穆敏一直封锁伊本·图马尔特死亡的消息，直到巩固了自己的埃米尔（*amir al-mu'minin*）地位。埃米尔是传统的哈里发头衔，象征性地表明他独立于阿拔斯王朝，追求大伊斯兰帝国领导权。尽管马赫迪已经建立了一套等级管理制度，但阿卜杜勒·穆敏开创了一个王朝。查尔斯-安德烈·朱利安（Charles-André Julien）写道：“伊本·图马尔特最初建立的制度是一种联邦与贵族政治共和政体（federative and aristocratic republic），柏柏尔人似乎可以接受，后来被

---

① 在伊本·赫勒敦看来，伊本·图马尔特“接受了艾沙里教派［Ash'arites，学者艾沙里（al-Ash'ari）的追随者］的基本思想，并批评马格里布人的复古传统背离这一信条，复古传统拒绝对宗教法做明确表达的隐喻式阐释，这一拒绝导致了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Ibn Khaldun 1967，1：471）。查尔斯-安德烈·朱利安认为伊本·图马尔特受到了逊尼派艾沙里学派的影响，该学派对法学进行“比喻（figurative）”，而非字面意义的阐释（Julien 1970，94）。

家族君主制所替代，其他柏柏尔人对此产生强烈的厌恶感”。（Julien 1970，108—109）[①]然而，阿卜杜勒·穆敏及其直系继承者“穆美尼德人”（Muminids）都能力非凡，必要的时候，还采用高压手段进行统治。

阿卜杜勒·穆敏是北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为了确保阿特拉斯地区和里夫山脉的安全，他率领大军步步紧逼穆拉比德王朝的领袖塔舒芬·伊本·阿里（Tashfin ibn Ali），并在特莱姆森附近打败了他。[②] 后来塔舒芬意外死亡。非斯城落入了穆瓦希德王朝手中。1147年，马拉喀什也陷落了，穆拉比德王朝在摩洛哥的势力几乎消失殆尽。阿卜杜勒·穆敏然后向东进军，于1151年夺取了贝贾亚城，并结束哈马德王朝的统治，后者曾成功地抵抗了穆拉比德王朝。[③] 穆瓦希德王朝哈里发在塞提夫（Sétif）附近打败了惹是生非的希拉尔部族，消除了来自他们的直接威胁。然而，希拉尔部族鼓舞其他阿拉伯游牧部落向西迁移，这些游牧部落造成该地区动荡不安。阿卜杜勒·穆敏从1159年至1160年在伊弗里基亚地区作战，从沿海要塞驱逐了诺曼底人。他的征服统一了从摩洛哥至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北非。

穆瓦希德王朝的权威也扩展到了安达卢西亚。尽管阿卜杜勒·穆敏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保护国，但他的继承者接管了它。[④] 阿布·雅库布·优素福（Abu Ya‘qub Yusuf，1163—1184年在位）在伊弗里基亚、安达卢西亚大获全胜。1196年，阿布·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Abu Yusuf Ya‘qub al-Mansur，1184—1199年在位）在阿拉尔科斯（Alarcos）战胜卡斯提尔王朝的阿方索八世（1158—1214年在位），确保了穆瓦希德王朝的安全。

穆拉比德王朝在巴利阿克群岛有些好冒险的和雄心勃勃的贾尼亚（Ghaniya）部族，他们入侵伊弗里基亚，但曼苏尔把他们驱赶了出去。

---

① 穆美尼德王朝有一个咨询委员会，由50位穆瓦希德部落成员组成。

② 穆拉比德王朝在安达卢西亚面临着基督徒的猛烈进攻。

③ 热那亚人的攻击也削弱了哈马德王朝（Hammadids）。

④ 阿卜杜拉·穆敏（Abd al-Mu'min）在去世之前正准备发动安达卢西亚战争。

然而最后一批穆拉比德王朝的人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回到伊弗里基亚进行冒险活动，迫使穆瓦希德王朝再次作战，领导者是曼苏尔的继承者哈里发穆罕默德·纳西尔（1199—1214 年在位）。为了维持穆瓦希德王朝的强大势力，纳西尔任命阿布·穆罕默德·本·阿比·哈夫斯（Abu Muhammad bn Abi Hafs）为总督。然而，叶海亚·伊本·贾尼亚（Yahya Ibn Ghaniya）与希拉尔和苏莱姆部族联盟在伊弗里基亚保持活跃状态。他在被驱逐出伊弗里基亚之前进行了两场战事：一是与穆瓦希德王朝作战；二是于公元 1237 年去世之前在阿尔及利亚附近与哈夫西德王朝作战。

与穆拉比德王朝相似，穆瓦希德王朝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建筑和文化遗产。这些清真寺表明，他们没有在宗教禁欲主义和庄严建筑之间感到矛盾。在他们看来，权力等同于建筑。他们在库图比亚（al-Kutubiyya）修建了清真寺，在马拉喀什的卡斯巴（al-Qasba）修建了堡垒，在廷麦尔（Tinmal）建筑了大清真寺。阿卜杜勒·穆敏修建拉巴特城，该城变成了穆瓦希德王朝的首都。他的孙子阿布·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Abu Yusuf Ya'qub al-Mansur）扩建了城市。“哈桑塔”（Hassan Tower）是一座巨大尖塔，表明了曼苏尔的理想（从未实现）是修建一座比麦加清真寺还要大的清真寺，以此显示穆瓦希德王朝的力量。阿布·雅库布·优素福修建的塞维利亚大清真寺就耸立着一个尖塔。

阿布·雅库布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也是一名宫廷医师，曼苏尔资助的伊本·图法伊尔（Ibn Tufayl，1110—1185 年）和伊本·鲁世德［Ibn Rushd，Averröes（阿威罗伊斯），1126—1198 年］是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家。阿布·雅库布尤其喜欢这两个人讨论哲学问题。阿布·马迪安（Abu Madyan，1126？—1197 年）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和苏菲派教徒（Sufi），被称为马格里布地区的安萨里。他在去往穆瓦希德王朝宫廷的路上（或许是到哈里发面前讨论和捍卫他的信仰），死在特莱姆森附近。伊本·伊哈里·马拉库什（Ibn Idhari al-Marrakushi，生活于 13 世纪后半叶）是非斯的卡迪，考察了从穆斯林

95

征服埃及到他那个时代的北非和安达卢西亚的历史（参见 Ibn Idhari 1948）。他的作品非常有价值，因为他引用了许多已经失传的编年史书。苏菲派的重要领袖西迪·贝尔·阿贝斯（Sidi Bel Abbès）和穆莱·阿卜杜勒·萨拉姆·本·马希斯（Mawlay Abd al-Salam bn Mashish）吸引了众多追随者。阿布尔-哈桑·阿里·沙泽里（Abu-l-Hasan Ali al-Shadhili），也就是阿卜杜勒·萨拉姆·本·马希斯的学生，他建立了沙泽里亚（Shadhiliyya）——马格里布最流行的苏菲派秩序之一。

随着穆瓦希德帝国的建立，马格里布地区也达到了其势力和影响力的顶峰。查尔斯-安德烈·朱利安指出："穆瓦希德帝国的力量、财富[①]、军队和舰队的荣誉[②]赋予了哈里发以极大的声誉。一位阿拉伯作家到处宣布开罗和亚历山大的穆斯林希望阿布·雅库布征服埃及"（Julien 1970, 128）。英格兰国王约翰（1189—1216 年在位）派了一支聪明的考察团去确定穆瓦希德王朝设计的方案是否可行，即英国从法国西南部的阿基坦（Aquitaine）穿越比利牛斯山（Barbour 1966, 7）。比萨和热那亚缔结了商业条约。[③] 然而，穆瓦希德王朝缺乏可用于管理和捍卫其从安达卢西亚延伸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广阔帝国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尽管穆美尼德王朝尽全力保卫其帝国整体性，但帝国还是分裂了，而且马格里布的地缘政治经历了一个重构过程。

① 伊本·赫勒敦提到伊本·图马尔特"确立了铸造正方形迪拉姆（dirhams）货币的先例，并在圆形第纳尔货币上铭刻一个正方形。他的图像位于货币的一面，并附文：'信主独一'和'赞美真主'。铸币的另一面是几行包含其名字的传奇文字。铸币中的人物和名字被他的继承人一再替换"（Ibn Khaldun 1967, 2: 57）。

② 伊本·赫勒敦写道，"就我们所知"，穆瓦希德王朝的"舰队在规模和数量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萨拉丁派遣卡里姆·本·穆奇德（Karim bn Munqidh）率领一支阿尤布王朝代表团到雅库布·曼苏尔那里，请求海军支援。据说，因为阿尤布王朝没有给作为"信仰者的指挥官"的哈里发写信，因而未能获得援助。不过，他们"得到了极为友善和尊敬的待遇"（Ibn Khaldun 1967, 2: 43—46）。按照《伊巴尔》的说法，曼苏尔最终派遣了 80 艘船只帮助阿尤布王朝阻止基督徒对叙利亚的进攻（Ibn Khaldun 1968—1969, 2: 215—216）。参见第三章。

③ 参见 Bovill 1995 中关于欧洲人与马格里布国家贸易交往的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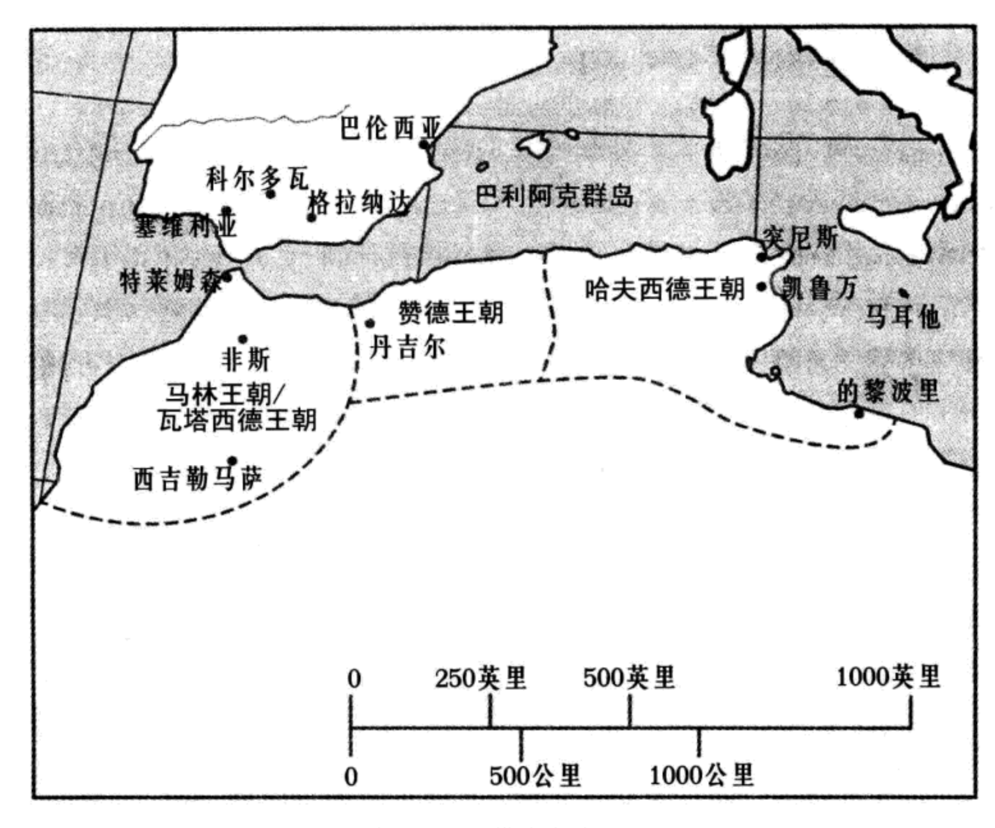
新三边主义（A New Trilateralism）

1195 年，穆瓦希德王朝在阿拉尔科斯战胜了基督徒，但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阿方索八世国王反攻，阻止了一次联盟行动（联盟国家包括卡斯提尔、里昂、纳瓦拉和阿拉贡王国），并于 1212 年在托洛萨（Los Novas de Tolosa）决定性地打败了穆瓦希德王朝。这次胜利加速了穆瓦希德王朝和穆斯林世界的瓦解进程。1236 年，科尔多瓦落入了西班牙基督徒手中。1238 年，巴伦西亚陷落。1248 年，塞维利亚陷落，把小块贫瘠的格拉纳达王国留给纳西里德（Nasrids）王朝统治。纳西里德王朝通过以下方式几乎幸存了 250 年：一是给基督徒支付贡赋；二是及时与摩洛哥马林王朝缔结联盟（参见下文）。神话般的宫殿阿哈布拉（意思是“红色宫殿”，该宫殿是用红色砖块砌成的）用物质形态体现了格拉纳达对世人的文化贡献，证明了安达卢西亚的辉煌灿烂。

96

由于与安达卢西亚战争的失败以及内部的争权夺利，穆瓦希德王朝逐渐衰败并在马格里布地区崩溃了。1248 年，特莱姆森附近发生叛乱，摧毁了雄心勃勃的哈里发萨义德，穆瓦希德王朝遭受了惨重一击。萨义德希望再度统一和复兴帝国。然而，一些新兴地区王朝出现了，即伊弗里基亚的哈夫西德王朝、马格里布中部的赞德王朝和摩洛哥的马林王朝。公元 1269 年，马林王朝占据了马拉喀什。1275 年，又在廷麦尔消灭了穆瓦希德王朝的最后一个城市。廷麦尔是伊本·图马尔特运动的发祥地。这几个新王朝再次显现出马格里布三边政治关系。对于随后 200 年来说，这三个国家为了确保地缘政治战略优势经常群雄逐鹿。他们经常征募欧洲人充当士兵，其目的有二：一是管理国家；二是保卫国家。在他们漫长的双边冲突中，赞德王朝和（特别是）马林王朝消灭了马格尔部族军队。哈夫西德王朝建立初期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胜利。

97



地图 9 后穆瓦希德时代

哈夫西德王朝（1227—1574 年）

哈夫西德王朝声称自己最靠近穆瓦希德王朝，最有资格成为其合法继承人 。阿布·哈夫斯·奥马尔（Abu Hafs Umar）把自己视作伊本·图马尔特（Ibn Tumart）最忠诚的马斯穆达（Masmuda）追随者之一。在穆尼尼德王朝看来，哈夫西德王朝始终是其潜在威胁。而事实上，后者始终是前者的坚定支持者。正如前文所言，哈里发纳西尔任命阿布·穆罕默德·本·阿比·哈夫斯去管理伊弗里基亚。阿布·扎卡里亚·叶海亚（Abu Zakariyya Yahya，1236—1249 年）和穆斯坦绥尔（al-Mustansir，1249—1277 年）将哈夫西德王朝的势力输入赞德王朝和马林王朝的属地。[1] 1258 年，蒙古人消灭阿拔斯王朝，洗劫巴格达后，穆斯林暂时把哈夫西德王朝视作西方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

① 哈夫西德王朝引人注目的扩张包括占领休达和西吉尔马萨。

马穆鲁克王朝邀请阿拔斯人到开罗（参见第五章）之前，麦加贵族把穆斯坦绥尔视作哈里发。此外，当穆瓦希德王国在安达卢西亚衰落的时候，穆斯林逃到了繁荣强盛的伊弗里基亚。

突尼斯，而非凯鲁万和马赫迪亚，成为哈夫西德王朝统治时期伊弗里基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突尼斯的赞图纳（al-Zaytuna）大清真寺学样较为著名，该大学是在公元8世纪晚期建立的，并最终由阿格拉布王朝重新设计与装修。与埃及的跨文化交流也促成了突尼斯的社会复杂性。为了展示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影响，哈夫西德王朝宫廷款待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斯堪的纳维亚的代表团。

1270年，法国的路易九世发动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进攻突尼斯。这是在昂儒（Anjou）城查尔斯的要求下发动的。尽管法国国王因疾病死在那里，十字军随之瓦解，但也极大破坏了哈夫西德王朝的威望与力量。之后不久，阿拉贡人开始从经济上主导、政治上威胁哈夫西德王国。1313年，哈夫西德王朝驱逐了西班牙人。1335年，哈夫西德人从杰尔巴岛把西班牙人驱逐出去。[①]

穆斯坦绥尔去世后，内部的相互倾轧削弱了哈夫西德王朝。赞德王朝审时度势，侵吞哈夫西德王朝的领土。1347年，马林王朝夺取了突尼斯，第二年又被驱赶出来。1357年又返回突尼斯。幸运的是，哈夫西德王朝在15世纪实现了稳定，其原因是出现了一批卓有才干的统治者，如阿布尔·阿拔斯（Abu'l Abbas，1357—1394年在位）、阿布·法里斯（Abu Faris，1394—1414年在位）和阿布·阿穆尔·乌特曼（Abu Amr Uthman，1435—1488年在位）。突尼斯再次恢复了声望和影响。哈夫西德王朝资助清真寺学校的建筑，监管赞图纳清真寺的修复活动。然而，16世纪的哈夫西德王朝国内较为混乱，对西班牙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野心十分敏感。

98

① 阿拉贡基督徒（Aragonese Christians）是赞德王朝的亲密盟友，这表明了后穆瓦希德王朝时期，柏柏尔人国家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加泰罗尼亚人（Catalonians）也为哈夫西德王朝服务。

赞德王朝（1236—1550 年）

赞德王朝的统治者们经常被称作阿卜杜勒·瓦迪（Abd al-Wadids）家族。他们是扎纳塔（Zanata）柏柏尔人，以特莱姆森为首都。特莱姆森是跨撒哈拉终点站，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特莱姆森靠近地中海，是商业中转的理想地点。赞德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是亚穆拉桑·本·扎亚（Yaghmurasan bn Zayyan，1236—1283 年），此人被伊本·赫勒敦称为“阿卜杜勒·瓦迪家族最勇敢、最可怕、最可敬的人”（Ibn Khaldun 1968—1969 年，3：340）。尽管赞德王朝偶尔会生机勃勃、取得成功，但其敌人——哈夫西德王朝和马林王朝——更强大，限制了赞德王朝的野心。马林王朝在 14 世纪长期占有特莱姆森。15 世纪，赞德王朝的首都也被哈夫西德王朝所占领。此外，赞德王朝的统治者都是臭名昭著、暗藏奸诈之徒，马林王朝经常施展阴谋诡计。①

然而，特莱姆森的统治者都很欣赏其首都的文化和宗教遗产。在赞德王朝（和马林王朝）统治下，特莱姆森变成了马格里布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阿布·哈姆·穆萨一世（Abu Hammu Musa I，1308—1318 年在位）和阿布·塔舒芬一世（Abu Tashfin I，1318—1337 年在位）属于赞德王朝的重量级统治者。前者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并加强了首都的防卫。后者让一个名叫希拉尔的基督徒担任他的首席大臣。三个后穆瓦希德马格里布王朝出现了，在这个新的地缘政治三边关系中，赞德王朝力量最弱。

马林王朝（The Marinids，1244—1465 年）

马林王朝在发展“摩洛哥”身份认同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伊德里斯王朝不同，扎纳塔的马林王朝不是谢里夫王朝。1248 年，马林王朝在阿布·叶海亚领导下，占领了非斯城。1269 年，阿

① 王朝内部的背信弃义偶尔也困扰着哈夫西德王朝和马林王朝。

布·优素福·雅库布（Abu Yusuf Ya'qub，不能与著名的穆瓦希德王朝的哈里发相混淆）占领了马拉喀什，穆瓦希德王朝的权威崩溃了。马林王朝控制了摩洛哥，并在安达卢西亚打击基督教所带来的压力，支持了格拉纳达。尽管马林王朝未能再次获得安达卢西亚领地，但他们的努力却保护了格拉纳达。伊本·赫勒敦描述了一支被派往东方的马林商队，其目的一是保护朝圣者；二是保护马林王国。马林王朝与马什里克，特别是马穆鲁克埃及之间互派大使（Ibn Khaldun 1969，4：153—155）。

在阿布尔－哈桑·阿里（Abu'l-Hasan Ali，1317—1351 年）和他的儿子阿布·伊南（Abu Inan，1348—1358 年）统治时期，马林王国繁盛起来，并扩展到了伊弗里基亚。特莱姆森和突尼斯落入了阿布尔－哈桑·阿里这个马林王朝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之手。[1] 阿布尔－哈桑送给马穆鲁克王朝 500 匹马，500 捆马格里布手工制品（例如武器和护盾、家具、服装、羊毛和丝绸纺织品），以及他亲手书写并送到麦加的《古兰经》复本（Ibn Khaldun 1968—1969 年，4：240—241）。他修建了曼苏拉城（Mansura），毗邻特莱姆森，城里有著名的清真寺。清真寺高耸的尖塔受到穆瓦希德王朝的影响。曼苏拉刚开始是一座武装兵营，这个兵营是在赞德王朝的首都受围困期间修建的，后逐渐发展起来。马林王朝定都非斯，并创造了一个新行政管理中心，被称为“第二城”［second city，（“新非斯城”或 Fas al-Jadid）］（参见 Le Tourneau 1961）。阿布尔－哈桑命令在非斯修建色拉比因（Sharabliyy-in，修鞋匠）和阿布尔－哈桑清真寺以及米斯比亚（Misbahiyya）和萨利清真寺学校（Sahrij madrasas）。他还在拉巴特修建了阿布尔－哈桑清真寺学校（完成于 1342 年）。乌巴德清真寺（al-Ubbad Mosque）完

① 阿布尔－哈桑（Abu'l-Hasan）被认为是“黑人苏丹”（Black Sultan），因为他的母亲是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马林王朝充满活力，但正如彭内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从未解决王朝人口太少这一难题，因为王朝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部落国家”（Pennell 2003，64）。国家的合法性依赖于“亲属关系和部落联盟”，而非像穆拉比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那样“建立在共同宗教信仰之上的政治统一体”（ibid.，75）。

成于1339年，位于特莱姆森外面，即阿布·马迪安（Abu Madyan）坟墓的遗址上，是马格里布地区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阿布·伊南废黜了他的父亲，执掌马林王朝的大权，推动非斯和梅克内斯（Meknès）的清真寺学校向前发展。与马格里布的对手不同，马林王朝也调拨大量资源去阻止残酷的“收复失地运动”。1340年，阿布尔-哈桑在萨拉多遭受惨败，但纳西里德（Nasrids）王朝通过向基督徒提供贡赋而成功地确保了独立地位。

欧洲人对穆斯林国家施加压力，在马格里布地区获得了重要地位，其中一些国家的地位得以长久保持下来。1383年，西西里人和热那亚人占据了远离伊弗里基亚海岸的杰尔巴岛。最重要的是，基督徒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1401年，西班牙人占据了得土安（Tetuan）。1415年，葡萄牙人占据了休达，并确保从丹吉尔到阿加迪尔等领地的安全。欧洲国家的胜利迫使马林王朝内部权力发生变化。从1420年开始，他们的亲属——瓦塔西德人（the Wattasids）作为首席大臣或维齐尔大权在握。尽管名义上是马林人在统治，但实际统治者是瓦塔西德人。当瓦塔西德·穆罕默德·谢赫（Wattasid Muhammad al-Shaykh）成为苏丹后，这种政治谎言也就结束了。15世纪末，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开始对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政权发动最后的进攻。1492年1月，格拉纳达投降了，结束了穆斯林在安达卢西亚存在了800年的政权。[①] 1497年，西班牙人占据了摩洛哥沿岸的梅利利亚，并成立了堡垒要塞，至今由马德里占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入侵极大地影响了马格里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100

跨文化的马格里布：柏柏尔人帝国及其后继国家

柏柏尔帝国及其后继国家的特点是大范围的跨文化交往。罗伯

---

① 马歇尔·霍奇森认为：“西班牙基督徒对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敌视非常具有代表意义。半岛上大部分人口由于拒绝皈依基督教，结果被驱逐出去了，包括很多辛勤劳作的阶层。在随后的（16）世纪，穆斯林和大量犹太人为了避难而成百上千地逃往穆斯林地区，很多人死在了路上”（Hodgson 1974，3：117）。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遍布在整个马格里布地区，非斯、特莱姆森、阿尔及尔和（尤其）突尼斯人口大量增加。

特·曼特兰（Robert Mantran）非常赞赏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的交往："这里的诗人、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非常杰出。这当然可以称为马格里布文明的黄金时代……西班牙人增加了它的精致妩媚，而柏柏尔人的苦行从整体上看到其令人骄傲、无可辩驳且宏伟壮丽的原初生态"（Mantran 1970，225）。正如前文所言，马格里布建筑风格经历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承认："在西哥特人、希腊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和北非人共同影响下所产生的建筑类型，在随后几个世纪，为西班牙和摩洛哥提供了一种模式。突尼斯在推动西班牙—摩尔建筑风格（Hispano-Moorish style）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那种作用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帕克认为，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否"突尼斯工匠到了西班牙……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凯鲁万（Kairouan）的大清真寺对西班牙和摩洛哥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Parker 1981，14）。穆拉比德王朝的沙漠史几乎没有决定他们的审美潜力。他们留给后人的遗迹令人印象深刻。穆瓦希德王朝的"尖塔"令参观者产生敬畏之情。此外，哈夫西德王朝、特莱姆森的赞德王朝和非斯的马林王朝也出资修建清真寺，以展示其虔诚和权力。马林王朝和赞德王朝融合了穆拉比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的建筑模式和风格。此外，尽管格拉纳达的纳西里德王朝独立地位较为勉强，但仍在安达卢西亚修建了大量建筑精品，如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 101

穆拉比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建立了货币经济体系。他们的商业网络从南撒哈拉非洲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同时保持着与马什里克的传统联系（参见 Bovill 1995）。相对快速的交往以及知识分子间的思想碰撞将马格里布与马什里克地区联系起来了。伊本·鲁世德对加扎利的《语无伦次的哲学家》（*The 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与《语无伦次中的语无伦次》（*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两本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伊本·鲁世德翻译了《注释》（*Commentaries*）一书，本书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伟大的基督教学者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年）有重大启发。此外，后穆瓦希德时代的沿海

城市获得了自治，如贝贾亚和阿尔及尔，并开发出自己的海洋贸易网络。哈夫西德王朝与意大利海洋国家保持着强大的商业交往，这些海洋国家“互不敌视，它们互利互惠、真正协作、热诚真挚”（Barbour 1959，286）。然而，海盗在地中海沿岸很常见，日益成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商人担心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斐然。伊本·祖尔［Ibn Zuhr，阿文·祖尔（Avenzoar），1091—1161 年］是一位内科医生和临床医师，侍奉穆拉比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的国王（尤其阿卜杜勒·穆敏），被视为自 9 世纪巴格达的拉齐（al-Razi 或 Rhazes）以来西方文明世界最伟大的医学思想家。伊本·鲁世德是伊本·祖尔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法理学家和哲学家。伊本·巴甲［Ibn Bajja，也叫阿文帕塞（Avempace），死于 1138 年］是另一个博学家，在哲学、尤其音乐学方面颇有造诣。伊本·阿拉比（Ibn Arabi，1165—1240 年）出生于安达卢西亚，先后在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学习。他在马什里克旅行时遇到了伊本·鲁世德，并以神智学研究（theosophy）见长（参见 Hourani 1991a，176—179）。伊本·库兹曼（Ibn Quzman）的诗歌与伊本·哈兹姆（Ibn Hazm）早期的诗歌相似，继承了安达卢西亚的遗产，影响了法国的宫廷爱情和行吟诗人的抒情诗体。这一时期（12 世纪至 13 世纪）也产生了两位塞维利亚的天文学家，即贾比尔·本·阿法拉［Jabir bn Aflah，吉贝尔（Geber）］和比特鲁吉（al-Bitruji，Alpetragius，埃尔皮特拉基）。此外，贾比尔是一位重量级的数学家，他研究球面三角形（spherical trigonometry）。比特鲁吉［al-Bitruji（Alpetragius）］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犹太人也对安达卢西亚的的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朱达·哈勒维（Judah Halevi）是一位著名诗人，离开安达卢西亚去了马什里克（尤其是圣地），旨在逃避不宽容的学术环境。12 世纪，亚伯拉罕（Abraham bar Hiyya ha Nas）把阿拉伯科学著作译成了希伯来语，随后学者们将其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传播到整个欧洲。卡斯提尔和利昂国王阿方索十世（1252—1284 年在位）在托莱多成立了一个翻译研究所。

102

安达卢西亚人和马格里布人认为自己博学多才，富有修养。我们已经提到伊本·图法伊尔（Ibn Tufayl）和伊本·鲁世德体现了穆瓦希德王朝宫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重视。前文提及的阿布·马迪安与马什里克的加扎利相似，融合了苏菲派教义和逊尼正统教义。1325 年，马利克教法学家（*faqih*）伊本·巴图塔（1304—1377 年）离开摩洛哥，环游伊斯兰世界，甚至到了中国。1349 年，他返回摩洛哥。然后在 1353 年，访问马里帝国。根据罗斯·迪恩（Ross Dunn）的记载，伊本·巴图塔“访问的地区相当于现代约 44 个国家，总里程约 73000 英里”（Dunn 1989，3）。伊本·巴图塔为德里苏丹国服务多年。他的游记《里拉》（*Rihla*）展示了北非及其“相邻地区”的活力和连通性（connectedness）。伊本·巴图塔从丹吉尔到特莱姆森、贝贾亚和君士坦丁堡的旅行期间，提供了相关城市的一些信息。[1] 哈夫西德王朝的突尼斯，当时是一个拥有约 10 万居民的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巨大的港口”。他还把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比较，如印度的卡利卡特和中国的刺桐城（Zaytun，今天的泉州）（Ibn Battuta 1929，46）。在亚历山大城，他遇到了瘸子杜尔汗·丁（Burhan al-Din），后者是一位苏菲派苦行僧。杜尔汗·丁凭直觉知道伊本·巴图塔喜欢旅行，并建议他应该访问三个苏菲派同行，其中两个在印度，另一个在中国。伊本·巴图塔写道：“我的旅行不会停止，除非找到那三个人，并转达杜尔汗·丁的问候”（ibid.，47）。这位摩洛哥法理学家对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开罗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个拥有 50 万居民的城市，在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享有较高的声誉。伊本·巴图塔看到开罗最大的医院——玛利亚医院

---

① 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在返回摩洛哥的路上，再次在特莱姆森停留下来，参观了阿布·马迪安（Abu Madyan）的坟墓（Ibn Battuta 1929，307）。这表明伊本·赫勒敦熟悉伊本·巴图塔的旅行情况，并对他加以批判性的评价。一个伊本·赫勒敦的熟人警告说：“当心不要排斥诸如王朝所处的环境这样的信息，因为你自己还不知道这些信息。”很明显，尽管伊本·巴图塔和伊本·赫勒敦是同代人，但从未谋面（参见 Ibn Khaldun 1967，1：369—371）。

(Maristan)"拥有无数医疗器械和药物"(ibid.,51)。[1]他在返回摩洛哥之后的几十年里，目睹了黑死病对西亚和北非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他叙述了开罗的情况:"人们告诉他，在瘟疫流行期间，日死亡21000人"(ibid.,306)。伊本·巴图塔的游记形象地阐明了费迪南德·布罗代尔关于"大地中海"(Greater Mediterranean)及全球交往的观念早已存在，但在16世纪表现的较为突出。

103 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是这一时期非常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出生在哈夫西德王朝统治下的突尼斯的一个安达卢西亚移民家庭里——移民是穆瓦希德帝国瓦解的结果。他研究苏菲派教义和亚里士多德，并对历史、地理、宗教、文学和哲学等产生广泛的兴趣，甚至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学。伊本·赫勒敦具有批判精神和洞察思维。他为马林王朝、赞德王朝和哈夫西德王朝服务，后来被马穆鲁克王朝任命为开罗马利克教派的大卡迪。[2] 马穆鲁克王朝派他去完成一件棘手的外交任务，即劝阻帖木儿灾难性的征服活动。然而，他未能阻止帖木儿(Tamerlane)对叙利亚的蹂躏。

伊本·赫勒敦最伟大的著作是377年在兰城附近的卡拉·本·萨拉玛(伊本·萨拉玛)完成的《穆卡迪玛》(*Muqakkima*)[《穆卡迪玛》介绍了《基塔·伊巴尔》(*Kitab al-Ibar*)(惩戒性信息之书)的相关信息，后者是伊本·赫勒敦在世界史方面的代表作]。该书的前言部分阐释了《穆卡迪玛》的一些重要观点：对历史的多元化理解；"表层历史"与"深层历史"的区别；历史上的代理人的群体感(*as-abiyya*)(参见该书前言)。伊本·赫勒敦认为历史学家：

> 需要了解政治原则、现存事物的(真正)本质和民族间的差别、地点和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时代、个性特征、风

---

① 按照伊本·巴图塔的描述，这个人很可能是马里斯坦·曼苏里(Maristan al-Mansuri)(参见第五章)。

② 贝尔克认为,"流浪"是伊本·赫勒敦的主要生活方式。参见他对伊本·赫勒敦的评述文章(Berque 1974,48—64)。

俗、教派、学派等。他还需要综合了解所有这些方面在当下的状况。他必须比较现在与过去的相似性或差异……他必须知道事物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原因……他的目标是：必须对每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有彻底的了解，必须熟悉每一件事情的源起。然后，他必须用他了解的基本原则考察那些传播信息。如果该信息满足基本原则的需求，那么它就是正确的。(Ibn Khaldun 1967, 1: 56)

对于伊本·赫勒敦来说，“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组织的信息，人类社会组织本身等同于世界文明”（Ibn Khaldun 1967, 1: 71）。这样，他提出了一种全球化北非的观点。雅克·贝尔克认为伊本·赫勒敦对世界是如何适应文化的这一命题颇感兴趣（Berque 1974, 61）。欧文·I. J. 罗森塔尔（Erwin I. J. Rosenthal）写道：“他的小说或许是关于作为人文主义观念的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最早理论，同时也是一个穆斯林看待人性和世界的最早的政治理论。”(Rosenthal 1979, 1) 伊本·赫勒敦寻找动力变量（*mubtada*），即引起变化的确凿原因或导致社会和政治形态以及文明变迁的变量（参见 Berque 1974, 59 和 Khatibi 1983, 65—75）。 104

根据马利克·本纳比的观点，伊斯兰文明的理性阶段与伊本·赫勒敦的生命和成就一起达到顶峰。考虑到马格里布地区法理学家越来越僵化的趋势，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和理论著作以及批评方法论共同表现了异常的成就。哈利勒·伊本·伊斯哈格（Khalil ibn Ishaq，死于1378年）的著作《概要》（*Mukhtasar*）深受马利克教法学派的影响。它的出版表达了对新观点和方法论的偏狭态度。[①] 费迪南德·布罗代

① 穆罕默德·伊本·阿拉法［Muhammad ibn Arafa，也叫瓦里哈尼（al-Warghani，1316—1401年）］是一位著名的马利克学者，在突尼斯从事教学和写作。1378年下半年，伊本·赫勒敦返回突尼斯并执教时，伊本·阿拉法发现他的学生都被吸引到伊本·赫勒敦的课堂上去了，这位马利克学者愤恨不已。伊本·阿拉法可能已经痛恨伊本·赫勒敦多元主义的解释方法（参见 Ibn Khaldun 1967, 1: lvii.）。

尔写道：“伊斯兰教……变成了自己成就的俘虏，自信处于世界的中心，找到了万事万物的正确答案，无需求助他人”（Braudel 1972—1973，1：187—188）。罗伯特·曼特兰认识到：“流传下来很多有价值的编年史家、诗人、地理学者或游记作家以及法学家、神学家和圣徒传作者；但他们的所有作品中，根本没有先前时代所特有的新颖与发明……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依靠继承先辈的成就活下来的时代，但没有显示出任何创造力的迹象”（Mantran 1970，235）。事实上，伊本·赫勒敦谴责了当时的文化颓废现象，甚至描述了北非环境恶化的景象。

瘟疫对北非地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伊本·赫勒敦描述了黑死病对北非造成的影响，这是目前尚存的稀有史料。瘟疫大面积地流行“摧毁了这个国家，人口消失。文明的精华被吞噬殆尽、一扫而光……随着人类数量的减少，文明退化了。城市和建筑物被损毁，公路和路标被抛弃，居住地和大厦变成了空巢，王朝和部落日益虚弱。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Ibn Khaldun 1967，1：64）。伊本·赫勒敦说：

> 凯鲁万和科尔多瓦分别是马格里布和西班牙的定居文化中心。它们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科学和艺术快速发展，这也是它们特别需要的。由于这两个城市历史悠久，定居文化发达，所以科学教育在这些地区牢固地扎根。但当这里变成一片废墟时，（穆斯林）的西方不再接受科学教育（凯鲁万和科尔多瓦）。科学文化的某些部分继续在穆瓦希德王朝延续，其原因在于王朝兴起与灭亡时间十分短暂。这里的定居文化很难连续存在（Ibn Khaldun 1967，2：427）。

105

在本纳比看来，文化衰落的标志表现在：知识分子缺乏科学的好

奇心和历史意识。[①] 用本纳比的话来说，“后穆瓦希德时代的人”恢复了前伊斯兰时代的习惯。质朴的阿拉伯部落周期性地向马格里布地区迁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较早期的希拉尔部族相像，他们是游牧民族，改变了昔日的城市结构，或者用伊本·赫勒敦的学术话语来说，改变了马格里布地区内陆的“定居化”进程。季节性的迁移放牧（Transhumance）代替了农业、贸易网络和都市化。此外，政治动荡和王朝分裂使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北非人意志消沉、易受攻击和被“殖民地化”。雅克·贝尔克参考本纳比的思想，将这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定义为“弥散时期”（dispersion）（Berque 1978，539）。

北非还有其他重要变化。尽管穆瓦希德王朝抗议马利克学派的呆板，但这个学派的教义（*madhab*）始终是司法的主要源头。穆瓦希德王朝时期也见证了马格里布地区苏菲派的兴起，后者对很多人思想进行全新表达，如阿布·马迪安，或者是对马利克颠覆性迷信行为的新表述。与穆拉比德王朝相似，穆瓦希德王朝变得越来越不容异说，对马利克学派和犹太人进行迫害（Julien 1970，119）。事实上，即使开明的统治者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Yusuf Ya‘qub al-Mansur）哈里发的宗教思想也逐渐僵化，结果毁掉了其他哲学家们的著作。

伊本·阿布敦（Ibn Abdun）在12世纪撰写的作品解释了塞维利亚的商业规章制度，形象地阐述了这里繁荣兴旺的经济生活。这些规章制度包括某些禁忌：“穆斯林不能为犹太人按摩，或者基督徒不能处理自己的垃圾，也不能清理厕所。犹太人和基督徒更适合于经商，因为他们是那些可耻人的贸易。穆斯林不应该照料犹太人或基督徒的动物，也不应该充当他们的赶骡人，更不应该给他们牵马坠蹬。如果任何穆斯林做了这种事情，他将公开受到指责。”（Lewis 1974，2：162—163）这种剥夺人权的腔调预示着文明共存秩序（*convivencia*）的

① 非斯、特莱姆森和突尼斯都有自己的伟大学者，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神学。科学、文学和历史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关注。除此而外，“收复失地运动”毁坏了安达卢西亚许多图书馆，其价值难以估量。

结束。[1] 积极的跨文化主义是以社会共存为标志的，互相尊重现象的106 突然消失削弱了安达卢西亚穆斯林的基本力量。此外，穆拉比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的征服活动强化了基督徒十字军战士的精神，正如激进的《熙德颂歌》（*Song of the Cid*）和《罗兰颂歌》（*Song of Roland*）所表明的那样。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使人们的观点变得狭隘，并产生了对其他人的“排斥”和淡漠。[2]

格拉纳达的征服结束了穆斯林在安达卢西亚的地位，导致了穆斯林家族向北非迁移或驱逐，包括哈桑·本·穆罕默德·瓦扎尼（Hasan bn Muhammad al-Wazzani，1485？—1554 年？）家族。哈桑的家族在非斯定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包括在卡拉维因学习。马林王朝任命哈桑的叔叔去执行外交任务，哈桑随行。哈桑在西非旅行时，看到了桑海帝国（Songhay Empire），并横穿北非。他可能到了马什里克地区和君士坦丁。1518 年，他被西班牙海盗抓获，成了罗马的奴隶，并被作为礼物献给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 年在位）。[3] 教皇资助乔瓦尼（哈桑）的学术活动。他的阿拉伯语手稿叙述旅行的全部内容，书名为《非洲历史及描述》（*The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Africa*）。1526 年，该书在意大利出版。乔瓦尼作为《利奥·阿非里加努斯》（*Leo Africanus*）的作者而闻名于世。

利奥的作品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巴克里（al-Bakri）和伊本·巴图塔的传统。他在旅游见闻的基础上叙述北非的作品，既有价值，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争雄地中海。此外，穆瓦希德帝国的柏柏尔人继承者的政治生涯也步入尾声。利奥的观点是跨文化理论的特殊形态，具体表现了地中海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行为体。他的叙述经常提到穆斯林市场、商

① 再强调一下，本章提及的所有王朝的军队都使用基督教徒，或者是基督教徒的盟友。历史学家伊本·阿提尔（Ibn Athir）认为，基督徒军队背叛了穆拉比德王朝，允许穆瓦希德王朝占领马拉喀什（Ibn Khaldun 1968—1969，2：577）。

② 尽管从历史编撰学角度来看，地中海世界稳固的宗教与政治地位与 16 世纪密切相关（参见第五章），但其发生时间早于此。

③ 历史学家们对他改宗的真诚持怀疑态度，一些人认为哈桑在其晚年再次改宗。

品和建筑物，这与欧洲同类形成对比。

尽管北非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不断，但它始终是充满生命力的和社会复杂的地区。利奥热情洋溢地描述非斯："它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世界，这个城市面积广阔、人口稠密、城防坚固、城墙厚实"（Leo Africanus 1970，2：419）。他赞赏城市供水系统先进的、卡拉维因的规模和清真寺学校的美丽。利奥也欣赏特莱姆森城的宏伟，尽管他也认为"非斯的建筑物更富丽堂皇"（ibid.，668）。关于特莱姆森周围地区，"除了美丽的草场和清澈的喷泉，还有各种丰富的水果令你赏心 107 悦目、垂涎欲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见到过比这里更令人愉悦的地方"。（ibid.，669）他补充说："这个城市的公民和商人的着装如此整洁和奇特，以至于有时他们超越了非斯的市民。"（ibid.，670）贝贾亚的"房屋、神庙（清真寺）和学院……是最奢华的建筑。这里是教授的储藏库，他们可以自由从事科学研究。其中一些教授讲授与法律有关的事情，其他教授讲授自然哲学"（ibid.，3：700）。利奥在整部《非洲历史和描述》中，详细叙述了北非的世界主义。关于非斯的郊区，利奥是这样描述的："我在亚洲、非洲和意大利从未见到过一个比这里人口更稠密或者商品更多、更好的市场"（ibid.，2：473）。突尼斯有一个维也纳人、热那亚人和其他基督徒商人生活的繁华社区。英国、荷兰和葡萄牙人的船只在亚历山大登陆。开罗国际市场的商品来自意大利、佛兰德斯和印度。

结论

马格里布地区文明在这几个世纪里达到了鼎盛，并异乎寻常地实现了文化统一。穆拉比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共同唤醒了人们对马格里布地区的重新幻想，即构建一个统一的马格里布。关于穆瓦希德王朝，阿本－纳斯尔（Abun-Nasr）写道："尽管通过统一，穆瓦希德王朝实现了对马格里布地区的统治，但该王朝用具体的历史存在实现了马格里布地区独特的宗教—文化实体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这样语境中具体化，即伊斯兰教在改变马格里布社会政治意识方面发挥了作用。"

(Abun-Nasr 1987, 101) 马格里布人牢牢记住了一个完整、鲜活的马格里布。1989 年，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rab Maghrib Union（UMA/AMU)］建立起来。尽管它在推进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努力成果至今令人失望（参见第八章和第九章)，但在本质上受到穆拉比德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遗产的鼓舞。此外，马利克主义、穆拉比德王朝合法性、穆瓦希德王朝苛求的道德融合在一起，始终是马格里布社会的内在本质。就马格里布“后穆瓦希德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地理而言，尽管其边界是流动的，但哈夫西德王朝、赞德王朝和马林王朝的三边政治关系深深地规范了当代个别国家的身份认同。

108 16 世纪是北非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开端。欧洲人对摩洛哥的干涉越来越多，引起了抵抗运动，但可能还谈不上独立战争。一个新的穆斯林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它就是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对北非发动征服运动，将从政治层面再次将北非与马什里克联系起来，但摩洛哥除外。

第五章　土耳其的统治与摩洛哥的独立

13—19 世纪，土耳其在北非的势力经历了兴盛与衰落的过程。13 世纪中期，土耳其的马穆鲁克代替了埃及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s）。16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打败了马穆鲁克，但保留了他们在本地区行政与经济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好战的奥斯曼帝国冒险分子在北非沿海和内陆发动袭击，并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为中心建立“摄政统治”（regencies）。土耳其的扩展，使北非卷入了雄心勃勃的奥斯曼人和同样具有侵略野心的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帝国对抗与竞争。当时，萨阿德和阿拉维（Alawis）两个谢里夫王朝（sharifian dynasties）坚持要求摩洛哥实现独立，免受欧洲的掠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这是一个帝国精英活力四射、海盗头子英勇无畏的时代。当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大英帝国等欧洲国家都雄心勃勃，预示着北非国家的不祥命运。尽管摩洛哥捍卫了国家独立，行使了国家权威，但到 19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其在北非摄政官员的权威都处于衰落局面。18 世纪末期，法国入侵并占领埃及，震惊世界，也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对埃及社会带来震荡性冲击。法国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埃及，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撼，显示了昔日不可征服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江河日下。 109

奥斯曼土耳其和北非

奥斯曼土耳其通过不间断的征服行动在北非东部重新恢复了统治权威（commanding authority）。尽管苏丹御驾亲征并成功征服埃及，但颇有进取精神的政治精英推动奥斯曼帝国继续在马格里布地区扩张。110 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地区建立了统治，这种政治存在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奥斯曼帝国概览

奥斯曼人在塞尔柱土耳其的征服活动中脱颖而出。11—12 世纪期间，奥斯曼人占领安纳托利亚，将拜占庭帝国作为征服目标。奥斯曼人服务于他们的塞尔柱领主，管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个小公国。13 世纪，奥斯曼人抓住塞尔柱帝国的衰弱和阿拔斯王朝的崩溃，再加上蒙古人还没有猛攻的机会，实现了独立。奥斯曼帝国拥有一连串世代继承的杰出领袖。第一个领袖是奥斯曼（Osman，1280—1324 年），他有条不紊地统治着安纳托利亚，然后横跨欧洲。1389 年，穆拉德一世（Murad I）发动科索沃战役，奥斯曼帝国接管巴尔干半岛。1453 年，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44—1446 年，1451—1481 年）的军队在欧洲火炮的支持下，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轰破一缺口，结束了拜占庭帝国的辉煌历史。这一伟大的帝国城市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深入考察奥斯曼帝国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的历史，特别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帝国分裂前的 300 年间，是跨文化主义（transculturalism）的典型个案。奥斯曼帝国承认并奖赏有才之士，不论他的出身背景如何。对“巴巴罗萨”（Barbarossa）兄弟及其海盗团伙的提拔和奖励就是鲜明例证。土耳其苏丹的出身复杂，混杂了各个族群的血统。再者，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担任行政职位一事也非同寻常。奥斯曼帝国挑选一些男性基督徒小孩，从小培养成才，让他们皈依穆斯林［这就是著名的“德米舍梅制度”（devshirme system）］，终身服务于苏丹及其帝国。

穆罕默德二世继位后，开始巩固帝国在东欧和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谢里姆一世（Selim I，1512—1520 年）率领大军向东方和南方扩张。1514 年，他在“查尔迪兰”（Chaldiran）一役打败了强大的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s）（萨法维王朝—奥斯曼帝国的对抗持续了数个世纪）。谢里姆的下一个目标是统率强大的军队对付马穆鲁克。

马穆鲁克（The Mamluks）

马穆鲁克为了对付外部力量的长期威胁，夺取了阿尤布王朝。这些威胁包括 1249—1250 年间路易九世（Louis IX）的十字军东征以及 10 年后的蒙古入侵叙利亚。事实证明，这些奴隶士兵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既有较高的治理绩效，又是埃及艺术的保护者。然而，马穆鲁克与法蒂玛王朝一样，也面对着天灾人祸的无情考验。这些天灾不仅包括尼罗河水的不规律泛滥，而且还遇到了黑死病的侵袭，接踵而至的是其内部的相互倾轧和争权夺利，这些都削弱了马穆鲁克的力量，最终被奥斯曼帝国所灭。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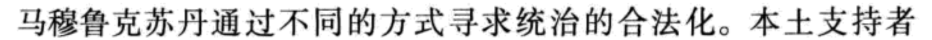
马穆鲁克与以前的王朝不同，它们的领导层是一个“群体”（group）。埃米尔（Emirs）辅助马穆鲁克苏丹治理国家，但二者也存在着竞争关系。首先提及的是 1250 到 1383 年在位的巴赫里（Bahri）马穆鲁克。他们的名字来自尼罗河流域拉瓦达（Rawda）军营。巴赫里马穆鲁克之一的卡拉温（Qalawun，约 1279—1290 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王朝，这是马穆鲁克统治埃及时期的唯一王朝，一直持续到 1382 年。巴赫里马穆鲁克主体是基皮克（Kipchak 或 Qipchaq）土耳其人，起源于里海（Caspian Sea）附近的伏尔加湖（Volga River）沿岸。第二个统治群体是布尔吉（Burgi）马穆鲁克，统治时间是 1382 年到 1517 年。他们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Circassian）土耳其人，也是当时埃及最强大的马穆鲁克首领。

巴伊巴尔斯（Baybars，约 1260—1277 年）主要负责安顿埃及掌权的马穆鲁克，寻求西亚（包括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地区安全（参见第三章）。他在击退 1250 年的十字军东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路易

被捕，交赎金后释放）。1260 年，巴伊巴尔斯会同赛义夫·丁·库图兹（Sayf al-Din Qutuz）在巴勒斯坦的艾因贾鲁特（Ayn Jalut）一举击败了蒙古大军，阻止了他们前进的铁蹄。当时，蒙古人已于 1258 年毁坏巴格达，结束了阿拔斯王朝的统治。马穆鲁克在艾因贾鲁特战役中大获全胜，产生了轰动效应，"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按照琳达·诺斯拉普（Linda S. Northrup）的说法，"这打破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Northrup 1998，274）。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埃及知名史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Abd al-Rahman al-Jabarti）指出，马穆鲁克的成功使民众"胆子大起来"（emboldened），他们"不断袭击（蒙古人）"（al-Jabarti 1994，1：25）。马穆鲁克将阿拔斯王朝的后裔请到开罗，并在 1261 年象征性地恢复了哈里发职位。因此，哈里发在马什里克地区存在几个世纪后，转移到了北非，标志着穆斯林权势和重心的转移。蒙古人及其继承者，波斯的伊尔汗国一直对马穆鲁克构成威胁，二者对抗长达几十年。[①] 马穆鲁克保证了马什里克的安全，直到 3 世纪后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为止。巴伊巴尔斯还逐步消灭十字军残余势力的军事要塞。

112 作为傀儡的哈里发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埃及的权力结构。马穆鲁克对埃及的治理比较成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4 世纪中期。马穆鲁克首领能力非凡，野心勃勃，相互争权夺利。他们残酷无情，夺权手段极为残忍。艾因贾鲁特战役后，巴伊巴尔斯杀死了库图兹（Qutuz），夺取了首领职位。苏尔坦·纳斯尔·穆罕默德（Sultan al-Nasr Muhammad，1239—1294 年；1299—1309 年；1310—1341 年）掌权时期标志着马穆鲁克权力走上巅峰。他将重要的政府职位安排给那些有威望的埃米尔或"政治要人"（magnates），而不是他的马穆鲁克亲信。纳斯尔死后不久，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夺取了马穆鲁克的统治地位。

① 伊尔汗国企图同欧洲结盟，对抗马穆鲁克。有一本书生动地叙述了一位名叫拉班·萨维玛（Rabban Sawma）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an Christian）教徒到伊尔汗国进行外交斡旋的情况（Budge 1928）。1271 年，英国的十字军到达阿卡（Acre），接受了伊尔汗国的援助。然而，二者战略上的合作除了让马穆鲁克焦虑不安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马穆鲁克苏丹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求统治的合法化。本土支持者

地图 10　马穆鲁克苏丹国家

（Patronage）在马穆鲁克权力关系博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丹特别热衷于公共工程建设。卡拉温的（Qalawun）苏丹经常进行慈善捐款，并在马穆鲁克的开罗修建了曼苏尔（Mansuri，al-Maristan al-Mansuri）医院，这是中世纪西方国家规模最大的医院。巴格达和波斯遭蒙古人洗劫后，开罗成为穆斯林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是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这里人口估计有 50 万，在西方文明中处于突出地位（参见第三

113

章）。苏尔坦·纳斯尔·穆罕默德（Sultans al-Nasir Muhammad）和古里（al-Ghuri，1501—1516年）出巨资修建了一个输水渠。苏尔坦·纳斯尔还命令在尼罗河和汉卡（Khanqah）之间穿凿了一条水渠，向城市输送饮用水。马穆鲁克慷慨出资完善教育设施，支持逊尼派教法学四个派别［马利克（Maliki）、沙斐仪（Shafi‘i）、哈乃菲（Hanafi）和罕伯里（Hanbali）］的乌里玛潜心宗教研究，显示出他们在法律领域的宽容大度（参见 Berkey 1998b，163—173）。纳斯尔·穆罕默德之子哈桑苏丹（1347—1351年；1354—1361年）修建的马德拉萨（madrasa）“毫无疑问是马穆鲁克在开罗的伟大杰作”（Williams 1993，66）。巴伊巴尔斯一世、纳斯尔·穆罕默德和卡特彼（Qatbay）时期修建的清真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穆鲁克以继承土耳其人的遗风而自豪。他们将自己与埃及人区别开来。然而，正如乔纳森·伯基（Jonathan P. Berkey）指出，“过分强调马穆鲁克与本土埃及人的疏离关系，或者低估伊斯兰文化的宽泛国际模式对它们的束缚，将会起误导作用。实际上，马穆鲁克深度参与了他们所治理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统治民众的复杂关系和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影响”（Berkey 1998a，1∶392）。随着蒙古人入侵马什里克，马穆鲁克欢迎阿拉伯人移民埃及并从中获益。[①] 从阿拉伯半岛来的混乱移民和流浪部族，使得埃及逐渐阿拉伯化（Arabization）和伊斯兰化（Islamization）。[②] 由于非穆斯林遭受迫害，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与日俱增。乌里玛抨击基督徒，理由是后者与蒙古人信仰相同。[③] 还有一些穆斯林心怀嫉妒地编造科普特人（Copt）的财富是从事金融活动骗来的。尽管社会上流传着各种说法，但传统的商业网络将埃及与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东非沿海的世界性城市以及南亚地区联成整体。不过，由于恐惧蒙古人控制陆上通道，使得北非商业

---

① 尽管蒙古人在1260年被阻止了，但在1295年再次发动进攻，夺取并占领大马士革达一年之久。

② 这些部族在北非沿海旅游之前，经常在埃及休息。

③ 马穆鲁克在艾因贾鲁特战役中曾要求十字军加入他们的军队，后者选择了中立。

贸易线路从埃及转移到他处。蒙古人一般为商人提供安全保障。[①] 马穆鲁克控制的阿勒颇（Aleppo）成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站。这里的商品数量大得惊人，包括纺织品、香料和宝石。蒙古人和其他竞争对手，如塞尔柱突厥人，都对马穆鲁克发出威胁，禁止后者到突厥人大本营中招募士兵（参见 Northrup 1998，1:277—279）。马穆鲁克通过娴熟的外交技巧，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保证了基皮克（Kipchak）和随后的高加索地区的奴隶士兵源源不断地涌入，成为军队的重要兵源。 114

切尔克斯人统治时期（Circassian era）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对马穆鲁克产生深远影响。埃及与北非其他地区一样也遭受黑死病的厄运，这种病曾残酷无情地横扫欧洲。历史学家估计，有 1/4 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灾难。1347—1348 年，黑死病（bubonic plague）扩展到埃及，随后肺炎（pneumonic plague）也蔓延开来，埃及遭遇了与欧洲同样的命运（参见第四章）。笼盖全国的瘟疫严重影响了埃及的农业。灌溉水渠淤泥堵塞，劳动力缺乏，土地荒芜。马穆鲁克贪污腐败，对老百姓巧取豪夺，更加重了黑死病所带来的灾难。他们残酷剥削生存下来的农民。马穆鲁克国家控制了获利丰厚的过境贸易（Transit trade），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商人的积极性受到打击。马穆鲁克精英在权力角逐和王位传禅问题上也产生危机，其结果是领导层相互残杀，两败俱伤。15 世纪初，帖木儿（Timur 或 Tamerlane）和他的鞑靼人（Tartars，蒙古人和突厥人）蹂躏了马穆鲁克控制下的叙利亚，毁坏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还“把最好的工匠带到其首都撒马尔罕（Samarqand）”（Gladiss 2004，171）（正如第四章所提及的，伊本·赫勒敦曾参与马穆鲁克与帖木儿的外交谈判，但以失败告终）。对马穆鲁克来说，发生以下事件是幸运的：即与 150 年前艾因贾鲁特战役一样，帖木儿在这次战争中也没有取胜，帖木儿帝国持续的时间与他的寿命差不多。他死后，埃及的外部威胁也消失了。尽管在 15 世纪，许多马穆

---

① 正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在他们的作品中所指出的那样，面对中东地区的跨文化交往关系，蒙古人接受了这些陌生的外来思想。

鲁克在治理国家方面卓然有效，但这些王朝不可逆转地衰落下去。到15世纪末，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角逐叙利亚（二者在1485年和1491年发生战争），葡萄牙人对他们在印度洋的贸易构成威胁。

奥斯曼人占领埃及

1514年，谢里姆一世在查尔迪兰战役中大败波斯萨法维王朝，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得以保证。谢里姆一世转而向南，奥斯曼帝国与马穆鲁克的冲突再起。骄傲自大的马穆鲁克对谢里姆军队使用的火枪大炮不屑一顾，而当时苏尔坦·贾维里（sultan al-Ghawri）尝试军队现代化，但只是徒劳之举（Winter 1998，1：494）。1516年，奥斯曼人在叙利亚的迈尔季达比克（Marj Dabiq）战役中消灭了马穆鲁克大部分力量，杀死了他们的苏丹。谢里姆还消灭了新苏丹图曼巴伊（Tumanbay）领导的马穆鲁克军队。1517年，谢里姆一世到达埃及，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正式控制埃及。随后，图曼巴伊的抵抗一直在继续，直到被捕后被处死。奥斯曼人将马穆鲁克驱逐到君士坦丁堡，最后一位傀儡哈里发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在迈尔季达比克被捕。埃及再次失去独立地位，成为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利奥·阿菲里加努斯（Leo Africanus）认为谢里姆苏丹征服埃及是一次“惊人的变革之举（wonderful alteration）”（Leo Africanus 1970，3：888）。在贾巴尔提（al-Jabarti）看来，谢里姆之子苏莱曼·卡努尼［Sulayman al-Kanuni，也叫苏莱曼立法者，即苏莱曼大帝（1520—1566）］“是黑暗中的亮光，高举宗教之光，熄灭了异教徒的火焰。”他尊重早期的奥斯曼人，认为他们是“自公正的哈里发统治（Rightly-Guided Caliphs）以来，（伊斯兰）社会最好的统治者”（al-Jabarti 1994，1：33）。贾巴尔提（al-Jabarti）对奥斯曼帝国后期并没有如此盛赞。（参见下文和第六章）。

奥斯曼人在埃及任命了总督或帕夏，允许马穆鲁克享有较大的行政权威，以限制帕夏的权力（及其自治野心）（参见 Hourani 1991a，

227—228）。奥斯曼人将马穆鲁克人编入奥斯曼帝国军队。奥斯曼帝国吞并埃及（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很容易获得诸如蔗糖、谷物、丝织品和蔬菜。其财政收入又有了新的财源，如关税、土地税和城市税（Urban taxes）。首先，奥斯曼人管理着直接税（direct taxation），但他们最终用讨厌的农业税取而代之。因此，在奥斯曼帝国和马穆鲁克双重剥削下，埃及农民的苦难更为深重。乌里玛借奥斯曼人和马穆鲁克各派系勾心斗角之机，经常居间调停，影响力逐渐上升。基督教徒（科普特人）和犹太人也从奥斯曼帝国较自由宽松的统治氛围中受益匪浅。

与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埃及不一样，奥斯曼人在建筑方面并不注重样式的更新与美感。按照迈克尔·温特（Michael Winter）的说法："原因其实很简单，马穆鲁克苏丹和高级埃米尔将埃及视为他们唯一的家园……奥斯曼帝国总督在埃及的任职是临时的……帕夏并没有时间、资金或积极性修缮历史遗迹。此外，奥斯曼帝国苏丹也不允许他任命的总督为自己修建一个'帝国'清真寺"（Winter 1998，2：6）。116 另一方面，埃及的识字率大为提高，"口述历史逐渐变成书写历史"（Hanna 1998，2：106—107）。再者，咖啡屋迅速增加，为一些诸如木偶剧（puppet shows）和音乐娱乐（musical entertainment）等表演艺术提供了场所。17 世纪，埃及有几百个咖啡屋，但到 18 世纪，仅开罗就有近 1200 个咖啡屋（参见 Hanna 1998，107—109）。实际上，来自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市场的咖啡过境贸易使埃及的经济更为富足。

尽管埃及名义上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但地方权力实质上处于马穆鲁克贝伊及其家族的手中，他们以保护者的身份操纵着复杂的商业网络。17 世纪前半期，马穆鲁克勒德旺（Ridwan）贝伊费卡里（al-Fiqari）掌握埃及实权长达 25 年。18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阿里贝伊（al-Kabir，the Great）统治埃及。他加强中央集权，开始了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尽管他掌权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的领土扩张行动，如占领汉志和叙利亚，显示了如同 19 世纪穆罕默德·阿里那样的勃勃野心。当时，奥斯曼帝国由于角逐于欧洲和波斯的战争，国力衰竭。埃及极力想实现自治状态，然而实

际上国力并不强。直到 18 世纪，埃及商品经济才强大起来，但来自西半球欧洲殖民地的商品，如咖啡、蔗糖和稻谷，其竞争力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埃及同类产品（Crecelius 1998，2：68）。

巴巴罗萨兄弟（The Brothers Barbarossa）和马格里布

16、17 世纪是地中海穆斯林海盗（corsair 或 privateer）（和欧洲海盗）活动最猖獗的时期。[①] 随着哈夫西德王朝的衰弱，马格里布沿海城市，诸如的黎波里、贝贾亚（Bejaia）、阿纳巴（Annaba）和阿尔及尔实现独立。这些国家经济的特点是：以农产品、土特产以及海盗抢夺的物质（privateering）为主要经济来源。1502 年，穆斯林海盗支持西班牙格拉纳达（Granada）的穆斯林发动叛乱。海盗干预内政及其在地中海西部的活动，再加上“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推动的十字军东征那种冷漠无情的精神，激怒了西班牙，此外，马格里布地区政治一盘散沙的局面也吸引着西班牙机会主义者的注意力。在上述117 因素推动下，一位名叫佩德罗·纳瓦罗（Pedro Navarro）的海盗船长，在红衣主教（Cardinal）希曼奈斯·斯内罗斯（Ximenes de Cisneros）的热情支持下对北非沿海地区发动战争。他们沿着北非海岸和内地修建战略要塞，包括 1509 年修建的奥兰（Oran），1510 年修建的阿尔及尔、特莱姆森、贝贾亚和的黎波里，攻城略地。另外一些城市尽管不处于西班牙统治或影响下，但也被迫缴纳贡赋。

阿尔及尔的首领难以忍受佩农（Peñon）岩石岛的西班牙驻军基地，向海盗寻求援助。巴巴罗萨兄弟——阿鲁杰（Aruj）、哈亚尔丁（Khayr al-Din，Hayreddin）和伊萨克（Ishaq）答应了请求。[②] 这些都体现了具有希腊和突厥血统的奥斯曼人具有的族群跨文化主义（ethnic

---

① Privateer 和 Pirate 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② “巴巴罗萨”（Barbarossa）专门指一个长着红胡子的海盗哈亚尔丁，不过阿鲁杰也叫“巴巴罗萨”，通称“巴巴罗萨兄弟”。另一个长兄伊利亚斯（Ilyas）被爱琴海海盗所灭，死于巴巴罗萨兄弟称雄北非之前。

transculturalism）的特点。[①] 作为海盗的首领，巴巴罗萨兄弟声名大噪，哈夫西德王朝允许阿鲁杰将杰尔巴岛（Jerba island）作为海盗基地。阿鲁杰两次攻打贝贾亚都失败了。1514年，他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另一城市吉杰利（Jijel）。这次成功使阿鲁杰赢得了阿尔及尔居民的信任，他们邀请他作为谈判代表阿尔及尔居间调停。阿鲁杰到达阿尔及尔，但拒绝民众要求进攻佩农的恳求。相反，他在1516年自任阿尔及尔首领，接管了该城。一年后，巴巴罗萨兄弟聚集力量，彻底击败了西班牙入侵者。然而，佩农仍在西班牙控制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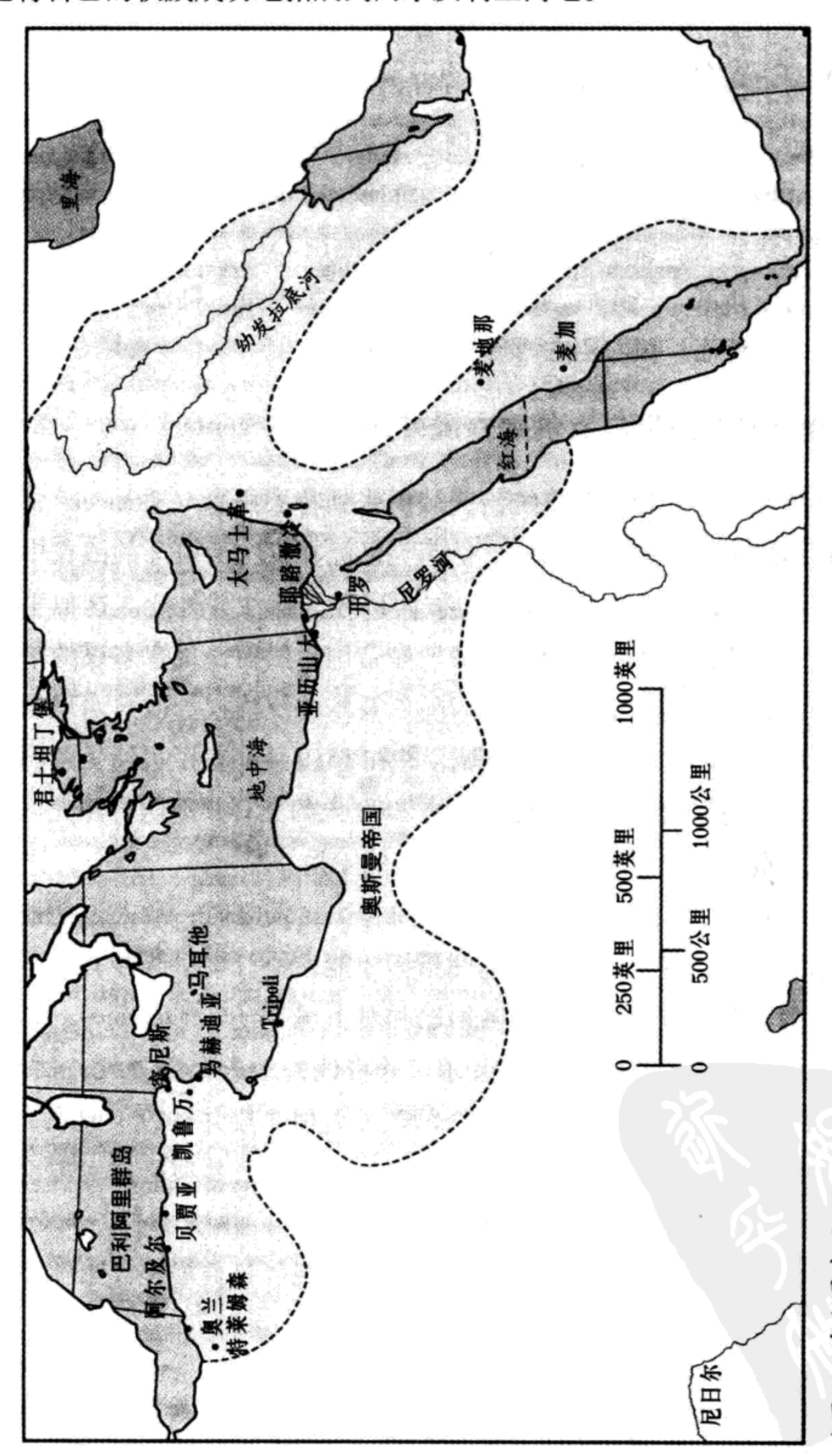
哈亚尔丁在阿尔及尔建立摄政统治（Regency）

阿鲁杰野心勃勃，想将统治区域扩张到特莱姆森（Tlemcen），但迅速被西班牙军队包围（当时，伊萨克已经在抵抗西班牙的战役中死去）。阿鲁杰从特莱姆森突围，但被西班牙人抓住并处死。这似乎预示着北非局势已经决定性地倾向奥斯曼帝国。然而，足智多谋的哈亚尔丁已经察觉到局势不妙，放弃对阿尔及尔的统治权。他与谢里姆苏丹建立联系，表达了对苏丹的忠诚，并在1519年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的援助。谢里姆派遣了一支装有火炮的2000人的土耳其军队，并允许哈亚尔丁从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招募更多的士兵。

就在哈亚尔丁接受奥斯曼帝国苏丹慷慨援助之时，敌人迫使他退出阿尔及尔。哈亚尔丁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他召集军队并有条不紊地攻下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城市阿纳巴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1525年，他报复性地重新夺回阿尔及尔，并将他的敌人全部处死。然而，1529年，作了表达对阿尔及尔民众的热爱，他进攻并摧毁了佩农，将这座城市从西班牙的占领中解放出来。他在大型公共项目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如清除了岩石岛（rocky islets），并修建了一条堤道，将海港扩建为海盗总部——这里停泊的海盗舰艇日益增多。哈亚尔丁 119

① 为奥斯曼人服务的希腊人有土尔古特人（Turghut，参见下文），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此得出的结论是："16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希腊开始了扩张到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新阶段"（Braudel 1972—1973，1：116）。

还将自己的权威成功地拓展到阿尔及利亚内地。



地图11 奥斯曼帝国

1533年，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约1520—1566年）任命哈亚尔丁为奥斯曼帝国的舰队首长（*Kapudan Pasha*）。次年，哈亚尔丁入侵伊弗里基亚，夺取突尼斯、比塞大（Bizerte）和凯鲁万等大城市，推翻了哈夫西德王朝。一年后，查理五世（Charles V，1519—1555年）皇帝聚集了一支由250艘战舰组成的船队，迫使哈亚尔丁从突尼斯撤退，重新任用哈夫西德人，后者成为势力强大的哈布斯堡皇帝的代理人。

哈亚尔丁一直同哈布斯堡王朝领导下的基督教神圣同盟（Christian Holy League）作战。作为报复，查理五世清除了哈亚尔丁的海盗基地，并在1541年命令海军上将安德烈·多里亚（Andrea Doria）向阿尔及尔发动袭击。多里亚纠集了一支由50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入侵阿尔及尔。哈亚尔丁身在外地，但他任命的总督哈桑·阿加（Hassan Agha）坚决地捍卫了这座城市。幸运的是，当时狂风大作，哈布斯堡入侵军被击败。

三个摄政国：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

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三个摄政国具有相似的历史特征，即行政实权从帝国任命的总督转到地方士兵或海盗的手中，其行政职位要得到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的认同。摄政国只要承认并尊重苏丹的权威，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地位。① 阿尔及尔摄政国影响强大，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他们那种咄咄逼人的政策和爱冒险的海盗天性直接影响了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摄政国的成立。

16世纪阿尔及尔摄政国的特点是：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贝勒贝（beylerbeys，最高指挥官）。他们包括哈亚尔丁之子哈桑·本·哈亚尔丁（Hassan bn Khayr al-Din）、萨拉赫·赖斯（Salah Ra'is，？—1556年）和乌卢杰·阿里（Uluj Ali）。总的来说，他们将摄政国的权力拓

---

① 安德鲁·赫斯（Andrew C. Hess）提出："各省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尊重帝国文化。这种文化网络和制度联系在非集权化时代极大地维护了帝国的统一。"（Hess 1978，112）

展到内地。埃及人萨拉赫·赖斯（Salah Ra'is）支持摩洛哥瓦塔西德王朝，并在撤退前占领费赞。他将奥斯曼帝国的权威扩展到阿尔及利亚内地，结束了赞德王朝在特莱姆森的统治，后者依赖于阿尔及尔的摄政统治。萨拉赫·赖斯死于一场瘟疫，当时他正发动一场战役，以夺取西班牙占领下的奥兰。

120 海盗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俘获乌卢杰·阿里。他皈依伊斯兰教，迅速提升为高级军官，并在1571年的勒班陀（Lepanto）战役中指挥阿尔及利亚军队作战，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①] 奥斯曼帝国继续依靠阿尔及利亚省来实现自己海军事业，巩固领导地位。乌卢杰·阿里被任命为舰队司令。[②] 1517年，乌卢杰·阿里在大维奇锡南（Sinan）帕夏的帮助下，在突尼斯建立了摄政统治，结束了哈夫西德王朝的统治（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这里的战略影响）。

作为成功的海盗，阿尔及利亚海盗的劫掠事业引人注目，他们得到战利品，俘虏或者被沦为奴隶，或者被对方赎回。土尔古特［Turghut（Dragut），？—1565年］是最著名的海盗之一，他是希腊人后裔，

---

① 伯纳德·路易（Bernard Lewis）和其他学者将这次战役看作是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情势下，土耳其人受到的“较小挫折”（a minor setback），此后土耳其人都将新购买的战舰派上战场（Lewis 2002，11）。奥斯曼帝国大维奇（grand Vizier）认为，帝国给战舰装备了“银锚、丝绸制成的柔软索具以及风帆”（Lewis 1982，43—44）。意大利人对勒班陀战役的结局非常满意。他们编造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歌曲，如其中有一首与乌卢杰·阿里有关：“你没有战舰，更没有发动一场袭击的小艇；你们男人都成为奴隶。听着，卑鄙贪婪（swinish）的畜生，如果天堂之门向你关闭，那么尘世，甚至地狱，也会拒绝接受你们那样的畜生。那么你将流浪何方？”（Heers 2003，112）安德鲁·惠特克罗夫特（Andrew Wheatcroft）写道：“在西班牙的政治流变史中，勒班陀战役象征着西班牙在控制地中海过程中，权力发生了决定性的转移。这种辉煌又因为哈布斯堡家族与勒班陀的亲密联系而增强了……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的海军权力持续增长，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遭到遏制。”（参见 Wheatcroft 1995，66）《堂吉诃德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Don Quixote*）的作者米格尔·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在勒班陀战役中手臂严重受伤。1575年，他被阿尔及利亚海盗逮捕。乌卢杰·阿里结束了流浪生涯，回到西班牙。乌卢杰·阿里在《堂吉诃德历险记》中被描述为“具有良好道德之人，以人道主义对待囚犯”（Cervantes 1966，354）。当然，信仰基督教的海盗袭击了穆斯林的船只。正如在第四章中所提及的，1519年，哈桑·本·穆罕默德（Hasan bn Muhammad）被捕，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利奥·阿弗利卡纳斯（Leo Africanus）。因此，海盗与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员和俘虏都在跨文化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 奥斯曼帝国很尊重海盗，将他们视为发展海军事业的领导和顾问。

哈亚尔丁的弟子。1551 年，奥斯曼帝国袭击的黎波里，反对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团。土尔古特参加了这次袭击，并取得成功。1553 年，奥斯曼帝国举行摄政国首领就职仪式，土尔古特成为的黎波里的帕夏。土尔古特还占领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内地和杰尔巴（Jerba）岛。在任帕夏期间，他修缮了的黎波里，使之成为北非沿海地区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土尔古特在马耳他战役中死去。

17 世纪的阿尔及尔摄政国的影响很大，取得独立地位。海盗们的船只远航至大西洋，甚至到冰岛抢劫船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艾哈迈德·陶菲克·迈达尼（Ahmad Tawfiq al-Madani）认为，阿尔及尔摄政国是“阿尔及利亚的奥斯曼共和国”（Algerian Ottoman Republic）（参见 al-Madani 1968，5—11）。军事长官（Aghas）和德伊（deys，总督）都从欧加克（*ojaq*）中挑选，由耶尼舍利（Janissaries）军团治理国家。[①] 摄政国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制造业，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海盗经济（piratical economy）。然而，与海盗相关的活动人口可能占“某一时期阿尔及尔经济活动人口的 25%”（Bookin-Weiner 1993，26），当然还包括流浪俘虏的打家劫舍。[②]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港都具有现代化的元素，如重修并加强了著名的卡斯巴（Casbah）港的防御工事。以安纳托利亚为样式的清真寺也拔地而起，如渔夫的码头（Wharf）清真寺（17 世纪）和卡齐哈瓦（Katshawa）清真寺（18 世纪）。阿尔及尔成为地中海重要的贸易中心（entrepôt）。[③] 听一听雅克·黑斯（Jacques Heers）的说法：

---

① 海盗们的领导层展开了权力之争。

② 天主教的遣使会成员（Lazarist）、三位一体者（Trinitarian）、梅塞德会（Mercedarian）和圣方济会托钵僧（Capuchin orders）都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起到了重要的人道主义作用，甚至承担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参见《堂吉诃德历险记》中“俘虏的传说”一章（Cervantes 1966，345—380）。

③ 惠特克罗夫特（Wheatcroft）曾提及奥斯曼帝国庞大的商业网络，包括北非：“亚欧大陆和北非内地的商品皮毛、皮革、毛绒和麻纱（cambric）通过君士坦丁堡源源不断地涌入各地……奥斯曼帝国霸占了从东到西的各个贸易路线，并控制着 3000 公里的海岸线，包括地中海各大港口。”（Wheatcroft 1995，71）其他详细情况参见 Braudel 1972—1973。

> 地中海没有一个港口像阿尔及尔那样神奇。
>
> 这里聚集着各种习俗的人群，他们来自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装束、语言、性格甚至发型……人们经常被新来的一波波人群弄得不知所措……眼花缭乱、迷惑不解。他们遍布大街小巷。他们很有魅力，但令人难以喘息。（Heers 2003，146）

121

17 世纪，阿尔及尔居民有 10 万到 12.5 万（Wolf 1972，97）。摄政国实际上拥有国家主权，名义上承认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合法性。英、法、德军队对阿尔及尔狂轰滥炸以示惩罚，但并没有削弱摄政国的防御力量。1775 年，西班牙在雇佣兵亚历山大·赖利（Alexander O'Reilly）的领导下对阿尔及尔发起进攻。奥斯曼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结成同盟，击退了赖利的入侵。这也是 18 世纪末阿尔及尔摄政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参见 al-Madani 1968）。

1534 年，即哈布斯堡家族将奥斯曼帝国驱逐并恢复哈夫西德王朝的统治之前，哈亚尔丁·巴巴罗萨在伊弗里基亚取得成功，并夺取了突尼斯。勒班陀战役后，奥斯曼帝国开始显示其军事力量的恢复程度。1574 年，大维齐锡南帕夏和舰队司令乌卢杰·阿里推翻了哈夫西德王朝，攻占了突尼斯。突尼斯新成立的摄政国以阿尔及尔摄政国为模仿对象。德伊（Deys）开始领导突尼斯摄政国。奥斯曼德伊（Uthman，约 1598—1610）支持本地制造业，推广摩里斯科人建筑风格（morisco）。1609 年，奥斯曼德伊被驱逐出西班牙，但受到突尼斯人的邀请。奥斯曼的继承者优素福（Yusuf）德伊（1610—1637）继承了前任强势而有效的治理方式。两个王朝的贝伊先后统治着突尼斯摄政国，即 1628—1785 年的穆拉德王朝（Muradids）和 1705—1957 年的侯赛因王朝（Husaynids）。[1] 贝伊给欧洲商人提供了很多商业机会，并缓慢地推

[1] 从跨文化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侯赛因王朝的建立者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bn Ali）是希腊血统的奥斯曼人，其母亲是突尼斯人。

进海盗事业。[1] 突尼斯人主要生产丝绸和毛织品。按照阿卜杜勒－哈米德·拉吉茨（Abdelhamid Larguèche）的说法："突尼斯在欧洲、非洲和利凡特地区的商业交往中扮演了核心角色"[2]（Larguèche 2001，121）。再者，贝伊们治国有方，有能力让摄政国处于自治地位，如穆拉德贝伊（Murad，1659—1679 年）、阿里二世贝伊（1759—1782 年）和哈姆达贝伊（Hammuda，1782—1814 年），通过地方领导人，即卡迪（*qa'ids*），将突尼斯内陆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此外，奥斯曼帝国帕夏和贝伊或他们的代理人通过军队施压，确保顺利收缴税收，从而巩固了在统治领土上的权威。"马哈拉"（*mahalla*）事件表明了统治者权力的扩大。卡尔·布朗（L. Carl Brown）解释说："马哈拉不仅仅是一次领导者视察之旅。它是政府自身走出去会见部族，建立社会秩序并当场作出决策的过程"（Brown 1974，128）。穆拉德王朝和侯赛因王朝通过马拉哈坚持了"突尼斯人"（Tunisian）的独立地位，巩固这些部族在内地的权威。

122

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波尔特（Porte）为的黎波里摄政国任命了帕夏，但处于自治地位的贝伊控制着耶尼舍利，在 1609—1711 年间一直统治着的黎波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奥斯曼人热衷于海盗事业。他们在 1576—1577 年渗透到费赞地区，寻求跨越撒哈拉地区贸易，威胁博尔努（Kanembornu 或 Bornu）的苏丹帝国（Sudanic empire）。[3] 博尔努著名的统治者（*mai*）伊德里斯·阿劳玛［Idris Alawma（Alooma），约 1569—1609 年］派代表到君士坦丁堡，抗议的黎波里摄政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二者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奥斯曼帝国派军队到博尔努支持本地政府同非穆斯林作战。穆拉德三世（Murad III）支持伊德里斯的建议，不过，至于产生何种后果就不得而知。奥斯曼人没有接管费赞，更

---

① 1609 年，西班牙将摩里斯科人驱逐出境，这一消息传遍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费赞、马拉喀什和拉巴特特别受难民欢迎。

② 利凡特地区指的是地中海东部，具体指现在的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的一部分，还包括土耳其。

③ 公元 4 世纪，苏丹帝国的首都从加奈姆（Kanem）迁到博尔努的伯尼纳扎尔古姆（Birni Ngazargmu）。这个国家经常被称为博尔努。博尔努是 9 世纪到 12 世纪的一个国家。

没有垄断撒哈拉地区贸易。另一方面，他们迫使本地居民向帝国缴纳贡赋。[①] 与此同时，老谋深算的伊德里斯与摩洛哥苏丹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al-Mansur）建立联系，从外交上抗衡奥斯曼帝国（见下文）。1711 年，一位颇受民众爱戴的军官艾哈迈德·卡拉曼利（Ahmad Qaramanli）推翻了的黎波里的奥斯曼帝国政府。[②] 他成立了被贾米尔·阿本·纳斯尔（Jamil M. Abun-Nasr）称之为“与侯赛因王朝相似的准国家王朝（quasi-national dynasty）”。除了从 1793 年到 1795 年间遭受短暂的篡权外，卡拉曼利王朝统治北非一直持续到 1835 年（Abun – Nasr 1987，192—193）。1722 年，艾哈迈德最终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承认，成为名正言顺的合法帕夏。1796 年，优素福·卡拉曼利（Yusuf Qaramanli）篡权夺位。他在位期间最值得提及的事情就是与美国发生冲突（参见“柏柏尔人战争”一章）。[③] 1805 年，美国驻突尼斯领事威廉姆·伊顿（William Eaton）企图实现“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但以失败告终。伊顿在美国军队［被认为是“海军陆战队”（Marines）］的支持下，希望废除优素福，以其兄长艾哈迈德取而代之。伊顿到达德尔纳（Derna）（不是“的黎波里海岸”）后才知道，的黎波里已经与美国达成一致意见（参见 Parker 2004，145—147）。优素福在解决了与美国的冲突后，将注意力转向博尔努和撒哈拉地区。他努力扩张自己的权威，在北非南部寻求新的收入来源，但欧洲人的出现及其在突尼斯的巨大影响使他的想法受阻。面对法国和英国领事馆的横行霸道，优素福无能为力，从而削弱

123

① 巴努（Banu）或阿尔瓦德·穆罕默德（Alwad Muhammad）在的黎波里摄政国强大时，向奥斯曼人交纳贡金；反之，则拒绝缴纳。巴努从跨撒哈拉贸易中获取收入。当费赞首都迈尔祖格［Murzaq（Murzuq）］被优素福·卡拉曼利（Yusuf Qaramanli）的军队占领，一位摩洛哥谢里夫和谢赫穆罕默德·法希（Muhammad al-Fasi）开创了一个从 16 世纪中期到 1811 年具有“部族国家”（Tributary state）特点的王朝，显示了撒哈拉地区宏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网络。随着优素福从地中海获取收入的减少，他希望通过从撒哈拉地区商业贸易中得到更多的财富。按照阿里·阿卜杜拉提夫·艾哈米达（Ali Abdullatif Ahmida）的说法，巴努统治区能持续存在，并抵制塞努西亚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解释了这个处于雏形中国家的基本情况（相关研究见 Ahmida 1994）。

② 艾哈迈德·卡拉曼利（Ahmad Qaramanli）是库伦古伦人（*Kulughlu*），即土耳其人和本土居民的混血儿。

③ 巴巴里（Barbary）指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摩洛哥的沿海地区。

了帕夏的权威。1830 年，法国舰队迫使优素福签署了屈辱性的条约，包括停止接纳贡赋，要求补偿并限制的黎波里的海军规模。英国随后向帕夏施压，希望利益均沾。1832 年优素福卡拉曼利（Yusuf Qaramanli）宣布退位。

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文献也对这三个摄政国有意贬低。例如，认为这些摄政国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贩运到北非市场，从可憎的跨撒哈拉奴隶贸易中获取暴利。[1] 然而，事实上，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俘获穆斯林并从事奴隶贸易，还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参与了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直到 1798 年拿破仑在前往埃及的路上占领该岛，才结束了这些活动。如此一来，随着骑士团被消灭，地中海的北非贸易又复活了。

到 17 世纪末期，处于上升期的欧洲国家炮轰包括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等地的海盗基地。不过，欧洲人（和后来的美国人）也向摄政国提供援助，向海盗提供装备。另外，欧洲人支持巴巴里（barbary）海盗还有其他原因。欧洲大国的海上舰队与商船一般不与海盗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摄政国的目标是削弱诸如美国那样的国家，对这类国家的商业贸易不予保护。欧洲海军也不保护美国商船。1783 年，谢菲尔德（Sheffield）勋爵在下议院演讲时指出，摄政国的掠夺行为有助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壮大："美国人不可能拥有海军，因此大国应该接受柏柏尔海盗的折磨，以遏制诸如意大利和美国之流小国的活动。"（Morsy 1984，73）美国之所以发展海军，与海盗威胁和海盗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参见 Parker 2004）。

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北非与"柏柏尔"海岸处于缓慢的衰落之中。[2] 此外，在达尔卡维亚（Darqawiyya）、卡迪利亚（Qadiriyya）

---

① 据估计，每年有 1 万奴隶到达北非市场（Morsy 1984，62），沿途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② 与此同时，柏柏尔人吸引着莫扎特（Mozart）和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的眼球，这些才子在其歌剧中对柏柏尔人展开了无尽的想象，莫扎特的代表作是《来自后宫的诱惑》（*Abduction from the Seraglio*，1782），焦阿基诺·罗西尼的代表作是《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孩》（*Italian Girl in Algiers*，1813）。

和提贾尼亚（Tijaniyya）的伊斯兰兄弟会的煽动下，北非内陆也掀起了反奥斯曼人活动。[①] 达尔卡维亚家族还威胁摩洛哥苏丹，声称他们有决心捍卫自己的独立地位，坚决反对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国家的入侵。在此期间，摩洛哥两次处于近乎分裂的边缘。每一次危机发生，都有一个新王朝出现，解救了苏丹之危。期间摩洛哥悠长的历史显得既骚动又辉煌。摩洛哥不仅寻求独立，而且还赢得了邻国的尊重和承认。这一时期也极大地塑造了摩洛哥的地位与认同感。

萨阿德王朝的崛起（1549—1654）

124

15 世纪，葡萄牙人利用瓦塔西德—马林王朝（Wattasid-Marinid）之间的对抗态势，夺取了休达（Ceuta）、阿卡斯尔·萨吉尔（al-Qasr al-Saghir）、丹吉尔（Tangier）和阿尔兹拉（Arzila）。虽然西班牙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但仍继续与葡萄牙联合发动十字军东征，并在 1497 年夺取梅利利亚（Melilla）。在曼努埃尔主教（Dom Manuel）的号召下，葡萄牙占领了大西洋沿海城市。如在 1502 年、1504 年、1508 年和 1513 年分别占领杰迪代［Al-Jadida 也叫马格赞（Magazan）］、阿加迪尔（Agadir）、萨非（Safi）和艾宰穆尔（Azemmour）。[②]

---

① 达尔卡维亚的建立者是出生于费赞北部地区的阿布·哈米德·阿拉比·达尔卡维（Abu Hamid al-Arabi al-‘Darqawi，1760—1823）。根据马加利·穆尔西（Magali Morsy）的说法，达尔卡维亚的出现反映了“民众普遍反对物质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复杂方式以及反宗教思想”（Morsy 1984，26）。阿卜杜拉·卡迪利亚·吉拉尼［Abd al-Qadir al-Jilani（Jilani）］（1077？—1166）在伊朗出生，在巴格达接受教育。他在 12 世纪建立卡迪利亚（Qadiriyya）。他的宗教仪式（*tariqa*）强调奉献（devotion）、宽宏大量（generosity）和禁欲主义（asceticism）。提贾尼亚是由艾哈迈德·提贾尼（Ahmad al-Tijani，1738—1815）建立于阿尔及利亚，不隶属于其他任何组织。尽管提贾尼亚经常与统治机构合作，但是偶尔也举起武器反抗政府以及敌对的伊斯兰兄弟组织（rival brotherhoods）。其总部最终设在费赞。提贾尼亚在哈吉·奥马尔（al-Hajj Umar，1794？—1864）领导下，雄心勃勃地渴望在塞内甘比亚（Senegambia）建立穆斯林国家，坚决抵抗法国入侵。

② 欧洲国家袭击西撒哈拉海岸始于 15 世纪早期，结束于 15 世纪末期。西班牙计划在此修建战略要塞。然而到 1509 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签署辛特拉（Cintra）协定，西班牙放弃了除圣克鲁兹（Santa Cruz de Mar pequeña）［此城于 1468 年由迪戈加西亚岛修建埃雷拉（Diego García de Herrera）修建］以外的沿海地区。1524 年，该城遭到部族袭击，西班牙被迫放弃此地（当时，西班牙的兴趣集中在西半球）（参见 Mercer 1976，75—90）尽管西班牙离开了西撒哈拉，但他们曾经存在的这一事实给世人留下了永恒的记忆。第六章对此进行了阐述。

实际上，随着地中海和大西洋出口被封锁，马拉喀什（Marrakesh）在1515年已经处于包围之中。摩洛哥的政治分裂似乎为期不远了。

然而，摩洛哥南部的谢里夫并不安静，他们发动各种抵抗运动，反对葡萄牙的入侵。他们联合伊斯兰隐士（marabouts）和苏菲派，聚集在摩洛哥南部萨阿德部族的周围——该部族声称是阿里和法蒂玛外孙的后裔。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认为，历史学家低估了宗教怨恨和宗教抵抗运动。正如殖民时期和非殖民化时期所显示的那样，宗教——政治领导人和共济会（fraternal order）领袖，诸如贾祖利亚（Jazuliyya）的建立者穆罕默德·本·苏莱曼·贾祖利（Muhammad bn Sulayman al-Jazuli）提升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并动员民众参与政治运动。[①] 萨阿德家族认为，瓦塔西德人办事效率低下。他们对瓜分苏丹领土的基督教入侵不屑一顾。

萨阿德王朝始于穆罕默德·加伊姆（Muhammad al-Qa'im，死于1518年），它以牺牲瓦塔西德人和欧洲人为代价，增强自己的力量并对外扩展。该王朝在1524年、1549年先后夺取了马拉喀什和费赞。1541年，萨阿德家族将葡萄牙驱逐出阿加迪尔，迫使后者放弃萨非和艾宰穆尔，重新打开了从摩洛哥到大西洋沿岸、从西非到大西洋的食糖和黄金贸易的大门。

萨阿德王朝成功地击败葡萄牙后，将注意力转向瓦塔西德王朝，后者有阿尔及尔摄政国的帮助。由于阿尔及尔有实力的贝勒贝（*beylerbey*）萨拉赫·拉伊斯（Salah Ra'is）干预此事，1554年，瓦塔西德人和奥斯曼人短暂地占领费赞。第二年，瓦塔西德王朝的领导人阿布·哈苏恩（Abu Hassun）在一次战役中被杀，柏柏尔人王朝随之结束。谢里夫王朝再次建立后，萨阿德王朝镇压了苏菲派和北非伊斯兰修士（marabouts）的动乱。

125

默罕默德·谢赫（Muhammad al-Shaykh）苏丹［1542—1544年

---

① 参见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69）中论述历史人类学、政府与部族政治关系等著作，分析了社会结构［“碎裂”（segmentation）］以及部族在靠近城市地区和中央政府期间的作用。

(与别人共治)；1544—1557 年］试图结束奥斯曼帝国干预摩洛哥内政的现状。为了对付土耳其人，他调解与西班牙的矛盾，反对奥斯曼帝国控制地中海。苏丹不理会西班牙在梅利利亚（Melilla）、奥兰（Oran）和梅尔斯凯比尔（Mers el-Kébir）的居民，有意触犯摩洛哥和奥斯曼人的政治忌讳。他向土耳其人控制下的特莱姆森（Tlemcen）进军，后者从来没有同萨阿德王朝作对。奥斯曼帝国后来对穆罕默德·谢赫采取报复措施，于 1557 年派人暗杀了苏丹。当时，穆罕默德·谢赫认为自己是马赫迪（Mahdi）或公正的导师，成功地确保了摩洛哥的独立地位。

加里卜（Al-Ghalib，1557—1574 年）苏丹继承了谢赫的政策。为确保萨阿德王朝的统治，他发起了反对苏菲派、伊斯兰修士和兄弟会（诸如 Yusufiyya）的运动。苏丹认为这些组织威胁了萨阿德王朝的权力基础和合法地位。加里卜下令修建了许多著名的公共工程，值得注意的是马德拉萨（madrasa），如伊本·优素福（the Ibn Yusuf）和马拉喀什清真寺。他还显示了自己在城市设计和规划方面的独特兴趣。在加里卜的统治下，萨阿德王朝与西班牙维持了战略友好关系，停止干预和镇压摩里斯科人（Morisco）的叛乱（1568—1570 年）。随着葡萄牙恢复对摩洛哥领土的野心，萨阿德王朝的统治也更加安全了。

由于葡萄牙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巴西殖民地的诸多商业网络，葡萄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与巨额财富。然而，由于王朝内部的派别内讧、信仰不同以及“收复失地运动”推动下的十字军东侵的影响，君主制政权重新侵略马格里布地区。因此，塞巴斯蒂安（Sebastian，1557—1578 年）国王重新调整了约翰三世（1521—1557 年）的葡萄牙政策。前者是全球视野，后者为地区眼光。

患有狂想症（quixotic）的塞巴斯蒂安，神秘而充满激情地寻找机会，以实现他在马格里布地区的野心。加里卜死后，出现了一连串有争议的事情。继位的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遭遇其叔父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的反对，前者得到奥斯曼人和西班牙人的支持。随后，阿卜杜勒·马利克击溃穆塔瓦基勒，后者逃亡葡萄牙，

并与塞巴斯蒂安国王结成盟友。塞巴斯蒂安国王不听叔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劝告，决定冒险入侵摩洛哥。这时，萨阿德家族参与这支装备现代武器的军队。军队纪律严明，装备精良，士兵为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他们是能征惯战的安达卢西亚人。

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al-Mansur）苏丹

1578年7月12日，卡斯尔卡比尔（al-Qasr al-Kabir）附近爆发了马哈兹尼谷（Wadi al-Makhazin）之役（也就是著名的三王之役）。由于军队劳师远征、实力悬殊，塞巴斯蒂安国王战死，穆塔瓦基勒溺水而亡，阿卜杜勒·马利克得了心脏病，在战役刚开始就死去（Mantran 1970，244；Smith 2006，35—36）。[1] 阿卜杜勒·马利克的亲弟弟艾哈迈德（Ahmad）成为苏丹，并在第二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艾哈迈德获得了曼苏尔（al-Mansur），即“胜利者”的美名。曼苏尔是摩洛哥历史上最精明能干的苏丹。他以其强硬的统治风格保护了摩洛哥，免受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入侵的野心。他也与英格兰关系密切。萨阿德王朝的势力在他统治时期达到顶峰。

曼苏尔在行政管理方面成就非凡。他成立了马赫赞（makhzan），大致意思是政府的中央机构，包括苏丹直接控制下的领土。不属于摩洛哥，但在吞并计划之内的领土被称为“化外之地”（Bilad al-siba）。这些领土上的民众不承认苏丹权威，是“叛乱”（dissident）之地。曼苏尔定都马拉喀什，修建了壮丽辉煌的王宫（1593年完工）。

曼苏尔统治下的王朝是摩洛哥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之一。他从国外引进技术工匠，鼓励发展商业。所作所为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跨文化的特点，如商人来自穆斯林和基督教土地，特别是英国人，商品交易范围包括皮革、黄铜、蔗糖以及硝石。再者，苏丹修建的大型公共建筑壮丽辉煌，显示其最高权威。据说，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是以摩洛哥王子为原型，奥赛罗（Othello）的原型就是曼苏尔。

① 具体细节参见 Smith 2006，39—42.

127 苏丹擅长玩弄权术。得知阿尔及尔摄政王乌卢杰·阿里（Uluj Ali）计划派兵进攻后，曼苏尔于1581年将一份厚礼送往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苏丹对摩洛哥君主的慷慨大方印象深刻，便命令乌卢杰·阿里停止攻打曼苏尔。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博弈，苏丹的政策扭捏作态。安东尼奥修道士（Dom Antonio）对葡萄牙王位垂涎三尺，他有英格兰的支持，也希望得到摩洛哥的帮助。然而，摩洛哥从来没有兑现诺言。1590年，安东尼奥企图接管西班牙王位，但遭受惨败。塞巴斯蒂安国王死后，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国王菲利普二世从阿斯拉[Arzila（Asila，Argila）]撤退。就在一年前，他还允许曼苏尔占领大西洋沿海的重要港口。曼苏尔继续与西班牙缓和关系，但双方猜忌日深。安东尼奥修道士惨败后，摩洛哥与英格兰关系冷淡。然而，伊丽莎白国王与曼苏尔互通信函，后者在信中表达了征服西班牙、拥有新世界的构想。[①] 如上所述，博尔努的伊德里斯·阿劳玛向曼苏尔请求援助。摩洛哥和博尔努是否签订正式协议，我们还不得而知，但统治者（*Mail*）向苏丹求助这一事实表明曼苏尔声威远播。

曼苏尔缅怀穆拉比德王朝的历史往事，于1591年率兵入侵苏丹（黑人之乡）。尽管当年穆拉比德王朝在与加纳王国对阵时大获全胜，但诸如马里和桑海等苏丹帝国成功地阻止了摩洛哥的进攻。穆拉比德的入侵中断了传统意义上以金换盐（salt-for-gold）的贸易模式，但后来该贸易又重新开始。[②] 曼苏尔认为自己是一个哈里发，怀有统一穆斯林乌玛的神圣使命。

然而，乌里玛对苏丹的战争计划和行动发出抗议，声称进攻另一个穆斯林国家是不道德的、不公正的。曼苏尔反唇相讥，指出他想重新确立穆斯林在安达鲁斯（al-Andalus）的地位，为达到这一最终目的，必须拥有巨大的资源。苏丹不顾乌里玛的宗教与道德目标，继续追求他扩张式的对外政策。摩洛哥远征军名叫加瓦哈迪（Jawdhard），是由一位基

---

① 苏丹建议将西班牙殖民地中气候温暖的部分送给摩洛哥人（Smith 2006，139）。

② 这也是葡萄牙沿大西洋海岸扩张的基本原理，曼苏尔也以达哈比（al-Dhahabi）著称，即金色一号（the Golden One）。

督教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士领导的，他在通迪比（Tondibi）一役中，击败了桑海帝国的军队。[①] 1591 年 3 月，加瓦哈迪占领高（Gao），一个月后夺取廷巴克图（Timbuktu）。加瓦哈迪接受土耳其人的任命，成为帕夏或总督。加瓦哈迪同意与桑海帝国妥协。曼苏尔对此心怀不满，派遣马哈茂德·本·扎尔奎恩（Mahmud bn Zarqun）替换了帕夏，此辈冷酷无情且野蛮粗野。后来，桑海帝国遭受了重大且无可挽回的损失。曼苏尔死后不久的 1603 年，摩洛哥人撤出苏丹，但这个国家已经处于政治上分崩离析、经济上积贫积弱的状态。[②] 实际上，盛行几个世纪的黄金贸易由于三个重要原因而逐渐萎缩：①战争使得商业混乱无序；②多年开发使得金矿资源殆尽；③新世界的黄金源源不断的来临。

128

萨阿德王朝的遗产因其自相矛盾而难以作出准确的评估。王朝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其谢里夫的地位以及萨阿德人不屈不挠地反对怀有敌意的欧洲国家剥削摩洛哥。尽管萨阿德王朝极力争取谢里夫的政治特权，但穆斯林反对他们的权力，讨厌他们的自负心态——特别是奥斯曼人和乌里玛的骄傲自大。再者，萨阿德一旦掌权，就与基督教国家实行和解，尽管有勇无谋的塞巴斯蒂安的冒险部分地遏制了奥斯曼人的好战精神。萨阿德王朝明确提出要出资修建建筑，展示美学艺术。他们在马拉喀什修缮的历史遗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巴布杜卡拉（Bab Dukkala）和穆阿斯姆（Mu'assim）清真寺。他们为基督教俘虏修建了医院，为犹太人修建了崭新的住所。萨阿德皇室陵墓的诸多装饰用品受到马穆鲁克的深刻影响（参见 Smith 2006，44），其壮丽的王宫也表明萨阿德王朝的辉煌，后来被阿拉维人毁坏的巴迪阿（al-Badi'a）遗迹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优素福·马德拉萨（Yusuf Madrasa）成为摩洛哥最大的宗教学校。在曼苏尔统治期间，一些知名学者家族，如法斯允［the al-Fasiyyun（Fasiyyin）］或法西（al-Fasi）家

---

① 详细情况参见 Smith 2006，111—114。

② 摩洛哥位于萨赫勒（Sahel）西部（西非的“苏丹”），由独立帕夏统治。他们与桑海（Songhay）家族互相通婚，构成了他们自己的族群（ethnic group），也以阿尔马（Arma）著称。（参见 ibid.，154—155）。

族在费赞定居。他们在未来250年里，成立了许多扎维亚（*zawaya*），撰写了无数多的宗教论著和文学作品。由于苏丹发动战争，一些知名的西非乌里玛被迫流放到马拉喀什。这些人包括卡迪奥马尔（Qadi Umar）和他的堂兄艾哈迈德·巴巴（Ahmad Baba），艾哈迈德·巴巴作为一个受尊重的教师和学者而获得崇高的威望。扎伊丹（Zaydan，1603—1628年在位）苏丹允许他回到廷巴克图。

曼苏尔施行绝对专制主义统治。他死后，萨阿德家族同室操戈、内战不断，还不断应付伊斯兰隐士的强有力挑战。[①] 拉巴特和塞尔（Salé）要求自治，并勾结海盗对抗西班牙、英格兰和爱尔兰。臭名昭著的欧洲“叛教者”、荷兰人扬斯基（Jan Jansz）也叫穆拉特·拉伊斯（Murat Ra'is）和混迹江湖的摩里斯科人经常指挥海盗船只，横冲直撞。[②] 与此同时，苏丹还遭受着瘟疫大流行的折磨。

129 曼苏尔可能死于瘟疫。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停止。另一个谢里夫王朝崛起，解救处于危机中的摩洛哥，这个王朝就是阿拉维王朝。他们声称是阿里和法蒂玛的儿子，也是殉难的侯赛因（680年在卡尔巴拉战役中殉教）的兄弟哈桑（Hasan）的后裔。

阿拉维人（1664—　）复兴摩洛哥

130 阿拉维·穆莱·拉希德［The Alawi Mawlay（Mulay）Rashid，1664—1672年在位］征服摩洛哥，驱逐了萨阿德家族，使这里混乱的社会秩序得以安定。1666年，他夺取费赞。1669年，占领马拉喀什。拉希德尊重学术研究，于1670年在费赞成立了乞拉提尼（Cherratine）宗教学校。拉希德在一次狩猎中意外死去，他的兄长穆莱·伊斯玛仪（Mawlay Isma'il，1672—1727年在位）继位，并通过制服叛乱部族保

---

① 这一时期，摩洛哥尽管政治上不稳定，但知识分子极为活跃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② 16世纪到19世纪初，摩洛哥海盗一直在活动。17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海盗更为猖獗。1624年，海盗船只在纽芬兰（Newfoundland）沿岸游弋。1637年拉巴特—塞尔（Rabat-Salé）的海盗舰艇有40—50艘之间。1828年，澳大利亚军舰通过轰炸拉腊什（Larache）遏制了死灰复燃的海盗活动。

证了君主国的安全。他组建了一支名叫阿比德（*abid*）的特殊军队。[①]他凭借这支势力强大的军队，畅通无阻地进入"化外之地"（bilad al-siba），要求马格尔部落重新效忠苏丹［使人回忆起突尼斯的马哈拉事件（mahalla）］。摩洛哥军队到达萨赫勒（Sahel）南部，曾短暂地占领今毛里塔尼亚的领土。

阿拉维人收回了欧洲国家在摩洛哥的飞地（enclaves）[②]，这些领土包括1681年曼苏尔、1689年阿莱斯（Ara'ish）、1691年阿斯拉（Asila）从西班牙手中收复的土地。他们还包围了欧洲国家在地中海的军事要塞，并威胁要邀请法国人到塞内加尔（Senegal）。1662年，英国从葡萄牙手中接收丹吉尔。但在摩洛哥的压力下，1684年英国从丹吉尔撤军。摩洛哥苏丹大力推进海盗事业，从海盗的战利品和人质赎金中获取暴利。他在外交上也十分活跃，意与法国结盟［试图与路易十四的私生女德康蒂（De Conti）公主政治联姻］。穆莱·伊斯玛仪建议路易十四国王皈依伊斯兰教，或者至少成为一个新教徒（参见Abun-Nasr 1978，233）！[③]相邻的奥斯曼人不断发出威胁，煽动柏柏尔人叛乱。1679年、1682年和1695—1696年，摩洛哥占领阿尔及利亚领土以示惩罚，警告奥斯曼人要承担让苏丹不快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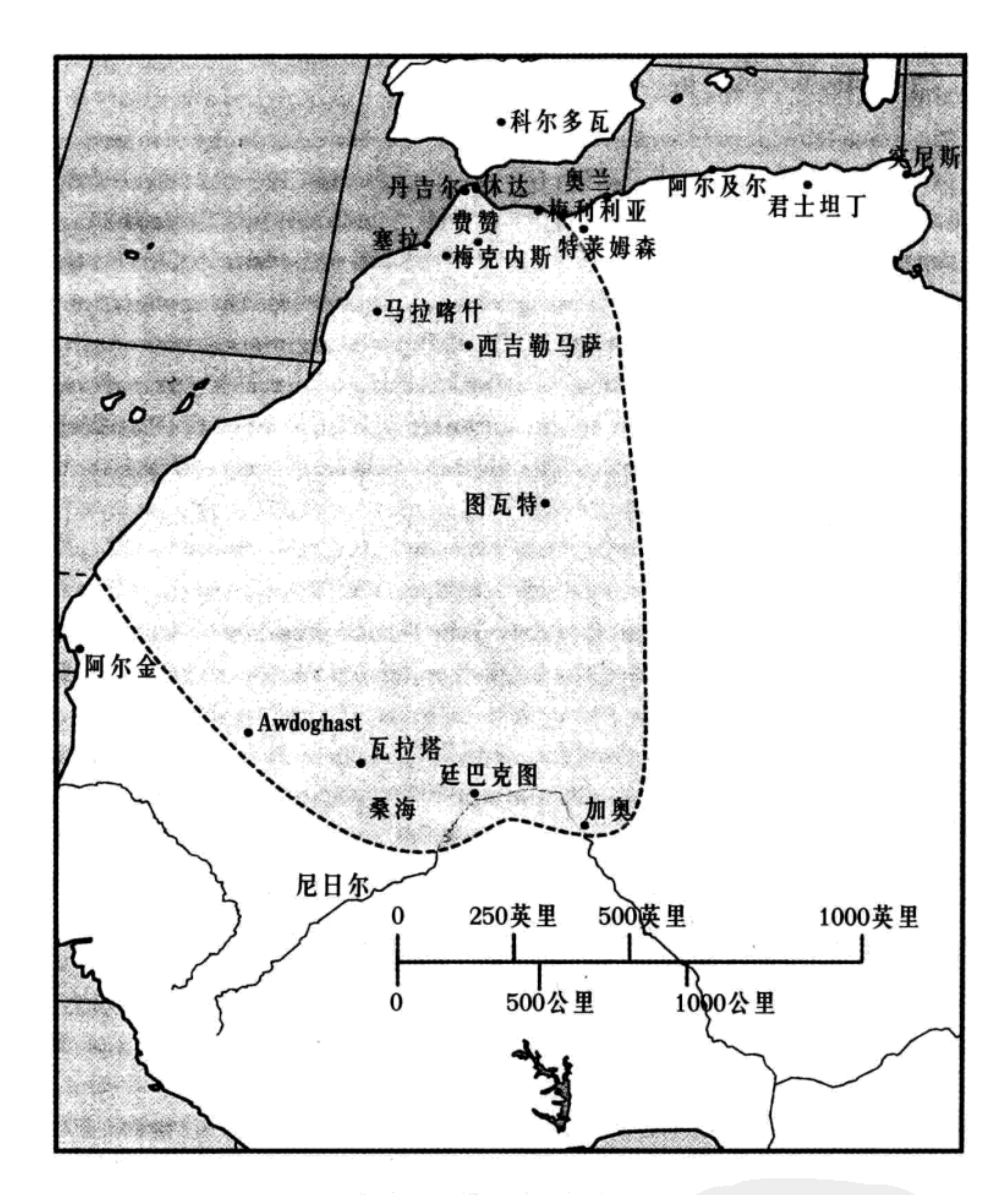
穆莱·伊斯玛仪赞同将梅克内斯［Meknès（Miknasa）］作为王朝的首都。他修建的王宫可与路易十四的王宫相媲美。正如理查德·帕

---

① 阿比德（*Abid*）的意思是奴隶或仆人，在摩洛哥特定语境下指的是非洲黑人。穆莱·伊斯玛仪（Mawlay Isma'il）身上有一半黑人血统。历史学家粗略估计阿比德的人数在7万到15万之间。关于跨越撒哈拉奴隶贸易的数据特别有争议。拉尔夫·奥斯丁（Ralph Austen）的研究成果最值得关注。他根据"直接和间接证据"估计：17世纪到19世纪末，约938.7万奴隶经过撒哈拉，运送到北非（据估计死亡率有20%，抛弃在荒漠中的奴隶有5%，约745万奴隶到达目的地）（Austen 1979，66）。摩洛哥和埃及从他们的军队招募奴隶。即使到了现代时期，"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仍从北非邻国接受了大量黑人奴隶人口（servile population）"（ibid.，37）。

② 飞地指的是在一国境内的外国领土或被外国领土包围的土地。——译者注

③ 正如马加利·穆尔西所指出的那样，"阿拉维家族的统治及实施的政策是在两个自相矛盾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增强军队势力控制摩洛哥，驱赶基督徒，阻挡外国人入侵的威胁。与此同时，从欧洲国家获取必要的收入和装备完成上述目标。实际上，该王朝能够通过绝对皇权控制外国事务，调停双方矛盾"（Morsy 1984，68）。考察阿拉维王朝的先辈萨阿德人，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地图 12 萨阿德王朝的扩张

克（Richard Parker）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至少穆莱·伊斯玛仪比路易十四优秀。他具有内在的品质（inside plumbing）"（Parker 1981，106）。在某种程度上，他与费赞的乌里玛相对抗，后者含蓄地对阿比德（*abid*）在法律和道德层面的合法性以及他的专制主义（absolutism）提出质疑，他的专制主义导致对梅克内斯重新定位。苏丹认为阿比德就是他的奴隶，尽管阿比德中部分是自由的穆斯林。在乌里

玛看来，“奴隶军队”与沙里亚自相矛盾。穆莱·伊斯玛仪没有听从这些宗教学者的建议，相反却迫害他们，结果造成经注学研究停滞不前。在阿本·纳斯尔（Abun-Nasr）看来：“他的统治标志着摩洛哥宗教——政治文化创新的高峰……最为重要的是，减少了乌里玛在社会中的影响。”（Abun-Nasr 1987，236）

摩洛哥经济上与欧洲国家，特别是与英格兰的贸易活动极为活跃。犹太人扮演了中介角色。尽管苏丹从个人商业垄断中获利丰厚，但也将一些特殊的商品出售给合作经销商。苏丹入侵“化外之地”（*bilad al-siba*）和萨赫勒地区的目的是维护摩洛哥的政治权威，独占跨撒哈拉地区的贸易。

毫无疑问，穆莱·伊斯玛仪既是精力充沛的苏丹，也是一个反复无常、贪婪粗野的统治者。而且，他也没有对自己的王位继承问题作出安排。他死后，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专制。特别是阿比德使得苏丹王国很不稳定。萨赫拉和撒哈拉地区的摩洛哥权威也逐渐削弱，直至彻底消失。政治斗争与内战一直持续到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Muhammad bn Abdallah，1757—1790 年在位）上台，他通过废除阿比德制度，重新确立了社会秩序。经过耶齐德（Yazid，1790—1792 年）的短暂统治，穆莱·苏莱曼［Mawlay Sulayman（Sliman），1792—1790 年在位］接替王位。苏丹受马什里克地区瓦哈比运动的影响，指责苏菲主义、伊斯兰修士，特别是达尔卡维亚（Darqawiyya）兄弟会。他还将摩洛哥与欧洲孤立开来。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缓慢而持续地入侵，这种孤立状态结束了。

拿破仑入侵并占领埃及

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层面考虑，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入侵埃及是北非和西亚历史的转折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历史编撰学角度来看，尽管这一流行的观点可能夸大其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法国的入侵促使阿里家族在埃及迅速崛起。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

法国革命及其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广泛流传，最终深刻地影响了北非、西亚和整个世界。拿破仑·波拿巴在革命洪流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并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脱颖而出。他在1793年土伦（Toulon）战役中显得与众不同。他在参与法国的“意大利军队”时充分抓住机会，成功地领导了对奥地利的战争。最辉煌的战绩就是通过协商于1797年签订的佛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使意大利北部领土归属法国。随之，拿破仑的成功事迹和知名度如日中天。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督政府（the French Directory），即革命政府统治期间，拿破仑负责草拟入侵英格兰的计划。他意识到在没有控制海洋的情况下横渡英吉利海峡是不可能的，他将目光转向东方，用他的话说是需要一个“人”（man）。他决定通过对英国到东地中海和印度的贸易路线构成威胁，进而间接进攻英格兰。

132

拿破仑认为埃及是世界上最具战略地位的国家，其资源和商机对法国的益处远超英格兰。他向法国督政府报告了入侵埃及的想法。[①]当时督政府正需要一次对外冒险分散民众的革命激情和政治威胁，就接受了拿破仑的计划，并给他装备了一艘战舰和一支军队。达雷尔·戴克斯特拉（Darrell Dykstra）的结论是：“远征军的宏大规模、随军战舰的辉煌气势以及博学专家等都表明法国……想从埃及捞到好处。”（Dykstra 1998，119）

埃及是一个文明演进出现断裂的国家。正如前文提及，18世纪70年代，马穆鲁克帕夏阿里·贝伊·卡比尔（Ali Bey al-Kabir）执行了穆罕默德·阿里在19世纪前半期的政治、军事和领土侵略政策以及现

① 占领埃及的想法在法国一直颇受欢迎。很明显，自从1797年以来，拿破仑就有了这种想法。假如法国在意大利实现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一想法有可能实现。塔列朗（Talleyrand）将埃及作为复兴法国殖民政策计划的一部分（Dykstra 1998，116；Cole 2007，12—14）。从1795年开始，大英帝国也酝酿着夺取亚历山大、开罗和苏伊士的战略计划。作为反对法国入侵的制衡战略，1799年英国在丕林岛（Perim）、曼德海峡（Bab el-Mandeb）海峡修建军事基地，直至后来占领亚丁（Aden）（参见 Morsy 1984，77）。

代化战略，统治的很有活力。在经济层面，埃及一直作为汉志和欧洲咖啡贸易的中转站，获取丰厚的经济收入。随着咖啡供应来源转向安提瓜（Antigua）等地，埃及收入大为减少。1783 年，尼罗河发生洪水泛滥。1784 年，埃及发生大饥馑。1791 年的大瘟疫更加重了埃及恶化的局势。随着欧洲国家廉价产品的大量输入，埃及国内的丝织品工厂因失去竞争力而濒临倒闭（Hanna 2003，10—11）。刚刚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对埃及和拿破仑的宏大野心产生威胁。

拿破仑的计划和目标自相矛盾，出现了许多问题。法国政府为了将埃及（特别是苏伊士运河）作为未来打击英国殖民下的印度的战略基地，命令拿破仑征服埃及。另一个目标是宣布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①] 杰弗里·塞姆考克斯（Geoffrey Symcox）认为上述两个目标自相矛盾："如何在不冒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情况下"实现这些目标是不可能的事情（Symcox 2003，20—21）。 133

拿破仑在埃及和利凡特（Levant）

法国军队夺取了马耳他，但在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勋爵指挥的英国军舰的威胁下，悄悄地离开了此岛。1798 年 7 月 2 日，拿破仑率领 3.6 万人的军队弃船登陆，夺取亚历山大。7 月 21 日，法国军队在金字塔一役中击溃了奥斯曼人和马穆鲁克，通往开罗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为了赢得埃及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拿破仑精心编造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告，声称法国不仅是伊斯兰的朋友，还是"忠实的穆斯林"。他吹嘘自己的胜利超越罗马教皇，"他总是呼吁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作战"。拿破仑指出马穆鲁克贪得无厌，对埃及民众进行残酷剥削，法国是他的坚定敌人（al-Jabarti 1975，41）。埃及的乌里玛，诸如博学多才的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Abd al-

---

① 斯图尔特·哈尔腾（Stuart Harten）认为，法国人侵埃及是"法国督政府时期开始的洲际和海外扩张进程的重要部分，是为了弥补在圣多明克（Saint-Domingue）的巨大损失，挑战英国海上霸权，刺激法国不顾一切地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冒险行为。"（Harten 2003，40—41）

Rahman al-Jabarti）猛烈抨击了拿破仑的文告（包括文字的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作为哈尔瓦提亚苏菲社团（Khalwatiyya sufi order）成员之一，贾巴尔提的目的是复兴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现代化，他批评了以圣经手稿为理由的“平等”观念，并质疑处决了他们“苏丹”（路易十六）的法兰西共和国如何治理国家（ibid. ,42—43）。贾巴尔提接受早期“西化主义者”（Occidentalist）的立场，认为法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炫耀世俗的“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s）（ibid. ,47）。[①] 然而，拿破仑轻松地击败穆斯林军队并且令人震惊地占领埃及，表明了奥斯曼帝国的软弱。从对埃及本土的影响来说，马穆鲁克被击败“打破了埃及人和他们最高统治者之间的联系”（Marsot 2007，61）。

与此同时，霍雷肖·纳尔逊海军上将发现了拿破仑的军舰，并于8月1日在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尼罗河战役）将之毁坏。这些损失将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孤立在埃及，整个行动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具有文化意义。杰弗里·塞姆考克斯对此解释道：

> 阿布基尔战役之后，本来是文化层面的表层冲突，却演变为一场颇具深度的改革者的邂逅。法国巩固了占领埃及的成果。埃及研究院的创立，标志着东方学（Orientalism）的形成时刻即将到来（参见下文）。历史意义深远的欧洲启蒙运动现在将与伊斯兰教零距离接触，并用科学和理性的力量去衡量、理解，最终去主导这块异域土地上的

134

① 拿破仑企图指派埃及领导人统治埃及，这些人包括组成的顾问“迪万”（Diwan）组。法国人担心埃及的基督教化，在重要的财政与官僚职位雇佣科普特人（Copt）（参见Cole 2007，103.）。胡安·科尔（Juan Cole）对此作出评估：“波拿巴的交流信件中关于立法等貌似合理的事件背后，隐藏着贪污腐败、滥用权力和恐怖统治的残酷现实。”（ibid. ,104）

现实世界。(Symcox 2003，26)[①]

拿破仑残酷镇压了埃及本土抵抗力量，诸如平定 1798 年 10 月爆发的开罗起义[②]。确保了在埃及地位的安全后，拿破仑看到利凡特地区是威胁其埃及地位的潜在力量，因而对此地发起了征服运动。1799 年 1 月，拿破仑到达叙利亚，遇到顽强抵抗。同年 5 月，由于瘟疫爆发，其军队被迫撤退。6 月，撤回开罗。

根据拿破仑的私人秘书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布列纳（Louis-Antoine Fauvelet de Bourrienne）透露，拿破仑“迫切渴望保住自己的征服成果，使成为法国殖民地”（Bourrienne 1993，145）。他还提及在通往印度的路上，曾发生过一次与亚历山大战役类似的情况（ibid.，161）。亚历山大·贝尔蒂埃（Alexander Berthier）也指出，拿破仑考察了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可能性，并下达了执行初步计划的命令（*Military Journal* 1800，91）。然而，由于法军战舰在阿布基尔战役中被毁，在利凡特的战役中大败而归，遏制了拿破仑的殖民构想以及再次征服的野心。为了参与推翻法国督政府的阴谋，拿破仑放弃了他的军队秘密离开埃及。1801 年 8 月，拿破仑军队向英国和土耳其军队投降。[③]

---

① 法国启蒙运动期间，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认为奥斯曼帝国苏丹暴虐专横，而伏尔泰（Voltaire）尽管承认自己描述不公平，但利用他的戏剧《穆罕默德》（*Mahomet*）作为抨击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的工具。波拿巴也批评了伏尔泰对先知的看法（Cole 2007，141）。关于法国人冒险远征埃及，胡安·科尔提及，乌里玛和欧洲人批评了迷信的伊斯兰仪式。再者，“处于中产阶级的、懂双语的埃及人很可能是向法国传授伊斯兰民众宗教实践的主要解释者，他们很可能将自己对伊斯兰的好恶情感传达给欧洲人。这些伊斯兰民众的想象决不是欧洲东方主义的唯一创造物，而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ibid.）。

② 1800 年 3 月，第二次起义爆发。

③ 拿破仑离开埃及后，军队由克雷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将军指挥。1800 年 1 月，克雷贝尔与英国和土耳其人签署和约，允许埃及军队撤离。英国违反协议，双方恢复敌对态势。1800 年 3 月，埃及发生大规模叛乱，6 月，克雷贝尔遭暗杀。埃及的抵抗运动仍在进行，再加上瘟疫流行，法国军队于 1801 年 9 月最终恋恋不舍地离开埃及。胡安·科尔指出，拿破仑的埃及冒险对他未来政策的影响，比历史学家所预期的更严重。例如，拿破仑与罗马教皇协商并在 1801 年签署宗教事务协定（Concordat），拿破仑与埃及乌里玛协调矛盾。此外，拿破仑还自认为是埃及的苏丹，使人再次联想到 1804 年拿破仑称帝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经“奥斯曼化”（Ottomanized）（参见 Cole 2007，244；Cole 在新式美国基金会上强调了这一点，2007 年 8 月 24 日，Booktv. com，C-Span 2）。

法国占领埃及所蕴含的多重意义，使得历史编纂显得丰富多彩（参见 Gelvin 2003）。法国士兵在修建防御壁垒期间，将罗塞塔石碑（The Rosetta Stone）发掘而出。该石碑是一块玄武岩材料的厚石板，上有希腊文、埃及文和象形文字（hierglyphics），经风化仍依稀可辨。经过 20 多年紧张有序的研究，这些艺术品成为揭秘埃及象形文字意义的解码器（参见第一章）。再者，波拿巴随行的学者和工程师对埃及文物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精密研究。[①] 最终成果是完成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多卷本的著作《埃及传记（1809—1828）》（*Description de l'Egypte*, 1809—1828）。[②] 该书艺术性地叙述了古代建筑风格对东方主义、欧洲知识分子与“东方”（意思是马什里克和马格里布）美学设计的重大意义，而使这些地区及其民众显得与众不同且产生自卑情感。该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位数学家约瑟夫·傅里叶（Jean-Baptiste Joseph Fourier）在给《描述学》（*Description*）写的“历史的序言”（Historical Preface）中，详述了法国的帝国野心：

135

> 埃及人拥有那些遥远的法国殖民地才具备的优势，即农业繁荣、商业兴隆、财富堆积如山。隔离法国和埃及的障碍仅是一小片海洋，海上航行是这些强国及其天然盟友的特权。埃及（开凿运河）将共同捍卫意大利邻国、亚得里亚海诸岛……这个国家将是法国对外交往的中间站：它们位于亚洲的门户，很可能继续威胁敌国（英格兰）的财富，威胁或入侵英国富裕的殖民地（印度）……面对如此有利的局势，法国殖民地将对邻国产生重大影响。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将首先受益……我们将与波斯和亚洲君主国签署持久而

---

① 这里仅有两位考古学家，大多数学者都是工程师（参见 Russell 2001，11—12）。

② 《埃及传记》是一部学术性极为浓厚的、独具特色的著作。斯图亚特·哈尔腾指出其中细节部分，“大约 7000 页的文本，837 幅铜版雕刻，共有 3000 幅插图。从其百科全书式的风格和不可估量的价值来判断，《埃及传记》也为拿破仑不成功的殖民冒险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正当性”（Harten，2003，34）。

> 有利的联盟。我们将渗透到非洲大陆的各个部分。（Russell 2001，17）

傅里叶遗憾地认为，由于拿破仑恢复了“古代的暴君形象”，因而这些野心是不可能达到的（ibid.，26）。[①] 然而，拿破仑等人对北非有帝国殖民的诉求。欧洲人也觉察到埃及、奥斯曼帝国和马格里布等地的虚弱，从而更加激发起帝国的殖民想象。达雷尔·戴克斯特拉曾提及：“法国占领埃及，特别是随后拿破仑回忆录以及随行学者的雕版印刷品，对欧洲人了解埃及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那些影响是对欧洲而不是埃及……欧洲人把埃及想象得如此彻底和有权威性，这些‘描述’将一代又一代地塑造着欧洲人的想象”（Dykstra 1998，2：137）。不幸的是，埃及人的话语诉求、学术地位及其创造的灿烂文化一经欧洲人表述，便成为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套路。胡安·科尔（Juan R. I. Cole）认为：

> 法国尝试着通过多种方法建构（construct）埃及，包括作为他者和自我的埃及……法国占领埃及也许是殖民冒险活动和自由殖民主义（liberal colonialism）话语中的第一次尝试……这次殖民冒险是由拿破仑·波拿巴及其军官领导的，存在着几组矛盾的序列，如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公开与私密、男性与女性、大国外交与地区政治。（Cole 2003，48）

法国对埃及的殖民冒险活动揭露了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后来北非

① 马亚·亚桑夫（Maya Jasanoff）注意到《埃及传记》的标题页是“没收的古物”（confiscated antiquities），边框是拿破仑在埃及取得胜利的名字，长方形或椭圆形图包括一枚恒星和一只蜜蜂以及拿破仑的个人图案。这并不仅仅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是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法国民族和帝国野心合为一体的产物。从整体考虑，《埃及传记》试图弥补了这一损失——这是一个替代性的收藏品和一件理智的事情（Jasanoff 2005，222）。

（和其他地区）殖民主义的多重复杂性。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政治经
136 济考虑，其背后则是相互矛盾等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跨文化所产生的经验与后果，影响十分巨大。

尽管贾巴尔提抨击法国，但也勉强承认拿破仑殖民也有对埃及有益的成分："法国国民……渴望将埃及从糟糕状态中解放出来，将埃及民众从奥斯曼人的无知愚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还指出，法国"既没有干预任何人的事情，也没有残忍地对待埃及人。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让埃及的事务更井然有序"（al-Jabarti 1975，86）。[①] 此外，贾巴尔提极为重视法国人带给他们的书籍：

> 一些穆斯林东张西望，其实法国人不会阻止他们进入这里。的确，法国会带给穆斯林国家各种各样的印刷品，这些书中有各种各样的插图和各国家、地区地图，以及动物、禽类、植物和古代历史故事、民族运动、先知的传说（包括他们的图画、奇闻异事、每个人的事迹以及使心灵困惑的事情）。（ibid.，116）

他注意到法国人：

> 对科学知识，主要是数学和语言知识十分感兴趣，并努力学习阿拉伯语及其方言。因此，他们不分昼夜地努力学习。它们喜欢那些关于各种语言类型、语法变格、词形变化以及词源学方面的书籍。他们拥有非同寻常的天文仪器，能够使建筑更完美，也能测量这些精美绝伦建筑的高度。他们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遥远的星星，并测量它们的距离、大小、高度、结合点、冲（oppositions）和滴漏计时器（clepsy-

① 贾巴尔提公开谴责那些在1798年10月起义的人士以及法国对起义的镇压（al-Jabariti 1975，93—108）。

dras）以及配有音级（gradings）、分钟和秒的钟表，这些东西形态各异、妙趣横生。（ibid. ,117）

法国人做的化学反应实验也使贾巴尔提十分吃惊。他的结论是："他们的事情很奇怪……我们难以理解这些设备仪器所取得的结果"（al-Jabarti 1994，3：57）。然而，双方在交流着各种观点。贾巴尔提叙述说："法国医生将治疗天花的方案作为礼物送给迪万成员，以便这项研究能够广泛宣传……迪万接受了礼物，并给作者写了封感谢信。认为这是一项不错的研究。"（ibid. ,3：224） 137

贾巴尔提的作品在现代北非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详细地描述了法国人和穆斯林交往的细节。他的《法国占领埃及史》可能是在法国占领埃及的十个月内写成的。贾巴尔提的叙述直接捕捉了这些感人事件。他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他在震惊于法国入侵与占领之时，也对法国的科学技术与学术精神产生了无尽的兴趣。《非同寻常的生活与事件遗迹史》以超然的叙述方式，将其所在时代的埃及历史以编年史的方式加以叙述，成为详细记录这一时期的大作。尽管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但该书视野开阔，很值得一读。他认为奥斯曼帝国阻碍了埃及潜能的发挥，鄙视奥斯曼帝国的落后。贾巴尔提承认欧洲国家先进的一面，但由于宗教信仰与文化结构的迥异，他并不赞同欧洲人的想法。其著作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为我们提供了穆斯林批评欧洲早期帝国主义的一手资料和最真实的观点；第二，他叙述性地阐述了令他烦恼的现实情况——穆斯林社会与文化的僵化结构（ossification）。贾巴尔提深知吸取法国和欧洲国家知识的必要性，但他抵制二者交往后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①] 他的学术成果从哲学层次存在主义的维度，为跨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个案。

法国短暂占领北非，这在北非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

① 另一方面，马利克·本纳比，特别是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参见第六章）很赞成那些交往，相信现代主义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相容的。

法国这次征服与占领活动，震撼了埃及、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世界。它构建了一整套从政治事务到科学实验的新型权力关系，使现代性（Modernity）等同于帝国征服和殖民主义。它也使得欧洲人意识到在与非欧洲国家博弈中力量的上升，即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地位优越性"（positional superiority）（Said 1979，7）。这一客观现实鼓舞了欧洲国家的政治野心，改变了学术界和民众的基本诉求。然而，欧洲国家科学技术的无限潜力鼓舞了一位满怀雄心的奥斯曼帝国官员，并最终成为埃及的统治者。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Mehmed Ali）。

结论

138 从奥斯曼帝国的到来到拿破仑军队的离开，北非与广阔世界的联系发生了许多重要的跨文化交往关系。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地中海地区统一且富有凝聚力"，同时，他"确信土耳其人居住和呼吸的地中海与基督教具有相同的韵律，整个海域面对共同的命运……即使不会有相同的后果，也会产生相同的问题和趋势"（Braudel 1972—1973，1：14）。不过，他也承认，奥斯曼人和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着两个"海上世界"（maritime worlds），尽管二者有"贸易联系和文化交往"。每个世界都是自治的，拥有"它们的影响范围，各地区人口内部混杂居住，藐视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的障碍与限制"（ibid.，1：134—135）。安德鲁·赫斯（Andrew C. Hess）对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统一观"（unitary vis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提出质疑（ibid.，1：134—135）。他在解释这一问题时建议："16 世纪的历史主题是地中海世界被分隔为不同的、界限明确的文化范围。"（Hess 1978，2—3）随着两大帝国在地中海与北非地区冲突和竞争的加剧，二者的边界变得日益清晰。对赫斯来说，"伊比利亚—非洲边界文化冲突的消失，等于表明使用拉丁语的基督教与土耳其—穆斯林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独一无二的分歧"（ibid.，207）。他指出，"每个帝国的核心都有助于形成抑制文化弥散的边界结构（border

structure)”（ibid. ,211）。实际上，布罗代尔和赫斯的解释观点相差很远。布罗代尔认为：“每个（帝国）都是一个单独的历史区域”，并指出，“两个区域的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日益成为16世纪的标志性特征。”（Braudel 1972—1973，1：137）[①] 此外，地中海逐渐失去其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人将精力转向其他阵线与敌人——葡萄牙人和波斯人——并在欧洲中部相互厮杀（土耳其人在1529和1683年两次围攻维也纳，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尽管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实力悬殊，但由于欧洲人避开北非海盗和利凡特地区从事东南亚贸易的中间商，因而布罗代尔声称：“东方人（easterners）有必要与西方的优越性联系起来，不计代价地分享财富：他们从西方可以得到贵金属……他们被迫采纳欧洲的先进技术。反之，处于发展中的西方工业必须为其多余的产品寻找市场”（Braudel 1972—1973，1：138）。即将出现的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的特点是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也是西欧经济处于“核心”地位，东欧、非洲和亚洲经济日益边缘化的过程（marginalized）［“单一化”（monoculture）、“外围化”（peripheral）］（参见 Wallerstein 1974，1：102）。其结果是，欧洲资本主义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汇聚在一起，控制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大规模地推动冒险事业和风险投资，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产生。再者，资本积累和优越技术刺激下的欧洲大国野心勃勃，发起了帝国主义，试图将外围经济整合进入日益扩张的世界（欧洲主导）经济。这些变迁中的经济与政治现实改变了跨文化关系，导致穆斯林和欧洲人在同等水平交往的过程中，处于衰落地位。[②] 因此，这些变迁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认识论上的层面，即改变了他者的接受和理解态度。

139

① 例如，马赛（Marseilles）商人阻止穆斯林和犹太商人和平期间的贸易活动。最终，法国主导了地中海西部，包括突尼斯和伊比利亚的贸易（Valensi 1977，58—59）。

② 伯纳德·路易（Bernard Lewis）声明：“一个肯定会阻止穆斯林到西欧旅行的因素是其统治者和民众惊人的偏狭……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将不可能鼓励其他非基督教的追随者去这些地方定居，甚至旅行。”（Lewis 1982，91）此外，诸如马赛的欧洲商人阻止穆斯林商业企业，因为后者威胁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商业交往的局限性构建了一种相互存在错误知觉的跨文化关系。

从地理和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来说，“不加批判和未经修正”是18世纪北非及其民众的固定特征。到18世纪末，学术界的诉求变得更富有批评精神，更危险，更具侵略性。雅克·格拉塞·圣苏威尔（Jacques Grasset de Saint-Sauveur）在《航海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s voyages*，1976）中写道：“土耳其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作为真正的海盗并不渴望大家庭，以及夫妻床笫之欢。他们以肉欲的快感蹂躏着这些土地，但没有得到任何成果。”他又补充说：“大自然徒劳地让土地肥沃，懒惰的居民对自然的诅咒视而不见。”他提出质疑：“这些国家何时才能关心海洋的自由，通过政治上的十字军打击这些非洲暴民，后者的江湖匪气是我们的耐心鼓励起来的吗？”（Valensi 1977，xx-xxi）①

16世纪末，土耳其国力衰竭，在地中海地区进取心的消减，再加上17世纪在欧洲被击败，使得奥斯曼帝国力量陡然直下。拿破仑入侵表明了奥斯曼帝国的软弱，法国在非洲的皇家公司（France's Royal Company）主导了地中海西部的商业贸易。此外，法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内还享有“投降条约”（capitulations）所规定的优势或者经济、文化和法律上的治外法权等优惠条件。两大跨文化行为体偶遇的话语代表了决定性的重大变化。由于他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上的优越性，尽管拿破仑对伊斯兰文明极为敏感，但法国对埃及的做法是施加影响，而不是与埃及交往。他们认为埃及人是低等的（除了特殊个体外），抑制了积极的跨文化关系的发展。拿破仑及其军队离开埃及不久，这种优越性的态度弥漫在东方主义学者的学术表达和理论诉求之中。

140

期间，奥斯曼帝国摄政政治和摩洛哥谢里夫王朝的历史，表明了北非政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里也存在着碎片化景象。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认为，奥斯曼人的到来代表了一种历史的中断，导致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以及利比亚和埃及）“走上了与摩洛哥不同的路径”（Berque 1978，543）。欧洲帝国主义最终切断

① 瓦朗西（Valensi）也列出了旅行者的叙述和其他回忆录，有助于这种认知上的改变。

了这条历史发展路径，包括摩洛哥。

显而易见，阿尔及尔摄政国和萨阿德苏丹击退了欧洲人的入侵。奥斯曼人、萨阿德人和阿拉维人成功地收复了欧洲国家在北非沿海地区占领的领土。然而，与拿破仑的惊人冒险活动一样，欧洲国家也具有侵略野心。甚至羽翼未丰的美国也提出在北非实现自己的目的。1801 到 1805 年间，美国与阿尔及尔协商谈判释放战俘问题，并与的黎波里摄政国兵戎相见。1815 年，经过一次短暂的冲突后，美国向阿尔及尔总督提出赔偿要求，如停止缴纳贡赋，结束他们的“柏柏尔人战争”（参见 Parker 2004）。[①] 到 19 世纪初，摩洛哥进入一种由自身影响而导致的孤立状态。奥斯曼摄政国暴露了其脆弱性和不安全感，奥斯曼的埃及也经历了短暂且引起重要后果的欧洲征服和占领活动。由于缺乏对抗性的力量，从开罗到西撒哈拉到博哈多尔角（Bojador）的北非面临着不祥之兆。

① 1777 年，摩洛哥承认美国，是第一个承认美国主权的国家。1786 年，两国签署和平友好双边协定，是美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条约。1802—1803 年，美国和摩洛哥爆发了战争，没有产生实质影响。我们将在另一章“柏柏尔战争”（Parker 2004，156—157）中阐述这一问题。摩洛哥与突尼斯摄政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只是哈姆达（Hamuda）贝伊在美国封锁的黎波里期间夺取了突尼斯海军舰艇和两只战船后，以战争相威胁。美国军队在突尼斯海港炫耀武力结束了这次危机。为了巩固双方的亲密关系，哈姆达贝伊派遣大使前往华盛顿。正如理查德德·帕克指出，苏莱曼（Suleiman Mellimelli）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第一位大使……较快速度地获得成功，产生较好的社会反响”（Parker 2004，152—154）。

第六章　北非的欧洲殖民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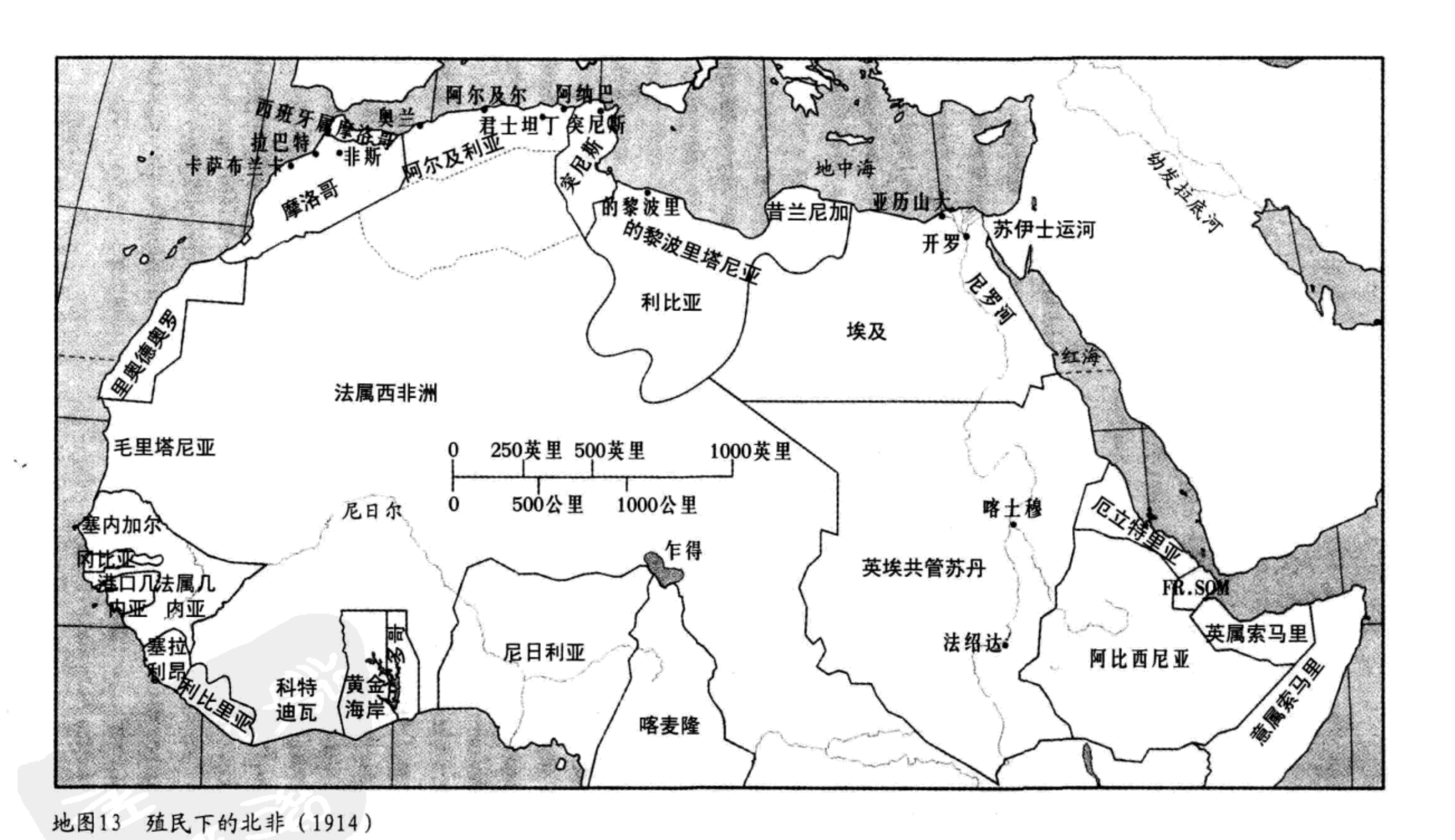
141　1816年，爱德华·柏柳［Edward Pellew，即埃克斯茅斯（Exmouth）勋爵］指挥着强大的英荷舰队（Anglo-Dutch fleet），举着白旗，佯装投降，驶入阿尔及尔海港。爱德华随后下令对这里狂轰滥炸，场面极为惨烈。这些轰炸声向摄政国和其他海盗国家传递了这样的信息：随着法国大革命与欧洲战争的结束，欧洲国家不再容忍海盗的劫掠行为。[1] 随后的战争导致北非被划分为三个单元，“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其他历史力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北非与世界。19世纪，以各民族国家与政府财政体系为后盾的、工业革命式的欧洲资本主义与政治结构悄悄地渗入诸如突尼斯和埃及等北非国家脆弱的、碎裂式的政治领域。再者，欧洲大宗商品击败了北非制造商与手工业者。尽管北非民众进行了机智且顽强的抵抗，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北非和撒哈拉地区已经处于欧洲国家的控制之下。

每个北非国家的殖民经验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新王朝坚决要求独立地位，却为英国干预埃及铺平了道路。法国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带有偶然性，却最终将欧洲殖民和压制性的殖民主义

---

① 英荷联盟舰队随后威胁突尼斯和的黎波里。



地图13 殖民下的北非（1914）

制度移植到北非。突尼斯与摩洛哥之所以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主要是欧洲大陆等国相互竞争的结果。意大利夺取奥斯曼帝国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折磨着这个衰弱不堪、落伍过时的帝国。甚至像西班牙这样微不足道的二流大国，重新上演了入侵北非的历史场景，声称要占领西撒哈拉等领土。欧洲殖民主义对北非造成多重后果。

埃及的阿里王朝（Alids）

143 阿里王朝的遗产对埃及历史的影响既深远又充满争议。在富有历史积淀的埃及史上出现了许多外族王朝，阿里王朝与他们一样，始于一个令人敬畏的领导者穆罕默德·阿里。他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使大英帝国胆战心惊，以至于后者极尽全力遏制他的野心。阿里的外孙伊斯梅尔（Isma'il）加速了埃及的现代化，却负债累累，最终招致欧洲的入侵。1882 年，英国干预并占领埃及。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现代化的推进者（Modernizer）

拿破仑推翻第一共和国督政府（Directory），以法国执政府（Consulate）取而代之，他本人成为第一执政官，并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具收获的历史时期。拿破仑忽视了在埃及与利凡特地区冒险的失败经历，并重新设计为一种法国军事上获胜以及传播先进文明的形象。[①]另一方面，埃及人并没有忘记拿破仑。法国将军留下的混乱政治局势为有魄力和进取精神的奥斯曼人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机会。阿里是奥斯曼军队的一名军人，到达埃及后与英国人结盟驱逐了法国人。1803 年，英国人离开埃及。奥斯曼人觉察到马穆鲁克的弱点，利用这一局势重新恢复在埃及的统治，结束了马穆鲁克的自治状态。然而，阿尔巴尼亚军队发动叛乱，不服从奥斯曼人的指挥，而让自己的领导

① 法国从埃及撤军十年后，《埃及记事》出版，更增强了法国出兵埃及是利他主义的观点。

人掌权。领导人被暗杀后，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了局势。1805 年，奥斯曼帝国任命他为埃及帕夏和总督。尽管奥斯曼帝国对阿里日益担心，但他仍暗中积聚力量。此外，穆罕默德·阿里推翻了英国对埃及的治理计划。英国夺取了亚历山大，但帕夏在 1807 年尝试夺取罗塞塔（Rosetta）时将英国人击退。英国人随后从亚历山大撤军。

不消除乌里玛和马穆鲁克的影响，穆罕默德·阿里改造埃及的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1809 年，阿里没收了乌里玛的财产，以示对后者的反对。乌里玛丧失了生存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只好靠政府的收入过活。随后，阿里破坏了马穆鲁克的阴谋，并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镇压。1811 年，他邀请马穆鲁克领导人赴鸿门宴，并诛杀了他们。阿里帕夏清除政敌，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144

按照图伦王朝以来的传统，穆罕默德·阿里招募突厥—切尔克斯人（Turko-Circassian）加入军队，帮助他统治埃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使得埃及士兵“马穆鲁克化”（mamlukization），为阿里王朝培育出一批突厥—切尔克斯人为主的政治精英。科普特人以及欧洲财政专家都为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革出谋划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人安托万－巴泰尔米·克洛（Antoine-Barthélemy Clot）。“克洛贝伊”在引进欧洲医药实践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参见 Sonbol 2003）。再者，富有进取精神的欧洲人（特别是希腊人）通过与埃及合作，在地中海地区多层次的进出口商业交往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国商人与埃及商人竞争，削弱了后者的政治潜力和经济实力（参见 Lawson 1992，69—70）。

穆罕默德·阿里调动并集合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包括扩大士兵招募规模[1]、给海军装备了强大的武器以服务于他的主子奥斯曼帝国苏

---

① 按照弗雷德·劳森（Fred H. Lawson）的观点，穆罕默德·阿里的军事行动对埃及国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及政府通过招募农业工人，控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削弱了埃及的大农场主”，从而“阻止出现地主军事精英”（Lawson 1992，141）。当然，军队的“埃及化”（Egyptianizing）与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后果，为埃及民众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接受教育创造了机会。

丹和自己的野心。① 1813 年，在阿里之子易卜拉欣（Ibrahim）帕夏的指挥下，埃及军队从瓦哈比人手中收复了圣地汉志（Hijaz，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瓦哈比派是在 18 世纪后期兴起的伊斯兰运动，他们狂热地反对苏菲主义。1818 年，埃及军队②占领其首都德拉伊叶（Dar ‘iyya）。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还与克里特岛和摩里亚半岛（Morea，希腊南部）的希腊起义者作战。不过，帕夏最担心的还是欧洲列强的干预。1827 年，阿里海军参与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 年）军队作战，欧洲联盟舰队（英法俄）在纳瓦里诺（Navarino）消灭了埃及—土耳其舰队。这次胜利的战役确保了希腊的独立地位。埃及的巨额付出与沉重损失使穆罕默德·阿里开始疏远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阿里付出了高昂代价，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在他看来，全身心服务于苏丹阻碍了他实现帝国野心的梦想。从 1820 年始，穆罕默德·阿里的另一个儿子伊斯梅尔在埃及南部（上埃及）发动战役，最终确保了苏丹北部（古代努比亚或库施）的安全。埃及人在苏丹构建帝国统治的重要原因是为了获得黄金、士兵与劳动力。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加速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他创建了一个欧洲式的政府，诸如部长级别的官员为迪万或部的首领。帕夏构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体系，垄断了所有贸易，大力推进棉花、谷物、亚麻、红花、糖料甘蔗（sugar cane）和谷物的生产。这样做的后果是：埃及政府控制谷物及其价格，农民劳累无度，受着沉重的剥削。阿里政府还废除了农业税（tax farming），以更有效的直接税（direct taxation）取而代之。穆罕默德·阿里还取消了中间商，国家则承担了

145

① 埃及人在劳达岛（Rawda Island）上修建了火药厂。埃及人烧煮废物垃圾（refuse），提炼火药的必需成分——硝石（al-Jabarti 1994，4：360）。这也是穆罕默德·阿里试图经济独立自主的表现。

② 穆罕默德·阿里敦促奥斯曼帝国原则上承认希腊的独立地位（Fahmy 1998，2：159）。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想方设法增加自己在埃及国内的影响。马亚·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发现："英国和法国在一种自相矛盾的扭曲心态中，发现他们只有形成合力才能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然而，英、法与帕夏都极力增强他们在埃及国内的地位。"（Jasanoff 2005，277）

中间商的职能。正如贾巴尔提（al-Jabarti）所说："帕夏……像着了魔，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敛财，他设立了各种名目的税收，由登记员登记在册……收税、消费与回款成为国有资金的一部分。"（al-Jabarti 1994，4：236）除了经济作物的直接收入外，穆罕默德·阿里还投资以丝织业和军需品为特色的制造业。由于缺乏生产能源所需要的自然资源，阿里普及工业化的梦想化为泡影。然而，他谨慎地监控着他的财政体系，强调征收高关税以保护埃及的新生工业，以免债台高筑。[①] 在阿法夫·卢特菲·萨义德·马尔索（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看来，穆罕默德·阿里的重商主义心态刺激了他经济独立、自给自足的雄心（参见 Marsot 2007，65—66）。

阿里意识到支持与扩大教育的现实需要。他成立技能学校，翻译欧洲的教材。据贾巴尔提介绍："帕夏确信……埃及人拥有科学天赋"（al-Jabarti 1994，4：359）。1815 年，埃及出现印刷机并印刷书籍。另外，他还鼓励海外学术研究。里法阿·塔赫塔维（Rifa‘a al-Tahtawi）既是具有现代化倾向的埃及人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观察力极强的年轻宗教学者。他在 1826 到 1831 年间一直住在法国。他将欧洲的知识、能力（特别是他们的技术）与欧洲的穆斯林国家和社会进行比较，并得出如下结论：

> 你很清楚，这些基督徒在科学领域都很优秀。同时，你将会承认，尽管我们国家有著名的开罗艾资哈尔（al-Azhar）清真寺、大马士革的伍麦叶（Umayyad）清真寺、突尼斯的札图纳（Zaytuna）清真寺、费赞地区的卡拉维因清真寺以及布哈拉（Bukhara）宗教学校，但这些学术研究机构都缺乏这些科学技术。传统的科学与诸如阿拉伯哲学、逻辑学与其他辅助科学等理性科学逐渐传播开来。（al-

① 贾巴尔提考察了 1817 年的穆罕默德·阿里后，得出以下结论："统治者除了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与巨大精力，通过剥夺他们的生计、限制与垄断他们生活所需获取的金钱外，没有其他任务了。"（al-Jabarti 1994，4：379）

Tahtawi 2004，256）

尽管塔赫塔维目击了1830年革命波澜壮阔的场面，但他仍对法国的政治制度羡慕不已：“他们完美的政治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ibid. ,189）塔赫塔威满怀热情地主张进行彻底而深远地改革，他还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先驱（参见下文）。

146 穆罕默德·阿里马哈茂德二世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后者也是一位主张现代化的统治者。实际上，马哈茂德摧毁了腐败的禁卫军（耶尼舍利）并让军队现代化，对穆罕默德·阿里所追求的自治理想构成威胁，双方爆发冲突。1831年，易卜拉欣帕夏率兵进入叙利亚。1833年，埃及军队打败奥斯曼帝国军队后，马哈茂德将叙利亚交给埃及。苏丹将叙利亚交给埃及是无奈的临时之举，并图谋报复。1839年，奥斯曼帝国军队进攻叙利亚，但易卜拉欣帕夏击退了来犯之敌。不久马哈茂德死去，穆罕默德·阿里似乎有接管奥斯曼帝国的希望。以英国帕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为首的欧洲列强迅速干预此事，易卜拉欣被迫离开利凡特。[①] 再者，大英帝国向奥斯曼帝国索求贸易特惠权，如自由贸易，剥夺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税保护权。[②] 失去国家保护的埃及工业难以与欧洲国家，特别是大英帝国的工业生产相匹敌。随后，欧洲商品潮水般涌入埃及，淹没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工业化雄心——这一不争的个案表明了全球经济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实力。按照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

---

① 英国人也极为担心穆罕默德·阿里在也门的意图。1833年，埃及鉴于也门国内不稳定的局势开始远征也门。也门的咖啡贸易，特别是英国的商业利益处于危险之中（Ibrahim 1998，202—204）。到1840年伦敦协定签署时，穆罕默德·阿里丢失了叙利亚、克里特岛和汉志。另一方面，帕夏世代相袭其职位。

② 由于英国人援助阿里王朝，奥斯曼人同意1838年巴尔塔湖（Balta Liman）协定（英国-土耳其协定）中规定的条款，该协定削减奥斯曼帝国（包括埃及）领土上的进口税。具体来说，该协议要求将关税减少到8%，禁止国家垄断贸易，因此摧毁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发展计划（Owen 1993，115）。1841年英国-土耳其商业协定强调了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边缘化与附属地位。英国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意味着，由于英国工厂产量的巨大，而保护英国的全球商业垄断地位。

英国阻止埃及步入“核心”（core）经济圈，将埃及安排到处于附属地位的“边缘地位”（peripheral status）（Wallerstein 1974，3：151）。另一方面，奥斯曼人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为埃及的统治者。1849年，阿里帕夏在霸业未竟的情况下死去。[①] 然而，正如马尔索（Marsot）对此的解释：“穆罕默德·阿里使埃及埃及化（Egyptianized），尽管他并没有计划那样做，而且从来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这样做了”（Marsot 2007，77）。他留下的历史遗产不仅使他作为现代埃及之父而名垂史册，而且还推动了现代埃及人的认同与现代埃及的形成。[②] 再者，穆罕默德·阿里还是一位跨文化交往的中介者。他坚持与欧洲国家交往、整合并吸收欧洲的工艺技能与科学技术。埃及再一次成为跨文化交往的媒介，在东西方现代性交往中起着传导功能。

伊斯梅尔总督（Khedive Isma‘il）

穆罕默德·阿里死后，其长孙阿拔斯一世希勒米（Hilmi，1849—1854年在位）统治埃及。阿拔斯是一位反现代化人士，在他的统治下埃及许多现代化工程的速度都被放慢了，包括翻译欧洲书籍。他允许英国修建从亚历山大—开罗—苏伊士的铁路。英国在埃及的势力逐渐增强，目的是阻碍法国在埃及的影响。[③] 萨义德（Sa‘id，1854—1863年在位）恢复并加速了埃及现代化的速度，并在1854年给他的法国朋友费迪南·莱赛普（Ferdinand de Lesseps）提供修建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④] 帕夏还结束了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并将这些土地向私人开放。农民表面上受益匪浅，但面对千变万化的农业市场，他们显得很脆弱，

147

---

① 1848年，帕夏由于身体欠佳而离职。

② 马尔索（Marsot）写道，穆罕默德·阿里“带给他军队中服役的农民一种痛击奥斯曼人的骄傲感，一种积极自我认同的成就感，虽然他们痛恨军队并时刻想着如何摆脱服兵役”（Marsot 2007，77）。阿诺阿尔·阿卜杜勒·马利克（Anouar Abdel-Malek）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对1852到1892年这段跨文化交往的著名时代进行了详细研究，这在界定现代埃及认同命题上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参见Abdel-Malek 1969）。

③ 两国在突尼斯也发生了这种对抗与竞争。

④ 扎切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将雷塞布（de Lesseps）描述为“幻觉、实用主义和意志的潜在组合”（Karabell 2004，7）。

经常深陷债务，被迫出售持有土地。其结果是：腰缠万贯的大地主与大地产商主导着农业部门。由于没有挣钱的机会，为避免强制劳役与军队招募，破产农民被迫流浪到城市，致使埃及的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伊斯梅尔（1863—1879 年在位）是在埃及经济极为繁荣的情况下上台的。由于美国内战期间，欧洲南部港口遭受封锁，欧洲（“核心”）工业急需棉花，于是毁坏埃及其他主要农作物，致力于长绒棉（long staple crop）生产。而伊斯梅尔却奢侈地将棉花收入投入到埃及的现代化（或者说欧洲化）事业之中。他修铁路、装电报，启动城市复兴计划。与穆罕默德·阿里一样，伊斯梅尔认为埃及的发展与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再者，他坚持认为，通过 1866 年的铸造货币以及奥斯曼帝国（通过贿赂）官方认定的“赫迪夫”（Khedive）称号，埃及已经获得独立地位。埃及总督成立了国家各部，甚至贵族内阁（或者说是议会）。尽管总督是否能够放弃国家权力还值得怀疑，但这也是埃及步入君主立宪国家的明显步骤。与穆罕默德·阿里不同的是，伊斯梅尔挥霍无度，埃及遂陷入债台高筑的危险境地。美国内战结束后，埃及棉花价格暴跌，经济体系崩溃。

当时，伊斯梅尔倾全部财力投资并完成了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工程——苏伊士运河工程。该工程的正式修建始于 1866 年。埃及工人劳动条件十分艰苦，却勇敢地应对各种困难。多夫·库珀（Duff Cooper）女士对法国—埃及合作进行了严厉批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诅咒法国——四万男子忍饥挨饿地在苏伊士运河工作，阿拉伯人并不欢迎他们”（Gordon 1969，66）。1869 年，作为现代世界奇迹之一的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工作，在一片庆贺声中开工了。欧洲各国的上层人士参加了开工盛典，包括法国皇后尤金妮亚（Eugénie）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①] 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迫于压力，以埃及人为主题创作了一部歌剧来庆祝运河的完成。《阿伊

① “贵宾名单”（guest list）还包括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尤金·弗罗芒坦（Eugène Fromentin）和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著名的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拉·卡迪尔也在应邀之列（参见下文）。

达》（*Aïda*）成为威尔第最著名的戏剧之一，于1871年末在开罗大剧院辉煌上演（参见 Humbert 2003）。［庆祝晚会的开幕式上演了威尔弟的《里戈莱托》（*Rigoletto*）剧目］苏伊士运河极大地提升了埃及在中东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但进一步加深埃及的债务危机。 148

埃及总督看到贷款与欠款的数额日益庞大，决定出售自己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急切地想购得此股。在金融家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Lionel Rothschild）的帮助下，英国出价高于法国。1875年，迪斯累利成功地购买了埃及总督出售的份额，英国购得了苏伊士石油公司44%的股份。英国在埃及下了巨大赌注。[1] 最重要的是，英国将两名英国人安排进公司的董事会，控制着公司的所有事务。

随后几年，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派出的行政长官组成的四国债务持有组织（the Caisse de la Dette Publique）举行就职典礼。他们还成立了一个起监督作用的金融组织，目的是保护外国人的利益和投资。再者，英、法采取“双重控制”（Dual Contrpl）的方式管理埃及财政。很明显，由于埃及总督对经济的管理不善，不但削弱了自己的权力，而且破坏了埃及的自治地位。埃及逐渐受欧洲控制，而这并不是埃及总督所希望的。

伊斯梅尔寻求各种方式试图从欧洲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摆脱英、法的双重控制。为了达到此目的，他需要得到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支持，尽管二者的关系时常处于紧张的态势。当伊斯梅尔民族主义立场日益明显之际，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1876—1908年）在欧洲国家的施压下迫使伊斯梅尔退位。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陶菲克（Muhammad Tawfiq，1879—1892年在位）成为埃及总督，但不久埃及就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

① 此时，埃及作为英国经济与商业合作伙伴，其重要性日益增长。从1848年到1860年，埃及出口市场的地位从第26位上升到第12位。其进口供应商的地位也从1854年的第10位上升到第6位（Owen 1993，116）。

英国占领埃及

伊斯梅尔对欧洲入侵的迟钝反应，激发了埃及的民族主义。1881年，祖国党［The National Popular Party 或者称瓦塔尼党（Watani Party)］在埃及成立。该党将一大批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其领导者是一位杰出的埃及军官艾哈迈德·奥拉比（Ahmad Urabi）帕夏。当欧洲国家与埃及关系恶化后，英国和法国调遣海军进入亚历山大，但这一行149 动引起了当地的暴乱。[1] 英国陆军在协商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于1882年9月击败了"奥拉比分子"（Urabists）。[2] 英国人此次行动的表面借口是为埃及提供临时保护，实际上则是占领并干预埃及内政事务。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56年，是年，埃及的另一位上校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向英国发起挑战。

英国人一旦占领埃及便常驻下来，因为埃及的地位太重要了，特别是通过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这一关键锁钥。1883年伊夫利·巴林（Evelyn Baring）担任埃及总领事，也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1892年克罗默（Cromer）勋爵步入贵族行列，他是一个圆滑老练的行政长官，曾在印度工作。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是这样描述克罗默的：

> 他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善于察言观色以及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他对那些没有参与现代社会变迁与民族主义人士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古典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人的典型代表。他发现他们（这里指的是埃及人）属于落后的种族，为了欧洲人的利益与安全需要，这些人需要被保护与教导

① 1881年，埃及的欧洲人数达到9万人，而1838年仅有8000到1万人（ibid.，117）。

② 查尔斯·埃德温·威尔伯（Charles Edwin Wilbour）是一位美国的埃及文物学者。亚历山大被毁后，他感到很伤心，碰巧"一位年轻的英国人"询问"为什么这里着火的标记如此之少……我说：为什么？'你个白痴，这里是你的躯壳撞的，它为什么要显示火的标志呢？'他似乎相信了。岁月流逝，我认为亚历山大将能够重建"（Wilbour 1936，179—180）。

（Hodgson 1974，3：241—242）。

在贝尔克看来，克罗默“在管理经济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在行政管理方面则是专制主义者”（Berque 1972，147）。他将治理印度的经验运用到埃及，用贝尔克的话就是“埃及的印度化”（*Egypt àl'Indienne*）（ibid.，146—169）。这种管理方式极为有效，埃及财政井然有序。新出台的法律条文结束了债务危机对埃及的束缚，特别解除了对埃及农民的约束。英国人赞同埃及以发展农业为主打产业，有意压制埃及工业和制造业的潜在竞争力。[①] 再者，克罗默限制埃及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外国人也通过与埃及签订治外法权协议而受益匪浅。社区种族出现多元化的特点，如亚历山大的希腊人，也鼓励了埃及贸易的发展与国际化大都市的构建。埃胡德·托莱达诺（Ehud R. Toledano）认为，英国的统治“是一种依靠地方精英实现政治治理，经济上进行剥削的排他主义（*exclusivist*），与奥斯曼帝国的包容主义（*inclusivist*）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允许埃及分享经济收益的较大份额”（Toledano 1998，2：284）。

我们还可以从东方学者（Orientalist）的态度来考察英国在埃及的帝国主义。克罗默写道：“我在东方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很难对东方人的期望、雄心和观点进行真实的估计与评价。”（Cromer 1908，1：6—7）他认为“心理平衡和精密估计……是不合逻辑与情理、具有独特思维的东方人与逻辑性极强的西方人的典型特征”（ibid.，1：7）。[②] 克罗默基本上是一位帝国治理的技术专家，他认同英国人的理想，接受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提出的“白人负担”（white man's burden）的基本观点：“（英国人）确信他的使命就是挽救埃及社会，并有能力这样做。”（ibid.，2：124）可能让读者惊奇的是，克

150

① “尽管埃及付出牺牲工业以及将农业改造成单一棉花栽培，以供养英国兰开夏小工厂的运转”的代价，但克雷默也达到了偿付债务的目标（Marsot 2007，93）。

② 克雷默对东方国家的态度很可能受语言的限制。尽管他“相当精通土耳其语”，但对阿拉伯语一窍不通（Cromer 1908，1：7）。

罗默拒绝了将埃及彻底纳入大英帝国，并预见成立一个自治国家(ibid. ,2：564)。他从跨文化维度预想了埃及的自治：

> 将所有埃及居民整合成一个大都市，让他们成为穆斯林、基督徒、埃塞俄比亚人或非洲人，成为一个自治实体。实现这一目标将花费许多年——很可能多少代，但除非这一目标实现，否则在我看来，任何自治思想都不得不放弃。(ibid. ,2：568—569)

在此期间，英国人在埃及事务上执行了克罗默所说的“举足轻重的影响”(paramount influence)(ibid. ,2：125)。

英国占领埃及的广泛后果

英国占领埃及也对苏丹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自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始，埃及就向南扩张到苏丹。伊斯梅尔统治期间，埃及人的统治范围延伸到索马里海岸（使人回想起埃及与古代蓬特人的关系）。1876 年，埃及入侵阿比西尼亚（Abyssinia)，遭遇重大失败。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1843？—1885 年）迅速崛起，成为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他自称马赫迪（Mahdi)，威胁着埃及阿里王朝在苏丹的影响。他的目标是在苏丹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1885 年，马赫迪运动（the Ahmadiyya 或 Mahdist movement）战胜了喀土穆的埃及军队，该军队的指挥官是英国雇佣军查尔斯·乔治（Charles George)，即曾到中国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戈登（Gordon)。昔日在英国战无不胜、颇受爱戴的戈登死于此役，被英国人追认为民族英雄。雅克·贝尔克认为，戈登“性格多变、敏感多疑，仅相信他的直觉。他是一位由维多利亚女王派往苏丹镇压另一位神秘人物（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神秘人物”（Berque 1972，143)。英国人认为尼罗河沿岸的马赫迪运动是对他们在埃及地位的巨大威胁。1898 年，赫伯特·基齐纳（Herbert Kitchener）勋爵在恩图曼（Omdurman）战役中击败

151

了马赫迪运动，英国的统治范围扩展到苏丹。英、法之间一场大战似乎迫在眉睫，但法国最终退缩。“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表明了“抢夺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潜在的危险。据历史学家的说法，英国接管埃及引发了“混乱”（Scramble）（参见 Robinson and Gallagher 1961）。1899 年，英、埃征服苏丹后，宣布共管“苏丹”（condominium）。二者签署了共同管理这片广大领土的协议，但实际上英国控制着苏丹。

英国占领埃及（和苏丹）以及欧洲干预并向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恺加（Qajar）王朝渗透这一事实，促使伊斯兰主义者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及其得力助手——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宣传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按照这些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穆斯林文明需要复兴，穆斯林—阿拉伯文化遗产更需要复兴。阿富汗尼和阿卜杜抛弃了伊斯兰教和现代主义互不兼容的观点，认为穆斯林需要仔细而深入地思考并借鉴欧洲国家通过科学与工业而崛起的事实。阿富汗尼在书中指出：

> 毫无疑问，危难贫困、不幸灾难以及民族孱弱从各个层面围困着穆斯林的各个阶级。因此，每一个穆斯林都应该充满期望地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注视和聆听来自四面八方与地球各个角落的圣贤之音。它们的出现将改变穆斯林的思想与灵魂，摧毁难以预见的腐败，再次用各种良好的教育来教化它们。也许，通过那些良好的教育，它们可能回归到昔日的喜悦状态。（Keddie 1968，125）

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对此作出如下解释：“阿富汗尼坚持认为，乌玛的强大与生存取决于伊斯兰的认同和团结。他劝诫穆斯林要意识到伊斯兰教是理性的宗教和科学——是一股充满活力、具有进步意义和创新精神的力量，能够响应现代性的需要。”（Esposito 2005，128）阿卜杜通过呼吁教育和道德启蒙阐释了阿富汗尼的观点。

1906 年 2 月，阿卜杜在《马纳尔》（*al-Manar*）发表一篇文章，他呼吁通过改革：

> （将穆斯林）从模仿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进入思想自由的世界。改革的目标就是教导它们重视知识与艺术，在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和哲学等领域发起科学运动，后者在马蒙（al-Ma'mun）及其继承者时代已经十分繁荣。（Moaddel and Talattof 2000，51）

152

阿卜杜唤起了穆斯林的历史意识，即伊斯兰教早期信仰者所具有的高尚情操与美德。因此，阿卜杜的“萨拉菲亚”（salafiyya）认同伊斯兰现代主义和复兴思想（*nahda*）。此外，穆斯塔法·卡迈勒（Mustafa Kamil）——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也是一位很有思想的理论家——表达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扩大了祖国党（National Party）的反英影响。埃及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极为活跃。

埃及人对英国人凌驾于埃及政府之上、处理 1906 年的丁沙威［Dinshaway（Dinshwai）］事件极为不满。事情是这样的：一伙英国人在聚会时以猎鸽子为乐，而鸽子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英国人的做法惹怒了丁沙威的村民，遭到他们愤怒而猛烈地打击。由于天气炎热，一位英国军官在冲突中中暑而死。英国人打死一位埃及人，以示报复。英国人怀着报复的心态处理了该事件——四个埃及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分别判处鞭刑、囚禁。

丁沙威事件激起了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怒火，祖国党和较温和的乌玛党（Umma）都表达了愤怒之情。埃及当局也抵制克罗默勋爵的特权与政策，克罗默在丁沙威事件后被迫辞职。然而，尽管埃及名义上处于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埃及总督的管理之下，但事实上是英国的殖民地。到 1914 年，国际社会认同了英国占领埃及的事实。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欧洲各大帝国多次对领土进行“贪婪”争夺。第一次是 15—16 世

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7—18世纪的法国、爱尔兰与英国的帝国构建（empire-building）。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占领埃及，接管苏丹。再有一次就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欧洲帝国主义时期——即从法国革命末期到英国占领埃及期间（1815年到1882年）的欧洲扩张。这一时期被称为"寂静的帝国主义"（quiet imperialism），其驱动力是欧洲工业化经济体系，特点是欧洲力量向全球范围的微妙且残酷的延伸，特别是向北非的扩张，最突出的地方就是阿尔及利亚。

法国帝国主义为什么看中阿尔及利亚

153

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承认阿尔及尔摄政国的独立地位，二者有着较密切的商业联系。然而，北非海盗一直威胁着法国利益，制约着法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勃勃野心，以至于17世纪末，亚伯拉罕·迪凯纳（Abraham Duquesne）海军上将轰炸阿尔及尔。法国入侵并占领阿尔及尔的直接原因与督政府期间（1795—1799年）法国拖欠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出口商业公司的债务有关，后者向前者运送谷物。[①] 阿尔及尔总督代表他们的犹太客户，一再徒劳地要求法国归还债务。

法国领事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傲慢态度，激怒了摄政国最后一位统治者侯赛因总督（1818—1830年在位）。1827年，总督挥起一把扫帚抡向法国领事。总督的冒犯之举导致法国包围阿尔及尔。[②] 恰逢此时，极端保守的查理五世国王（1824—1830年在位）统治法国。他疏远自由派。为了将公众的注意力从他不受欢迎的政策上转移，他下令入侵阿尔及尔。1830年6月，法国军队采用拿破仑部属的建议，调遣3.7万远征军乘风破浪抵达阿尔及尔，奥斯曼帝国军队大败。1830年7月5日，总督投降，签署了一份将权力交给法国人的协议，结束了摄政国的统治。随后，法国发生了1830年7月革命，不受爱戴的查理五世政权被推翻。其堂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成为法国国

① 合同日期始于1796年。

② 鉴于法国与开罗的紧密联系，法国接纳了穆罕默德·阿里夺取或管理阿尔及尔的宏伟计划（参见 Abun-Nasr 1987, 250）。

王，接管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

路易·菲利普不清楚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具体情况。因此，他指派一委员会到那里进行调查。其报告内容是我们熟知的帝国主义基本原则。从军事层面来说，法国军队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确保了法国控制地中海西部。从经济层面来说，阿尔及利亚为法国制造商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委员会认为自己肩负传播先进文明、教化落后民众的神圣使命。最重要的是，法国政府非常赞同这次征服行动，其原因是新政府和君主都想加强政治合法性（参见 Naylor 2000a，13—14）。1834年，殖民化成为法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不过表面上的定义仍为“限期占领”（limited occupation）（Heggoy 1981，153）。[①] 到 1840 年，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均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

阿尔及利亚人的抗法斗争

154 法国的殖民计划遭到阿尔及利亚人顽强而长期的抵抗。反对者的首领是阿卜杜勒·卡迪尔（Abd al-Qadir）埃米尔（1807—1883 年），他也是卡迪利亚兄弟会（Qadiriyya Brotherhood）的领袖。1835 年，他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击败法国军队。1837 年，法国与埃米尔签署塔夫纳（Tafna）协定，承认埃米尔的权威。阿卜杜勒·卡迪尔（Abd al-Qadir）在阿尔及利亚中西部组织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法国军队也面临着奥斯曼帝国艾哈迈德（Ahmad）贝伊的坚决抵抗。1836 年，一队法军企图炮轰阿尔及利亚城市，但以失败而告终。1837 年，该城最终失守。艾哈迈德贝伊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继续抵抗，持续了许多年。

与此同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冲突的迹象日益明显，恢复敌对状态。阿卜杜勒·卡迪尔（Abd al-Qadir）的国家在托马斯－罗伯特·毕若（Thomas-Robert Bugeaud）元帅率领的强

---

① 考虑到法兰西帝国历来的政策以及最近在埃及的经历，马亚·亚桑夫写道：“如果不是阿尔及利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埃及控制，法兰西永远不会征服阿尔及利亚。入侵阿尔及利亚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拿破仑入侵埃及：二者都不是创新之举，而是原有事件的延伸。这些都栩栩如生地证明了法兰西帝国的抱负以及在东方的毅力。”（Jasanoff 2005，286）

大军队（108 000 名士兵）面前开始崩溃。埃米尔（以及难民）进入摩洛哥。法国紧随其后，并于 1844 年进行了伊斯利（Isly）战役（参见下文）。法国击败摩洛哥人，迫使后者停止支持阿卜杜勒·卡迪尔的支持。1847 年，阿卜杜勒·卡迪尔投降；法国随后将埃米尔囚禁并流放。[①] 法国军队首领利昂·罗什（Léon Roches）对阿卜杜勒·卡迪尔较为尊重，前者充当后者的“秘书”（secretary），二者关系亲密，甚至带有浪漫的色彩（参见 Berque 1974，68—71）。迪维维耶（Duvivier）将军在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被捕的前几年写道：“阿卜杜拉·卡迪尔（Abdelkader）是一位埃米尔，因为自由已经用利剑赋予他这种使命……他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阿尔及利亚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的名字会被不断提起……被遗弃的痛苦的儿子，后来人将以你为荣。”（Barbour 1959，216—217）事实证明，迪维维耶确实有先见之明。

尽管毕若在阿卜杜拉·卡迪尔投降前离开阿尔及利亚，然而人们公认他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真正奠基者。[②] 他筹划的殖民计划，反映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此外，他不仅指挥军队击败阿卜杜拉·卡迪尔，而且创造了“阿拉伯办公室”（Bureaux arabes）。毕若试图让该机构在殖民者与本土民众之间起着调解作用。与美国西部印第安人代理机构一样，该机构主要联系部族与定居者。许多官员都是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的应声虫（Arabophone/Berberophone），对这里的部族较为尊重。法国元帅在打击阿卜杜拉·卡迪尔及其抵抗人士时残酷 155

① 阿卜杜拉·卡迪尔认为，法国会把他流放到马什里克。事实恰恰相反，他一直被囚禁在法国，直到 1852 年被路易·拿破仑释放。随后直至 1855 年间，他一直生活在布尔萨（土耳其）。随后，他行至大马士革，直到 1883 年死去。据说，1860 年他在大马士革发生的教派冲突暴力中解救了 1.2 万名基督徒，使他赢得了法国官方与民间的尊重。他参加了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仪式。尽管偶尔有谣传阿卜杜拉·卡迪尔是拿破仑三世在马什里克或者甚至阿尔及利亚的代理人，但埃米尔更倾向于从事写作与研究。他的书《智力下降》（*Rappel àl'intelligent*，1858 年）表明，他对哲学、宗教、人类文化学、语言学和历史学非常感兴趣。尽管他对法国殖民主义持抵制态度，但流浪异乡的阿卜杜拉·卡迪尔希望穆斯林与欧洲人相互理解。他的作品也表现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初生与萌动。

② 1839 年北非的“法国领地”（French Possessions）的官方名称为“阿尔及利亚”（Algérie）。

无情，但在对待本土民众和掩饰殖民剥削方面却值得称道，二者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法国军事行动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残酷无情，如用大火猛烧隐匿在山洞里的阿尔及利亚人，致使后者窒息死亡。阿尔及利亚的抵抗运动采取多种形式，民族主义者后来言之有理地认为，阿尔及利亚从来没有向法国屈服。[1]

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人进入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个柏柏尔人居住区卡比利亚（Kabylia），遭遇更猛烈的抵抗。19 世纪 60 年代，阿尔及利亚西部阿维亚德·西迪（Awiad Sidi）谢赫部族发生叛乱。1871 年的卡拜尔人（Kabyle）起义对法国造成最大威胁。拉赫曼尼亚（Rahmaniyya）兄弟会在起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国军队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将起义镇压下去，将上千亩的土地收为己有。法国殖民主义等同于没收财产，对阿尔及利亚民众在心理上产生影响。

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

阿尔及利亚所遭遇的殖民主义与北非其他国家的殖民主义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从 1848 年到 1962 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行政上划分为三个不同部门。在法国人看来，阿尔及利亚人是法国的后裔（atavism），即“阿尔及利亚是法国”。[2]这种观念不仅对受殖民人口，还将对殖民地的欧洲居民社区产生深远且悲剧性的后果。科隆斯（Colons）也以“黑足”（black feet）著称。[3]“黑足”等同于欧洲居民，他们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繁华城市，诸如阿尔及尔、

---

① 朱利亚·克兰西－史密斯（Julia Clancy-Smith）特别记录了阿尔及利亚人——法国殖民抵抗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他的结论是“起义与不稳定的团结一致”都同等重要与“密切相关”（intimately related）（Clancy-Smith 1994，254）。

② 1892 年，法国帝国主义首要提倡者朱尔斯·费里（Jules Ferry）认识到，尽管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但前者并不能同化后者：“阿尔及利亚并不是法兰西的延伸，而是一块殖民地”（Peyrouton 1966，199）。尽管殖民主义固有歧视所造成的不同分歧，以及阿尔及利亚人的抵抗运动在法国人同化阿尔及利亚人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按照佩鲁东（Peyrouton）的说法，伊斯兰教阻止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ibid.，268）。

③ 历史学家声称“黑足”可能源于阿尔及利亚人，指的是居民的鞋子。该词也指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法国居民，但经常等同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奥兰和阿纳巴（参见 Çeylik 1997；Prochaska 1990）。

“黑足”不知疲倦地辛苦劳作，改变着阿尔及利亚的面貌并与这里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叛乱（特别是 1871 年起义）结束以后，法国人通过立法没收大量地产，如 1873 年的警告立法（Warnier Law）。从 1830 到 1940 年，殖民主义者获得了 344.5 万公顷土地（Bennoune 1976，13）。[①] 其余土地都是贫瘠的荒地或者未耕种土地。穆斯林遭受痛苦，而“黑足”从大多数肥沃的土地中受益匪浅。

156 军方和平民定居人口之间的行政管理之争，是处于殖民地地位的阿尔及利亚在第一个四十年的显著标志。1858 年，也就是法国军队的“铁腕统治”（rule of the saber）结束后，拿破仑在阿尔及利亚成立民政部。然而，1860 年，拿破仑三世撤销该部门，他对穆斯林人口极为敏感，同时对法国定居者的行为感到愤怒。这位善于狂想的愚侠还访问阿尔及利亚，称这个国家是“阿拉伯王国”（Arab Kingdom）。任何穆斯林都希望拿破仑三世可以进行一个合格的殖民主义，但其结果是导致发生了灾难性的法国—普鲁士战争（1870—1871 年），唐突地结束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随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确保对民众的控制，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及其民众的盘剥。

19 世纪 70 年代，葡萄根瘤蚜枯萎症（phylloxera blight）席卷欧洲，葡萄园荡然无存。阿尔及利亚却没有遭此经济劫难，反而扩大葡萄栽培并成为葡萄酒生产者与供应商。葡萄种植替代了谷物种植，饥饿逐渐萦绕着殖民地区。1880 年，阿尔及利亚葡萄种植面积达 4 万公顷，但到 1940 年，葡萄种植增加到 40 万公顷（Amin 1966，1：39）。

葡萄栽培代表了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深刻影响。土地的种植结构变革也是一种文化冒犯，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饮酒。[②] 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在阐述和分析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进程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他描述了殖民主义如何迷惑了受殖民者的个性，导致产生

---

① 1 公顷等于 2.47 英亩。

② 殖民主义对北非本土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后果，使人联想起希拉尔部族的入侵以及引入季节性迁移放牧。

"心理共鸣"（psychoexistential）状态。[①] 他的意思是殖民主义在文化、经济与种族等层面比受殖民者优越（Fanon 1967，11—12）。殖民主义不仅疏离而且抹掉受殖民者的认同，受殖民者"感觉不到自己存在"（ibid. ,139）。由于他们的生活被殖民主义者破坏，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在社会交往层面面临着两难选择——移民法国还是留在本地工厂工作。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主义的结果肯定是有害的，但前者对之漠然视之的态度让后者难以忍受。

另一方面，法国教会也向受殖民者宣传，但他们起初的兴趣是劝服阿尔及利亚人改变宗教信仰，并没有对他们的殖民状况提出抗议。基督教传教士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核心是照顾卡拜尔人（Kabyle）的孤儿。[②] 1868 年和 1869 年，大主教查尔斯·拉维热里（Charles Lavigerie）分别建立了"白色教父"（White Fathers）和"白色姐妹"（White Sisters）两所教会。其目标是让受殖民者改变宗教信仰，认同法国在非洲的帝国大业。尽管有一些阿尔及利亚人皈依基督徒，但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雄心抱负并没有取得成功。白色教父与姐妹组织成员随后到医院、孤儿院和收容所工作，他们猛烈抨击阿尔及利亚的奴隶制度。

157

查尔斯·欧仁·富科（Charles Eugène de Foucauld）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会人员，他曾经是一位沉迷酒色、闲游浪荡的装甲兵军官。尽管他不是白色教父成员，但在北非服兵役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被任命为牧师，隐居在阿尔及利亚萨赫拉地区的霍加尔山（参见 Porch 1984，277—289）。富科在劝服图阿雷格部族（Tuareg，西撒哈拉和中撒哈拉的柏柏尔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对基督教的虔诚和极端苦行主义的热衷，对塔马哈格（Tamahaq）哲学

---

① 尽管黑皮肤、白面具是法国安的列斯岛的社会条件的产物，但随后法农在其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作品中反映了这些思想。他在《地球苦难者》（*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中认为，殖民主义是"自然状态下的暴力"（Fanon 1968，61）。受殖民者在许多方面遭致殖民暴力。心理存在主义困境（psychoexistential dilemma）是一种反对受殖民者的超自然的暴力。

② 卡比利亚也有一些清教徒传教士。

和图阿雷格语言的精通，使他赢得了当地人和国际社会的尊重。1916年，他在图阿雷格人的一次抢劫行动中死于非命。[①]

突尼斯和摩洛哥保护国地位的确立

与阿尔及利亚相比，突尼斯和摩洛哥同处保护国地位，其殖民地经验略显不足。这两个国家的前殖民历史具有相似性。欧洲人入侵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提升自己的经济利益，逐渐破坏了突尼斯摄政国的自治地位以及摩洛哥主权。与阿尔及利亚的历史遭遇不同的是，欧洲建立保护国与其外交事务密切相关。突尼斯和摩洛哥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国外交“大博弈”（Greater Game）进程中的一部分。[②]再者，与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不同，但与埃及类似，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殖民主义保留了前殖民时代的行政体系，甚至还是较先进的国家结构。在殖民期间，法国保留了两国的统治家族——突尼斯的侯赛因王朝和摩洛哥的阿拉维人的头衔，但是法国殖民当局掌握实权。

突尼斯保护国

侯赛因家族极力维持突尼斯的自治地位，但由于法国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其他欧洲大国控制了突尼斯的经济，这种想法实现起来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拿破仑战争后，欧洲人自信能在北非地区立足。1819年，英、法海军炫耀武力，再次强调了对1818年欧洲列强达成的议定书内容的重视，该议定书表明了欧洲国家不再容忍北非海盗的骚扰。[③] 后来，尽管侯赛因家族支持法国对抗阿尔及尔[④]，但在1830年与法国签署的条约给突尼斯贝伊自治理想以沉痛打击。该条约要求制定一个投降制度（capitulations system），给予欧洲国家及其附属国经 158

① 2005年11月，天主教会为富科教父祈祷。

② “大博弈”主要指的是东方问题（参见下文）。当时，欧洲外交的“博弈”是“全球的”，因此是“大博弈”。

③ 从突尼斯多元化的经济体系来看，海盗并不是重要的经济变量。

④ 法国的支持也意味着同意突尼斯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

济优惠待遇和超越司法的保护权。另一方面，法国接管了阿尔及尔摄政国的统治权，结束了后者的长期威胁（但另一威胁接踵而至）。具有现代化思想的艾哈迈德（Ahmad）贝伊（1837—1855 年在位）率先进行西方化的军事改革，在巴尔杜（Bardo）成立一所理工学院。再者，他巧妙地利用法国吞并突尼斯的野心制衡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恢复统治的企图（参见 Brown 1974，238—240）。艾哈迈德贝伊通过外交手段阻挠其好斗的邻国，维持一种有限制的独立地位。[①] 他也体现了北非变革的艰难，正如卡尔·布朗（L. Carl Brown）对此做出的评估："自称军事上不可一世的西方化人士，在一种较舒适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语境下，不时地沉迷于他的怪念头。艾哈迈德按照新思想和旧习惯这种不协调情势，始终如一地生活和工作着。"（ibid.，313）

这位具有现代化思想的贝伊作为一个非凡的统治者，继续对该地区迅速变迁中的地缘政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857 年 9 月的"安全保证"（Pledge of Security）主要确保穆斯林和欧洲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财产和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该保证允许欧洲人能够获取财产（Abun-Nasr 1987，281）。1860 年，突尼斯人在自己的伊斯兰王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成立了一个相当自由的立宪君主政体。部长们均对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负责，后者的作用相当于议会。立宪君主政治仅存在了四年，但这也表明了突尼斯人面对乌里玛和其他传统力量的反对，改革的力量正逐渐崛起。具有雄才大略的哈亚尔丁（Khayr al-Din）帕夏对法国十分着迷，他领导的改革运动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一直主导着突尼斯政治。

然而，19 世纪 60 年代，突尼斯陷入巨额债务之中。借鉴埃及的做法，1868—1869 年成立的国际金融委员会（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ission）基本上接管了突尼斯经济。哈亚尔丁主管该委员会，法

---

① 朱利亚·克兰西—史密斯详述了总督在地中海沿岸的娴熟外交（deft diplomacy），政府通过租借或贷款建造海边别墅，作为"结盟与构建政治盟友的精明战略"（Clancy-Smith 2008，7）

国行政官员维克托·维莱（Victor Villet）帮助他管理。正如阿本·纳斯尔所说："维莱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突尼斯实实在在的金融部长"（ibid.，283）。1873年，哈亚尔丁担任国家首相。他改革税收系统，推进经济发展，鼓励提高橄榄产量。欧洲各国领事反对他提高关税，哈亚尔丁促进突尼斯制造业的希望也化为乌有（ibid.，285）。1875年，哈亚尔丁成立了萨迪奇［Sadiqi（Sadiqiyya）］大学。大学讲授西方课程，目的是让突尼斯人作好准备，以应对现代世界日益变化的现实。[①]哈亚尔丁的主要政治使命是以贝伊统治区的自治抵消领事裁判权，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最终疏远了曾经提拔他的法国政府，并在1877年辞职。尽管哈亚尔丁帕夏经常因其改革者的姿态而受人钦佩，但阿本·纳斯尔对他提出批评，声称哈亚尔丁"与19世纪其他穆斯林改革者具有相似的特点，即幼稚地确信文化输入（cultural borrowing）可以被局限在某些具体领域，因此，伊斯兰社会可以在保留其宗教信仰与价值观的基础上恢复活力"。阿本·纳斯尔还提醒说："他作为首相并没有恢复1860年宪法"（ibid.，285—286）。

突尼斯越来越成为"东方问题"中涉及地区的组成部分，凸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②] 英国人想让突尼斯贝伊与奥斯曼帝国联系在一起，而法国想让突尼斯独立，处于自己的影响之下。1870年，意大利完成了统一，踌躇满志地想成为地中海强国。在其自娱自乐设计的扩张计划中，突尼斯的贝伊领地也被囊括其中。1878年的柏林会议决定了突尼斯的命运。1870年，德国统一。1871年，德国夺取法国的洛林（Lorraine）以及阿尔萨斯（Alsace）。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法兰克福协定）试图转移法国复仇的注意，鼓励其对外扩张。在德国的

① 1896年，萨迪吉（Sadiqi）的毕业生和持自由思想的突尼斯保护国官员在赞图纳成立了哈尔杜尼亚（Khalduniyya，以伊本·马特尔的名字命名）学校，学校以欧洲国家的教育方式为基础，从事伊斯兰研究。当然，两所机构的课程目标不同，后者主要是培养突尼斯人对法国的忠诚。

② 东方问题主要研究奥斯曼帝国地位的削弱与俄罗斯帝国力量的滋长。大英帝国担心与印度至关重要的地中海东部可能受到俄罗斯野心的威胁，因此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支持奥斯曼帝国。

支持下，突尼斯贝伊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意识到意大利的野心以及意大利人口在突尼斯的激增，决定采取行动。

法国声称突尼斯部族成员袭击了阿尔及利亚，以此为借口跨越边界进入突尼斯。突尼斯贝伊迫于法国军队占领比塞大（Bizerte），于1881年与法国签署巴尔杜（Bardo）协定，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继续要求侯赛因贝伊为名义上的统治者。1883年的迈尔萨（Marsa）协定确认了突尼斯的殖民地位。尽管"黑足"接管了他们购买、开发的领地，但并不像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严重。再者，保罗·康邦（Paul Cambon）作为常驻公使（resident minister）劝服法国国民大会在1884年批准迈尔萨协定，承担了突尼斯的全部债务，国际金融委员会的使命也结束了。此外，新近高升的红衣主教拉维热里（Lavigerie）向罗马教皇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古迦太基的辉煌。1884年，他的请求得到批准。拉维热里代表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穆斯林居间调停。此时，白色教会和白色姐妹已经从规劝别人改变信仰（proselytism）转为从事慈善事业（philanthropy）（参见上文）。

160

就在保护国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的突尼斯改革家，也是初生的民族主义精英出现在突尼斯历史舞台。他们自称是"青年突尼斯派"（Young Tunisians），希望法国能加速突尼斯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突尼斯实现独立。1911年，突尼斯附近的采石场因扩大规模，毁坏了一个穆斯林的墓地，致使暴力事件发生。然而，这些都是表面问题，表明"青年突尼斯派"对保护国歧视突尼斯人、维护"黑头"利益的愤愤不平。1912年，"青年突尼斯派"由于卷入劳工纠纷，被保护国解散。然而，当时萌芽中的民族主义开始浮现。

摩洛哥保护国

摩洛哥并没有突尼斯软弱，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逐渐陷入分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扩张主义给摩洛哥带来重重压力。整个19世纪，阿拉维人将与英国的友谊作为对抗外敌的政治抗衡力量。作为回报，英国人通过与摩洛哥的友好关系，获得在直布罗陀地区的稳

固地位。[1] 摩洛哥苏丹支持阿卜杜拉·卡迪尔的反法运动，但在前面提及的1844年伊斯利战役中遭受惨败。法国海军轰炸了摩洛哥港口［丹吉尔和萨维拉（al-Sawira）］。摩洛哥苏丹尽管不想援助阿卜杜拉·卡迪尔，但对埃米尔的顽强抗争心生同情。法国竟厚颜无耻地对摩洛哥政府日益担心。

1845年末，摩洛哥苏丹派遣一外交使团到法国以示友好，揣摩法国的意图。外交官穆罕默德·萨法尔（Muhammad al-Saffar）提供了一份摩洛哥积极进取、改革图强的备忘录。与塔赫塔维一样，萨法尔对法国科学与技术，特别是铁路、电讯与印刷术产生深刻印象。[2] 他在检阅军队后说道：

> 当法国军队走过之后，我十分羡慕这些军人势不可挡的力量与气势，他们准备充分、训练有素，一举一动都很到位。与伊斯兰教的软弱、力量的损耗以及民众的四分五裂状态相比，他们显得多么自信……他们在征服敌人时威武勇猛——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勇气、胆量或宗教热忱，而是因为他们了不起的组织结构、统领军队的神秘能力。（al-Saffar 1992，194）

161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法国是摩洛哥一个重要的威胁。摩洛哥苏丹遂加强与英国的关系。

到1856年丹吉尔协定签订之时，英国接受了在摩洛哥贸易交往中享有的特惠条件，包括财产所有权。再者，摩洛哥苏丹同英国签订投降协定，允许英国臣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摩洛哥苏丹以此协定为原型，希望将投降协定运用到其他欧洲国家，以促进他们的良好关系。然而，法国、西班牙有各自的领土野心，拒绝摩洛哥苏丹的投降协定。

---

① 英国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1714）将直布罗陀海峡据为己有。

② 萨法尔曾提及埃及人"被穆罕默德·阿里派到（法国）学习科学技术"（al-Saffar 1992，179）。

1848年，西班牙夺取了扎费林（Zaffarin）的三个小岛。他们仍然拥有休达、梅利利亚和阿卢塞马斯。西班牙想将势力扩张到里夫，并发现苏丹将梅利利亚周边土地送给西班牙以示抚慰。西班牙军队在休达着陆，行军途中反对安加拉（Anjara）部落民，并在1860年夺取得土安。1860年4月的和平协定将领土范围扩大到梅利利亚和休达，沿着摩洛哥南部大西洋沿岸给西班牙含糊其辞地界定了领土范围，最终将伊夫尼地区囊括在内，摩洛歌还支付了一大笔赔偿（1亿比塞塔）。西班牙后来索要西撒哈拉沿岸的领土，并在1884年将之命名为里奥德奥罗（Rio de Oro），成为西班牙的撒哈拉。[1] 在摩洛哥看来，该地区是苏丹国传统领土范围的一部分，这为后殖民时代的领土争端问题埋下伏笔。[2]

西班牙的侵略暴露出了摩洛哥苏丹的弱点。在穆莱·哈桑（Mawlay Hasan，1873—1896在位）统治期间，摩洛哥继续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然而，像突尼斯这种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欧洲外交与战略结盟“大博弈”中的棋子。此外，应该强调的是，构筑一种新型、革命化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工业化将深刻地影响摩洛哥国家政策。例如，关于摩洛哥，埃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三世叙述道：“摩洛哥公司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缓慢地削弱了旧社会的生存能力”及其“本土的传统结构与制度”（Burke 1976，210，212）。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他北非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反映了摩洛哥易受外敌入侵的脆弱情势。

162 欧洲国家的军事占领、政治干预与经济掠夺加快了摩洛哥苏丹国家权威崩溃瓦解的速度。柏柏尔部族及其成员享有免受惩罚的特权。如1904年5月，一位名叫艾哈迈德·雷苏尼（Ahmad al-Raysuni）的谢里夫，在丹吉尔绑架了一位希腊籍美国富豪约恩·柏迪卡里斯（Ion Perdicaris）及其女

---

① 西班牙曾索要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和布兰科角（Cape Blanco）之间的一大片土地。1994年10月，法国—西班牙协议界定西班牙范围为摩洛哥南部和里奥德奥罗（Rio de Oro）。

② 穆莱·哈桑苏丹企图通过任命一个苏非派谢赫马－艾纳允（Ma-l-Aynayn）为撒哈拉地区代表，以压制西班牙。后殖民时代的摩洛哥政府声称，这一行动代表了摩洛哥在西撒哈拉传统意义上的主权。

婿，并要求得到赎金和地区总督职位。他的两个要求都得到满足，但欧洲人迫使苏丹阿卜杜·阿齐兹（Abd al-Aziz，1894—1908 年在位）解除了雷苏尼的职位，后者又重操旧业，继续绑架勒索和骚扰生事。[①]

德意志帝国抓住摩洛哥政局不稳的有利时机，评估英、法 1904 年签署的双重协定（Dual Entente）的可行性。此时，欧洲人普遍认为，摩洛哥未来与法国的殖民意图密切关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起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摩洛哥之行，并以德国支持摩洛哥独立挑逗法国。他的行为引发了 1905 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然而，当德国得知英国支持法国时，对协约国提出了抗议。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干预此事，并于 1906 年作为调解人协商签署了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法令。很明显，该法令将摩洛哥置于法国的势力范围。[②] 1907 年，一位法国人莫名其妙地死去，给法国提供了经阿尔及利亚边境向乌季达派兵的口实。是年，法国接管了卡萨布兰卡，开始在此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卡萨布兰卡及其周边地区发生暴力事件，致使法国军队大规模地干预。

1911 年，当摩洛哥苏丹权威丧失后，德国再次掀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美洲豹（*Panther*）战舰乘风破浪驶入摩洛哥海域。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最终通过以下方式得以解决：法国以承认德国占有喀麦隆领土为代价，换取德国认同法国在摩洛哥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穆莱·阿卜杜拉·哈菲兹（Mawlay Abd al-Hafidh）苏丹（1908—1912 年在位）取代其兄长阿卜杜勒·阿齐兹（Abd al-Aziz），担任摩洛哥统治者。摩洛哥发生民众起义，这个国家面临肢解的命运。[③] 当叛乱蔓延到非斯地区之时，苏丹请求法国援助。1912 年，摩洛哥和法国签署

---

① 摩洛哥政府也允许雷苏尼担任阿斯拉总督。

② 罗斯福因成功调解并结束了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威望还体现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的外交努力，使得摩洛哥的财政与国内安全处于法国—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使人不免联想起埃及和突尼斯被殖民前的经历。

③ 反对摩洛哥领土分裂者包括基塔尼亚秩序的建立者阿卜杜·卡比尔·基塔尼（Abd al-Kabir al-Kittani）。基塔尼刚开始支持阿卜杜·哈菲兹（Abd al-Hafidh），后者同意遵守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法案，目的是让欧洲国家承认他的苏丹国。基塔尼与阿卜杜·哈菲兹恢复敌对状态后，谢赫于 1909 年被处死。

非斯协定，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西班牙接管了摩洛哥北部的部分地区，等于整个摩洛哥领土的三分之一加上南部的一个地区［塔尔法亚（Tarfaya）］。[1] 阿拉维家族继续担任傀儡苏丹，后者本来有可能挽救这个王朝，但国家大事大都被法国军队首领所控制。

163 第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是于贝尔·利奥泰（Hubert Lyautey）将军，他的任职时间是1912年到1925年。他认为，法国军官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和社会责任。他曾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岛担任过殖民官员，这一经历对他的工作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实际上，他将殖民责任与社会责任合二为一。1990年，他在《两个世界月刊》（*Revue des Deux Mondes*）发表文章，描述了法国的"幸运使命"（providential mission）是"开启有色人种的工业的、农业的和经济的生活方式，而且……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使他们的生命更完整"（Lyautey 1900，318）。他在作品中提及，殖民地的法国士兵再现了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身影（ibid.，327）。在这种情景下，他想确保摩洛哥社会与文化不再像阿尔及利亚那样遭受殖民主义。因此，他密切关注着法国的一举一动。正如格温多林·怀特（Gwendolyn Wright）所指出的那样："保护国想控制法国居民，管理怀有投机思想的暴发户，约束乡下的中产阶级以及城市的无产阶级——这些人得不到利奥泰太多的信任与尊重……捍卫摩洛哥的文化和财富表明了其家长式作风的优越感。当然，应该承认种族主义在法国社区十分盛行。"（Wright 1991，142）

殖民军官鼓励欧洲社区和摩洛哥社区各自独立发展，以保护被殖民者的文化遗产和认同，从而保证法国的主导地位。"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architect-urbanist）亨利·普罗斯特（Henri Prost）在城市规划项目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例如，拉巴特新城环绕着老城修建而成——这种划分结构隐喻了法国权力的形式与空间（参见 Rabinow 1989，277—319）。非斯的城市规划也是这样，殖民"卫星城市"（Ville Nouvelle）迅速崛起。利奥泰理解权力和美学的形式，目标是增

[1] 摩洛哥与法国签署的1912年协定界定了西班牙领土的基本轮廓。

强法国的地位。与突尼斯的情况一样，摩洛哥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得以较好改善，突出标志就是卡萨布兰卡的发展。

利奥泰确信，与间接管理摩洛哥事务的军队和民事官员合作，能够支持摩洛哥苏丹国。正如威廉·霍伊辛顿（William A. Hoisington）所说，利奥泰的"思想为帝国构建提供了一个目标，那将使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以及传教士迷惑不解"（Hoisington 1995, 53）。然而，他在受殖民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以便实现政治意义上的分而治之。最重要的是，利奥泰确信摩洛哥人维持着自己的认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体察到摩洛哥人的认同意识。法国殖民军官大都从道德上认为，摩洛哥社会福利等于克罗默勋爵在埃及的"负担"。然而，利奥泰热情的进取心削弱了他对摩洛哥殖民剥削的努力。 164

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

法国结束了阿尔及尔摄政统治，并对突尼斯总督强加各种条款。1835年，奥斯曼帝国担心欧洲在北非的残暴掠夺，采取特殊措施恢复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直接统治。当他们将国家权威延伸到内地时，遇到了伊斯兰力量的激烈反对，那就是"大赛努西"（Grand Sanusi）、阿尔及利亚土生土长的穆罕默德·赛努西（Muhammad al-Sanusi，1787—1859）领导的塞努西亚兄弟会（Sanusiyya brotherhood）宗教复兴运动。[①] 塞努西亚大都位于昔兰尼加，并通过扎维亚（*zawaya*，即沿途旅店）动员传播这种理念，其影响向利比亚南部和西部扩散。实际上，扎维亚还扮演着保护撒哈拉商业贸易的角色（Anderson 1986, 106）。意大利入侵利比亚的勃勃野心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主要威胁。

历史与地理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在北非的利益。古罗马的历

---

① 1837年，赛努西（1787—1859）成立了塞努西亚，其宗旨是净化伊斯兰，促进穆斯林的团结意识。谢赫更像一个善于思考的穆贾迪迪（*mujadid*），而不是一个具有造反精神的穆贾迪迪。然而，由于利比亚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塞努西亚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政治与宗教运动的双重角色。

史以及最近的国家统一激发了意大利入侵利比亚的灵感。刚刚统一的意大利要在欧洲国家的殖民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意大利政府设想了海外扩张蓝图，以此作为解决国内人口压力的方法。法国占领了意大利梦寐以求的突尼斯，迫使意大利寻求非洲其他地区领土。1896年，意大利在阿杜瓦战役中被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埃塞俄比亚）打败，前者征服后者的野心彻底破灭。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迅速衰落，怀有机会主义想法的意大利挑衅并发起了一次针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的战争，并在1911年入侵利比亚。[①] 尽管意大利在作战技术上高于奥斯曼帝国，但后者仍得到部族力量的大力支持。1912年5月，意大利人夺去了罗德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就在意大利于1912年发动一系列咄咄逼人攻势的同时，对奥斯曼帝国怀有敌意的巴尔干同盟也挑起事端，迫使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寻求和平。意大利获得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的沿海与内陆地区以及费赞的部分地区（直至夺取爱琴海群岛）。[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关注于欧洲战场的意大利人与赛努西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奥斯曼人作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利比亚沿海城市的穆斯林已经处于意大利的控制之下。1915年的伦敦协定保证了意大利在北非的统治地位。然而，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反抗意大利的起义接连不断（参见第七章）。

165

意大利占领利比亚对后者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正如丽萨·安

---

① 意大利已经在的黎波里进行大规模投资。按照克劳迪奥·塞格雷（Claudio G. Segrè）的说法："意大利控制着的黎波里最大的商业银行，1907年意大利造船公司控制了进港商品45%的份额"（Segrè 1974，41；参见 Ahmida 1994，105）。殖民期间，意大利用古老的名称利比亚命名其在北非的领土。

② 此时，奥斯曼人已经处于危险的政治情势。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接管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开始了现代化改革运动。但他们的改革雄心也产生许多麻烦，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地民众对他们颇有微词。巴尔干各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目标是脱离奥斯曼帝国，成立具有独立领土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最终导致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奥斯曼人通过路易斯安那条约（1912年）在利比亚保留了一个精神上的而不是世俗的权威机构，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分歧。意大利人意识到疏远了穆斯林，允许苏丹任命的黎波里的卡迪（qadi）。直到1923年的路易斯安那条约，土耳其才正式结束了在利比亚的精神影响与间接政治存在（参见 Khadduri 1963，12）。

德森（Lisa Anderson）所指出的那样："沦为殖民地以前的利比亚行政机构遭到破坏，新机构形成了一个受保护人的关系网。"（Anderson 1986，10）意大利人对阿拉伯文化知之甚少。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形象，为本国迅速增加的人口寻找出路"（ibid.，186）。意大利首先考虑到通过地方首领实现对利比亚的间接统治，但当1922年法西斯分子掌权后，意大利的殖民政策出现重大转折。本尼托·墨索里尼政府鼓励殖民行动，但也遇到利比亚本土力量的顽强抵抗。

结论

欧洲大国对北非的占领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也是超乎寻常的历史和跨文化经验。欧洲人将他们的文化与制度引进北非，在很大程度上与北非的文化与制度进行着冲突与融合。正如贝尔克所体会的那样："北非城市与贝都因生活方式的竞争与对抗达几个世纪之久，欧洲人的闯入，成为影响二者角逐的第三者，并且这个第三者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吸血鬼。"（Berque 1972，56）这是一个充满创伤，但又具有改革精神的跨文化事件。

控制北非证明了东方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以及欧洲人认为他们文明优越的固有观念。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的实质是西方优越性与东方卑微性这种根深蒂固、难以克服的差别。"（Said 1979，42）[①] 但图像化的摄影术通过宣传诸如顺从、性感妇女等老一套做法

① 除了前面提及的《埃及传记》（参见第五章），爱德华·萨义德指出，爱德华·威廉姆·莱恩（Edward William Lane）的《现代埃及人的礼仪与习俗录闻》（*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1836）是另一部著名的东方学者作品。提及当代电影中的"埃及狂热症"（Egyptomania）（如1998年的《埃及艳后》、1999年的《木乃伊》、2001年的《木乃伊归来》）都是东方主义的衍生作品。泰西尔·戈马（Tayseer Gomaa）写道："在后殖民时代，埃及题材电影的视觉定式已经超越了……仅仅将这个国家与其古代文明的重大成就联系起来的层次。他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将这些成就与埃及画面捆绑在一起使这些成就显得平凡与琐碎，而后者本来仅仅是激发恐惧与害怕的源泉。至于埃及人，他们被不公正地看作是文物中的野蛮的奴隶魔鬼，后者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壮大起来。"（Gomaa 2002，101—102；参见 MacDonald and Rice 2003）还可以查阅 AlSayyad，Bierman and Rabbat 2005。

增强了东方主义的“地位优越性”（positional superiority）。在阿尔及利亚，殖民者的摄影师特别热衷于拍摄具有色情内容的图片，他们是不合时宜、带有兽性倾向的窥阴癖者（参见 Alloula 1986）。再者，殖民摄影师还从政治层面表达了下述信息：“殖民者的明信片充满幻想地认为北非不存在抵抗运动，并提出一种观点，抚慰民众对现实的不满”（ibid.,64）。马利克·阿鲁拉（Malek Alloula）得出的结论是：“殖民主义实际上是东方主义和异国情调的最终道义，但这是拉皮条客和妓女的道义”（ibid.,122）。欧洲人将埃及的考古文物和历史书籍据为己有，不仅是东方主义的典型案例，也是另一种微妙（静悄悄）的帝国主义（Reid 2002）。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旅游过程中记录了北非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明显带有污蔑的成分。[①] 殖民者对北非本土居民的社会学研究得出各种不同的民族学理论，如“柏柏尔人神话”（Berber Myth）的说法，使得柏柏尔人的地位高于阿拉伯人（参见 Lorcin 1995）。诸如 1867 年和 1889 年的展览增强了东方主义学者的扭曲性描述。学者的叙述成为现实（参见 Çelik 1992）。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曾对此进行思考：“欧洲人最终设法理解了东方诸国，仿佛展示自己一样。”（Mitchell 1992，310）实际上，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在 1867 年的万国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期间一直驻留在埃及王宫，因此成为蒂莫西·米切尔所说的“展览的一部分”（ibid.,293）。[②] 这种感受并以此体察北非历史、社会和文化，产生了

166

① 撒哈拉探险家，即 19 世纪 50 年代的海因里希·巴尔特（Heinrich Barth）、19 世纪 60 年代的亚历山德里纳·廷尼（Alexandrine Tinné）和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Gustav Nachtigal）、19 世纪 70 年代的欧文·巴里（Erwin von Barry）。在这些探险家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对北非的兴趣日渐浓厚，最终导致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如 1880—1881 年保罗·弗拉泰斯（Paul Flatters）的冒险活动（参见 Porch 1984；de Villiers and Hirtle 2002）。

② 另一方面，泽伊内普·切利克（Zeynep Çelik）指出：“伊斯梅尔帕夏和（奥斯曼）苏丹阿卜杜·拉齐兹抓住机会游说推进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其目的是让奥斯曼帝国成为欧洲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对公众产生影响，震撼着他们浪漫的信仰，解开了某些陈规俗套的神秘面纱。”（Çelik 1992，36）

长期影响与后果。[①] 然而，殖民主义的虚荣做作与剥削掠夺不可避免会遇到本土民众的抵抗。尽管殖民主义在现代北非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保护国和利比亚来说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埃及在历经英国 75 年不同程度的占领后获得自由。阿尔及利亚遭受了长期的殖民主义，其去殖民化过程是北非最剧烈、最具暴力的。

欧洲在北非（以及其他地区）的殖民主义造成了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二元化，如城市的现代与本土、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与传统化。[②] 弗兰茨·法农将这种殖民状况命名为“二元论者”（Manichaean）。然而，殖民主义并不仅仅是纯粹的二元化，在某些方面还是一种隐形的剥削。然而修建高速公路、治理水坝、制造港口、筑造铁路、建修飞机场，提高并丰富了殖民主义者的兴趣，而且赋予北非有限的现代化基础设施。[③] 欧洲的公共卫生政策与干预措施减少了人口死亡率，增加了人口数量。殖民主义并不支持这种现实。考古学家、旅游人士和

---

① 扎切里·卡拉贝尔对此作如下解释：“当欧洲人在 19 世纪考察世界文化时，他们从不审视自己”（Karabell 2003，53）。他又补充说：“西方国家在全球不加抑制地扩张。他们不需要角逐于敌手文化的复杂性，但在对方看来，结果就不一样。”（ibid.，54）埃蒙德·布尔克三世（Edmund Burke III）将社会学研究与殖民时期的摩洛哥联系起来（参见 Burke 1972，175—199）。戴尔·艾克尔曼（Dale F. Eickelman）认为，摩洛哥保护国以前或早期的作品“构成了殖民地民族志研究的最佳文本。比起阿尔及利亚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研究成果质量上乘。对法语学习来说，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或者至少在原则上保存或增强了本土研究机构的力量”（Eickelman 1998，33）。在贝尔克看来，帝国主义使得受殖民者成为“历史的客体而不是历史主体”（Berque 1964b，163）。

② 这种错位与贫困化使北非民众被迫移民寻找工作。特别是在法国崛起了大马格里布社区，致使在法国产生了一个介乎北非与欧洲文化之间的混杂社会。到 1954 年，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多达 40 万人。我在结论部分认为，这些人通常被看做是疏离主流社会的社区里非常宝贵的人口。他们在战略上处于社会与文化狭缝之中，作为连接传统与遗产的桥梁，从而相互理解与交往。

③ 例如，1902 年修建的第一个阿斯旺大坝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后果。正如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所说：“通过对河岸的稳定化处理，埃及农业不仅免受洪涝与干旱的历史循环，而且沿岸地区的城市都发展起来。开罗城的重心开始从中世纪城市向东边的泛滥平原转移”（Sorkin 2001，45）。比利时城市开发人员巴龙·爱德华·昂盘（Baron Edouard Empain）负责修建开罗电气铁路以及首都北部的黑里欧波利斯城（Heliopolis）（该城最终被融入开罗城）。索尔金指出，昂盘希望“在沙漠地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城镇，这里是奢侈的度假胜地和工业基地。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埃及规划了各种类型的住房，屋内的布局基本是欧式的。这些雕梁画柱和复杂修饰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东方学者的至高境界。舒适大方的公寓住宅与今天的建筑风格颇为相似”（48—49）。

历史学家都大肆掠夺埃及与北非其他地区的文化遗产与资料（参见 Raven 1993，xxx-xxxi）。不过，他们也抢夺与收藏欧洲人创办的博物馆里的人造古物。

此外，欧洲人对北非历史遗迹的兴趣也感染了本土民众，推动167 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例如，在英国人占领埃及以前，塔赫塔维编著了前伊斯兰时代埃及史，并于1868年正式出版。此前的几十年，穆罕默德·阿里和塔赫塔维都想方设法地保护埃及文物免受外国人的掠夺（参见上文），这也标志着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初生与萌动（参见 Reid 2002）。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和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从爱国主义的理念出发，将古埃及的辉煌与国家的现代化潜能联系在一起（ibid.，119）。塔赫塔维的继承者——阿里·穆巴拉克（Ali Mubarak）、艾哈迈德·卡迈勒（Ahmad Kamal）与克劳迪亚斯·拉比卜（Claudius Labib，科普特人），都试图诉诸宣传古埃及的历史辉煌，提升埃及人的历史意识。历史相对论（Historicism）的出现成为证明殖民主义合法性与指责殖民主义的重要方式。

2005年2月23日，法国议会通过立法，呼吁教育工作者对北非的殖民主义提供积极正面的评价。这一呼吁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阿尔及利亚政府对之加以谴责。为了理解殖民主义，我们必须对之进行整体研究，包括它们的空间关系、运行方式和修饰润色。殖民主义的积极成果表现在大都市获得的经济利益，这些肯定比殖民主义或隐或现的无人道更有价值。殖民主义通过其殖民代理人、对他者的想象以及大规模的镇压等行为压制受殖民者。贝尔克认为，殖民主义者与受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神秘关系……同时，二者也是一种具有进取精神和防御性的朦胧意识的关系”（Berque 1972，70）。从诸多层面来讲，历史的歪曲与误读导致文化占有（cultural confiscation），而文化占有的破坏力等同于经济占有与政治主导。正如贝尔克所指出的

那样，帝国主义基本上破坏了民众的历史（Berque 1964b，156）。[1] 另一方面，马利克·本纳比声称，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北非殖民是伴随着北非知识分子与民众道德滑坡而产生的，最终欧洲的入侵和帝国主义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在本纳比看来，殖民主义是一种令人唾弃的可耻行为，但它也对受殖民者提供了一次新生的机会（参见 Naylor 2006a）。殖民主义的跨文化交往后果是复杂的、自相矛盾的，充满了各种冲突。

---

① 艾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在一部名为《夏天》的论文集中指出，阿尔及利亚的跨文化特性并没有必要一定体现在其历史层面："阿尔及尔人的温和与意大利人相当。奥兰的残酷与西班牙人相差无几。君士坦丁雄踞在卢美尔（Rummel）峡谷的岩石之上，使人缅怀起托莱多。但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充满着各种记忆、艺术作品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废墟……另一方面，我可以说城市是没有历史的乡镇。"（Camus 1970，143）尽管加缪作品令人羡慕，但艾哈迈德·塔利布·易卜拉欣（Ahmed Taleb Ibrahimi）批评他缺乏历史意识［Taleb（Ibrahimi）1966，76—77；关于加缪和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参见 Le Sueur 2001，87—127］。皮埃尔·克拉弗里（Pierre Claverie）最终成为后殖民时代的奥兰主教，反映了他如何在没有认识到殖民秩序的"殖民泡沫"（colonial bubble）下成长起来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使这个泡沫爆炸了"（burst the bubble）（Pérennès 2000，32）。克拉弗里在担任奥兰主教期间曾思考"我的年轻时代如同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J'ai vécu en étranger toute ma jeunesse）（ibid.，109）。正如法农在其作品中所强调的那样，殖民主义对殖民者产生了负面效果。参见 Rivet 2002。

第七章　北非的非殖民化

168　由于欧洲在北非殖民主义的不同形式，导致非殖民化的多样性。除了西班牙的（西）撒哈拉以外，到1962年北非已经完成非殖民化。[①] 然而，正如伊本·赫勒敦在导言中所提及的“表面历史”（surface history）和“内在意义”（inner meaning）的历史一样，我们仔细考察会发现，独立是一种表象的成就。殖民主义已经使北非社会错位、分裂并造成严重破坏，以至于殖民解放的程度经常是不彻底的，并预示着后独立时代的北非将困难重重，甚至出现了“后殖民时代的非殖民化”（post-colonial decolonizations）（如阿尔及利亚个案，参见第九章）。[②] 然而，殖民斗争也存在着一些共性。各种各样的本地精英吸收了舶来的欧洲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主义，突出标志就是源于伊斯兰现代主义的萨拉菲亚运动

① 西班牙的撒哈拉非殖民化将在第九章考察。它是不完全非殖民化的代表，也是后殖民时代的重要问题。

② 在贝尔克看来，殖民主义包括“剥夺”（dispossession）受殖民者的个人与自然环境（Berque 1964b，105—106）。因此，非殖民化是一个多层面重新占有的过程。他提及国家需要从殖民主义中“恢复”（recovering），需要重新发现他们的“性质”和文化（Berque 2001，2：349）。本纳比认为“殖民化”（colonization）就是“人类历史的退化”（Bennabi 1949，90）。本纳比的思想与贝尔克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思想较为相似，殖民化不仅是受到“外部”（exterior）的压迫，而且还受到“殖民化”（colonizables）、“内部”（interior）的推动。

(Salafiyya movement)。对政治精英来说，将这些个人层面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协调起来是件困难的事，经常延续到后殖民时代。因此，非殖民化并不仅仅是权力移交，它不可避免地与自我、国家与社会的再次想象联系起来。

埃及为独立而斗争

埃及的殖民情形呈现出反常的状态。尽管英国在 1882 年占领埃及，气焰嚣张地宣称要争夺非洲，但埃及实际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宣布埃及为保护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埃及在 1922 年实现了有限的独立，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936 年。直到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冲突后，埃及才从英国的殖民权利和帝国自负中解放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169

1914 年 10 月末，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为核心的集团。英国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并在 11 月初对奥斯曼帝国宣战。12 月，英国宣称埃及为自己的保护国。[①] 尽管奥斯曼帝国支持的赛努西人进攻昔兰尼加，以牵制西部阵线的部分英军力量，但奥斯曼帝国对苏伊士运河的袭击效果并不佳。英国人鼓励"阿拉伯人起义"（Arab Revolt），以劳伦斯（T. E. Lawrence）的策动最为突出。更重要的是，无数外交认知与错误知觉（1915—1916 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最有争议）造成了具有悲剧色彩的阿拉伯—犹太人（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冲突。

埃及变为英国的保护国，意味着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更为严格，其标志是军事管制和取消埃及人的政治表达权（埃及正式成为大英帝国

① 英国人认为，奥斯曼人所呼吁的吉哈德（jihad）是企图将保护国地位作为独立的必经阶段，但按照戴利（M. W. Daly）的说法，这里还存在着另一层隐秘的动机："保护国地位是战争期间的临时之举，是防止埃及滑入奥斯曼帝国范围，而不刺激埃及，以便巩固英国的控制地位。"（Daly 1998a，2：246）

的一部分)。英国人还进行强制劳工和强行招募士兵。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使埃及人对英国人的怒火更为强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现实主义，如民族自决原则，鼓舞了民族主义者的激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认同乌玛党（Umma Party）的柴鲁尔（Sa'd Zaghul）试图领导华夫脱党（Wafd）及其代表到伦敦讨论结束保护国地位问题，然后继续到巴黎呼吁埃及独立。英国人逮捕了柴鲁尔并将他囚禁在马耳他。[1] 英国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埃及人的抗议和暴乱，迫使英国人重新考虑对付柴鲁尔。“1919 年革命”给埃及人留下深刻印象，赋予他们极大的政治潜能。妇女也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中扮演了与众不同的角色，显得极有活力。[2] 据说，暴力活动夺去了约 800 名埃及人和 50 名英国人的生命。柴鲁尔无罪释放，允许先参加巴黎和会，后到伦敦讨论埃及独立问题。尽管他没有承诺让埃及独立，但柴鲁尔的民族英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英国人也知道他们必须适应埃及正在发生的变化。

正式独立

埃及国内的局势十分紧张。[3] 高级专员埃蒙德·艾伦比（Edmund Allenby）是中东民族运动的英雄，他建议英国人结束对埃及的保护国地位，与埃及构建一种新型关系。1922 年 2 月，埃及正式获得独立。[4] 170 福阿德（Fuad）苏丹担任国王，制定的宪法赋予了君主极大的权力。埃及成立了两院制的议会。上议院的二分之一议员都是经过任命产生的，下议院议员经直接选举产生。埃及还宣称：成年男子拥有普选权。

---

① 埃及的英国官员，也就是著名的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和埃蒙德·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承认需要与埃及民族主义协商并妥协，但并不是冷酷无情的英国政府的想法，后者正卷入爱尔兰的非殖民化活动。

② 关于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期埃及妇女的研究，参见 Badran 1995 and Baron 2005。

③ 英国指责柴鲁尔应为连续不断的暴力行为负责，并在 1921 年将他驱逐到塞舌尔岛，1922 年才允许回到埃及。

④ 尽管英国的存在限制了埃及的独立，但文化层面的后果也同样重要。独立“允许埃及保留最近发现的古埃及法老图坦卡门（Tutankhamun）坟墓的全部，严格控制文物出口，博物馆和文物古迹的建筑风格表现了埃及化的特点，学校强调法老历史，成立国立大学，培训埃及的古物学家、古典学者以及精通伊斯兰艺术史的专家”（Reid 2002，293）。

英国和埃及随后的协议表达了所谓的“保留要点”，即英国人保留了他们的基地、对苏丹的控制与战略交通线，以及少数族裔保护者的传统角色。然而，埃及 14 年后才明确提出了限制英国在埃及影响的规定。在此期间，君主制政权、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和英国人三种政治行为体相互竞争，不断产生冲突。1924 年，柴鲁尔担任首相。与此同时，暴力事件接连不断，包括 1924 年的暗杀苏丹总督李·斯塔克（Lee Stack. Zaghul）事件。柴鲁尔一再向国王和英国发起挑战，前者被迫辞职。他最后接受了令人尊重的下议院主席一职。[①] 1930 年，福阿德颁布了新宪法，赋予君主更多权力，但由于华夫脱党的反对，加上英国担心埃及政治不稳定所施予的双重压力，埃及于 1935 年恢复了 1923 年宪法。

1936 年，华夫脱党的穆斯塔法·纳哈斯（Mustafa al-Nahas）首相与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协商，双方最终签署了英埃新型关系协定。埃及人满怀热情地欢迎颁布新协议。尽管大英帝国保留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在运河区拥有军事基地，但该协议结束了埃及与英国签署的投降条约（1937 年的蒙特勒公约肯定了这一点），并于 1937 年呼吁将埃及并入国际联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埃及社会充满活力。[②] 1929 年，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1906—1949 年）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及非革命人士的班纳认为，埃及盲目模仿、信仰苏菲主义以及西方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欧洲化）在文化意义上是消极有害的。他特别谴责了“西方国家”的物质主义，认为是不道德的主要来源：

---

① 在阿法夫·卢特菲·萨义德·马尔索看来，柴鲁尔的政治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他将庇护人制度引入埃及政治生活，并将暴力制度和公众示威游行当做反对政敌的武器。通过独裁政治，他疏远了最有才气的智囊人员，建立一整套个人的统治规则”（Marsot 2007，102）。马尔索也意识到，柴鲁尔的政治遗产继续影响着现代埃及的政治生活。

② 参见贝尔克在 1972 年书中非常深刻的洞察，特别是《当他者看我们》一章，第 466—483 页。

西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实用性与技术知识、发现、发明以及泛滥于世界市场的机械产品——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丁点思想的火花、一丝希望、一种信仰或者给烦躁之人提供慰藉与安静的基本方法……人类已经厌倦了纯粹的物质享受，渴望精神寄托。但是，西方的物质享受仅能给他们提供带有罪恶、激情、酗酒、女人、喧闹的聚会以及他们所推崇的浮华炫耀等新型物质主义。男人的欲望与日俱增：他想解放自己的精神，破坏物质主义的禁锢，寻找并呼吸信仰和慰藉的清新空气。(Donohue and Esposito 2007, 60)

171

穆斯林兄弟会“招募成员并不仅限在宗教圈子，更多的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通常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昔日手工业行会、苏菲兄弟会和自助社团领域，发挥动员功能，从事非政治领域内的实践行为。这就是“社会反对派”(Roussillon 1998, 341)。哈桑·班纳强调了在进行现代化之前，需要恢复传统和伊斯兰价值观。

另一方面，塔哈·侯赛因（Taha Husayn，1889—1973 年）的作品举例阐述了西方化埃及人的特点。他在《埃及文化的未来》中写道：

为了捍卫我们的国家，鉴于埃及地缘处境以及反对西方入侵的目的，因此有必要采取欧洲的武器与技术。我感觉，通过这种反思先辈曾经的做法以及对现代社会需要作出反应，我们的宗教将会得到完美保存……公正地说，我不能对那些失去埃及认同的埃及人进行指责，因为我仅仅要求通过采用西方的技术和思想来保留和捍卫宗教、语言、艺术与历史。(McNeill and Waldman 1983, 421)

塔哈·侯赛因的所作所为是跨文化交往的典型特征。他认为埃及的文化遗产与个性品质是由三大因素构成的，即古代埃及文明、外来影响（特别是希腊的影响）以及阿拉伯传统（特别是其语言）（参见

Hourani 1991a，341—342）。

此外，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青年埃及运动也随势崛起，声称苏丹应该并入大埃及的范畴。青年埃及组织（Misr al-Fatat）的成员身穿“绿衬衫”，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倾向。女权主义运动也出现了。[①]胡达·萨拉威（Huda Sha ‘rawi，1878—1947 年）就是埃及女权主义的先驱。1944 年，法特马·尼马特·拉希德（Fatma Nimat Rashid）组织了埃及女权主义政党。1948 年，杜里亚·沙菲克（Durriya Shafiq）成立了尼罗河之女协会（Bint al-Nil）。另一位有影响的女性栽娜卜·安萨里（Zaynab al-Ghazali）赞同伊斯兰主义。此外，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被贝尔克称为“神圣奇迹”（a sacred wonder）和“道德表率及完美艺术家”（a moral symbol as well as a fabulous artist），其音乐与歌声震撼着整个埃及与阿拉伯世界（Berque 1964a，227；参见 Danielson 1997）。她给朝气蓬勃的埃及妇女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妇女开始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特别在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上台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172

埃及人越来越认同古代埃及。1928 年，马哈茂德·穆赫塔尔（Mahmud Mukhtar）完成其不朽的雕刻杰作“埃及复兴”，突出展示了对古埃及的推崇。法扎·海卡尔（Fayza Haikal）对雕刻做出了分析：“雕刻艺术的大小、材料以及象征主义等层面都是埃及化的体现，这一庞大的红色花岗岩雕像代表了法老文明的宏伟庄严，它耸立在一位埃及妇女雕像的旁边，后者挥舞着面纱，显示了国家的觉醒。”（Haikal 2003，175）马哈茂德·侯赛因·海卡尔（Muhammad Husayn Haykal）在其作品《文学的背叛》（*Thawrat al-Adab*）中对研究埃及古代历史的需要进行了思考：

一个国家历史的任何部分都不能从塑造其认同的整体史

---

① 欣德·纳瓦勒（Hind Nawal）于 1892 年创办了《青年妇女》（*al-Fatah*），这也是埃及第一份关于妇女的报纸。

> 中删除。正如欧洲文化的发展不能与基督教割裂一样，更不能忽视古典时代的研究，因此，埃及语言与宗教所发生的变化决不能隔断历史与现状的联系。我们在界定埃及历史特殊性的时候，毫无理由否认其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联系。(Haikal 2003，167)

银行纸币（Banknotes）、柴鲁尔的宏伟陵墓（1927）以及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的早期小说均阐明了埃及古代历史的辉煌与魅力。①

埃及阶级结构包括欧洲化的上层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就是 *effendiyya*）、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当时，埃及城市迅速增加，具有了国际化大都市的风格。再者，自 1925 年以来，埃及的小学教育强调义务教育，这与克雷默勋爵的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埃及文学方面的贡献表现在艾哈迈德·邵基（Ahmad Shawqi）、哈菲兹·易卜拉欣（Hafiz Ibrahim）、艾哈迈德·拉米（Ahmad Rami）、哈利勒·穆特兰（Khalil Mutran）和扎基·阿布·沙迪（Zaki Abu Shadi）等诗人发表的大量作品。埃及诗歌从整体上表现了浪漫情怀、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具有深刻含义的个人修辞。乌姆·库勒苏姆受到民众的追捧，其原因不仅在于她嗓音甜美，还在于她的音乐精确地表达了诗歌朗诵的某些元素，包括邵基和拉米的诗歌韵律（参见 Danielson 1997）。海卡尔（Muhammad Haykal）为阿拉伯小说引进了新型与现代的形式［*Zaynab*（1914）］。马哈茂德·泰穆尔（Mahmud Taymur）和叶海亚·哈基（Yahya Haqqi）的短篇小说以擅长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为突出特征。

农业继续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许多农民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甚至不能糊口。再者，物价波动，特别是经济危机期间的价

① 马哈福兹的《三部曲》（*Thulathiyya*）出版于 1956—1957 年，叙述了埃及内战时期的动荡岁月。

格不稳，使农民更加贫困。1920 年成立的米斯尔（Misr）银行主要资助埃及企业家，当时埃及已经无情地卷入了现代全球经济体系。贝尔克对此进行解释："埃及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来临。她通过最现代化的技术，将工人的勤劳与土地上生产的成果重新整合起来。从西方标准来看，这些成就不足为奇。拿来欧洲的机械、召集欧洲的专家，也无济于事，其缺点纯粹是数量上的问题。"（Berque 1972，343）由于地中海商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埃及人的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益颇丰（Jankowski 2000，123）。 173

正当 1936 年的英埃协定接近签订之时，法鲁克担任埃及国王（1936—1952 年）。他受到普通大众的欢迎，许多民族主义者认为他能够领导埃及走向独立。不幸的是，法鲁克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辜负了国民寄予他的厚望。当时的埃及政治上极不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战之际，皇宫宠臣伊斯梅尔·希德基（Isma'il Sidqi）和穆斯塔法·纳哈斯却在争权夺势。

北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之一，埃及深卷其中。1942 年，在欧文·隆美尔（Erwin Rommel）将军的指挥下，德意轴心国军队长驱直入埃及，距离亚历山大仅有 100 公里。被步步紧逼的英国人觉察到埃及政府有靠近轴心国的倾向，迫使法鲁克国王解除首相阿里·马希尔（Ali Mahir）的职务，取而代之以华夫脱党的穆斯塔法·纳哈斯。这次"政变"表明了英国对"独立"埃及仍具有政治影响，后者处于尴尬状态。华夫脱党与英国合作也破坏了自己民族主义者政党的名声。当时，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和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指挥下的英国军队对隆美尔发动反攻。1942 年 10 月，英国人在阿拉曼战役中大获全胜，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随着英国人将北非东部的德军驱除出境，1942 年 11 月，美国人也从北非西部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943 年，德国人在突尼斯［凯塞林山口（Kasserine Pass）］进行了猛烈抵抗后，撤出意大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埃及人经历的政治环境紧张而又

具爆发性。他们对持续进行但又不合时宜的英国军事基地感到愤恨，感到后者是对埃及国家主权的公开侮辱。再者，1948 年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在阿以军事冲突中的失败，使埃及民众疏离了法鲁克和埃及政府。有关英国人向埃及士兵提供劣质军需品的报告，更加深了公众的愤怒之情。军队中大量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加入示威群众行列。由于马哈茂德·法米·努克拉斯（Mahmud Fahmi al-Nuqrashi）暗杀埃及首相，致使 1949 年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遭暗杀。

174

由于政府领导层缺乏代理人，英国人在埃及的继续存在成了问题。问题之一就是统一后的埃及人问题。1951 年 10 月，纳哈斯再次担任首相，否决了 1936 年的英埃协定以及 1899 年英埃共管苏丹的条约。1952 年 1 月 25 日，英国军队和埃及警察发生械斗。暴力斗争一直持续到次日的“黑色星期六”（ Black Saturday），这次开罗暴乱冲突蔓延至欧洲旅游人士都喜欢的牧羊人（Shepheard）旅馆。1952 年 7 月，默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上尉领导的“自由军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及其政府。谋划了这次政变的纳赛尔是一位曾在 1948 年抵抗以色列建国的老兵。法鲁克乘着游艇，流放到异乡，本土埃及人自公元前 6 世纪以来第一次统治埃及。[①] 然而，军方接管政权也意味着埃及自由主义政治时代的结束，即埃及“不能够获得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真正独立或者经济发展”（Botman 1998，2：308）。被疏远的埃及人对“自由军官”的期望与日俱增。1954 年，纳赛尔通过高超的政治谋略架空了纳吉布，控制了政府。不久，纳赛尔就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发生对抗。

苏伊士运河危机

纳赛尔在许多方面认同穆罕默德·阿里的遗产以及伊斯梅尔加速

① 1953 年 6 月，君主制被正式废除。在波斯统治时期，埃及人也偶尔起义或临时独立。

现代化的做法，特别是修建大型公共工程，如阿斯旺大坝的项目。与帕夏和埃及总督不一样，纳赛尔放弃领土期望，并在1954年与英国签署关于苏丹的协议或优惠条件，允许苏丹在1956年独立。1954年10月，英埃协定签署，英国军队开始从苏伊士运河撤退（1956年6月），双边紧张关系得以缓和。然而，纳赛尔面对着民族主义者和其他阿拉伯人的重重压力。民族主义者认为，纳赛尔对英国太顺从了，而阿拉伯人认为纳赛尔应该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1953年，巴勒斯坦游击队从埃及控制的加沙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采取了大规模的报复性袭击，致使38名埃及人死于非命。

175

与此同时，埃及与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关系也恶化了。纳赛尔拒绝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后者是美国支持的一个中东条约组织。该组织成员包括美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其目标是遏制苏联可能带来的威胁。[①] 与此相反的是，1955年9月，纳赛尔与共产党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签署武器条约。同时，纳赛尔取消巴格达条约，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最重要的是，他于1955年4月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他与苏联进行谈判，协商让苏联资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这疏远了美国，特别让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极为恼火。1956年7月19日，华盛顿通知开罗，美国不再资助阿斯旺大坝项目。该大坝对于纳赛尔的治国理念极为重要，它既可以增加农业用地，也可以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能源。因此，1956年7月26日，为了收取运河通行费，展示埃及的独立形象，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曾经协商签署1936年英埃协定的安东尼·艾登首相筹划了报复的

---

① 巴格达条约组织或者叫中央条约组织［CENTO（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指的是1949年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1954年南亚条约组织［the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的补充。

具体计划。[①] 他找到的合作者是法国和以色列。法国之所以将纳赛尔认定为敌人，是因为后者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参见下文）。以色列将纳赛尔诽谤为一个决心破坏其新生国家的顽敌。按照结盟计划，以色列将进攻埃及并威胁运河。英、法将以保护运河为名，干预并确保占有运河。英、法、以希望借苏伊士运河危机推翻纳赛尔政权。1956年10月末，英、法、以三国对埃及发动袭击。以色列士兵横扫西奈半岛，按照预定计划，英、法以保护运河的名义，发出停火的最后通牒。以色列同意埃及人提出的条件，但埃及人拒绝并秘密支持纳赛尔。11月5日，英、法调兵遣将，袭击埃及军方阵地，夺去了塞得港。美国、苏联与联合国认为，这次行动是不合时宜的帝国主义行为。按照英、法的战略构想，英国仍然渴求控制苏伊士运河，法国也意图继续在北非实现殖民存在。然而，世界与北非正在发生着变化。7月11日，美、苏超级大国共同要求英、法接受停火，这种一致做法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同年末，英、法撤军。1957年3月，以色列人最终从埃及领土撤军。纳赛尔作为国际英雄确保了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实现了埃及的真正独立。

利比亚独立

176 1912年，意大利取得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最后一块领土。然而，意大利人在昔兰尼加仍面临着赛努西人的顽强抵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赛努西人、的黎波里塔尼亚本土部族以及奥斯曼人，迫使意大利人从内地撤退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沿海城市（参见第六章）。随后，接受奥斯曼人给养的赛努西人进攻埃及西部，迫使英国人在1916年组织反攻（参见上文）。当时，社团的“大赛努西”是萨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Sayyid Ahmad al-Sharif）。赛努西运动

① 按照艾登的建议，1936年英埃条约签署后，埃及出版了一枚印有艾登脸部的邮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登为温斯顿·丘吉尔的外交部长。他将纳赛尔等同于希特勒，这是对特定条件下埃及民族愿望的误读。按照前文提及的1954年协议规定，6月，英国军队离开基地。

失败后，萨义德·艾哈迈德（Sayyid Ahmad）开始了流亡生涯。[①] 他将社团权力委托给堂兄萨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Sayyid Muhammad Idris），后者是一位亲英分子。

1917 年，意大利与伊德里斯经过协商，双方签署阿卡拉马［Akrama（'lkrima）］协议。按照协议规定，意大利控制昔兰尼加沿海地区，而伊德里斯获得自治，控制内地（这里人口稀少、资源缺乏）。伊德里斯被承认为昔兰尼加的埃米尔。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遇到难题。当地领导人坚持要求自治，强硬对手是艾哈迈德·马拉伊德（Ahmad al-Mrayyid）和拉马丹·苏维西里［Ramadan al-Suwayhili（Sawayhli）］。[②] 战争期间，努里（Nuri）贝伊指挥下的奥斯曼人试图像埃及民族主义者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扎姆（Abd al-Rahman Azzam）那样，统一的黎波里塔尼亚。[③] 1919 年，阿扎姆对意大利人施压，声称要成立一个的黎波里塔尼亚本地首领领导下的议会。意大利官员迅速协商，与共和国领导人签署协议。意大利议会通过了“基本法”（*Legge Fondamentale*）或“法规条例”（*Statuo*），这些文本具有自由主义的成分。这些法律要求意大利人做总督，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成立省级议会和地方议会，意大利人在这些机构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自治权。法律还规定了意大利—利比亚人双重公民身份。[④] 意大利人倡导的精神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共和国解散了。然而，阿扎姆（Azzam）、哈立德·卡尔坎尼（Khalid al-Qarqanni）和奥斯曼·加尔亚尼亚（Uthman al-Gharyania）组织了国家改革党（Na-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亚境内的情况较为复杂，各种派系斗争严重。1916 年赛努西试图将影响范围和权力扩散到的黎波里塔尼亚，但被拉马丹·苏维西里的军队打败。

② 苏维西里宣布在米苏拉塔成立共和国以示独立。尽管该共和国没有得到承认，但却是 1919 年发生类似事件的预兆。

③ 阿扎姆后来成为阿盟的第一任秘书长。

④ 1919 年 6 月、10 月，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分别发布分离基本法（Separate Fundamental Laws）。吉亚卡摩·迪马蒂诺（Giacomo di Martino）总督尝试着执行这些自由化措施，目的是建立间接统治。地区不兼容以及本土国民的抱负阻止马蒂诺实施统一的殖民政策。他在 1921 年末死后，意大利政策强硬起来。但在 1922 年法西斯夺取政权之前仍采取抚慰政策。

tional Reform Party)。1920 年 10 月，伊德里斯签署了《拉贾马协议》(Rajma Agreement)，重新肯定了阿卡拉马协议中的精神，承认伊德里斯为世代相传的埃米尔。意大利人主要关心赛努西的扎维亚没有解除武装。伊德里斯认为他不可能控制赛努西教团的所有扎维亚，因为后者分散在整个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一个月后，的黎波里塔尼亚领导177 人召开盖尔扬会议，成立统一阵线，与意大利协商二者关系。

另一方面，尽管利比亚施加压力，意大利似乎不愿意执行协议(包括在罗马的直接游说)。1922 年 7 月，的黎波里塔尼亚决定对意大利施加更多压力，给伊德里斯提供担当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埃米尔的机会。作为一位勉为其难的政治领导人，伊德里斯尽可能地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11 月，他已经意识到由于宗教和民族的原因，自己除了同意外别无选择，尽管他的决定冒着疏远意大利人、与阿卡拉马和拉贾马协定发生冲突的风险。伊德里斯接受了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提议后，迅速宣布他将移民埃及，并将国家权力委托给赛努西领导者。此时，意大利人和利比亚人的关系迅速恶化。1921 年末，朱塞佩·沃尔皮（Giuseppe Volpi）总督来到利比亚，决定性地改变了意大利的政策。这时的政策除了讲和外，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了。

1922 年 10 月，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接管意大利政权，随后取消基本法。在墨索里尼看来，占领北非将会给意大利人提供经济与社会机会。他准备了一个大规模的殖民计划。但出人预料的是，组织有序的赛努西抵抗运动的指挥者是一位年长的谢赫奥马尔·穆赫塔尔（Umar al-Mukhtar)。他的领导特长是在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从事游击战。装备现代的意大利军队难以控制乡村地区，直到他们发起了一个限制游击战的战略，情况才有所改变。意大利人修建了一个大约 300 公里长的钢丝篱笆，孤立起义队伍，推进殖民征服运动(*Riconquista*)。意大利法西斯迫使当地民众放弃自己的家园，而将大家聚集到集中营（参见 Ahmida 1994，139；Ahmida 2005，43—46)。抵抗运动一直持续到奥马尔谢赫被捕才结束，后者于 1931 年 9 月审判后

被当即绞死。奥马尔死后，赛努西的抵抗活动分崩离析。[①] 利比亚人不知道司法过程的复杂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接受了“失去”土地的“赔偿金”（Abun—Nasr 1987，401）。

意大利殖民事业的主要设计师是精力充沛的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他于1915年到达利比亚。与于贝尔·利奥泰一样，巴尔博是“一位能够激发狂热忠诚和献身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Segrè 1974，84）。但与利奥泰不同的是，巴尔博渴望将利比亚北部的海岸线变成意大利的“第四海岸”(fourth shore)，作为对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和第勒尼安海的补充（ibid.，88)。[②] 巴尔博作为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法西斯分子，努力推进意大利重建罗马帝国的梦想。[③] 意大利殖民政府挖掘深井，修建高速公路、铁路以及现代化的港口设施。巴尔博想象着推进农业项目，吸引殖民主义者。1939年，意大利颁布法令，宣布利比亚是意大利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意大利发起了出乎意料的自由主义计划（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形成对比)，向所有利比亚人提供意大利国民地位，而不失去其穆斯林身份。[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约有10万意大利殖民主义者到利比亚定居。[⑤]

178

战争蹂躏了利比亚。1941年和1942年的一些战役对托布鲁克这一战略据点破坏尤甚。昔兰尼加也遭受到战争的巨大冲击，意大利苦心经营的大量殖民成果受到破坏。[⑥] 萨义德·伊德里斯支持英国人，

---

① 然而，穆赫塔尔的遗产是鼓舞人心的（参见 Nassar ad Boggero 2008，201—217)。

② 为了反映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管理，巴尔博打算让利比亚处于军人统治之下。北部地区将会与阿尔及利亚一样，融入这个国家。

③ 该计划想还原莱普提斯马格纳（Leptis Magna）和塞卜拉泰（Sabratha）的罗马考古遗址（Pitock 2005，103)。这些地点在的黎波里，最突出的遗址是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拱门（Fuller 2000，134)。巴尔博对考古学非常感兴趣（Nickerson 1968，127)。“利比亚”这一名词是该地区民众的希腊语名称（参见第一章)，殖民时期被殖民地借用。

④ 尽管殖民政府并不打算提高受殖民者的地位，赋予后者享有同等公民权和经济机会等完全公民身份，但巴尔博坚持认为文化具有敏感性，例如，在斋月期间禁止销售酒类饮料（Abun-Nasr 1987，402)。

⑤ 尽管有殖民野心，但利比亚的意大利人中仅有12%的人口直接从事农业活动（Hourani 1991a，323)。

⑥ 意大利防空部队误射并击落巴尔博乘坐的飞机，巴尔博死亡。他反对与德国联盟。

后者许诺昔兰尼加将不再归还给意大利。[①] 与此相反，大英帝国、意大利和法国在战后时期，向羽翼未丰的联合国提供了一个管理计划。按照三方建议，利比亚的三个主要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将由意大利、大英帝国和法国分别管理。联合国拒绝上述计划，并成立托管委员会，在1951年推动利比亚实现独立。[②] 萨义德·伊德里斯（Sayyid Idris）成为国王，也就是利比亚的统治者。冷战期间，他严重依靠其盟国英国和美国顾问实行统治。1953年，英国与利比亚签署20年的条约，获得利比亚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则支付了4.2亿美元，此为1954年到1971年使用惠勒斯军事基地的费用。

尽管伊德里斯国王及其政府有一部宪法，但这是一种分裂性联邦制的寡头政治。实际上，如果不“逃避”成立一个国家，那么后殖民时代的利比亚的主题就略显得犹豫不决（参见第八章；Anderson 1986 和 Vandewalle 2006）。从地缘战略视角来看，后殖民时代的利比亚曾经是一个相当无关重要的国家，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情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法国保护国获得独立

179 突尼斯和摩洛哥维持着他们有名无实的君主制和身份，忍受着法国殖民主义的糟糕统治和残酷剥削。然而，人们对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改善印象深刻，这意味着对法国利益和投资将大有益处。此外，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派遣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以及阿尔及利亚人）到战争西线（Western Front），后者以其英勇善战和敢于牺牲精神而显得杰出卓越。[③] 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保护国”强加给自己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占领利比亚。意大利居民鼓动意大利在战后恢复统治。1944年成立的反英“共和国法西斯政党”（Republican Fascist Party）党员遭到逮捕。当然，利比亚也反对意大利恢复其统治（Khadduri 1963，82）。

② 一些利比亚的民族主义组织流落在埃及，他们采取各种立场，包括支持或拒绝赛努西君主制和泛阿拉伯主义（参见 Baldinetti 2003，80—82）。

③ 德里斯·马格拉维（Driss Maghraoui）估计“约63748摩洛哥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募新兵的比例……超过男性人口的6%”（ Maghraoui 2004，7）。德国人也希望通过宣传奥斯曼人所声称的吉哈德思想煽动盟军中的穆斯林士兵开小差。然而，穆莱·优素福（Mulay Yusuf）苏丹和兄弟会支持法国，决定性地影响了新兵征募活动（（ibid.，10—16）。

的限制。民族主义被激发起来，独立运动的产生便不可避免。

突尼斯独立

保护国在其统治的前 20 年，提供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这比前殖民时代的“执政官统治”更有效率。居民部长（Resident Minister）保罗·康邦成功地管理并削减了突尼斯债务（参见第六章）。然而，尽管突尼斯人进行抗议，但保护国开放土地（1896 年的 Beylical Decree），包括将土地捐赠给宗教基金会，以及给居民大量特权和优惠待遇。保护国迫切地招募法国“黑头”（*colons*），压制意大利人口的激增。1911 年，突尼斯境内有 6.95 万人，1.78 万人是法国人，3.42 万人是意大利人。欧洲总人口从 1881 年的 1.9 万人增加到 1911 年的 14.3 万人（意大利人 8.8 万，法国人 4.6 万），1956 年的 25.5 万人（法国人 1.8 万，意大利人 6.7 万）（Nouschi 1970，313，315）。突尼斯从 1885 年发现的磷酸盐（phosphates）矿中受益匪浅，推进了橄榄工业的发展。不过，1888 年到 1900 年间，农业遭受了经济萧条的打击。

由于突尼斯人对法国征用土地感到愤怒，再加上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突尼斯民族主义迅速兴起。[①]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塔利比（Abd al-Aziz al-Tha‘alibi）的领导下，受过法国教育的“青年突尼斯派”呼吁在保护国架构之内进行改革，以及要求更多的教育和经济机会。对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的抗议，对保护国漠不关心突尼斯的抱怨，致使 1911 年突尼斯发生暴力事件（参见第六章）。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突尼斯派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机会来了。1919 年，塔利比在巴黎和会上呼吁突尼斯实现独立。与柴鲁尔一样，塔利比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在 1919—1920 年组织成立了宪政党（Destour Party），修正了民族主义的目标。宪政党认为，法国保护国破坏了突尼斯的现代化，要求重新修改 1860 年宪法。[②] 该党提出一个温和的改

180

---

① 1884—1885 年和 1903 年，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访问突尼斯。

② *Dustur* 在阿拉伯语中是宪法的意思。

革方案，不再称突尼斯无条件独立。该党也不能够动员民众，或者劝服贝伊支持自己；宪政党的领导人被捕。不过，突尼斯工人脱离法兰西联邦（French unions，法国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于1946年至1958年间结成的政治联盟，后改为法兰西共同体），并于1924年成立了突尼斯工人总联盟（the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Travailleurs Tunisiens，简称CGTT）。1926年，法国保护国当局阻止民族主义者的叛乱，采取措施限制政治活动，并限制新闻媒体的传播。

突尼斯迎来了文化上的全盛时期，首先主要反映在阿布·卡西姆·谢比比（Abu-l-Qasim al-Shabbi，1909—1934年）的诗歌艺术方面。他的抒情诗和探究性韵律已经跨越了保护国的边界。穆斯塔法·胡拉伊夫（Mustafa Khurayyif，1900—1967年）的作品歌颂了突尼斯历史；他的诗歌代表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马哈茂德·马萨迪［Mahmud al-Mas'adi（Masadi），1911—2004年］也是在非殖民化时期出现的伟大小说家。

1930年5月，圣公会（Eucharistic Congress）在迦太基召开会议，突尼斯政治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圣公会的所作所为（如修建红衣主教拉维热里的大型雕像）伤害了穆斯林的情感。现代突尼斯魅力之父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将国民大会看作是突尼斯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1934年，布尔吉巴退出宪政党，成立新的宪政党。按照洛娜·哈恩（Lorna Hahn）的说法，该党是一种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产物："新宪政党来源于穆罕默德的平等主义以及伏尔泰和卢梭的民主思想。"（Hahn 1960，19）该党主张忽视阶级和职业差别，其特点是构建一种复杂的庇护人关系网。1938年4月，突尼斯发生暴乱，布尔吉巴被捕，扣押在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将布尔吉巴派遣到意大利，希望这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能站在轴心国一边反对法国。然而，布尔吉巴拒绝并坚决支持戴高乐将军及其自由法国运动。

战争期间，突尼斯人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侯赛因家族的傀儡蒙斯夫（Munsif）贝伊出乎意料地宣布保护国将进行包括成立协商议会在

内的改革措施。法国维希政府拒绝了上述建议。蒙斯夫贝伊还要求重新定位经济发展的方向，推进内生性制造业的发展，让突尼斯民众受益。自由法国政府将蒙斯夫贝伊赶下台，以防他与“轴心国”勾结，然而其真实原因却是担心他们的民族主义纲领。突尼斯人也勇敢地参与自由法国军队。

181

战争结束后，突尼斯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合作主权（Co-sovereignty）成为运动的主要问题。1946 年，运动的活跃分子费尔哈特·阿谢德（Farhat Hached）组织成立了突尼斯总工会（General Union of Tunisian Workers，简称 UGTT），将新式的民族主义者引入日益高涨的暴力氛围。1952 年，游击队战士（*Fellaghas*）开始在突尼斯南部进行反法活动。1952 年 12 月，阿谢德被暗杀，引发了更多的抗议游行，并在整个马格里布地区产生共鸣。摩洛哥也发生罢工事件。与此同时，法国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还深深地卷入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不想再处理另一场震撼世界的殖民主义局势。1955 年 4 月 22 日，法国与布尔吉巴签署协议，同意突尼斯自治。不过，这一事件造成民族主义者内部的分裂（参见第八章）。1956 年，法国同意突尼斯完全独立。次年，落伍于时代的侯赛因王朝结束了。

摩洛哥的独立

成立保护国也不能给摩洛哥带来秩序。事实证明，这个国家利用法国的委婉方式（euphemism）难以“平息”乱局。20 世纪 20 年代初，阿卜杜勒·卡里姆［Abd al-Karim（Abdel Krim）］在摩洛哥北部击败了西班牙，宣布里夫共和国（Rif Republic）独立。[1] 最终，他在高耸的亚特拉斯山修建堡垒，袭击法军。战争期间，里夫共和国军队

① 阿卜杜·卡里姆（Abd al-Karim）在打击西班牙战争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 1921 年的安努尔（Annual）战役中战胜了西班牙军队，1.5 万人命丧此役。他用俘虏换取赎金。据阿拉勒·法西的说法，著名的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和里夫民族运动的萨拉菲（Salafi）呼吁独立，其宪法制度是“20 世纪以来所有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目标”（al-Fasi 1954，105）。阿卜杜·卡里姆提倡在里夫学校接受教育，利用西班牙战中的囚犯修筑道路和电话系统（Pennell 2003，146）。

曾经将战火蔓延到距离非斯 25 公里之内。为击败叛军，法国召集了 32.5 万军队，西班牙召集了 10 万军队，并部署飞机等装备（Abun-Nasr 1987, 381）。1926 年 5 月，阿卜杜勒·卡里姆（Abd al-Karim）投降，但摩洛哥局势仍不平静。正如威廉·霍伊辛顿所指出的那样："叛军以最公开的、引人注目和无可争辩的方式暴露了利奥泰军事思想的缺点。尽管摩洛哥人经历了与法国四十多年的谈判并受间接统治，但摩洛哥继续怨恨并抵制法国的存在。"（Hoisington 1995, 2004）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军队中的前外籍军团（Foreign Legion）仍然需要确保摩洛哥南部的安全。再者，法国利用摩洛哥历史上的竞争对手，即柏柏尔人和苏菲派抵抗苏丹国的传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

1926 年 8 月 1 日，也就是阿卜杜勒·卡里姆投降后不久，最近刚从埃及归来的、得土安的穆罕默德·贝努纳（Mohammed Bennouna）将他所感受到的埃及民族主义告诉给朋友。人们认为，这些讨论是摩洛哥独立运动的开始。诸如类似非斯的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同样的文明对话。参加者之一就是阿拉勒·法西（Allal al-Fasi），他最后成为独立党（Istiqlal）的领袖。民族主义运动另一不太确定的领导人，是在 1927 年由法国支持而上台的一位腼腆的统治者。法国挑选穆罕默德·本·优素福（Muhammad bn Yusuf, r. 1927—1961）为苏丹，后者深入简出，似乎消极被动，容易控制。

182

尽管法国保护国维持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君主制，但突尼斯的侯赛因家族几乎难以捕捉其"臣民"的想象力，这一点与摩洛哥的阿拉维家族几乎一样。阿本·纳斯尔指出："苏丹国是摩洛哥伊斯兰认同的象征。利用苏丹国作为法国控制的工具，而不是摩洛哥的穆斯林领导人向保护国妥协。这被认为是一种宗教冒犯，苏丹被认为是法国政策的牺牲品，而不是一个通敌叛国分子。"（Abun-Nasr 1987, 382）这种认知赋予苏丹国在摩洛哥非殖民化期间一种政治优势。

萨拉菲亚也影响了摩洛哥，另一个个案就是埃及在马格里布的影响。阿布·苏阿比·杜卡里（Abu Shu'ayb al-Dukkali）在埃及潜心研究多年后，接受了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思想，然后回到摩洛哥。他在

这里赢得了“马格里布阿卜杜谢赫”的绰号（参见 Berque 1974，173—176）。萨拉菲（Salafi）成立“免费学校”推进伊斯兰现代主义。他们也反对法国支持的提贾尼亚和基塔尼亚（Kittaniyya）社团。法国还资助的马拉喀什（Marrakesh）附近势力强大的柏柏尔领导人萨米·格拉维（Thami al-Glawi），后者反对阿拉维苏丹国。法国人实施分而治之政策，其代表就是柏柏尔人 1930 年的王室法令［*zahir*（*dahir*））］，后者使柏柏尔人宗教处于法国司法管辖之下。① 这是无礼之举，因为这将意味着取消了柏柏尔人穆斯林源于沙里亚的合法地位。回想起流行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时期的“柏柏尔神话”（Berber Myth）（参见 Lorcin 1995），这一法令“是基于双重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方面，柏柏尔人从种族层面接近欧洲人；另一方面，他们的伊斯兰化仅仅是表面的虚饰，与阿拉伯人难以媲美”（Hahn 1960，66）。事实上，柏柏尔人已经通过非斯协定处于苏丹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该法令激怒了投身于政治运动的摩洛哥人，推进了民族团体（The National Group）的发展。民族团体的领导人自称“扎维亚”（Zawiya，修道院小教堂）。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民族团体以民族行动集团（National Action Bloc）著称于世。 183

1930 年，穆罕默德苏丹签署了颇有争议的皇家诏令（*zahir*），但法国人惊奇地发现，他更乐意聆听代表对法令的指责与抗议。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苏丹的行动标志着年轻的君主对他们的雄心抱负充满同情。因此，民族主义者在 1934 年作巡回演讲时，组织示威游行支持苏丹。在此期间，阿拉勒·法西逐渐以杰出民族主义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他将萨拉菲派的价值观，摩洛哥的未来与苏丹国联系起来。②

---

① 在盖尔纳（Gellner）看来：“该法令激起了现代摩洛哥的民族主义”（Gellner 1969，18）。此外，也有人担心该法令是“柏柏尔人尝试皈依伊斯兰教进程中的重要措施”（ibid.，18—19）。据说，该法令与法国保护国政策“浪漫主义的真实元素”密切相关，”即“关于保留部族制度的政策”（ibid.，23—24）。

② 据法西的说法，萨拉菲亚的“目的是将改造个体作为构建完美社会的前提条件。他们意识到，运动的成功取决于对具有革新精神和批评言论的‘开放思维’”（al-Fasi 1954，114）。

1934 年，摩洛哥行动委员会（Moroccan Ation Committee，CAM，源于 Kutlat）制定了“改革计划”，这是一份长达 134 页的文件。文件列举了各种要求以及保护国应该作出的重大改变，如成立地方议会。尽管该计划没有提出摩洛哥完全独立，但它要求保护国模仿国际联盟的托管方式治理摩洛哥。[①] 它们还要求结束卡迪（*qa'ids*）的权利，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受殖民当局资助和支持的萨米・格拉维。法国政府不理会这些文件。1936 年 10 月，摩洛哥行动委员会召开会议。法国保护国经过两次会议都否决了这些计划，摩洛哥行动委员会将自己改名为“实现改革民族党”（the National Party for Realizing the Reforms）。[②] 民族党希望得到那些对现状不满、允许成立工会（突出的代表是磷酸盐矿工）的摩洛哥工人和无依无靠的破产农民的支持。1937 年，摩洛哥爆发暴力示威与抗议活动［梅克内斯（Meknès）地区尤甚］，法国殖民当局镇压、逮捕并流放了民族主义领导者。查尔斯・诺格斯（Charles Noguès）受到利奥泰的指导，增强了改革的努力强度，目标是实现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包括保护国关税自治以及结束法国的治外法保护权。他还推进灌溉工程，恢复古老的手工艺技术。而提高消费税这一措施有效地将成本转移给欧洲人（Pennell 2003，244—245；参见 Hoisington 1984，74—103，120—13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丹抵制法国维希政府要求迫害犹太人的压力，声称他的责任就是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圣书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应该受到特殊保护。当时，摩洛哥约有 40 万犹太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着陆地点。[③] 1943

184

① 在委任制度下，委任统治国需要出版关于委任统治活动的报告，其结果是国际监管和温和的“委任殖民主义”（mandate colonialism）。

② 穆罕默德・哈桑・瓦扎尼（Mohamed Hassan Ouazzani）是一个屡受挫折的民族主义精英人物（a fractured nationalist elite），他希望在民族党中扮演主要角色，也是民族行动党（Hizb al-Amal al-Watani）的奠基者。此时，民族党的重要民族主义者是艾哈迈德・贝拉弗利杰（Ahmad Belafrej）、奥马尔・阿卜杜勒－贾利勒（Omar Abdeljalil）、阿拉勒・法西和穆罕默德・法西及其妻子玛丽卡（Malika）。

③ 与马格里布地区其他人一样，服役于法国军队中的摩洛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十分勇敢（参见 Gershovich 2000，185—186，192—193）。

年，穆罕默德苏丹借卡萨布兰卡会议召开之机，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讨论摩洛哥未来的命运。很明显，双方在会议上彼此都很欣赏。据说，罗斯福支持摩洛哥自决。1944 年，摩洛哥政治精英在拉巴特组织成立独立党，流放在外地的阿拉勒·法西获得“领袖”（而不是总统）的尊号。该党党章批评了法国保护国“直接和压制性的统治”，决定“要求摩洛哥独立”（al-Fasi 1954, 217）。然而，法国当局的反对阻碍了民族主义者的发展势头。[①] 1947 年，苏丹在丹吉尔军事基地发表演讲，赞扬了摩洛哥阿拉伯人的团结精神，故意淡化与法国的联系。苏丹明显赞同独立党提出的目标，激怒了法国当局和摩洛哥盟友，主要指萨米·格拉维。

阿尔方斯·朱安（Alphonse Juin）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法国的英雄，现在是一位驻地将军。他的意图是消除苏丹的激进主义倾向。萨米·格拉维也对苏丹施加压力，后者在 1951 年宣布与政敌断绝关系，但没有具体提及独立党的名字。事后来看，这仅是一种延缓策略，因为穆罕默德苏丹于 1952 年 3 月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统写信，敦促结束保护国地位，实现摩洛哥独立。法国政府拒绝了苏丹的请求。1951—1952 年，摩洛哥国内由示威游行而发生的暴力行为遍及全国，造成几百名摩洛哥人和欧洲人死去（Pennell 2003, 160）。[②]

民族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与摩洛哥君主制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保护国及其本土盟友迫使苏丹在 1953 年 8 月退位，并将其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③] 法国认为穆罕默德苏丹是一位危险分子，后者在流放中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在此期间，身在埃及的阿拉勒·法西呼吁武装抵抗

---

① 贝尔克在 1947 年初的著作中认为“王朝渴求独立。”他认为，保护国作为行政管理机构与变化中的社会与历史现实是不相适应的——一种“合法的异国情调”（legal exoticism）（Berque 2001, 3：46）。

② 与此同时，欧洲人发现弗朗索瓦兹（Présence Françise）这个恐怖组织的打击目标是摩洛哥人，目的是保留法国人在摩洛哥的统治。

③ 按照洛娜·哈恩（Lorna Hahn）的说法，柏柏尔人在拉巴特和非斯外面示威游行或炫耀武力可能是反对穆罕默德苏丹，其原因是让他们接种疾病疫苗后才可以参加重大节日活动（Hahn 1960, 93）。

法国。穆罕默德苏丹的继承人穆罕默德·本·阿拉法（Muhammad bn Arafa）多次逃过暗杀危险。此外，民族主义者组织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法国殖民当局宣布穆罕默德立即回到摩洛哥。10 月 1 日，阿拉法宣布退位。次日，一个自称“解放军”（Liberation Army）的组织开始行动。与突尼斯非殖民化一样，法国也难以应付摩洛哥接连不断的殖民冲突，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势也陷入困境。1955 年 11 月，穆罕默德回到摩洛哥。萨米·格拉维极力展示自己的顺从，亲吻苏丹的脚。1956 年 3 月 2 日，摩洛哥实现独立，穆罕默德苏丹担任国王，即穆罕默德五世。

185

阿尔及利亚为独立而斗争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事迹既悲壮又充满英雄气概。尽管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并不相邻，但它是法国的一部分，就如同阿拉斯加是美国的一部分一样。这种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的心理隔代相传，给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增加了变量。阿尔及利亚人不仅不得不从法国的控制下解放自己，而且还必须从殖民主义的心理共存（psychoexistential）的状态下解放自己（参见第五章）——这是一种自卑、缺乏身份认同的感觉。弗兰茨·法农将一般意义上的去殖民化与“真正地创造新人”联系起来（Fanon 1968，36）。

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

与“青年突尼斯人”一样，“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也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现代化人士。他们都是浸染了法国教育的精英（*évolués*）。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他们指出，在官员们看来，法国思想与法国殖民主义的矛盾性直接游说了巴黎人。他们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取消豁免特权以及司法制裁权。他们呼吁拓宽教育渠道，享受法国公民的特权。另一方面，一些保守的穆斯林领导人被其批评者斥责为“陈旧的裹头布”（Vieux Turbans）。他们拒绝殖民主义，早在 20 世纪初就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利凡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引入了 12 万阿尔及利亚人充实法国工厂，替换了奔赴西线的工人。此外，有 2.5 万阿尔及利亚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这些人的献身精神鼓舞着乔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制定改革措施，推进阿尔及利亚人通过获取公民权参与政府构建和社会治理。由于欧洲居民的强力抵制，使得仅有的改变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例如，尽管 1919 年的公民权法（Jonnart Law）使得居民地位无懈可击，但土著法（Code de l'Indigénat）执行的较为温和，殖民者担负的特殊责任减少了，在地方议会的代表增加了。

186 由于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身份，也不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服役提供报酬，激起了哈立德（Khaled）埃米尔的愤怒，他是著名的老兵阿卜杜拉·卡迪尔的外孙。他提出一些较激进的改革建议，包括殖民议会的平等代表权（equal representation）、用阿拉伯语和法语进行义务教育、公民身份不损失穆斯林地位。哈立德不仅仅要求同化作用，还要求民主化——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激进的改革，潜台词是结束殖民主义。1923 年，法国殖民当局驱逐了哈立德。

哈立德离开后，阿尔及利亚出现了三股重要的民族主义者倾向。[1] 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在与国际共产主义进行短暂的意识形态交流后，呼吁完全独立，主张泛阿拉伯主义；费尔哈特·阿拔斯（Ferhat Abbas）呼吁融入法国，同法国和解；谢赫阿卜杜勒·哈米德·本·巴迪斯（Abd al-Hamid Ben Badis），深受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以及萨拉菲亚运动的影响，鼓励穆斯林价值观和阿拉伯语言的复兴。谢赫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民族主义者。1936 年召开的穆斯林大会推动法国政府采取了最重要的举措——布鲁姆－维奥莱特立法（the Blum-Viollette legislation）。该法令于 1936 年提出，其目标是为大约 2 万阿尔及利亚人提供法国公民身份，而不丧失穆斯林身份。殖民主义者阻止将该法

① 尽管看似简单，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与北非其他国家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复杂且竞争性强，他们试图选出代表性的权威政府和可靠的国家机构。参见 McDougall 2006。

令提交到国民议会（the National Assembly）。这一令人失望的表现使民众对费尔哈特·阿拔斯的幻想破灭了。

1943 年 2 月，阿拔斯发布了阿尔及利亚民众宣言，呼吁阿尔及利亚自治。1944 年 3 月，自由法国领导人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提议通过如下法令，即授予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公民地位，而不剥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民族主义者认为，从政治层面来说，戴高乐的做法不合时宜（anachronistic）。阿拔斯随后通过动员自由宣言友好协会［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Manifesto and of Liberty（AML）］试图将民族主义运动统一起来。1945 年 3 月，自由宣言友好协会选择梅萨利·哈吉为其领导人。法国政府宣布放弃梅萨利计划。这一决定引发了导致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重大事件之一——塞提夫暴动（the Sétif riots）。1945 年 5 月，欧洲国家在塞提夫和盖勒马（Guelma）举行会议，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阿尔及利亚人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引发了大规模暴力以及对殖民者的报复行为（估计死了 5 000 到 1 万人）。[①] 殖民主义者的残忍暴行深刻影响了焦躁不安的青年精英。

187 阿尔及利亚人疏离法国的殖民情绪随着 1947 年机构改革法令而变得更为激烈，后者的特点是以固定选举法平息民族主义者的不同声音。1947 年，特殊组织［Special Organization（OS）］与梅萨利新成立的政党“民主自由胜利运动”（Movement for the Triumph of Democratic Liberties）相联系，发起了一场准军事运动。[②] 1950 年，殖民当局警察解散了特殊组织，其领导人被逮捕，但部分成员在 1953 年加入统一和行动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ittee for Unity and Action，CRUA］。随后几年，部分成员又成为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LN）］的成员。

① 其他人估计，死亡人数在 1.5 万和 2 万之间。欧洲人死亡 13 人。

② “民主自由胜利运动”经常指 PPA/MTLD 或 MTLD/PPA。阿尔及利亚平民党［The Parti du Peuple Algérien（PPA）］是一个被法国在 1939 年禁止的梅萨利（Messalist）政党。

解放战争

1954 年 11 月 1 日，民族解放阵线宣布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开始。据现有档案证明，桀骜不驯的民族解放阵线认为独立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尽管民族解放阵线内部经历了兄弟阋墙以及带有悲情色彩的自相残杀，但最终仍维持了团结。民族解放阵线发布文告，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解放斗争国际化。尽管法国军队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采取了有效的镇压行动，但民族解放阵线的分支——民族解放军［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ALN）］不断对法国构成威胁。

战争始于 195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一般而言，法国政府采取军事解决方式，但忽视了社会和经济问题。1955 年，总督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将军提出“整合思想”（the idea of “integration”）的想法，该思想要求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无条件地从政治、经济层面整合在一起。苏斯戴尔希望，该政策将会无可置疑地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联系在一起。但这也意味着民主化会使北非法国居民（*pieds-noirs*）大吃一惊。1955 年 8 月，民族解放军在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也就是今天的斯基克达（Skikda）］犯下暴行。苏斯戴尔被这次残忍暴行震惊了，于是允许法国人在“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的基础上毫无差别地采取报复行动。法国的报复疏远了诸如费尔哈特·阿拔斯之流的温和派穆斯林，许多人投入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怀抱。

1956 年 8 月，民族解放阵线召开苏马姆会议（Soummam Conference），提出了一个行政改革与战时策略。与会者决定在阿尔及尔发起城市游击战（urban guerrilla campaign）。这些人采取恐怖手段，包括让有魅力的阿尔及利亚妇女乔装改扮为欧洲人。民选政府将权力移交给军方，如雅克·马苏（Jacques Massu）将军的伞兵队。法国政府的审讯人员通过严刑拷打俘虏的方式，获取民族解放阵线组织与行动信息。尽管法国在 1956—1957 年战争中获胜，但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实施的严刑逼供等残暴行为被公之于世，结果为民族解放阵线实现重要 188

目标——冲突的国际化奠定基础。

然而，到 1957 年末，民族解放阵线内部产生严重分裂。该组织的一些奠基者，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领袖”或被杀或被捕。随后，拉姆丹·阿班（Ramdane Abane）在苏马姆会议上主张成立强有力的领导层（strong leadership），但他的文官控制军队的主张疏远了民族解放军。他还提倡“内部”优先的原则，即政府和军队的精英应该来自阿尔及利亚国内，且数量超过来自国外的政治精英。1957 年，阿班作为内部斗争的牺牲品被杀。此外，民族解放阵线还逐步消除竞争对手。1957 年 5 月，梅萨利·哈吉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Algerian National Mouvement（MNA）］在梅洛扎大屠杀（Mélouza massacre）中遭受重创。[①] 尽管民族解放阵线内部派系横行，但最终保留下来。

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过程中，邻国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并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避难所和武装供应。例如，1956 年 10 月，穆罕默德五世国王提供飞机，将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运送到开罗参加会议，但法国采取劫机行动，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抗议。法国还沿着突尼斯边界构建了“莫利塞路线”（Morice Line），阻止民族解放军的士兵渗透。法国军队轰炸突尼斯乡村［Saqiyat（Sakiet）Sidi Youssef］，致使英美外交干预并修复突尼斯和法国的关系。[②] 出于对国际社会干预的担心，具有政治倾向的法国军队恼羞成怒，他们担心自己重蹈 1940 年在法国本土和 1954 年印度支那遭受屈辱性失败的历史。[③] 更糟的是，法国人构想的与民族解放阵线协商谈判的军事思想没有被接受。

---

① 1954 年 12 月，梅萨利·哈吉成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和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相互竞争并发生冲突。休·罗伯特（Hugh Roberts）曾提及民族解放阵线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为了民族主义目标而进行斗争的政治运动，该组织从一开始就与阿尔及利亚昔日存在的政治组织意见不一，前者试图挫败或者除掉后者”（Roberts 1993，118）。

② 马格里布的殖民主义者与穆罕默德苏丹和罗斯福总统私下会见，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入侵北非，具有前民族主义的性质。

③ 简·尼克森（Jane S. Nickerson）声明，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的另一后果是：“1954 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越南独立同盟（Viet Minh）释放的 2.8 万战俘中，三分之二是北非人。他们回到家乡后，不仅记忆着法国令人羞耻的大溃败，而且被彻底灌输了共产主义原则。”（Nickerson 1968，133—134）

1958 年 5 月，法国军队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接管了阿尔及尔。他们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并呼吁戴高乐上台执政。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挽救了法国的荣誉，许多阿尔及利亚士兵为法国而战。随着文官在第四共和国地位的下降，戴高乐的地位上升。首先，得到军队支持的戴高乐寻求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有利地位，以确保权力稳固。1958 年 10 月，戴高乐宣布君士坦丁计划（Constantine Plan），呼吁对阿尔及利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撒哈拉地区碳氢的发现更加推动了改革的步伐。他的主要目标是让法国留在阿尔及利亚。随着艰难岁月的到来，戴高乐不得不重新界定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存在的性质。

189

1958 年 9 月，民族解放阵线成立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Algerian Republic（GPRA）］，选举费尔哈特·阿拔斯为总统。临时政府拒绝 1958 年 10 月戴高乐提出的名为“勇敢和平”（Peace of the Brave）的停火建议，以及在法国社区内为阿尔及利亚人设定的“特殊区域”（special place）。1959 年 9 月，戴高乐在电视上发表演讲，宣布法国政府将采取民族自决原则。1960 年 1 月，失望的北非法国居民设置重重障碍，但戴高乐通过花言巧语避免了内乱。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莫里斯·沙勒（Maurice Challe）将军的指挥下，有效地动用空军（通过直升战机调派军队），极大地削弱了民族解放组织的力量。1960 年 6 月，戴高乐开始邀请民族解放阵线代表谈判。7 月，谈判会议在巴黎郊外的莫伦（Melun）举行。11 月，戴高乐大声呼喊“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北非的法国居民和某些官员也放弃了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思想。12 月，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支持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的全民投票，但他发现是受殖民者而不是法国移民欢迎他。两类社区之间的暴力行为接连发生。

很明显，现在戴高乐的政策就是去殖民化，他曾在 1961 年 4 月的电视演讲中提及这一观点。4 月，包括沙勒在内的四个将军在阿尔及尔发动叛乱，反对戴高乐政府。这次叛乱的结果与 1958 年的那次不

同。戴高乐呼吁军队向法国政府保持忠诚，大多数人遵从他的命令。沙勒和安德烈·泽勒（André Zeller）投降，拉乌尔·萨郎（Raoul Salan）和埃德蒙·茹奥（Edmond Jouhaud）加入了反对派秘密军事组织[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OAS）]，妄想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存在，但这仅是徒劳之举。

埃维昂协议与权力移交

190 1961年5月，民族解放阵线与法国政府在埃维昂地区举行谈判。一个月后，双方谈判出现分歧：一是撒哈拉地区主权问题，法国认为撒哈拉不是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二是移民社区在未来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随后，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爆发。标志性事件是：1961年10月，法国政府对在巴黎举行抗议活动的移民工人进行残酷镇压，200多人丧生。

1962年2月，谈判在靠近瑞士侏罗山的莱雷鲁斯（Les Rousses）地区重新开始，最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3月，双方在埃维昂进行最终谈判。随后的埃维昂协议规定：两国停火，阿尔及利亚实现政治独立，通过“合作”的方式保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法国仍然控制着撒哈拉的碳氢场地和临时军事基地，同意继续提供大量的社会与经济援助。三年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必须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公民身份之间做出抉择。

与此同时，秘密军事组织采取焦土政策，进行恐怖主义袭击活动。著名的卡尔拜小说家穆卢德·费拉恩（Mouloud Feraoun）惨死于这次袭击。民族解放军对北非的法国居民采取报复行动。面对充满恐怖的生存环境，北非的法国居民抛弃了大量的土地和财产，逃离阿尔及利亚。法国政府希望他们“回到祖国”，但并没有预料到约80%的欧洲移民将立即归来——约80万居民。后勤保障一度出现严重问题。6月，秘密军事组织和民族解放阵线签署协议，结束敌对状态，但这些居民仍继续源源不断地离开阿尔及利亚。7月3日，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两天后，阿尔及利亚官方宣布民族解放，这一天距离法

国占领阿尔及尔已经132年。

但是由谁来掌控政府呢？民族解放阵线与民族解放军之间的"内外力量"分歧逐渐加大。战争期间，法国封锁和孤立阿尔及利亚的国外力量，他们主要聚集并受训于突尼斯和摩洛哥。战争结束后，他们长驱直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首领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反对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并站在发动劫机事件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的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的一边。他们成立了政治局。1961年8月，本约瑟夫·本赫达（Ben Youssef Ben Khedda）接替费尔哈特·阿拔斯，成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主席。冲突随后在游击队内部和外来力量之间展开。内战已经若隐若现，但阿尔及利亚总工会［General Union of Algerian Workers（UGTA）］组织大规模抗议，阻止自相残杀。1962年9月，鉴于政治局突出的军事实力，本贝拉成为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理。

191

布迈丁一再声称阿尔及利亚人解放战争损失了1500万人的生命；戴维·戈登（David C. Gordon）认为死亡人数是100万（Gordon 1966，84）；本杰明·斯多拉（Benjamin Stora）认为死亡人数为50万（Stora 2001，111）；曾经参与埃维昂协议的贝勒卡西姆·克里姆（Belkacem Krim）认为死亡人数达30万（Horne 1987，538）。但这些人都认为阿尔及利亚人为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族解放阵线战时议会（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召开）也承认，埃维昂协议的新殖民主义条款表明，尽管阿尔及利亚获得解放，但非殖民化并没有彻底完成。

结论

北非的非殖民化不仅重新解读了受殖民国家的政治地位，而且重新解读了殖民者的政治地位。大英帝国失去了苏伊士运河，结束了殖民时代，推进其非洲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留利比亚的希望也遭受挫败。摩洛哥和突尼斯保护国的非殖民

化以及失去阿尔及利亚，标志着法国地位的下降。然而，在戴高乐等人看来，非殖民化代表了法国获得重新定位的机会，并将其政策与变动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应该牢记的重要事件是，相对北非宏大的历史流变来说，殖民主义仅仅是短暂的瞬间。然而，殖民主义经验非常丰富，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意义产生深刻影响。[①]

非殖民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将欧洲人从北非驱逐出去，而意味着如何处理输入的意识形态以及将现代化与解放协调起来（参见 Berque 2001，3：149）。在北非人看来，非殖民化也包括相应而生的个人身份与民族认同问题。贝尔克和本纳比都理解“内部力量”在非殖民斗争中的重要性。正如贝尔克所体察的那样，后殖民的悖论在于，前殖民 192 “将自我从他者那里解放出来，他对他者充满愤恨，但发现他者已经深深影响着自我”（Berque 1964b，170）。他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如习惯、语言、衣着，甚至烹饪。本纳比断言：“将自我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更有必要将自我从其事业——开拓殖民地（colonizability）中解放出来。”（Bennabi 1954，81）[②] 各种困扰问题一直存在。欧洲人的离开真的结束了殖民主义了吗？联系到本纳比的思想，“后殖民人类”仍然“能够殖民吗”？

---

① 殖民主义的持久影响在后殖民时期昔日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关系的重塑上起着重要作用。关于阿尔及利亚，参见 Stora 1991、Naylor 2000a、Ruedy 2005 和 Lorcin 2006。

② 本纳比在有关后殖民时期的著作中写道：“最革命的行为是非殖民化与人类本身。”（Bennabi 1989，44）阿卜杜勒－克比尔·哈提比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这种诉求和理性中心的修辞，并得出结论：“阿拉伯社会学”需要非殖民化和解构（参见 Khatibi 1985）。

第八章　后殖民时代和当代北非
——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

权力移交和国家独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就。然而，后殖 193 民时代北非国家在诸多层面面临着挑战。政治动荡、经济飘摇以及社会失序销蚀着这些发展中国家。此外，关于伊斯兰和现代化的文化层面命题也在后殖民时代的北非变得日益突出。很明显，北非国家很有必要恢复国家主权和国家构建。上述命题在当代社会成为迫在眉睫的必要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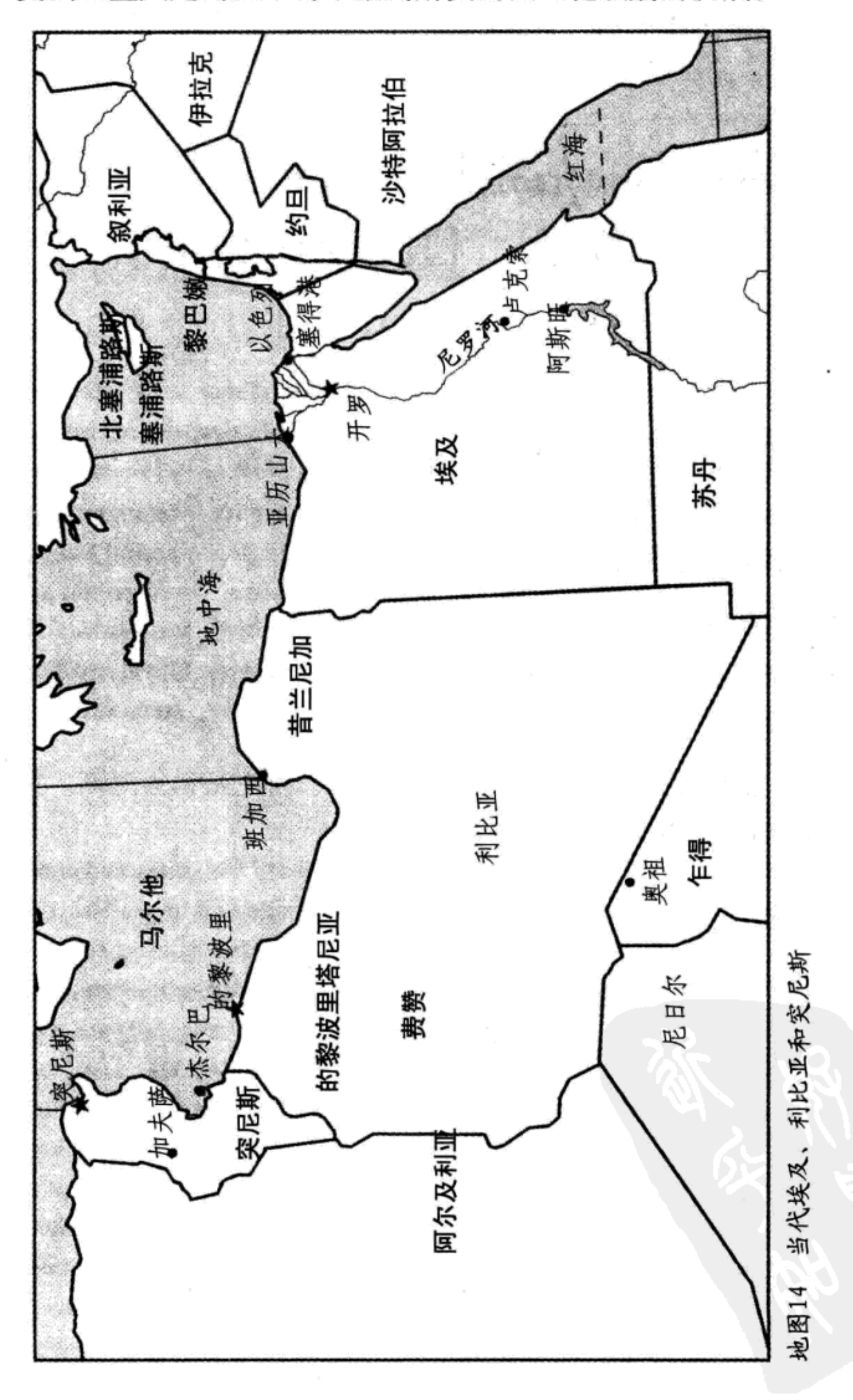
本章主要考察后殖民时代与当代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第九章继续考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撒哈拉。

埃及

埃及的后殖民时代始于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56年冲突之后，这被认为是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行动。埃及击退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赢得超级大国的支持，最终掌控苏伊士运河，实现了国家独立。埃及的成功在阿拉伯世界和浮现中的第三世界引起共鸣。埃及的影响及其泛阿拉伯意识形态深深鼓舞了革命中的阿尔及利亚——埃及是现代跨文化交往的典型个案。埃及后殖民时代的主要行为表现在：与以色列频繁战争、镇压国内的异己分子和激进伊斯兰分子。从经济层面来说，埃及不能集中资源或者为多产的人口——现在约（或者超

过）8000 万提供就业机会。预期到 2020 年，埃及人口达到 1 亿（UN 2002，37），埃及越来越依靠外部援助。独裁主义政府在后殖民时代的遗产受到日益兴起的且不得不最终解决的民主化预期的挑战。

195



地图14 当代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

由于埃及历史悠久的地缘政治地位，其解决之道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北非和整个世界。

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纳赛尔：从辉煌到没落

纳赛尔声誉的飙升主要源于他成功地处理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他热衷于将阿拉伯人统一起来的泛阿拉伯主义付诸实践，其结果是1958年到1960年间叙利亚和埃及短暂联合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他将埃及民族主义和自己标榜的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称为“纳赛尔主义”。这一思想深深吸引着后殖民时代北非和阿拉伯世界日益崛起的政治精英。[1] 然而，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联合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埃及主导的行政当局疏远了叙利亚人。再者，纳赛尔主义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国家垄断财产）导致了多种后果。令人钦佩的土地改革将大量财富重新分配，但并没有威胁财产所有权。除了修建阿斯旺大坝（官方始于1971年）工程值得称道外，其他工业项目都踯躅不前。苏联积极参与埃及发展项目，特别是阿斯旺大坝，共产主义开始出现在非洲大陆和地中海——这也是美国战略短视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允许言论、出版自由，但他在20世纪60年代加强了国家审查制度。纳赛尔政府解散诸如华夫脱等反对党，剥夺了他们表达不同声音的权利。阿法夫·卢特菲·萨义德·马尔索对这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进行深入思考，认为埃及人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外族控制后，实现自我统治，但公众却对新政权保持疏离的态度，“因为1952年后成立的新政府极不稳定，不能实施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因此采取了威权政治和压制性的统治方式，其结果就是该政府仅能代表既得利益集团，难以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Marsot 2007，ix）。

穆斯林兄弟会也是纳赛尔崛起于政坛的强有力对手，据说他们支

---

① 高涨的民族主义使埃及的外国社区处于孤立状态。民族主义还增强了对他者的刻板印象。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埃及政府将外国人驱逐出境，而其他国家则凭这些人自己的意愿离开（参见 Marsot 2007，137）。外国社区的消失也意味着具有重要意义的跨文化交往的结束。

持纳吉布将军。1954 年，穆斯林兄弟会因暗杀纳赛尔而遭受镇压。20 世纪最有影响的伊斯兰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萨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因坚持伊斯兰革命而被捕。他将这段时间称为“20 世纪的蒙昧时代”（jahiliyya），暗示着那些声称维护穆斯林价值观的威权政治国家的非法性与不合逻辑（Roussillon 1998，342）。“蒙昧时代”指的是穆罕默德接受伊斯兰天启之前那段愚昧无知、异端盛行的特殊历史时代。然而，库特卜认为现代伊斯兰教仍然处于蒙昧时代。他声称：“我们被蒙昧时代所包围。其实质与伊斯兰教第一时代相类似，或许更加顽固。我们的周遭环境、民众信仰与思想、习俗与艺术、规则与法律都具有蒙昧时代的特征。”① 联想到萨拉菲亚的原则，他指出：“我们必须正本清源，规范指导原则、免除其他因素的污染……我们的生活构想、政治经济治理原则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来自《古兰经》。”他赞同积极、具有攻击性和防御性的吉哈德：“伊斯兰教中吉哈德的目的是，通过将全世界人类从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侍奉安拉（Rubin and Rubin 2002，30—31）。”他坚持并绝对地认为，外国人的影响像毒药一样破坏着整个穆斯林社会，并吸引了一大批国际伊斯兰激进主义者。② 1966 年 8 月，库特卜被处死。1967 年，大灾难重创了埃及并席卷了阿拉伯世界。

196

纳赛尔对以色列的敌意既深刻又带有个人色彩（可以追溯到 1948

---

① 库特卜阐述道：“蒙昧时代是以反抗真主主权为基础的。真主主权交给那些认同真主的伟大人物，从而使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尊贵。真主主权并不是古代蒙昧时代简朴、原始的形式，而是那种有权创造价值观、对集体行为立法定规，选择与人类相关的生活方式，而不考虑真主的启示”（Qutb n. d.，11）。他声称：“任何社会都是蒙昧时代（jahili），即并不仅仅屈服于真主，屈服于信仰和思想，遵守礼拜仪式，服从法律规则。”库特卜得出的结论是：“按照这种说法，今天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社会都是蒙昧社会。”（ibid.，80）他将穆斯林社会、犹太人社会和基督徒社会都归于蒙昧时代，“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以服从真主为基础。尽管他们信主独一，但他们将属于真主的立法权交给其他人，服从于他的权威，从这个权威衍生出他们的制度、传统和习俗、法律、价值观和标准，几乎涉及民众生活的各个实践”（ibid.，82—83）。

② 本纳比并不属于他们的行列。实际上，库特卜主张，本纳比受到他殖民经历的深刻影响（参见 Christelow 1992，69—70）。引自 *Jalons sur la route de l'Islam* [（Ma ‘alim fi al-tariq）（Paris，1968），91—92]。

年他亲历的巴勒斯坦战争)。他的反对以演讲尖酸刻薄、雄辩有力，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以色列和叙利亚发生激烈的边界冲突，纳赛尔因没有支持阿拉伯兄弟而广受批评。纳赛尔不想履行诺言，却被以色列的回应严重误导。他迫使联合国维和部队从埃以边界线后退，封锁蒂朗海峡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口，这是一个好战的举动。[①]阿拉伯军队在边界线附近进行战争动员和聚集，而焦躁不安的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袭击。以色列意识到埃及是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破坏了仍在地面整装待发的埃及空军。与此同时，以色列装甲部队横扫整个西奈半岛。到战争结束之时，以色列已经接管了西奈半岛，占领苏伊士运河沿岸。埃及盟友也损失了大量领土。[②]纳赛尔请求辞职，但遭到拒绝。在随后的三年，他面临着阿拉伯世界分裂的痛苦。1964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巴解组织，PLO）正式成立，得到纳赛尔的支持。1967 年大溃败后，侯赛因国王及其政府意识到巴解组织在约旦从事破坏活动，担心后者推翻自己的君主制政权。解决这种威胁的方式就是“黑九月事件”（Black September)，巴勒斯坦和约旦发生激烈的内斗。1970 年，年弱体衰的纳赛尔设法结束了这场悲剧。尽管纳赛尔极尽全力并成功地承担了调解员的角色，但他也积劳成疾，并最终死于心脏病。纳赛尔之死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纳赛尔采用镇压的方式进行统治，显得残酷无情。然而，他的魅力（charisma）使他的统治声名卓著，富有感召力。马尔索指出：“他的口号是‘我们都是纳赛尔’，并在民众心中激起波澜……他是埃及人唯一的统治者，为穷苦大众做了许多好事。他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提高了成千上万埃及人的生活水准。直到今日，这些人仍对纳赛尔大加赞誉。”(Marsot 2007，153—154)。他的继承者由于缺乏敏锐的政治灵感度和社会灵活感，遭受了致命的失败。

197

---

① 以色列坚持认为，联合国紧急部队仅能驻扎在埃及边界。马尔索认为纳赛尔的行为是“愚弄之举”（Marsot 2007，147）。

② 叙利亚丢失了具有战略地位的戈兰高地，耶路撒冷东部以及约旦河西岸。

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冒险政策

纳赛尔的长期助手、“自由军官”的伙伴、时任副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执掌政权。观察家发现，评估萨达特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纳赛尔控制埃及政坛长达几十年。然而，萨达特是一个爱冒险的人，也是一位空想家，追求一种冒险政策。1971 年宪法替换了 1956 年宪法，埃及官方名称也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改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Arab Republic of Egypt）。其首要目标是对抗以色列，夺取并占有西奈半岛。自 1967 年以来，埃及与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沿岸进行着低水平的冲突，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如突击队员发动袭击或者互射炮火。萨达特希望突破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巴列夫防线（Bar-Lev Line）。

为完成这一目标，萨达特急需获得国民的支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①] 他意识到伊斯兰激进主义疏离自己，便想法设法提升自己作为穆斯林的政治形象与公众形象。他虔诚地带头做周五的祈祷，并放松国家的各项限制。他还运用各种策略击败对手，确保国家安全。1972 年，他通知苏联技术人员、官员以及顾问，埃及不需要他们的服务。[②] 这一决定得到公众的认可，因为这代表了国家自我依赖以及不受外国人控制的行动。萨达特恢复埃及与叙利亚的盟友关系，并筹划发动一场战争收回失去的领土，以雪 1967 年失败之耻。

198

1973 年 10 月，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震惊整个以色列。埃及空军有效的防御能力已经预料到以色列空军的反应。与此同时，叙利亚军队从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腹背受敌。[③] 美国匆匆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供应，苏联提出抗议。战争的威胁日益扩大，并导致超级大国

---

① 萨达特被民族主义深深吸引，1971 年的埃及宪法发出这一信号。新宪法替换了 1956 年的埃及宪法，埃及官方名称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② 萨达特的行为与其 1971 年签署的友好协定相矛盾。

③ 尽管埃及和叙利亚都是阿拉伯世界的好战多事者，但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苏丹也提供军队和物资。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提供财政援助。

卷入其中。以色列逐渐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美国源源不断的后勤援助改变了以色列军队的劣势地位。以色列军力恢复，局势发生变化。以色列军队运用战略击败埃及人，跨越苏伊士运河，威胁尼罗河三角洲。满足于战争初期取胜的萨达特，开始担心以色列军队突破尼罗河，于是接受停火要求。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各国进行“穿梭外交”，致力于恢复和平。基辛格还积极推进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接触，随后双方签署脱离接触协议（disengagement agreements）。

尽管埃及处于失败的边缘，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发动反攻，但萨达特认为埃及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埃及军队表现得确实很出色，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他们希望收复更多的领土，并不仅仅满足于苏伊士运河东岸地带。另一方面，基辛格和萨达特的对话显得更亲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忱对话。美国与埃及关系在纳赛尔统治时期几乎破裂，但在萨达特时期大为改善。萨达特希望美国人和欧洲人到埃及投资，这是战后“开放型经济”（*infitah*）与自由化政策的基本需要。再者，埃及总统迫不及待地希望以色列对埃及的态度有所改变。他的结论是：再发动一场战争显得太危险了，并意识到公众日益高涨的不安情绪，他又采取了一次冒险行动。

得知埃及总统有意访问以色列并发起一项和平倡议，以色列人震惊了。1977 年 11 月，萨达特到达以色列，表现了他的魅力和决心。他希望收回西奈半岛，也乐意为之进行协商。随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鼓励并推动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的对话进程，其最终成果就是 1978 年的戴维营框架协议。该协议制定了一条中东和平进程的路线图，其核心是巴以关系。第二个协议是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双边和平协议。1979 年 3 月，两国正式签署双边和平协定。以色列军队从西奈半岛分阶段撤退，并互派大使（外交上承认）。协定的附件规定，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协商。然而，由于以色列的不妥协和阿拉伯人对协定的反应，附件倡议胎死腹中。包括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坚定阵线”（Front of Steadfastness）均谴责埃及对以色列的外交。埃及被阿盟除名，前者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立的

199

阿盟中起着重要作用（阿盟的两次会议均在埃及召开，即1944年的亚历山大会议和1945年的开罗会议）。阿盟总部也从开罗迁往突尼斯。阿拉伯国家相继与埃及断交，萨达特陷于孤立。实际上，萨达特对以色列的政策也疏远了许多埃及人，尽管大多数埃及人对和平前景抱有希望。

在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看来，萨达特向美国和西欧国家示好，与以色列缓和关系，无异于总统毒害了民众。埃及经济也陷入危机，“开放经济”并没有吸引大量的国外投资。[①] 但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的重新开放以及西奈半岛油田的恢复生产，使埃及经济受益匪浅。[②]（居住在国外埃及人的侨汇也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经济增长并不均匀，消费至上的理念（consumerism）扩大了阶级差别，而这一切通过反对派的字斟句酌成为政治斗争的口实。[③] 萨达特在国际层面为自己构建一个自由主义形象的同时，其对内政策则是对日益蔓延的伊斯兰主义和对政治反对派进行无情镇压。1981年，萨达特在庆祝1973年十月战争的阅兵仪式上遭伊斯兰激进分子枪杀。[④] 世人都为这位冒险人士与和平缔造者哀悼，但也纳闷为什么埃及人不能接受这种不幸。

---

① 阿兰·鲁西荣（Alain Roussillon）考察了“发展心理学倡导者”（developmentalists）的历史模式，即穆罕默德·阿里、纳赛尔、伊斯梅尔和萨达特，他们都“背叛或扭曲他们前辈的……意志，牺牲了公共利益。埃及独立于投机者和不知廉耻的重商主义利益，他们也是外国人渗透的楔子”（Roussillon 1998，2：334—336）。鲁西荣发现，这种模式“过分简单”（simplistic），并得出如下结论：“在这种模式的逻辑结构之内，‘理解埃及’——撰写历史、描述其社会或政治制度，并解读当下的意识形态——包括突出强调与江河和沙漠之间长期、准循环的连续关系，同时显示地形如何突变，表面上的变化还是内在的变动，最终产生了长期历史的规律——语言变化、宗教皈依以及异邦统治——重新构建了历史连续性的意义。”（ibid.，2：336）从我们解释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历史重现是对埃及沉积史的简单剖析。

② 1975年，埃及共收取1亿美元，1980年，增加到7亿美元（IMF 2007a，8）。

③ 按照贾拉勒·阿明（Galal Amin）的观点，1952年革命通过改变埃及经济及其教育制度，使埃及社会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件事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社会流变”（social mobility），其影响具有革命意义。阿明认为，社会流变表明中产阶级的崛起，女性参与社会的重要意义，也是埃及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参见Amin 2000）。

④ 两个激进伊斯兰组织即贾尔玛伊斯兰委员会［Jama‘at Islamiyya（Gemaa Islamiyyah）］和伊斯兰吉哈德（Islamic Jihad）谋划并导致萨达特之死。

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与寻求稳定

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接管政府并掌权。尽管埃及与以色列关系紧张，但二者仍维持着外交关系。再者，他还镇压伊斯兰激进分子。这种镇压式的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穆巴拉克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NDP）］主导立法与总统选举。① 穆巴拉克的突出成就是：逐渐让阿拉伯世界接受埃及，包括埃及在1989年回归阿盟。随后，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恢复外交关系。1991年海湾战争发生后，穆巴拉克参加了联合国盟军。② 他还调解20世纪90年代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会谈。2003年，他质疑并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 200

穆巴拉克的政治利益主要在国内。大赦国际和其他人权组织都因为埃及安全部队的暴行而抱怨穆巴拉克政府，特别是对激进伊斯兰分子的无情镇压。③ 反之，伊斯兰组织（the Jama ‘at Islamiyya）则声称为1997年开罗与卢克索的游客遇袭事件负责。④ 这次袭击造成70人死亡，其中58名为旅游者。穆巴拉克谴责2001年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9·11”自杀式袭击事件，以“9·11”证明镇压埃及国内伊斯兰激进分子是正当的。2004年10月和2005年7月，伊斯兰激进分子分别在塔巴和沙姆沙伊赫引爆炸弹，致使数十名埃及人和外国人死于非命。

埃及宪法规定多党制的政治参与制度。不过，穆巴拉克时代的选举制度与全民投票可确保民族民主党稳坐政坛。其他政治组织有：新华夫脱党（New Wafd Party）、社会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SLP）］、国家协议党（Hizb al-Wifaq al-Qawmi）和阿拉伯民主纳赛尔

---

① 萨达特死后，穆巴拉克于1981年10月13日经全民投票当选为埃及总统。1987年、1993年、1999年和2005年，四次被选举为埃及总统。1977年，萨达特成立了国家民主党。

② 由于富裕的科威特人的负面形象以及阿拉伯国家兄弟同情伊拉克国内萧条的情况，埃及参与海湾战争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另一方面，鉴于埃及与联合国的合作态度，美国将埃及庞大的军事债务（45亿美元）一笔勾销（参见 Marsot 2007，171—172）。

③ 1995年的埃及发生了暗杀穆巴拉克本人的事件。

④ 这次进攻发生在埃及第18王朝女王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墓葬的附近。

党。自从1928年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以来，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一直是埃及的传统。穆斯林兄弟会是最重要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吉哈德组织的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归属于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领导。贾马特·伊斯拉米亚（Jama ‘at Islamiyya）在1999年的推翻埃及政府的活动中宣布停火。乔治·布什总统现在提出大中东计划，呼吁大规模的民主化（美国的政治家和权威人士都将矛头指向穆巴拉克的威权主义）。2005年9月埃及举行总统选举，各类候选人第一次粉墨登场。穆巴拉克顺理成章地赢得了选举，但随后出现的新型政党，如卡非亚（Kafiya，受够了），吸引了中东地区和全球力量的眼球。12月，明日党（Ghad）和在野党总统候选人艾曼·努尔（Ayman Nour）被囚禁入狱。[①] 政治恐吓和普遍的欺诈行为是2005 201 年11月议会选举的典型标志。然而，由于候选人都是“独立”的，穆斯林兄弟会依然是埃及政府最强大的政党，获得了444个议席中的88个。2006年2月，由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政治抗议，迫使穆巴拉克推迟原定4月的地方选举。2007年3月，埃及全民公决修改宪法，禁止宗教政党存在。选民稀疏的政治参与标志着民众的无可奈何和疏离。[②] 埃及面对着重重困难和危险时刻。民众对此都充满疑惑：谁将是穆巴拉克的继承人？[③]

埃及的经济与社会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1961年到1980年，埃及经济

---

① 埃及政府指控努尔撰写了请愿书。尽管有国际社会抗议，但他仍然被囚禁入狱。

② 按照BBC的说法，官方认为27%的选民参与选举，而“独立团体”声称，仅有5%的选民参与投票（BBC 2007）。

③ 媒体经常渲染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Gamal）可能是未来的继承人。阿法夫·卢特菲·萨义德·马尔索提出警告：“除非恢复自由主义政体，即内阁向民众真实选举出来的议会负责，彻底根除腐败行为，替换那些漠视民众利益、难以信赖、办事效率不佳的官员，否则反对派将会日益强大，更加好战。”（Marsot 2007，177）

年增长率为6%。[1]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经济年增长率为4.8%。从2001年到2004年，埃及年经济增长率为3.5%。这些日益下降的技术指标表明埃及人均收入低于其他非产油国，也戳穿了埃及政府鼓吹的经济一直在发展的谎言（IMF 2005a，15）。[2]

埃及人口迅速增长，达到8000万，消费了大量的资源。[3] 正如前面章节所言，埃及经济严重依赖农业出口，但现在埃及必须进口大量生活必需品，如小麦。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农业占国内年生产总值的16%。阿斯旺高坝的洪水泛滥（纳赛尔湖也是这样）可以常年供应灌溉用水，并扩大农业地区，如西部沙漠地区。然而，地下水位和盐碱化出乎意料的增加，限制了可耕地数字的扩大。城市化增速也制约了土地开发利用项目。再者，淤泥流失在三个层面影响了大河流域。第一，没有淤泥沉积和肥沃土壤的滋养，农民只好购买肥料，产生其他生态问题；第二，淤泥也滋养并恢复了消失了几十年的养鱼业；[4] 第三，如果没有淤泥积聚，地中海将侵吞并销蚀尼罗河三角洲（Marsot 2007，167）。棉花是主要农作物，也是劳动密集型产物，有助于缓减失业，官方估计约10%的劳动力在此行业就业。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长绒棉出口国。大米和蔗糖也是重要的作物。2006年和2007年，禽流感洗劫了埃及家禽业。

202 制造业部门包括食品加工、纺织业，特别是碳氢部门。埃及的石油和天然气仅能自给自足。20世纪90年代中期，埃及日产石油90万桶，但在2002—2003年，日产原油、浓缩油和液化石油气达到71.9万桶。国民日消费46.1万桶，仅出口25.8万桶（1975年以来是净出

① 据哈立德·伊克拉姆（Khalid Ikram）估算，1965年到2000年间，埃及经济年增长率为4%—5%到4%—7%，因为"国民收入过分夸大了工业的重要性……和农业的分量"（Ikram 2006，278）。

② 按照EIU数据显示，2002—2006年，埃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为3%—4%（EIU 2007e）。据EIU估计，埃及在2007年到2012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是6.2%到6.3%。然而，粮食价格的暴涨（以及2008年末全球经济危机）必定会影响经济绩效。

③ 埃及人口在7500万左右，人口年增长率是1.9%（ibid.）。

④ 此外，埃及政府并没有开发纳赛尔湖高坝的生产食物和养渔业的潜力。

口国)。埃及日均生产 59 万桶石油 (IMF 2005a, 34)。埃及是一个中等生产国，并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 (OPEC)。另一方面，埃及希望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输出国 (ibid. , 34—35)。埃及已经生产化肥，筹划成立更多的加工厂。正如计划中所期望的，阿斯旺大坝为埃及重工业包括钢铁和铝的生产提供水电能源。

埃及第三个经济部门是旅游业，年收入 40 亿美元。因此，1997 年卢克索 (Luxor) 交火，2005 年沙姆沙伊赫 (Sharm al-Shaykh) 爆炸目标均对准埃及经济和埃及政府。尽管有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地区不稳定局势的影响，但埃及悠久历史的魅力与厚重积淀的文明继续吸引着游客络绎不绝地到这里观光。阿斯旺大坝的完成也提高了国家的电气化程度。

2006 年，苏伊士运河为埃及政府提供了 36 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尽管碳氢管道与油轮出口相竞争，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业也增加了关税和税收 (German and Taylor 2007, 365)。

目前埃及经济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贸易和财政赤字、失业率高与巨额外债 (约 300 亿美元)。从历史眼光来看，工资并没有随通货膨胀同步增长，其结果使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企业家日益贫困。20 世纪 90 年代，当通货膨胀降到最低点，埃及局势变得更为恶化。正如上述人口增长和人均资产所暗示的，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急速下降 (Jankowski 2000, 182—183)。政府大规模压缩财政补贴，如燃油费，这都是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结果 [2007 年初为 203 12% (German and Taylor 2007, 359)]。另一方面，21 世纪初的个人和企业税收改革也产生益处。埃及面临的紧迫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是减少赤字，同时维持社会保障系统的稳定 (IMF 2007a)。埃及参与海湾战争获益匪浅。美国减免埃及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慷慨地提供备用信贷。巴黎俱乐部也重写并重新安排了债务归还表。然而，海湾战争使成千上万在国外工作的埃及人无家可归。1989 年，全部汇侨收入达到 42 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收入 (German and Taylor 2007, 360, 374)。流落在国外的埃及工人达 400 万人。

埃及经济严重依赖外部援助。1973 年十月战争后，美国与埃及双边关系解冻。此后，美国一直是埃及的主要援助国。尽管埃及国内政治气氛压抑，但美国仍很欣赏埃及，并认为它在变幻无常的中东国家中是一个温和国家，也可以起调解作用。自 1975 年以来，美国给埃及的援助金额近 500 亿美元（Levinson 2004）。埃及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为美国和欧盟。

埃及的对外交往对象是北非和阿拉伯地区变幻无常的国家。这是由其跨文化特征与传统以及处于联系民众、商业和思想等十字路口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这些思想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以及最近的阿拉·阿斯万尼（Alaa al Aswany）和纳瓦勒·萨达维（Nawal el-Saadawi）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参见结论）。

埃及在两性平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步。2001 年，埃及政府在对圣训进行自由解释的基础上修改了家庭法，赋予妇女更多的权利，如离婚权，削弱了男子在家庭中的权威。目前妇女有权提出离婚。2005 年，纳瓦勒·萨达维（参见第九章）参与总统职位角逐，颇具象征意义。

埃及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历史（及其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关注与考察。鉴于埃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意义，拿破仑认为埃及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最引人注目的国家。

利比亚

后殖民时代的利比亚仅有两位统治者，即伊德里斯国王和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二者的领导方式截然不同。国王依赖专家与顾问治国，是一位勉为其难的君主，而上校灵活机变，目前仍在统治利比亚。自从 1969 年夺取利比亚政权以来，卡扎菲扮演了多种“角色”（personas）——雄赳赳的军官、造型独特的贝都因人、“至高无上的革命领导人”、全球恐怖分子、泛阿拉伯主义者和泛非主义者。卡扎菲行为乖张不定，个性神秘莫测，再加上模棱两可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以及他对利比亚石油财富的拥有，这一切使得卡扎菲在世界舞台上地 204

位突出且充满争议。

尽管他们的个性反差很大，但后殖民时代利比亚的两届政府和领导人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按照丽萨·安德森和德克·范德瓦勒（Dirk Vandewalle）的说法，二者都很令人讨厌，成立一个国家和构建一个民族“都应该避免二者的做法”（相关话题见 Anderson 1986 和 Vandewalle 2006）。由于没有复杂的官僚政治体系和相关部门，仅仅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利比亚由三个与众不同的地区组成：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作为一种无国家的国家显得一反常态。另一方面，阿里·阿卜杜拉提夫·艾哈米达（Ali Abdullatif Ahmida）坚持认为，尽管利比亚具有“无国家”的明显条件，但利比亚人将中央集权国家等同于殖民主义，具有国家构建的传统（“部族—农民联盟”和赛努西制度体系）（Ahmida 1994，5—6；Ahmida 2005，74）。不管利比亚无国家（statelessness）状态如何令人费解，但后殖民时代的利比亚历史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伊德里斯的统治

纵观伊德里斯的一生，他主要是作为苏菲派领袖出现在公众视野。他的祖父是第一个“大赛努西”（Grand Sanusi）穆罕默德·赛努西（Muhammad al-Sanusi），他所主张的伊斯兰主义激发利比亚民众坚决抵制意大利入侵和殖民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德里斯支持英国，对抗意大利，后成为联合国人为制造的利比亚联合王国的统治者。正如我们前面所担心的那样，王国由三块不同的领土构成：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各具与众不同的地缘政治特色和文化历史意义。伊德里斯主要在昔兰尼加发挥重大影响。尽管利比亚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国王掌握实际权力。美国和英国支持伊德里斯政府。各盟友均在利比亚拥有军事设施，如美国在惠勒斯的军事基地，它是美

国从全球视野遏制苏联的战略财富。[①] 不过，伊德里斯偶尔会坚持己见。例如，他不顾与英国关系密切的传统，在 1956 年拒绝英国苏伊士特遣部队在利比亚海域着陆。实际上，尽管埃及面临外部力量入侵，但纳赛尔拒绝放弃运河国有化的决定。上述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利比亚人，特别是穆阿迈尔·卡扎菲（Pargeter 2000，54）。1967 年，美国支持以色列，引发了利比亚民众在惠勒斯基地和美国大使馆的抗议浪潮。 205

此时，伊德里斯已经是一位身心疲惫的七旬老人，国王目睹了利比亚所发生的戏剧性巨变。利比亚独立之时，国内仅有七名大学毕业生。三种重要的出口商品分别是：乌贼骨（cuttlefish bone）、细茎针草（esparto grass）和战场废弃物（Parker 1987，65）。1969 年，利比亚发现石油，使这个国家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利比亚国家机构较少，君主仅依靠"一组受到宠爱的个人、家族和部族，来决定自己的生死存亡"（Vandewalle 2006，73）。1969 年，穆阿迈尔·卡扎菲和革命指挥委员会［the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RCC）］废黜伊德里斯，国王到异国避难，可能会感到解脱的慰藉。卡扎菲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军官。想到他随后反复无常的行为举止，时至今日也令人费解。

卡扎菲的行为：循环主题

尽管理解卡扎菲几十年的行为有些困难，但这些行为也有一些反复发生的循环主题。卡扎菲热衷政治统一，努力推进利比亚与其他国家的整合。他是一位纳赛尔主义者，认同并接近纳赛尔，寻求与埃及的统一。卡扎菲与萨达特之间渐生敌意。1977 年，利比亚和埃及在边界发生暴力事件。在穆巴拉克任总统期间，利比亚与埃及的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1984 年，摩洛哥和利比亚这两个差异鲜明的国家签署乌季达协定，宣布两国统一。但该协议在 1986 年以失败告终。[②] 利比亚

① 1943 年，美国从英国手中接管了的黎波里东部的梅拉哈（Mellaha）飞机场，也就是后来的惠勒斯军事基地。

② 利比亚参与统一计划，包括与阿尔及利亚（1973 年）和突尼斯（1974 年）的联合（参见 Vandewalle 2006，87）。关于摩洛哥和利比亚关系，参见 Parker 1985。

还是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后者成立于1989年。[1] 最近几年，卡扎菲呼吁与撒哈拉南部地区非洲实现统一，也是非盟（以前的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者，并拥护成立非洲联合众国的想法。因此，他已经从热衷于泛阿拉伯主义转变为支持泛非主义。

1970年和1971年，卡扎菲对抗外国石油公司，导致石油高标价和高税收。卡扎菲的行为影响并鼓励阿尔及利亚人于1971年2月将撒哈拉地区的法国公司国有化。从1971年末到1974年，利比亚将大型外国石油公司进行有限的国有化（利比亚控制公司50%和51%的股权），这样就扩大了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Libyan National Oil Company's（LNOC）］参与这些部门的份额。

206 20世纪70年代，自封为“革命领袖”（*qa'id al-thawra*）的卡扎菲发动了文化革命，其特点就是在1975年和1979年出版了3卷本的《绿皮书》。《绿皮书》将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模糊地混合在一起，目标是将利比亚民众动员起来。他构想了一个新型的意识形态诉求，被称为“世界第三理论”。[2]该理论在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中有所反映——包括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革命指挥委员会成立总秘书处（General Secretariat）。尽管利比亚增强民众动员，扩大代表大会，但卡扎菲并不考虑公众意见或让民众参与政治治理。利比亚国名改为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众国（the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ya）。“民众国”（Jamahariyya）是一个新创名词，在此语境下是指民众大会（mass assembly）。[3] 无可辩驳的是，这一意

---

① 马格里布联盟是马格里布地区整合的最后努力。1958年，阿拉伯马格里布宪法议会成立。1964年，马格里布委员会长期协商会议。与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命运一样，除了偶尔开几次会议外，他们也不能获得富有意义的整合。

② 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认为：“《绿皮书》绝大部分并不明确指向伊斯兰教。人们批评卡扎菲反对伊斯兰教，后者对此辩护，世界第三理论……是为了带来社会正义和实现整个世界的平等，并不仅仅是穆斯林。”（Esposito 2005，177）

③ Jumhuriyya意思是共和国，因此，这一新词的意思与共和国有关，但也有所区别。该词成为官方通用名称。丽萨·安德森指出与Jumhuriyya有关的一些意思——“民众国”（state of the masses或peopledom）（Anderson 1986，264）。jama ‘a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集合”（to assemble，to gather，to group）。Hurriyya（词根是harra）意思是独立和解放。动词jamhara，衍生出jumhuriyya，与jama ‘a同义。

识形态的首倡精神是“无国家社会——避免构建现代国家”的最好个案（Vandewalle 2006，1；也参见 Anderson 1986，251—269）。卡扎菲并不愿意发展国家机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官僚机构与赛努西君主制政治实践具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阿里·阿卜杜拉提夫·艾哈米达认为，卡扎菲的主张考虑到利比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由于对无国家社会乡村意识形态的吸引，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现实（被认为是殖民国家）的担心，卡扎菲破坏了君主制政权的机构。与此同时，成立的民众国机构使得利比亚强大国家更为合法化，利比亚内地民众都接受了卡扎菲政权。”（Ahmida 2005，72）

在范德瓦勒看来，《绿皮书》的“思想极为简单，主张平等主义，缺乏等级制度，反映了部族的精神气质”（Vandewalle 2006，103）。卡扎菲所执行的社会主义计划，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和私人企业，随后削弱中产阶级。由于石油收入充盈着国库收入，卡扎菲进口物品为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利比亚也从世界上一贫如洗的国家变为最富有的国家。安德森认为卡扎菲的政策是“分配型的”（distributive），民众被迫依赖于政权的“慷慨施舍”（largesse）（Anderson 1986，268—269）。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实现动员民众的结果。不过，利比亚人生活过得舒适且对现状很满足。卡扎菲为了刺激经济（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允许私人企业存在。1987 年 3 月，利比亚颁布了第一个自由化改革（*infitahs*）措施。

卡扎菲对利比亚的构想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1975 年，利比亚大学生举行抗议活动，且发生未遂政变。流亡海外的利比亚政府反对派遭受无情追捕，成为卡扎菲政府打击的目标。从 1980 到 1987 年，约 25 名流亡海外的利比亚政府反对派惨遭暗杀（Lawless 2007，771）。卡扎菲的行为反复无常，尽管没有文本记录，但国内（和国外）的反对派都试图推翻卡扎菲，特别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更为如此。面对伊斯兰 207

激进力量的威胁，卡扎菲的应对措施是将伊斯兰法引入利比亚法律体系。[①] 2003 年，卡扎菲决定顺应国际社会的需要解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赢得了国际社会好评。经过几十年的外交孤立，再加上经济制裁的打击，[②] 利比亚受到更多的关注，新的合同接踵而来，将对卡扎菲政府和个人带来益处（参见下文）。

卡扎菲火中取栗

阿拉伯地区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漠视卡扎菲雄心勃勃的联合计划，并认为后者行为古怪。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卡扎菲支持那些在国际社会有争议的激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组织包括巴勒斯坦极端主义组织，西德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 Gang）、意大利的红军旅、爱尔兰共和军。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卡扎菲支持恐怖主义直接与美国对抗。

1981 年 8 月，美国第六舰队的舰载机在苏尔特湾击落利比亚战机。当时谣传，利比亚派出“职业杀手”（hit squad）暗杀美国总统。1985 年 3 月，美国第六舰队在苏尔特湾游弋挑衅，遭到利比亚 SAM 地对空导弹的袭击。美国迅速作出回应，摧毁利比亚的导弹和雷达设施以及四艘巡逻艇。4 月 5 日，美国人时常出入的柏林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一名美国人和一名土耳其妇女被炸死。调查显示利比亚间谍与该起爆炸事件有染。4 月 15 日，来自英国的美国战机和第六舰队轰炸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特定目标。卡扎菲官邸被毁，养女被炸死。1989 年 1 月，威胁第六舰队的两架利比亚战机被摧毁。

卡扎菲并没有从阿拉伯世界或反美的武器供应国苏联得到支持或同情。实际上，卡扎菲政府与两件惊人的恐怖事件有关。1988 年 12 月，一架搭载 293 人的泛美波音 747（103 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

① 1978 年，什叶派领导人穆萨·萨德尔（Musa Sadr）在访问利比亚时神秘消失。在许多什叶派人士看来，他已经隐遁了，但会重新出现（Esposito 2005，188）。关于利比亚伊斯兰主义的更多资料，参见 Ouannes 1999，178—182.

② 1992 年，利比亚试图与美国恢复对话，但没有成功。

爆炸，机上乘客全部死亡。1989 年 9 月，法国的 UTA 客机在撒哈拉地区爆炸，死亡人数达 170 人。这次爆炸也与利比亚有关。联合国对利比亚施加制裁。自从 1985 年以来，美国再次实施制裁，利比亚的财产已经被美国冻结。经过多年的协商谈判，两名利比亚人于 2000 年在荷兰接受苏格兰法官的审判。2001 年 1 月，苏格兰法官作出判决：一名被告获释，另一名被判处终身监禁。2003 年 8 月，利比亚提出洛克比空难遇难者赔偿计划（约 270 亿美元），并分发给遇难者家属。联合国随后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2004 年 1 月，利比亚也同意了 UTA 客机遇难者家属的赔偿计划。

卡扎菲还参与非洲事务。利比亚与乍得的边界争议（奥祖地区）始于殖民时期。军事冲突持续 8 年之久，以 1987 年利比亚被击败而告终。1989 年，利比亚同意国际法院的判决，将奥祖地区交给乍得。1971 年，摩洛哥发生反对哈桑二世国王的军事政变，该政变得到卡扎菲的支持。卡扎菲支持西撒哈拉独立阵线（POLISARIO）、萨拉威解放组织（the Sahrawi liberation organization），这两个组织一直为赢得西撒哈拉独立而斗争（参见第九章）。然而，卡扎菲对萨拉威人的支持是飘忽不定的，他通过前文提及的《乌季达协定》修复了与摩洛哥的关系。1980 年，突尼斯政府反对派跨越国界进攻加夫萨（Gafsa），企图颠覆布尔吉巴政权。然而，到 20 世纪末，利比亚已经与邻国讲和，如加入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UMA）。[1]

卡扎菲的惊人之举

众所周知，卡扎菲一直寻求生化武器。1980 年，利比亚一家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芥子毒气的加工厂神秘着火，估计是西德情报机构所为。2003 年 12 月，英美宣布利比亚意图公开并毁坏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没有发现利比亚有核武器，但已经拥有核研发能力。利比亚做出此决定后，美国解除了大多数制裁措施（联合国的制裁在之前已经取　209

① 据报道，卡扎菲也为图阿雷格部族的叛乱分子提供避难所和支持，反对马里政府。

消）。卡扎菲政策为什么做出如此惊人的变化呢？

美国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也表明了美国不允许别国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坚决态度。美国所作所为使卡扎菲确信，他可能是布什政府的下一个打击对象，因为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借口就是搜寻并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卡扎菲“变脸”与布什政府的威慑有关，但也与经济发展停滞和国内民心不稳有密切联系。再者，卡扎菲对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谴责态度，已经向美国发出合作的信号。他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反对态度，也众所周知并富有争议。[①]

卡扎菲答应泛美103航班遇难者家属的要求，结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据报告，利比亚与美国进行情报分享。2004年，利比亚同意对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受害者给予补偿，美国结束经济制裁。2006年，利比亚与美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利比亚不再被认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实际上，美国石油公司希望恢复在利比亚的恢复商业活动。

利比亚的经济与社会

利比亚的改革使得这个国家的600万居民由穷人变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不过也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后果。卡扎菲处置财富的方式颇有争议。利比亚社会福利较好，这个国家大多数工作都由外国劳工所把持。公共部门雇佣了75%的劳动者。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每年2%的速度递减。因此，尽管政府赞同合办企业（EIU 2007c），但私人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IMF 2005b，5）。卡扎菲亲自邀请非洲人到利比亚工作，给本国的就业和住房带来许多问题。此外，外来移民利用卡扎菲堂吉诃德般的狂想来到利比亚，引发本国人的憎恶，撒哈拉非洲以南地区的非洲人被迫离开利比亚。[②]

---

① 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逮捕本拉登的逮捕证，利比亚是第一个赞同的国家。

② 利比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报告显示，外国工人从2001年的18.79万人降到2005年的5.69万人（IMF 2007d，7）。

利比亚政府要求外国公司，特别是碳氢部门，雇佣利比亚人。

利比亚严重依赖碳氢部门，经济处于波动状态，如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增长率下降。从 1999 年到 2003 年，利比亚石油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占出口收入的 97%，政府收入的 75%（IMF 2005b, 5）。[①] 2003 年，利比亚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 9%（IMF 2005c, 5）。2002 年到 2006 年，利比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值为 5%（EIU 2007b）。[②] 鉴于与美国恢复关系，美国公司希望参与这些部门，以使碳氢价格保持平稳。不过，高油价也产生了错误的期望值。碳氢与其他部门和市场一样，经历了周而复始的过程。卡扎菲理解国家经济实现多元化、构建分配性经济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采取果断而有效的行动。

210

1983 年，卡扎菲启动了规模宏大、野心勃勃的“大人工河”公共工程。据说，加拉曼特人的考古技术可以利用地下水渠进行灌溉（参见引言，第二章）。与加拉曼特人一样，卡扎菲期望通过抽取撒哈拉地区的地下水，将这些水运送到利比亚北部，推进农业发展。大人工河工程分几个阶段实施，但“大河”偶尔也会由于合同和技术问题而受到阻碍，资助工程修建的碳氢收入的历史波动也经常影响工程的顺利进行。然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已经利用大人工河的水源。即将竣工的国家水网遍布各处，与之相联系的农业工程也在进行，显示了卡扎菲的雄心抱负。卡扎菲喜欢戏剧性地变革（或身体力行），如大人工河工程，不理睬或不赏识较温和的、实用的尝试，如发展利比亚捕鱼业。相反，外国旅游人士在沿海地区获益匪浅。

卡扎菲敏锐地感觉到国内的骚动不安。制裁造成了无数社会与经

① 2003 年，利比亚每天抽取 153.9 万桶原油，其中出口 118.4 万桶（IMF 2005c, 21）。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韩国和土耳其都是重要的商业伙伴。

② 据 EIU 估计，2007 年到 2012 年利比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5%—7%。猛增的油气价格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利比亚的租赁经济体系也可能发生结构性调整（EIU 2008b）。

济问题。制裁解除可能激发了不满民众的期望，危及民众国的稳定。再者，正如艾哈米达所观察的那样："利比亚政权似乎已经耗尽了革命豪情，国内面临大量的难题，包括制度缺失、公民社会削弱，受到良好教育的利比亚人流失到海外，领导层却没有能力处理变化的、复杂的国际体系"（Ahmida 2005，72）。尽管卡扎菲最近的和解政策结束了利比亚的孤立状态，但卡扎菲的反复无常使得世人对之浮想联翩。211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认为："（卡扎菲）很可能引入变革，巩固他在自己构建的政治体系中的突出地位……由于没有正式、合适的机制来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后卡扎菲时代无论何时出现，但有一点可以预见，那就是利比亚将陷入局势紧张、危机四伏的状态，无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组织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St. John 2008，67）[①]

突尼斯

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是现代北非史上一位勇气十足、充满矛盾和富有争议的人物。他使突尼斯成为穆斯林世界最世俗的国家之一。他赋予妇女前所未有的权利，在西方法律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法律制度。不过，布尔吉巴变得越来越独裁，导致伊斯兰激进主义等政治反对派迅速崛起。尽管布尔吉巴身体虚弱，但拒绝离职，这位"重要的老人"被尊敬地请下总统宝座。布尔吉巴的继承者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在发出政治自由化的信号之后，也诉诸独裁主义。不过，突尼斯的经济快速增长，令人对本·阿里刮目相看。

从布尔吉巴到本·阿里

布尔吉巴独立的渐进主义路线疏远了两位重要的民族主义者。萨拉赫·本·优素福（Salah Ben Yusuf）将自治等同于屈从法国。他认

① 很明显，这里提到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Sayf al-Islam）可能是卡扎菲的接班人。玛丽－简·迪布（Mary-Jane Deeb）认为，他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没有其父浓厚"（Deeb 2007，453）。

为布尔吉巴忽视了突尼斯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突尼斯总工会的秘书长艾哈迈德·本·萨拉赫（Ahmad Ben Salah）也不同意以损失独立地位为代价与新宪政党整合在一起。他后来调整了自己的立场，成为布尔吉巴的部长，制定20世纪60年代突尼斯的社会主义政策。至于萨拉赫·本·优素福，他也反对布尔吉巴，并在南部地区发动游击战争。他随后流亡到的黎波里、开罗。1961年8月，他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市遭暗杀，可能是突尼斯人所为。

布尔吉巴在把政治反对派收编或清除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意志在突尼斯付诸实践。他深受法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1956年，他制定了个人地位法，这是穆斯林世界最世俗化的法律。该法律拒绝多妻制，男女拥有平等的离婚权，母亲拥有孩子的监护权。个人地位法规定最低结婚年龄：男子为18岁，女子为15岁。1956年，突尼斯政府没收公共胡布斯（*hubus*，伊斯兰基金会占有的土地）。一年后，私人胡布斯被废除。1958年，突尼斯政府发起了一个扫盲运动。突尼斯1945年成立高等研究机构。1960年，该机构改称突尼斯大学。 212

布尔吉巴支持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特别是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提供避难所。1958年，法国轰炸了突尼斯的西迪优素福［Saqiyat (Sakiet) Sidi Yusuf］村庄。这一事件引发了1958年5月的阿尔及尔事件，并导致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终结。[①] 1961年，布尔吉巴试图将法军驱出比塞大的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随后引发了暴力冲突，致使1000名突尼斯人死亡。1964年10月，法军从比塞大撤军。布尔吉巴还想重新绘制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边界，目的是利用边界附近的石油与天然气，但以失败告终。

1964年，布尔吉巴将新宪政党的名字改为宪政社会党［Destourian Socialist Party (PSD)］，该党指明了布尔吉巴领导国家的意识形态取向。为了执行社会主义制度，艾哈迈德·本·萨利赫（Ahmad Ben Salah）搜集了许多部长的档案资料，如金融、教育和规划编制。突尼

① 法国政府认为撒奎特（Saquiat）隐藏在阿尔及利亚革命分子之中。

斯独立之时，西方白人仍然控制着相当数量的农业用地。1964 年和 1965 年，布尔吉巴将法国人的财产国有化，法国对此极为气愤，削减对突尼斯的合作项目和援助计划。突尼斯农民抵制萨利赫的社会主义方案，布尔吉巴以此为由解雇了这位位高权重的部长（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1970 年，萨利赫被指控并定罪为叛国通敌，判处 10 年徒刑。1973 年，他逃离突尼斯，流亡他乡。

1974 年，法国下议院指责布尔吉巴是“终身总统”，疏远了党内成员与公众。1978 年 1 月 26 日，突尼斯爆发全国性的罢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抗议政府操控经济，死亡几十人（很可能有 200 人）。1981 年，突尼斯举行议会选举，宪政社会党与工会结成联盟，成立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取得胜利。这次选举产生了一个新反对派，即伊斯兰倾向运动［Islamic Tendency Movement（MTI）］。1984 年，伊斯兰倾向运动发动骚乱，被突尼斯政府镇压下去。1986 年，各主要反对党抵制议会选举，国民阵线因各党弃权而获胜。1987 年 10 月，健康状况不佳的布尔吉巴挑选本·阿里为总理。不久，突尼斯政府宣布布尔吉巴不适合执政（执行突尼斯宪法第 57 条），本·阿里担任国家领导人。①

213

为了确保统治的合法性与掌控权力，本·阿里做出突尼斯向民主体制过渡的承诺。1989 年，突尼斯签署“国民宪章”（National Pact），规定政党合法化，伊斯兰倾向运动（现在被称为复兴党）被排除在外。其主要伊斯兰领袖谢赫拉希德·盖努西［Rashid Ghannushi（Ghannouchi）］被迫流亡海外。② 1989 年，突尼斯举行全国大选，没有反对党的本·阿里继续担任民主宪政联盟［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Rally

① 布尔吉巴退休后回到家乡莫纳斯提尔（Monastir），2000 年 4 月去世。

② 盖努西认为，权力分享（power-sharing）“非常必要，为社会秩序稳定奠定基础。这种权力分享可能并不是建立在伊斯兰法之上。然而，为了制止独裁政府的罪恶，外国殖民统治或者地方混乱状态，它必须建立在伊斯兰政府的重要基础之上，即舒拉制或者尊重乌玛社区的权威”（Donohue and Esposito 2007，273）。马利克·本纳比的思想对盖努西产生重大影响。

(RCD)，前身是宪政社会党］主席，获得了议会中的全部议席。[①] 1990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地方选举中获得成功，遭到政府弹压，持续至今。1994年，突尼斯允许议会中象征性地有反对党存在。1999年，本·阿里再次被选举为总统。1995年，许多反对党领袖因对突尼斯政治参与环境提出批评而被逮捕。2003年，复兴党（al-Nahda）发布公告，呼吁反对党团结起来，制定“反对党全国协定”（national pact of opposition）（Communiqué 2005，329—331）。然而，本·阿里继续大权独揽，实施独裁统治。[②] 正如肯尼斯·珀金斯（Kenneth Perkins）所说的那样，本·阿里在2004年的重新大选使他成为突尼斯的“第二任‘终身总统’”（Perkins 2004，202，212）。由于缺乏政治自由，这预示着突尼斯未来会险象环生。

突尼斯的外交关系

布尔吉巴看到邻国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在整个第三世界普遍受到欢迎的情况，决定在突尼斯实施相同的政策。尽管突尼斯最终拒绝了社会主义，但在20世纪70、80年代，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一直较好。1983年，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签署友好协定。在突尼斯人看来，与阿尔及利亚保持亲密的外交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1980年利比亚支持的300名游击队对加夫萨发动进攻后，保持这种关系更为紧迫。本·阿里上台后，突尼斯与利比亚的关系有所改善。1989年，突尼斯加入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突尼斯在冷战期间与西方结盟。整个20世纪80年代，突尼斯在阿拉伯世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后，阿盟总部迁往突尼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突尼斯政府同意接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直驻留在突尼斯，

214

① 其他政党也参与这次选举，但他们被民主宪政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者获得80%的选票（参见 Perkins 2004，189）

② 另一方面，乔吉·安妮·盖尔（Georgie Anne Geyer）富有同情心地将本·阿里描绘为一名追寻渐进民主事业的谨慎的政治家（参见 Geyer 2003）。

直到 1994 年才离开。

突尼斯也是恐怖主义的打击目标。2002 年，杰尔巴岛的犹太教堂外发生爆炸，21 人被炸死，20 多人受伤。遇难者大多是游客。基地组织指责突尼斯是一个暴行累累、背叛伊斯兰教的国家。另一方面，复兴党的拉希德·盖努西也谴责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

突尼斯的经济与社会

突尼斯人口有 1000 万，在马格里布地区属于经济发展最稳定的国家。各个经济部门都具有优势。主要生产作物包括谷物、柑橘类水果，特别是橄榄。突尼斯约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可耕地。突尼斯制造业主要是丝织业和磷酸盐生产。突尼斯的石油与天然气生产几乎满足了国家的基本需求。突尼斯的第三产业主要是旅游业。来自国外（特别是欧洲人）的突尼斯人侨汇也为推动经济做出较大贡献。此外，突尼斯通过与欧盟签署第一个联盟协议巩固了二者的关系，该协议于 1998 年生效。法国也是突尼斯的主要商业伙伴。通过 2004 年的阿加迪尔协定，突尼斯、埃及、约旦和摩洛哥建立统一自由贸易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阿尔及利亚代表认为“突尼斯是世界上贸易资源未被开发的最有潜力的国家”（IMF November 2004，20）。不幸的是，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所渴望的最大地区贸易计划并没有完成。尽管突尼斯经济发展强劲，但失业率估计达 14%。目前，突尼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 5%，短期内或者维持这一比率或者略高一点（EIU 2007f）。突尼斯的通货膨胀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0%，降到 2005 年的 1%（IMF 2007c，4）。突尼斯是北非和阿拉伯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本·阿里独裁主义统治下的突尼斯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鉴于他个人主导着这个国家，那么后本·阿里时代将对突尼斯相对繁荣的局势产生何种影响？与政治动荡相比，将对脆弱的经济与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第九章　后殖民时代和当代北非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撒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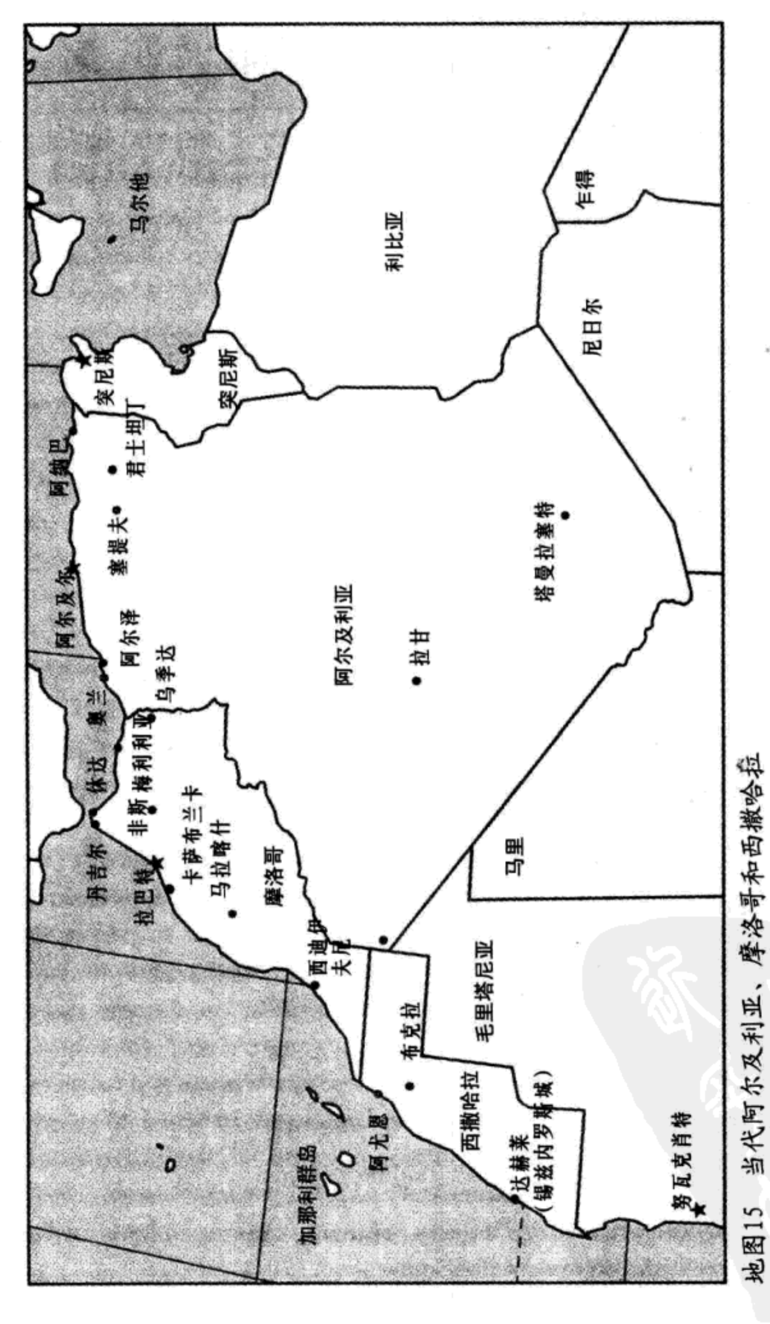
本章继续考察与后殖民时代和当代北非联系密切的第二组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撒哈拉。尽管西撒哈拉作为“国家”来说，其国际地位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但其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值得肯定，并受到特别关注。 215

阿尔及利亚

后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历史揭示了一种存在主义的理念，即寻求建设一个遭受殖民主义和战争破坏的国家。从 1962 年到 1988 年，军队和民族解放阵线主导了阿尔及利亚政坛。1988 年，阿尔及利亚爆发骚乱，政府启动政治与经济自由化改革。伊斯兰救赎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FIS）］迅速崛起，并成功地在大选中获胜。1992 年 1 月，阿尔及利亚军队和平民精英发动反政府政变，第二轮议会选举取消，伊斯兰救赎阵线可能在此次选举中获胜并登上政坛。这次政变的后果与影响也具有深远意义——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大范围的内战，死亡人数达 15 万—20 万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利亚米纳·泽鲁阿勒（Liamine Zeroual）总统小心谨慎地实行了再政治民主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和再制度化政策（redemocratization），随后，继任者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具有娴熟的统治技

巧，采取国家和解行动方案。阿尔及利亚紧张的政治局势有所缓和，国内冲突日益减少。2007 年 9 月和 12 月，巴特纳（Batna）、代利斯（Dellys）以及阿尔及尔发生爆炸事件，伤亡多人。

阿尔及利亚是世界上主要油气生产国之一。其石油产量巨大，天217 然气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欧盟成员国特别依赖于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



地图15 当代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撒哈拉

再者，美国最近成为阿尔及利亚主要贸易伙伴国，“九一一事件”后双方政治联系日益紧密。2006 年 3 月，阿尔及利亚和俄罗斯同意签署一个数额巨大的军事合同，双方同意在天然气开发方面进行合作。2006 年 11 月，阿尔及利亚与中国签署经济和战略协议，显示了阿尔及利亚的全球利益和首要地位。

尽管长期孤立与疏远国际社会的状况使年轻人感到痛苦，但 1954 年 11 月 1 日的革命思想宣言在阿尔及利亚引起共鸣。2001 年的卡拜尔人发动抗议游行，威胁着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稳定，柏柏尔人主义（Berberism，也叫 Amazighism）逐渐抬头。2004 年，布特弗利卡总统再次赢得大选，但在 2005 年末，其健康状态不佳。阿尔及利亚议会通过了搁置已久的宪法修正案，预示着独裁主义的“总统政权”将进入制度化阶段。

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第一个艰苦岁月（1962—1965）

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结束于临时政府和政治局之间的权力之争，前者曾协商埃维昂协议，后者是由本贝拉领导并得到军方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支持的反对派。政治局最终获胜，但流血杀戮也使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形象受到损伤。随后，各种力量组成的国民大会举行大选，资深民族主义者费尔哈特·阿拔斯当选为总统，本贝拉为总理。

本贝拉面对的是一个经历了 132 年殖民主义和残酷解放战争的阿尔及利亚。北非法国居民的逃离（*Exode*）也意味着阿尔及利亚损失了大量国家骨干人才和行政管理人员。法国的应对方式是：给予大规模的援助（“合作”），包括技术与文化援助，如提供技术人员和教师。保留法国人，包括军事基地，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愿望互相矛盾，但对于政府精英来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由于后殖民时代法国—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内在关系，双方既冲突又合作，似乎是一种悖论（参见 Naylor 2000a）。埃维昂协议对二者未来关系作了规定，但变迁中的重

218 大历史事件迅速对此构成挑战。考虑到北非法国居民疯狂出逃的现实，保护他们的规定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成为不合时宜的事情。再者，的黎波里为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设计了一套社会主义规划，暗中切合法国的长期利益，特别是在碳氢部门的利益。尽管阿尔及利亚面对着多重错位，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重要问题。本贝拉及其继承者已经直接或间接提出构想，即阿尔及利亚仍然需要将自己从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以便构建一种真正的国家认同。因此，法农所提及的心理存在主义情景在后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普遍存在。①

后殖民时代阿尔及利亚政治的特点是对外排斥而不是内向包容。按照1964年阿尔及尔宪章规定，民族解放阵线成为阿尔及利亚唯一的合法政党。在劳工关系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全国劳动者总同盟（UG-TA）处于民族解放阵线的控制之下，新宪政党与突尼斯总工会关系相类似。1963年的宪法架构规定了总统的主导地位。随后，本贝拉被选举为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统，任期五年。他的威权主义疏远了费尔哈特·阿拔斯，后者辞去国民大会主席一职以示抗议。另一位杰出的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海德尔（Mohammed Khider）也辞去民族解放阵线秘书长一职，流落他乡，据说携走一大笔政党基金。1963年，民族解放阵线的奠基者之一——卡拜尔人侯赛因·艾特·艾哈迈德（Ho-cine Ait Ahmed）与海德尔一样，领导社会主义武装阵线［Socialist Forces Front（FFS）］发动武装叛乱。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社区冲突像幽灵一样对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构成严重威胁。

就在卡拜尔人叛乱蔓延之际，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关系迅速恶化。1961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与摩洛哥签署协议（费尔哈特·阿拔斯主持协商），规定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再处理两国边界问题。本贝拉对此协议置之不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发兵边境，决定迫使

①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受挫精英（fractured elite）以及随后建立的专属机构和政府机构。克莱门特·亨利·摩尔（Clement Henry Moore）在此期间的作品写道："阿尔及利亚缺乏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精英。"（Moore 1970，128）

阿尔及利亚政府考虑处理两国边界问题。随后两国爆发战争，阿尔及利亚军队显示出优势。1963 年 11—12 月的“沙漠之战”（War of the Sands）给国家带来危机，叛军首领艾特·艾哈迈德的一名军官与本贝拉和解。领导层的损失严重削弱了叛军的力量，1964 年，叛乱遭受镇压。艾特·艾哈迈德被投入监狱后逃脱。1964 年，阿尔及利亚武装部队司令穆罕默德·沙班尼（Mohamed Chaabani）发动叛乱。他对本贝拉的社会主义诉求充满质疑，这似乎符合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个性。沙班尼被捕后处死。

219

尽管政治上遭受重重威胁，但本贝拉及其对手都想方设法结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新殖民主义。1962 年和 1963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没收了废弃的、无人认领的财产，使遣返的法国白人与法国政府感到不安。[①] 埃维昂协议保证法国石油公司在撒哈拉地区享有特权，但本贝拉成立了阿尔及利亚国家天然气石油公司（SONATRACH）与国际石油公司相竞争。[②] 再者，本贝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支持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信奉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小学课程就开始阿拉伯化。埃维昂协议允许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拥有军事基地（包括原子弹试验场），但他们退出撒哈拉地区，将太平洋作为实验场地。

本贝拉和布迈丁的关系一直不和，后者批评前者行为反复无常。当本贝拉试图从内阁中清除布迈丁的支持者，这位上校提前采取行动。1965 年 6 月 19 日，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暂停实施宪法。

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构建国家（1965—1978）

布迈丁严肃认真的脾气与本贝拉天真率直的秉性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们具有共同理想，即完成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和社会主义化（socialization）。1965 年 7 月的阿尔及尔协议重新规定了法国在撒哈拉

---

① 阿尔及利亚查封这些财产，并开始了别出心裁的自我管理（*autogestion*）体系。后来成为政府的官僚机构（参见 Clegg 1971）。

② 碳氢的研究、生产、运输、加工和销售国有公司［National Company for Research,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of Hydrocarbons（SONATRACH）］。

地区油气生产的地位。此外，法国同意帮助阿尔及利亚实现工业化。[1]布迈丁开始了国有计划经济时代，1967 年启动了第一个“计划前”的准备阶段。1970 年，阿尔及利亚开始了大规模的五年计划。计划强调的重心是工业化——工业与制造业（“工业化的工业”）。

1971 年 2 月，经过艰苦且令人失望的协商谈判，布迈丁将撒哈拉地区的法国油气公司收归国有，取消了所有特权。这件事是“后殖民时代非殖民化”的典型个案。法国—阿尔及利亚关系陡然下降。到 1973 年 7 月，当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访问巴黎时，两国才知道他们互相需要。例如，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就有 100 万，他们对法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人的侨汇对于阿尔及利亚的国际收支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布特弗利卡访问法国后不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区不断发生暴力事件，布迈丁决定停止向法移民。由于当时法国经济不佳和失业率剧增，该决议引来一片争议之声。

220

1971 年，阿尔及利亚官方宣布土地革命，农业部门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修建 1000 个社会主义农庄，开垦并重新分配土地。该计划首先对准无主土地。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政府发动文化革命，与教育和社会领域的加速阿拉伯化形成互动。[2] 尽管布迈丁深受法农思想的影响，但他也认识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意义。[3]例如，他将阿尔及利亚的周末时间从西方的星期六和星期日改为穆斯林的星期四和星期五。

布迈丁认为，阿尔及利亚应该在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阿尔及利亚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撒哈拉地区的法国石油公司国有化，增强了其革命性国家的形象。他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后来谴责萨达

---

① “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设计了许多 11 小时社会和经济项目。

② 例如，街上的标语从法语改为阿拉伯语，但问题也出现了，因为阿尔及利亚人不认识阿拉伯语。

③ 例如，他赞同一个深受马利克·本纳比影响的价值观组织（al-Qiyam），后者是阿尔及尔大学的行政人员与教授。1966 年，布迈丁政府解散该组织。本纳比最后在他的家乡主持私人“研讨会”，传播他的伊斯兰主义。

特与以色列的和平尝试。1974 年，阿尔及利亚资助一次关于南北关系的联合国特殊会议，会议主题是介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平等的相关情况。布迈丁主政的阿尔及利亚在发展中国家“77 国组织”（Group of 77）中扮演着积极作用。

布迈丁在统治初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暗杀他的未遂阴谋与政变层出不穷。杀害潜在的政敌穆罕默德·海德尔（死于 1967 年）和贝勒卡西姆·克里姆（Belkacem Krim，死于 1970 年，他领导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小组，签署埃维昂协议）的凶手可能是阿尔及利亚特殊部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布迈丁大权在握，在国际社会也声名显赫。

1975 年 4 月，法国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访问阿尔及尔，表明两国决心和解的高姿态。然而，法国从阿尔及利亚的油气进口并不多，表明两国的贸易并不平衡，但最重要的是，法国明显支持 1975 年的马德里和会，该会议将归属西班牙的撒哈拉分别划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解除关系也预示着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特权优惠的结束。随后，布迈丁给予萨拉威解放组织西撒哈拉独立阵线（POLISARIO）大量援助（参见下文）。

221

1976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颁布国家宪章（National Charter），规定阿尔及利亚是社会主义和伊斯兰国家。同时颁布的新宪法赋予总统较大权力，允许国家民众大会［National Popular Assembly（ANP）］存在。然而，民族解放阵线仍是唯一的合法政党。

随着社会经济革命和崭新的制度体系的建立，后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提出发展计划。但是否能够完成，值得质疑。布迈丁做出了许多突出成就，但他仍然排斥而不是吸纳其他力量进入政治体系。他构建了一个国家（state），但那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吗?[①] 1978 年 12 月，布迈丁死于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

---

① 约翰·恩特里斯（John Entelis）在他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作品中将阿尔及利亚描述为一个“官僚政治——即权力与国家决策几乎全由国家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最高层的军官部队、政党组织以及文官政治，包括属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主要社会经济阶层”（Entelis 1986，208）。

沙德利·本贾迪德（Chadli Benjedid）：改革、动荡和悲剧

始于1976年的阿尔及利亚新宪法，确保了布迈丁死后总统职位的顺利交接。布迈丁的继承者沙德利·本贾迪德的意识形态色彩淡薄。他刚开始沿袭了布迈丁的社会主义指向，但随后又谨慎地开启了自由化行动。本贾迪德政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80—1984年）给予农业更多关注，其原因是阿尔及利亚人口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粮食进口。工业部门也继续得到大量资金投入。很明显，本贾迪德想去平衡各部门发展，这一点在1985到1989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得到证明。随后，农业革命被废除，农业实行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骤降，对天然气价格产生影响，震撼了整个经济体系。1986年，阿尔及利亚为了吸引外资，开始了油气部门的自由化。

本贾迪德的经济重新定位也与其外交政策有关。本贝拉和布迈丁为阿尔及利亚构建的国际威望，使这个国家成为斡旋和调解国际纠纷的中间力量。阿尔及利亚在解决美国与伊朗444天的人质危机（1979—1981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尔及利亚在斡旋伊朗—伊拉克战争中努力奔走，以至于搭上了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本·叶海亚（Mohamed Benyahia）的性命，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1983年和1987年，本贾迪德两次会见国王侯赛因二世。1988年，阿尔及利亚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因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关系破裂）。1989年，阿尔及利亚确保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成立。1983年，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签署友好协定，表明本贾迪德对地区事务而不是全球事务感兴趣。1981年11月，法国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访问阿尔及利亚，两国关系迅速改善。双方在随后几年签署一系列协议，推动各个领域的“合作发展”（co-development），特别是在碳氢部门（1982年2月的天然气协议）。20世纪80年代，尽管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关系冷淡，但两国在1989年1月签署了金融与天然气协议，3月密特朗短期访问法国。

本贾迪德统治期间的另一主题就是去集权化。阿尔及利亚的省份

从34个增加到48个，地方参与度大大增强。阿尔及利亚政府还改组国有企业，如阿尔及利亚国家天然气公司。尽管有这些重要的变化，然而“充实后”的1986年国民宪章重复了昔日的社会主义的原理；这次变化主要体现在表面而不具有实质内容。然而，这次宪章增加了历史部分，承认民族主义者，包括梅萨利·哈吉在构建国家所作出的努力。此外，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拉姆丹·阿班、穆罕默德·海德尔和贝勒卡西姆·克里姆死后，恢复其名誉。①

整个20世纪80年代，公众普遍承认本贾迪德实行的是谨慎节俭、深思熟虑的自由化政策。然而，有迹象表明，尽管阿尔及利亚社会长期稳定，统治者也引以为豪，但一切并不顺利。就在民族解放阵线精英内部，反对自由化的也大有人在。批评者认为，改变社会主义等于宣布放弃革命。1981年，女权主义者成功地抵制了一部保守的家庭法。然而，1984年，阿尔及利亚通过法律，重新强调父权制和沙里亚在阿尔及利亚法律体系中的作用。伊斯兰激进分子也成为暴乱分子。穆斯塔法·布亚利（Mustapha Bouyali）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武装伊斯兰运动［Armed Islamic（Algerian）Morement］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的暴力程度。布亚利谴责了国家的世俗化性质，并掀起一场暴乱。1987年，布亚利死去，暴乱随之结束。阿尔及利亚政府强调阿拉伯化和阿拉伯认同，这一点在文化革命上已有表现，并导致1980年柏柏尔人卡尔拜人发生大规模冲突。随后，1982年和1986年，又接连发生其他暴力事件。②

阿尔及利亚每年财政预算中的教育拨款是相当可观的，但受教育后的年轻人没有就业机会。由于缺乏增加经济收入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再加上政治上受排斥，这些年轻人疏离国家、蔑视社会。阿尔及利亚年轻人与突尼斯、摩洛哥的年轻人一样，转而接受激进的伊斯

---

① 1979年，本贾迪德命令将软禁中的本贝拉予以释放。1980年，本贝拉前往欧洲。1984年，成立反对党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The Algerian Movement for Democracy（MDA）］。

② 1980年，因为描写和分析“柏柏尔人的春天”而爆发示威与抗议，以及她在卡比利亚（Kabylia）倔强的柏柏尔人的个人经历，参见Goodman 2005，29—48。

223 兰，作为发泄不同政见的可行渠道。油价崩溃产生各种负面的社会与经济后果。阿尔及利亚减少政府补贴，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引发了民众抗议与罢工。1988 年 10 月，国民对贫困境遇产生不满，阿尔及尔出现骚乱，并蔓延到整个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政府采取野蛮的镇压政策，人员伤亡无数。① 1988 年 10 月的骚乱是阿尔及利亚历史的转折点。阿尔及利亚政治合法性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遗产受到质疑。

伊斯兰内战（The Fitna）：阿尔及利亚的严峻考验

在阿拉伯语中，fitna 的意思是严峻考验、诱惑以及冲突。该词的多重含义均适应于 1988 年以来的阿尔及利亚。1989 年，本贾迪德在骚乱之后颁布新宪法并启动改革计划，允许反对党合法化。民族解放阵线对阿尔及利亚政治垄断的时代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允许民众自由表达意见，出版物也飞速增加。阿尔及利亚成为阿拉伯世界自由度最高的国家。② 1989 年 9 月，阿尔及利亚官方承认政党存在，包括伊斯兰救赎阵线［the Islamic Salvation Front（FIS）］。12 月，长期流亡在外的政治反对派侯赛因·艾特·艾哈迈德也回到阿尔及利亚，他的社会主义武装阵线［Socialist Forces Front（FFS）］也获得官方认可。1990 年，本贝拉到达阿尔及利亚。1990 年，许多政党公布候选人自由参与地方选举。令阿尔及利亚和世人惊奇的是，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救赎阵线顺利赢得大选。另一方面，鉴于动荡不安的局势，阿尔及利亚政府取消了预定于 1991 年 6 月的议会选举。当局逮捕伊斯兰救赎阵线领导人阿巴西·迈达尼（Abassi Madani）和阿里·本哈德杰（Ali Benhadj）。1990 年 12 月至 1991 年 1 月，阿尔及利亚重新计划选举，震惊阿尔及利亚全国与国际社会。在第一轮的选举中，伊斯兰救赎阵

---

① 官方报告为 161 人被杀，154 人受伤，但外界认为这一数字不准确，对阿尔及利亚政府进行严厉批评。

② 阿泽迪尼·拉亚希（Azzedine Layachi）指出，阿尔及利亚迅速变迁的政治文化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政治自由化启动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发现，执行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些领域的改革构想以前一直由技术专家和政治精英所垄断。"（Layachi 1996，147）

线居主导，并承诺控制国家民众大会［National Popular Assembly（APN）］，改革宪法和政府。1992 年 1 月，民众与军队精英担心出现一个伊斯兰政府，在能确保伊斯兰救赎阵线胜利的第二轮选举之前，推翻了本贾迪德政府。[①]

3 月，名为国家高级委员会［High State Committee（HCE）］的新政府立刻取消大选并宣布伊斯兰救赎阵线非法。国家高级委员会的领袖穆罕默德·布迪亚夫（Mohamed Boudiaf）是一名被遣返回国的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领导人和创办人之一。他以诚实正直而著称于世，试图动员民众支持自己的政府。他的目标是清除国家腐败。其雄心勃勃 224 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得到好下场，6 月份惨遭暗杀，死于非命。布迪亚夫之死被归咎于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但他的改革也威胁到在军队中居主导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布迪亚夫的利益。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位受尊重的退伍老兵阿里·卡菲（Ali Kafi）替换布迪亚夫，但阿里·卡菲并没有布迪亚夫的威望与魅力。当时，国内暴力开始愈演愈烈。MIA 得以重组，伊斯兰救赎阵线的军事武装伊斯兰救赎军队［Islamic SalvationArmy（AIS）］加强动员。1993 年，武装伊斯兰组织［Armed Islamic Group（GIA）］出现在阿尔及利亚，打击目标对准外国人。残忍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

将这一时期称为内战时期是错误的。这并不是国家（或者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相竞争的二元博弈，[②] 而是一种国家内部的冲突，其中部分属于社区间冲突。然而，媒体、民众与相关出版物将这种暴力称为内战。付出的人力成本也是巨大的——死亡人数达 15 万到 20 万之间（数字包括零星的、不定时的暴力）。1995 年 1 月，反对党经过努力，成立联合阵线，结束了这场冲突。各方在罗马的桑特埃吉

① 既得利益集团也担心伊斯兰救赎阵线将追查他们的贪污腐败（参见 Martinez 2005，18）

② 这一悲剧性冲突有许多维度。例如，这次斗争为叛乱分子授予经济与社会权力提供机会，引发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埃米尔"和奥斯曼海盗之间的比较关系（参见 Martinez 2000，137—146）。

迪欧（Sant'Egidio）召开会议，形成寻求各方和解的文本文件。[①] 阿尔及利亚政府拒绝强加的解决之道，而是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

1994 年 1 月，国家高级委员会自动解散，国防部长利亚米纳·泽鲁阿勒成为阿尔及利亚总统。1995 年 11 月，他经过深思熟虑启动了阿尔及利亚的“再民主化”（redemocratization）进程，其特点是候选人的多层次性和投票者的高比率。这次选举禁止伊斯兰救赎阵线参与，但允许温和的伊斯兰政党参加选举。泽鲁阿勒被授权统治阿尔及利亚。然而，他的统治就像他自己一样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既想对叛乱分子实行怀柔政策，但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又想将叛乱分子彻底清除。1996 年的新宪法将许多权力赋予总统，重新创立国家民众大会［the National Popular Assembly（APN）］，还增加了一个上议院，即国家委员会［Council of the Nation（CN）］——有时被称为“参议院”（Senate）。20 世纪 90 年代，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援助以及重新安排公共与私人外债（分别是巴黎和伦敦俱乐部）的情况下，对叛乱分子进行镇压。法国提供了特别的支持。[②] 1997 年末和 1998 年初，阿尔及利亚爆发了恐怖暴力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欧盟与联合国派出调查团，但提供的报告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阿尔及利亚政府小心谨慎地监视着再民主化和再制度化的进程。随后阿尔及利亚在 1997 年 6 月和 10 月进行议会选举。泽鲁阿勒所在的政党——国家民主集会［National Democratic Rally（RND）］在选举博弈中居主导地位。[③] 尽管这些选举活动取得了成功，但泽鲁阿勒在 1998 年宣布在任期结束前退休。1999 年 4 月，预定中的总统选举正常进行。

225

① 这一文本文件为“政治与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构建了平台”。这就是著名的“国家契约”（National Contract）。

② 这次暴力指的是 1995 年和 1996 年的内战，蔓延到巴黎。

③ 1996 年的修改宪法禁止宗教性的政党存在。对于伊斯兰政党和武装组织的考察，参见 Layachi 2005，54—56。

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复位与和解

7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但就在选举进行前出现舞弊行为。6名候选人自动撤出，仅剩布迈丁执政时的外交部长与门生布特弗利卡，成为唯一的候选人。因此，布特弗利卡的总统职位一开始就充满争议。不过，布特弗利卡自任总统之日起，就追寻着两个重要目标——恢复阿尔及利亚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实现国家和解。他尽管也取悦了既得利益集团（Pouvoir，特别是军队），但也极力推进文官政治，后者意味着他个人权力的增加。他提出了"国内和解"（Civil Concord）建议，并立法规定对那些没有犯有特大暴行的叛乱分子实行特赦。1999年9月，该建议获得了98%的赞成票，85%的选民参与了投票。当时，伊斯兰救赎军队利用布特弗利卡的特赦，签署停火协议并自动解散。武装伊斯兰组织与一个名为布道与遏制萨拉菲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抵制该计划，继续反对政府。不过很明显，到2000年，叛乱活动被极大地削弱了。

布特弗利卡要求阿尔及利亚在国际社会上出头露面。2000年6月，他访问法国，被认为是第一位访问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总统。[①] 同年晚些时候，他帮助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进行和平协商。2001年，布特弗利卡两次访问华盛顿，也是"9·11事件"后第一位向美国表示同情并提供援助的国家。他主持了2005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阿盟峰会，恢复了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生机，并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亲切会谈。随后，由于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分歧，两国关系逐渐冷淡。

布特弗利卡的权威也面临着严重挑战。2004年4月，一名卡拜尔年轻人在警察局拘留期间死去。随后，这一事件引发的暴力行为致使100多人丧生。[②] 卡拜尔人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阿拉伯化政策极为愤 226

---

① 1983年，本贾迪德访问法国，但受到的接待并不是"国事访问"规格。

② 1998年6月，卡拜尔人歌手——激进分子马图卜（Lounès Matoub）死去，在该地区引起强大的反响（参见 Silverstein 2003，101—103）。

怒，这等于当局否认他们的语言（塔马塞特文）与文化。他们的抱怨与不满成为2001年6月卡瑟尔论坛（Kseur Platform）的一部分，即废除卡拜尔人不能充当警察的规定，推进塔马塞特文为国家语言和官方语言，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以及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卡瑟尔论坛的各个层面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①] 2001年11月，阿尔及利亚骤发洪水，阿尔及尔的死亡人数约750人。民众指责政府没有构建合适的污水管道系统，更没有有效地治理洪水。2003年5月，阿尔及尔东部发生地震，2250人死亡，10500人受伤。阿尔及利亚政府对这些突发事件反应迟钝，对布特弗利卡的总统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不过，民众很欣赏布特弗利卡恢复阿尔及利亚在国际社会威望上所取得的成绩。就在此时，另一件事情发生了。民族解放阵线重新主导政坛，这在2002年的议会和地方选举中得以证明。2004年4月，阿尔及利亚举行总统选举，布特弗利卡获得85%的选票——结果出乎意料。11月，他在解放战争开始15周年纪念日上建议实施另一次特赦。

2005年8月，布特弗利卡详细说明了"和平与国家和解宪章"（Charter for Peace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对1999年"公民和谐"特赦结束以来的所有叛乱分子实行特赦，但参与大屠杀以及严重暴力者除外（宪章也保护参与反暴力行动的安全部队，后者免于起诉）。2005年9月，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公投，80%的选民参与，宪章以98%的赞成票通过。2006年3月，阿尔及利亚议会批准宪章，狱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获释。许多挑剔的观察家认为，布特弗利卡的和解政策培养了一种原谅—忘记（forgive-and-forget）的心态，而不是清晰地阐明持续内战的原因、过程以及后果（参见 Tlemçani 2008, 15）。2007年初，布道与遏制萨拉菲组织，现在称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地区基地组织［Al-Qa'ida in the（Land of the）Islamic Maghrib，AQ（L）IM］的

① 卡瑟尔论坛是卡拜尔积极分子和政府之间讨论的基础，关于这一平台的详细阐述，参见 Bennadji 2003, 139—145。

227

袭击活动逐步升级。2007 年 4 月和 12 月，该组织在阿尔及尔制造了震惊于世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几十人丧生或受伤。很明显，伊斯兰极端主义是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的重要威胁。此外，2007 年 5 月，阿尔及利亚立法选举参与人数较少，仅有 35% 的选民参与。据报道，这也表明了民众“普遍的绝望与冷漠”（Ouali 2007；也见 Whitlock 2007）。11 月份举行的地方与省级选举吸引了 44% 的选民参与，这也标志着主导政坛的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地位的下降，而与之意识形态相近的竞争者国家民主集会也付出了代价。

布特弗利卡任总统期间的突出特征就是追求国家和解。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削弱了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然而，布特弗利卡威权政治也越来越引起关注。预计目前阿尔及利亚搁置的宪法修改允许他第三次上台执政，可能不久将兑现。然而，观察家想知道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

阿尔及利亚的经济与社会

碳氢部门主导着阿尔及利亚经济。阿尔及利亚 95% 的出口收入来自油气销售［供应欧盟进口的 25%（EIU 2007d）］。到 2007 年末，由于高油价和油气需求旺盛，阿尔及利亚约有 1000 亿美元的货币储备。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阿尔及利亚还减少了近 50 亿美元的外债。2005 年，通货膨胀从 1992 年的 32% 降到 2005 年的 2%（IMF 2007f, 11）。阿尔及利亚仍必须进口大量粮食，但据报告，农业部门已经有所改进［如硬质小麦、马铃薯生产（参见 IMF 2007e, 11）］。服务业（特别是住房供应与供水）受到关注。但对政府的批评之声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预计阿尔及利亚最终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 12 月，阿尔及利亚与欧盟签署了准会员国协定。

阿尔及利亚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 1999 年的 3.2% 增加到 2003 年的 6.9%（IMF 2005d, 3）。预计 2008—2011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将以 6% 的增长率继续增长（EIU 2007a）。2005 年，石油生产（和替补）将达到 6250 万公吨，而 2001 年的产量则是 4060 万公吨。此外，天然

气的总产量将从2001年的1732亿立方米增加到2005年的1932亿立方米（IMF 2007e, 7—8）。就在2008年末经济不景气前，阿尔及利亚得益于碳氢收入的支持，经济经历了一段繁荣景象。这种繁荣为确保
228 部门发展所准备、计划和执行的项目提供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机会。[①]然而，对于改革金融制度与监督管理服务、推进经济多元化、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和国内民众投资、增加贸易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来说，上述局面是迫切需要改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住房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的心病。尽管国家富有，但半失业者或失业者属于社会下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证实，阿尔及利亚失业率为劳动人口的20%和25%，但官方报道的失业率相当低。[②] 其原因在于：经济的普遍增长、公共部门在建筑业和公共工程的投资以及私人部门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但许多都是临时性的工作，而不是长期固定工作（IMF 2007f, 19）。今天，阿尔及利亚的人口约接近3.2亿，增长率相当低。不过，导致1988年10月暴动的变量仍然潜在且极其危险。马丁·埃文斯（Martin Evans）和约翰·菲利普（John Phillips）指出，“愤怒不会自动消失”［他们出版的书“后记”（Afterword）］，并得出结论：“阿尔及利亚人感到愤怒和失望，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未来和希望”（Evans and Phillips 2007, 297）。如何调节这些愤怒情绪成为阿尔及利亚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

摩洛哥

如果不是穆罕默德五世最终死去的话，那么评估后殖民时代摩洛哥如何演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吸引人的魅力个性将会被遗忘。穆罕默德五世之子，也是他的继承人哈桑二世，尽管

① 2001年，阿尔及利亚政府执行了“经济恢复项目和经济增长巩固项目”（Economic Recovery Program and Growth Consolidation Program），该项目对非碳氢部门受益匪浅（IMF 2007f, 4—5）。经济增长巩固项目（2005—2009）是第三产业的特别计划，公共投资项目金额达1400亿美元，希望解决失业问题（IMF 2007b, 4—5）。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阿尔及利亚在2004年和2005年的失业率分别为17.7%和15.4%（IMF 2007e, 18）。非碳氢部门雇佣了全部劳动力的98%（IMF 2007f, 3）。

政治上非常有能力，但仍是一位专制统治者。不过，他在统治后期实施的自由“开放”政策，值得称道。摩洛哥政府控制并遏制反对派。在对外政策层面，哈桑二世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以保障摩洛哥的“稳定”。不过，两次政变未遂，暴露了军方对现政权的不满。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调整军队，实现民众渴望的“大摩洛哥”（Greater Morocco）计划，哈桑开始着手接管西撒哈拉的行动。

哈桑之子，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统治之初开始释放政治犯，允许更开放的市民社会。他随后实施有限制的政治包容，并维持君主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不过，问题是：作为权力“仲裁者”（arbiter）的国王如何才能在历史发展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呢（参见 Waterbury 1970）？

哈桑国王：福音（*Baraka*）与雄心抱负

229

穆罕默德苏丹在非殖民化期间所累积的威望使他在后殖民时代初期获得了影响与权力无懈可击。作为独立摩洛哥的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同情阿尔及利亚革命，但他的支持非常谨慎，并没有疏远提供技术等援助的法国。他通过以下措施确保国家独立：1957 年镇压柏柏尔人起义，将解放军与王室部队［Royal Armed Forces（FAR）］合并，解除非正规军，改革苏菲社团。国王确保自己控制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他还鼓励多党制，反对一党制国家。这些统治策略保护了君主制，阻止形成强大的政治反对派。1959 年，独立党（Istiqlal）以穆罕默德·阿拉勒·法西（Muhammad Allal al-Fasi）和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为领袖分成两派，后者具有左倾倾向，并成立了民众力量总工会［National Union of Popular Forces（UNFP）］。穆罕默德五世意外死去，皇储哈桑继位成为国王。

哈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擅长政治。他在位期间，为摩洛哥制定了五部宪法（1962 年、1970 年、1972 年、1992 年和 1996 年）。1963 年，他划分或重新界定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边界线，引发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沙漠之战”（War of the Sands），两国的“兄弟情义”

就此结束（参见上文）。迈赫迪·本·巴尔卡是君主制政权的严厉批评者，但在1965年，摩洛哥特工在巴黎将他绑架，随后杀死了这位反对派领导人。这件事造成摩洛哥与法国关系的不睦。本·巴尔卡之死并没有结束反对派活动，1970年颁布的新宪法重新巩固了国王的政治主导地位。

哈桑在1957年的王室部队建立中起着直接作用。1971年和1972年，军方两次发动袭击，哈桑险些丧命。人们普遍认为，他能够活下来是福音或运气（*baraka*）。[①] 在清除军队中的反对派后，哈桑利用西班牙的虚弱状况，使国家和军队从事冒险事业。这件事导致他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境遇，但也确保了君主制政权的安全。

摩洛哥和西撒哈拉

摩洛哥之所以对西属撒哈拉（Spanish Sahara）感兴趣，与其君主将摩洛哥幻想成为一个强大国家有关。摩洛哥从历史传统出发，认为

230

西属撒哈拉是有争议的“化外之地”（*bilad al-siba*）。如果从短期历史来看，摩洛哥的所作所为相当于历史上萨阿德王朝和阿拉维王朝对外扩张，征服这里的部族使之效忠。[②] 1956年6月，阿拉勒·法西说道：“如果摩洛哥是独立国家，那么我们的统一大业并没有完成。摩洛哥人会继续奋斗，直到征服丹吉尔以及从廷杜夫（Tindouf）到科洛姆－贝沙尔（Colomb-Bechar）、图瓦特（Touat）、凯纳迪扎（Kenadza）的撒哈拉地区，解放毛里塔尼亚，从而完成统一大业。我们的独立仅能与撒哈拉地区联为一体！摩洛哥的南部边疆应该在塞内加尔的圣路易”（Hodges 1983，85）。独立党的报纸《世界报》（*Al-Alam*）

---

① 针对王室的暴力行为仍在继续。1972年，叛乱分子在纳多尔（Nador）和乌季达（Oujda）制造爆炸事件。卡萨布兰卡和拉巴特的爆炸装置被及时解除。阿尔及利亚牵涉其中，因为很明显，一些叛乱分子是从阿尔及利亚进入摩洛哥（参见 Knapp 1977，310）。

② 当然，从毛里塔尼亚/萨拉威人的观点来看，摩洛哥是穆拉比德帝国的一部分。可以说，穆拉比德人属于来自毛里塔尼亚和西撒哈拉地区的桑哈加柏柏尔人（参见第四章）。欧内斯特·盖尔纳曾提及罗伯特·蒙塔涅，将摩洛哥力量的兴衰和影响描述为“动荡不安”（oscillation）（Gellner 1969，4，64—66；也参见 Montagne 1973）。

出版了一副大摩洛哥地图，君主制政权对此大力拥护。1956 年，西班牙将丹吉尔归还摩洛哥。1958 年，西班牙放弃了摩洛哥南部的塔尔法亚（Tarfaya）地区。与此同时，1957 年，摩洛哥索要伊夫尼、西属撒哈拉以及毛里塔尼亚。

哈桑二世继承王位后，对大摩洛哥计划持温和态度，执行着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政策，对西班牙也充满耐心。1963 年，他在马德里附近的巴拉哈斯国际机场（Barajas airport）会见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并建立友好关系。两年后，哈桑在安达卢西亚的一次狩猎聚会中，参与佛朗哥阵营。哈桑谨慎地对待佛朗哥（包括独裁者们的物以类聚）颇有成效，1969 年，西班牙将伊夫尼转让给摩洛哥。同年，哈桑和布迈丁在摩洛哥的伊夫兰消弭分歧。1972 年，两国签署条约，解决边界争端（廷杜夫归属阿尔及利亚，共同开发这里的铁矿石）。阿尔及利亚欣然同意，而摩洛哥没有答应。[①] 1970 年，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关系实现正常化，前者似乎放弃了包括毛里塔尼亚在内的大摩洛哥计划。

1974 年 7 月，西班牙宣布西属撒哈拉开始内部自治。这一声明使摩洛哥大吃一惊，这将意味着西班牙要让西撒哈拉地区走上一条民族自决之路。摩洛哥的担心不无道理。8 月，西班牙宣布，将与联合国联合在一起，于 1975 年的上半年举行公民投票。尽管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一再呼吁西属撒哈拉民族自决并支持联合国决议，但西撒哈拉内部的政治气氛悄然生变。摩洛哥认为，萨拉威人会选择与摩洛哥合并，但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组织——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于 1973 年成立并寻求西撒哈拉独立（参见下文）。摩洛哥邀请国际法院考察西撒哈拉的合法历史。这件事得到毛里塔尼亚的支持，也得到联合国决议的允许，后者要求国际法院提出一个“咨询意见”（advisory opinion）。阿尔及利亚也投票赞成执行该决议。

10 月，哈桑国王主持阿拉伯峰会。很明显，他与毛里塔尼亚总统

① 摩洛哥在马格里布联盟形成以前批准了该协定。

穆赫塔尔·乌尔德·达达赫（Mokhtar Ould Daddah）达成一致意见，希望将西属撒哈拉一分为二，分别占有。布迈丁总统重视阿尔及利亚对邻近地区的兴趣，在一次秘密举行关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计划的行政会议上得知了这一消息。据毛里塔尼亚提供的一盘磁带显示，布迈丁同意上述做法。理查德·帕克大使认为，布迈丁可能认为西班牙不会让西撒哈拉地区分裂，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之间不会合作（因为“大摩洛哥”思想就包括了毛里塔尼亚）。布迈丁后来声称，他从来没有答应过该计划（Parker 1987，109—110）。哈桑国王与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举行会谈之后，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似乎达成一致，那就是1975年7月发布的联合公报。该文件显示，阿尔及利亚将支持西属撒哈拉的分割计划。作为交换，摩洛哥承认廷杜夫，并最终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如批准1972年协定）。[①]

然而，布迈丁明显改变了主意（或者说是布特弗利卡的活动能力太强），坚决反对分割计划。也许，布迈丁之所以承认西撒哈拉独立阵线，是因为后者的奋斗历程使他想起了自己当年为阿尔及利亚独立所进行的艰苦岁月。阿尔及利亚外交政策的原则就是呼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否定相当于战争期间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行为，等于否定了阿尔及利亚的意识形态原则和革命民族主义遗产。摩洛哥所追求的大摩洛哥计划也使布迈丁大吃一惊。再者，摩洛哥也没有批准1972年协定。

1975年10月，国际法院重新承认部族与摩洛哥之间存在“效忠的合法关系”，与毛里塔尼亚也在“土地上存在权力关系，构成了二者法律上的联系”。然而，国际法院还得出如下结论：“西撒哈拉领土和摩洛哥王国、毛里塔尼亚之间没有建立领土主权关系”（Jensen 2005，27）。在哈桑看来，这种解释并不足以让摩洛哥合法地接管这块领土。美国大使理查德·帕克认为：“他本来不着边际地告知他的民

232

① 阿尔及利亚人“的话模棱两可”，最后还是彻底支持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关于这一问题的简要分析，参见 Hodges 1983，193—195。

众，他们大获全胜——国际法院也发现，撒哈拉人效忠摩洛哥。按照伊斯兰法，这种效忠等于承认摩洛哥主权，因为这将意味着对国家主权的忠诚与信任。”（Parker 1987，111）[①]

当时，哈桑准备了一场引人瞩目的政治行动。阿尔及利亚政府动员35万没有任何武装的摩洛哥人闯入西属撒哈拉并停留在那里。这被称为“绿色三月”（Green March）。西班牙政府的佛朗哥将军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屡次心脏病复发处于昏迷状态），只好同意将权力交与他人。因此，没有时间与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协商谈判（参见下文）。1975年11月，西班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签署马德里协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将西属撒哈拉瓜分，从而迅速解决了危机。阿尔及利亚受到冷落，十分愤怒。阿尔及利亚为萨拉威难民和游击队提供避难所，对西撒哈拉独立阵线提供后勤补给和政治支持以示报复。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斗争从此开始，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参见下文）。

西撒哈拉问题是摩洛哥的政治难题。一方面，冲突各方的解决态度犹豫不决，使得摩洛哥孤立于其他国家。1976年2月27日，西班牙从西属撒哈拉正式撤军，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宣布成立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the Sahrawi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SADR）］。阿尔及利亚承认西撒哈拉政府，摩洛哥立即与阿尔及利亚断交（1988年复交）。1994年，非洲统一组织承认西撒哈拉为其成员国，摩洛哥随后退出该组织。另一方面，吞并西撒哈拉的要求将使摩洛哥国内的左右政党联合起来。摩洛哥国内也很少有人反对或抗议政府对西撒哈拉的政策。[②] 更重要的是，实现“大摩洛哥”的努力增强了君主制政权的力量和威信。另一方面，战争与占领西撒哈拉的管理费用也十分昂贵，再加上磷酸盐价格的下跌，摩洛哥财政不断恶化。摩洛哥国内的动荡、

---

① 理查德·帕克对这些事情特别熟悉，他在此期间担任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大使。最近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在西班牙从西撒哈拉地区撤退以及随后摩洛哥接管该地区的过程中有同谋关系（参见 Mundy 2006）。这些决策属于最高机密，并不透露给大使（Mundy 2006，292）。

② 主要人物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亚伯拉罕·塞尔法蒂（Abraham Serfaty）（参见下文）

国内对西撒哈拉问题的激烈讨论，以及摩洛哥学校里萨拉威学生的呼吁，影响着当局对西撒拉问题的主导诉求。

穆罕默德六世登上王位

233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以严厉镇压和随意扣押为特征的“沉重之年”（leaden years）后，[1] 哈桑国王允许一种谨慎的“自由化”政策，包括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与特赦政策。1992年，摩洛哥颁布新宪法。次年，摩洛哥进行了被赞许为自独立以来最自由的议会选举（参见Munson 1999）。1996年，摩洛哥修改宪法，成立两院制议会。1997年，摩洛哥重新举行大选。为了缅怀萨阿德王朝时期的伟大苏丹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al-Mansur）的辉煌（参见第五章），哈桑二世国王也“重新展示”他的君主制政权，树立一种政治宽容、社会包容、容纳劝诫的形象，关注被疏忽的弱势群体。上述做法即使是象征性的，不具实质内容，也已经具有进步意义，如保护妇女利益。改革君主制政权的典型个案就是：1993年，摩洛哥举行开放哈桑二世清真寺的庆祝活动，试图将国家统一起来，提高君主制政权的地位（参见Combs-Schilling 1999）。就在国王侯赛因死去的前一年，苏珊·华尔兹（Susan E. Waltz）指出：“摩洛哥的政治问题远远没有消失，但扩大议会权力，容忍不同政见者的苗头已经显现。”（Waltz 1999, 301）

1999年7月，哈桑国王举行葬礼，许多国际知名人士赏脸光临摩洛哥。贵宾们对穆罕默德六世的表现留下深刻印象。[2] 国内人都期望他能够与民众分享权力（参见Ferrié 2002; Howe 2005）。他随后宣布，摩洛哥成立人权委员会，调查任意羁留、滥用暴行等案件。他允许一位支持西撒哈拉自决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亚伯拉罕·塞尔法蒂（Abraham Serfaty）从流放地回来。他还将一位有权势、喜欢镇压民众的内务部长德里斯·巴斯里（Driss Basri）解除职务——人们一直认为他是

① 相关论述参见Ben Jelloun 2006。

② 穆罕默德国王会见了布特弗利卡。实际上，布特弗利卡也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握手言和，这属于阿尔及利亚支持巴解组织的例外情况。

摩洛哥政府的幕后掌权人物（éminence grise）。2000 年，国王释放了软禁中的正义与慈善组织（Justice and Charity Group）成员，也是伊斯兰激进分子谢赫阿卜杜勒－萨拉姆·亚辛（Abdessalam Yassine），不过他仍处于被监视状态。[①] 谢赫挑战哈桑的合法性，被称为"信仰的指挥官"（*amir al mu'minin*），并提议穆罕默德六世用皇家基金偿还国家债务。2000 年，新国王意识到日益崛起的柏柏尔人运动，成立了柏柏尔文化皇家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for Amazigh Culture）。

国王宣布，不会改变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立场。他极力回避布特弗利卡召开峰会的建议。2005 年 3 月，他们在阿尔及尔召开阿盟峰会时进行简短会面，会议表面上谦恭有礼，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内容。他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持偏激立场，阻止对话的深入进行。 234

2003 年 5 月，恐怖主义在卡萨布兰卡引爆炸弹，目标是旅游地点和犹太人居住点，炸死 45 人，这对摩洛哥是一次沉重打击。肇事者是本土的摩洛哥人。历史上的摩洛哥实行文化宽容政策。据说，恐怖主义四处开花，并不一定是在摩洛哥，而且肯定不能在大都市卡萨布兰卡。2004 年 3 月，摩洛哥被大规模地卷入马德里的恐怖主义袭击。191 人被杀，1 800 人受伤。2007 年 3 月和 4 月，卡萨布兰卡又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这次有人受伤，但没有人死亡。

伊斯兰激进力量对摩洛哥君主制造成极大威胁。2002 年 9 月，议会选举内阁代表一事揭示了温和伊斯兰组织正义和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PJD）］的力量，后者成为内阁代表中第三个势力强大的政党。[②] 五年后，正义和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为仅次于独立党的第二大党，但选民参与率极低（仅有 37% 的选民参与）。谢赫亚辛及其女儿纳迪亚（Nadia）继续表达他们的反对立场。穆罕默德六世在

① 1974 年，亚辛（Yassine）谢赫派人将一本 124 页长的小册子呈送国王，要求改革由乌里玛选择的哈里发制度。1984 年，谢赫遭逮捕，判处两年牢狱生涯。1989 年以来，他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

② 1996 年宪法，增加了上议院，也就是顾问内阁。

政治操作方面已经展示出灵活性，但他会乐意将政治权力与别人分享吗?[①] 那么，他的政治底线又是什么呢?

摩洛哥的外交政策

尽管摩洛哥最终确保了西撒哈拉地区的安全，但其国际地位却衰落了。阿尔及利亚在国际社会的威望有助于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在对外交往中获得特权与身份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近60个国家承认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②] 1984年11月，非洲统一组织承认萨拉威共和国，摩洛哥抗议并退出该组织。哈桑国王极尽全力试图在外交政策层面孤立西撒哈拉。1988年，哈桑国王和沙德利·本贾迪德总统（在沙特法赫德国王的主持下）举行峰会，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恢复关系（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双边关系似乎建立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之上）。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的激进伊斯兰叛乱愈演愈烈，这让摩洛哥十分担心。1994年，暴力蔓延到边界线，致使两国关闭边界，对摩洛哥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存在歧见和困难，但两国外交关系持续了较长时间。

235

摩洛哥与美国维持传统意义上的亲密关系。尽管美国声称并不支持“绿色三月”和三方马德里协定，但很难相信没有美国的认可（阿尔及利亚的观点），哈桑会在1975年的行动如此引人注目和决然果断。最近，雅各·芒迪（Jacob Mundy）公布的档案表明，美国盟友支持摩洛哥接管西撒哈拉（参见 Mundy 2006）。再者，美国在冷战期间慷慨

---

① 丹尼尔（Daniel Zisenwine）写道：“君主制国家一直维持摩洛哥的积极主动力量，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机构有能力进行大范围的改革。”（Zisenwine 2007，146）另一方面，格雷戈里·怀特（Gregory W. White）认为，摩洛哥“的政治稳定因经济稳定与社会公正而有所不同……不得不提供经济或社会承诺，或者说封闭的政治体系显得更为明显”（White 2008，105）。怀特认为，摩洛哥正处于过渡状态，或者回归“仁慈时代”（era of leniency）（即2003年卡萨布兰卡爆炸前的时代），或者转向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

② 本书的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已经得到40多个国家的承认，大多数是非洲国家，包括最近的南非和肯尼亚。

地提供军事援助，并挑选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推动联合国努力解决西撒哈拉。这也暗示美国并不完全对摩洛哥的野心放手不管（参见下文）。

尽管阿以冲突愈演愈烈，但哈桑按照父亲穆罕默德五世的传统，保护犹太社区的安全。1986 年 7 月，国王宴请西蒙·佩雷斯，以斡旋阿以矛盾。日益缩小的犹太社区非常看重这次访问，以色列和美国也有同感。[①] 1999 年，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参加哈桑的丧礼，表明以色列对摩洛哥的尊重以及宗教宽容政策。

本·巴尔卡事件发生之后，哈桑国王与法国关系有所改善。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总统认为摩洛哥国王是他的伙伴（*copain*）。季斯卡同情摩洛哥立场，赞同西撒哈拉问题，同意毛里塔尼亚的军事干预（参见下文）。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总统起初将注意力集中在阿尔及利亚，而不是摩洛哥。不过，法国最终不得不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持同样态度。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美国对马格里布地区十分关注。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也坚持法国在这些地区的传统利益。他并没有与哈桑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关系，但希拉克的政策与季斯卡的立场相似。[②] 法国和摩洛哥关系更加亲密，并相互支持，特别在西撒哈拉问题上更是如此。

总之，西班牙放弃了昔日“放手不管”（de-administration）的政策，允许撒哈拉地区遭分割的局面，一再支持萨拉威人民族自决。西班牙和摩洛哥的关系忽冷忽热，富有争议。此外，双方在休达和梅利 236

① 摩洛哥的犹太人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0 万降到 21 世纪初的 5000 人（Howe 2005，41）

② 从 1981 到 1984 年间，密特朗非常关注阿尔及利亚，追求一种平衡的地区政策。丹妮尔·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为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妻子，政治上批评摩洛哥的政策，支持萨拉威人。

利亚军事要地的争议使两国关系更为复杂。[①] 向撒哈拉地区的秘密移民（马格里布、撒赫勒地区以及摩洛哥问题）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影响。2005 年 9 月和 10 月，成千上万黑非洲民众试图冲破梅利利亚的铁丝网护栏（目前上百人在休达），致使 13 人死亡，100 人受伤（de Larramendi and Bravo 2006，167；也参见 Gold 2000，120—150）。再者，摩洛哥的非法移民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每年有成千上万人被驱逐出境。[②] 西班牙批评摩洛哥边界懒散的监督人员。2004 年 5 月，摩洛哥人参与马德里恐怖主义袭击，两国关系顿时紧张。不过，两国也意识到安全合作的必要性。[③]

由于军事基地的僵局及其未来走向（马德里问题导致国内的紧张局势），安全问题以及在捕渔业等问题上的长期争议，这些将继续扰乱两国的政治关系。再者，让西班牙一再遗憾的是，放弃西撒哈拉有一种“不守信用”（bad faith）的感觉。

1984 年，哈桑国王出乎意料地同意与利比亚签署乌季达协定，希望后者停止支持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并希望尽可能地接受财政援助。卡扎菲上校切断对萨拉威人的援助，但婉言谢绝了摩洛哥要求的大量援助。实际上，这种关系仅是一种外交上的联合协议，鉴于哈桑国王与卡扎菲上校对比鲜明的个性与野心，协议不会起多大实质作用。1986 年，摩洛哥和利比亚结束该协议，但仍维持一种友好关系。

---

① 西班牙的其他领土有胡塞马群岛（Peñon de Velez de la Gormera，the islands of Peñon de Alhucemas）以及法里纳斯群岛（the Islas Charafinas）。2002 年 7 月，许多摩洛哥士兵“入侵”休达附近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岩石小岛佩列杰尔/莱拉（Perejil/Leila）。西班牙认为这种策略是对流放地的威胁，随后发生短暂危机。西班牙兵临此岛，夺回失地。尽管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但这些小摩擦恶化了普雷西迪奥问题。

② 从 2000 年到 2004 年，西班牙平均每年将 24 107 名摩洛哥人驱逐出境（de Larramendi and Bravo 2006，159）。

③ 2004 年的马德里爆炸案发生后，西班牙当局拘留了许多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犯。由于摩洛哥人的活动及其在西班牙的社区规模（约 50 万人），摩洛哥人成为怀疑目标。2007 年 5 月，遭逮捕的 16 名北非人中，14 人为摩洛哥人，2 人为阿尔及利亚人。他们遭指控的罪名是为国际极端伊斯兰分子及其支持者招募自愿者（Burnett 2007，A9）。

摩洛哥的经济与社会

摩洛哥独立之时，其农业部门出口的物品为谷物。[①] 摩洛哥目前人口有3.2亿，必须进口大量粮食才能满足国民需要。在过去的几年里，干旱重创了这个国家，影响了产品的出口，如柑橘类水果。据估计，2006年到2011年，摩洛哥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在4.5%—5%之间（EIU 2006）。摩洛哥是世界上最大的磷酸盐出口国；然而，价格却长期波动。[②] 2000年，据错误报道，摩洛哥东部地区存在石油，并公开宣传，这使得摩洛哥政府颜面尽失。摩洛哥的海外存款具有较大的潜力（包括西撒地区）。捕鱼业也是摩洛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摩洛哥与欧盟签署了捕鱼和酬劳的协议（EIU 2005）。亚洲国家的竞争极大地损害了摩洛哥的纺织工业。旅游业也有助于消减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经济体系。此外，工人的侨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2000年前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约为5%（IMF 2004b, 32）。[③] 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样，摩洛哥与欧盟签署准会员国协定，并在2000年正式生效。2004年，摩洛哥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FT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心摩洛哥债务，不过摩洛哥已经完成或正在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大多数观察家正对摩洛哥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持积极态度。1981年，卡萨布兰卡发生面包商暴乱的悲剧，非官方数据显示有上百人死亡。这一事件让摩洛哥政府意识到自由化和削减政府津贴的危险。[④] 摩洛哥接近20%的就业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学生骚乱一直是政府的威胁，这在

237

① 摩洛哥没有对法国财产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或没收，而是给予并购资金和赔偿计划。

② 西撒哈拉的布卡拉存款（Bou Craa deposits）扩大了摩洛哥的生产规模。价格暴涨与西班牙在西撒哈拉的“去行政化”（de-administration）有关。物价从1973年秋天的14美元/吨增涨到300美元/吨，2008年末，物价有所下降。

③ 据估计，生活在国外的摩洛哥人有200万人。

④ 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死亡66人，但非官方数据显示，包括这些流亡团体，约600到1000人遭杀害（Pennell 2000, 354—355）。

1994 年的暴乱中显示出力量。最后，投资西撒哈拉以及在那里驻军也影响了摩洛哥的预算和开支。在摩洛哥国内的评论家看来，这些款项应该在王国内进行分配。

摩洛哥人说多种语言，拥有殷勤好客的美名。这些美德得以褒扬，特别在高科技中心卡萨布兰卡地区有所表现。不过，摩洛哥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大。摩洛哥文盲率较高，2003 年数据显示，15 岁以上的文盲占总人口的49.3%（妇女为60.6%）（CIA，Morocco）。2004 年，在女性主义和社会活动家的推动下，摩洛哥修改家庭法以及定额分配制，以确保妇女在政党和选举中的政治参与。妇女占内阁代表的 10.8%。不过，根深蒂固的家长制对改革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纲领具有深刻的政治与文化影响。社会与经济状况将成为摩洛哥政治未来的决定因素。

西撒哈拉

238 西撒哈拉不应该仅仅在阿尔及利亚外交政策语境或摩洛哥领土野心的背景下加以研究。萨拉威人具有政治认同，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已经得到46 个国家的承认。再者，西撒哈拉问题解决的犹豫不决及其重要价值会产生多重国际后果。①

萨拉威人是谁？

萨拉威人是一个社会复合体。桑哈加（Sanhaja）柏柏尔人一直统治着西撒哈拉地区，直到 13 世纪，马格尔部落的阿瓦拉德·哈桑尼亚［Awlad Hassaniyya，特别是阿瓦拉德·杜莱姆（Awlad Dulaym）的分支］来到这里（参见第三章）。16 世纪，一支实力强大的新游牧部族雷古巴特人［Reguibat（Rgaybat）］出现在西撒哈拉地区。该部族属于桑哈加人，在谢里夫西迪·艾哈迈德·雷盖毕（Sidi Ahmad al-Rgaybi）

---

① 详细情况请参阅 Hodges 1983；Damis 1983；Barbier 1982；Dunbar 2000；Pazzanita and Hodges 1994；Lawless and Monahan 1987；Zoubir and Volman 1992；Price 1979；Shelley 2004；Jensen 2005；Ruf 2004；and Mundy 2006。

的领导下从摩洛哥南部移民到这里。雷古巴特人（Reguibat）分裂为东西两派。萨拉威人内部经常发生冲突，并导致两败俱伤。

综合这些事件，摩洛哥人偶尔向撒哈拉西部地区扩张［被认为是化外之地（*bilad al-siba*）的组成部分］，萨拉威人对摩洛哥人宣誓效忠（*ba'ya*）。殖民主义时期，雷古巴特人进入阿尔及利亚，袭击了廷杜夫。直到1934年，法国才确保了对廷杜夫的控制，“抚慰”遍布四处的雷古巴特人。西班牙当局对撒哈拉内陆地区关注较少，直到在法国的施压下才改变这种状况。然而，由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该地区军事活动频繁，西班牙的立场改变了。

穆罕默德苏丹遭废黜以及流放异地后，摩洛哥的“解放军”开始行动起来。它的最初目标是解放摩洛哥。摩洛哥独立后，苏丹尽管极力要将解放军成员编入王室军队，但这些人十分活跃。此时，军队已经变得较为激进，试图解放殖民控制的马格里布地区（*maghrib al-aqsa*）。游击队袭击伊夫尼，并在毛里塔尼亚，特别是西属撒哈拉地区发起进攻。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许多萨拉威人参加解放军。被步步紧逼的西班牙从西撒哈拉内陆撤退到沿海地区。1958年2月，西班牙与法国联合镇压解放军，即乌拉滚行动（Operation Ouragon）。这次行动取得成功，解放军被赶到摩洛哥南部，游击队武装遭解除。由于 239 武装力量受到重创，解放军瓦解，但解放西属撒哈拉的思想一直存在。再者，西属撒哈拉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65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西属撒哈拉地区非殖民化。一年后，非洲统一组织也呼吁这块领土“自由和独立”（参见 Pazzanita and Hodges 1994，xxii）。

萨拉威民族主义的兴起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摩洛哥最终将会合并西撒哈拉，并没有预料到萨拉威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正如前文所言，解放军中的萨拉威士兵是初期民族主义的推动者。在一位受到过良好教育的萨拉威人穆罕默德·西迪·易卜拉欣·巴西里（Mohammed Sidi Ibrahim Bassiri）的领导下，一个名为解放萨吉亚阿拉姆和达哈巴旱谷运动［Movement of

the Liberation of Saguia el Hamra and Oued ed-Dahab, （Río de Oro）（MLS）］的民族主义秘密组织开始形成。1970 年 9 月，该组织公开抗议西班牙殖民当局，后者因制造了“泽姆拉（Zemla）大屠杀”而声名狼藉。殖民当局野蛮地镇压了这次示威，伤亡多人。巴西里被捕并神秘失踪。不过，他成为“新萨拉威人”（new Sahrawi）的代表。

1973 年 5 月 10 日，在摩洛哥接受教育的萨拉威年轻人逐渐关注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并在瓦利·穆斯塔法·萨义德（El-Ouali Mustapha Sayed）的领导下成立了西撒哈拉独立阵线。10 天后，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发动游击战，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到 1974 年中，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决定为彻底独立而斗争。他们支持萨拉威人，遏制西班牙控制的议会德杰玛（Djemaa），以及殖民当局推动的撒哈拉国家联盟党［Party of Saharan National Union（PUNS）］。1975 年 5 月，联合国调查团访问西属撒哈拉，并得出结论，认为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已经作为重要政治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视野”（Pazzanita and Hodges 1994, 165）。9 月，西班牙政府承认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协商释放被逮捕的成员，并考虑权力移交问题，以换取从事捕鱼业和获取磷酸盐的特权。此时，哈桑国王动员摩洛哥人发起“绿色进军”（Green March）行动。摩洛哥政府的意图是吞并这块领土，煽动萨拉威人，以及顺从的议会撒哈拉国家联盟党支持撒哈拉独立阵线。然而，由于国内发生危机，240 佛朗哥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以及摩洛哥的施压，西班牙立即改变强硬立场，并签署了马德里协定。1976 年，西班牙正式从西撒哈拉地区撤军，萨拉威人宣布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

为西撒哈拉而斗争

就在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进入西撒哈拉地区，占领他们已经瓜分的领土之时，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开始抵抗入侵者。不过，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最初目标是让成千上万的萨拉威难民重新定居。这些在廷杜夫、阿尔及利亚的难民分成许多营地。流浪的萨拉威人在营地制定管理制度，最大特点就是妇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社会角色，甚至参与政

治。多年以来，营地的组织与行为给国际社会官员与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军事行动日益增加。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已经准确地判断出毛里塔尼亚比摩洛哥更脆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萨拉威袭击者在阿尔及利亚寻求避难所并袭击铁矿石开采中心祖埃拉特（Zouerate）和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1976 年 7 月，在瓦利领导下的西撒哈拉独立阵线袭击努瓦克肖特。尽管行动取得成功，但独立阵线的魅力领袖丧生于此。1977 年，按照军事合作规定，法国的美洲虎战机（Jaguar aircraft）干预并向毛里塔尼亚政府提出抗议。不过，作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毛里塔尼亚难以维持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1978 年，乌尔德·达达赫总统被推翻，宣布停火。1979 年，毛里塔尼亚与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签署协议，承认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后者将西撒哈拉的部分地区割让给前者。摩洛哥迅速占领这些地区，领土范围迅速扩大。

随后，萨拉威人对摩洛哥人发动战争，包括袭击摩洛哥南部地区。随着西撒哈拉独立阵线行动的愈演愈烈，摩洛哥人通过构建“沙漠之墙”（The Sand Wall）——650 公里的狭道，将萨拉威人游击队与西撒哈拉许多“有用”（*utile*）地区隔离开来。随后，狭道得以拓展，接近 1000 公里。1983 年，震惊于世的萨拉威行动之后，战争蔓延到西撒哈拉地区的斯玛拉（Smara）和摩洛哥南部的勒斯德（Lemsid），战事陷入消耗战。尽管联合国发起了“近距离会谈”（proximity talks），但敌对双方几乎没有举行什么会谈。1988 年，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提出计划，解决摩洛哥和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冲突。冲突双方原则上同意提出的计划。12 月，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单方面宣布停火。1989 年 1 月，西撒哈拉派代表到马拉喀什会见哈桑国王。国王谦逊地认为，萨拉威民族主义者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组织。国王并没有萨拉威人所预期的那样，提出双方调解的方案和前景，而是疏远了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后者重新走上对抗摩洛哥人的道路。1991 年，作战各方正式宣布停火（实际上已经付诸实施），组织民族自决

241

公投。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观察团［UN's Mission for the Referendum in the Western Sahara（MINURSO）］负责公民投票。整个20世纪90年代，人们一直在质疑，谁将妨碍通过投票解决冲突。在联合国的帮助下，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通过1997年休斯顿协议规劝双方重新选举。休斯顿协议还制定了公投期间释放战争犯和扣押人员、限制军队和采取行动的程序。2000年，贝克计划（Baker Plan）提出“第三种方法”（third way），要求先自治，然后进行自决投票，在阿尔及利亚的施压下，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于2003年同意贝克尔计划的第三稿，即允许萨拉威人在行政管理方面有5年的过渡期，然后自决投票。但摩洛哥人拒绝了这个最后版本。2004年，贝克辞职（参见Zoubir and Benabdallah-Gambier 2004）。尽管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MINURSO）仍然存在，但国际社会认为，解决西撒问题应该依靠单个国家的协商（更有效的方式就是包括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而不是通过联合国。摩洛哥和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在虐待战俘问题上相互指责。2005年8月，萨拉威人释放了所有的摩洛哥战俘。萨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要求摩洛哥释放萨拉威战俘。[①]

如果摩洛哥强力吞并这些领土，即使有国际社会支持或者阿尔及利亚抛弃萨拉威人，西撒哈拉将会继续成为历史上的“化外之地”（*bilad al-siba*）。[②] 其后果就是怨恨与抵抗形影相随，这不是西撒问题的解决之道。尽管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实现停火，但仍声称占领区起义不断（参见Shelley 2004，81—107）。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及其占领区的

242

① 阿米纳图·海德尔（Aminatu Haidar）是一位萨拉威妇女，居住在摩洛哥占领下的西撒哈拉。她一直以和平方式抵抗摩洛哥人，也是安德烈·萨哈罗夫奖（Andrei Sakharov Prize）提名候选人。萨拉威民主共和国的官方网址（http://www.arso.org/aminatoucamp.htm）展示了一幅嗜杀的面孔（2005年9月进入）。尽管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希望宣传海德尔的窘况以及其他萨拉威人的受虐情况，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西撒哈拉日益成为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摩洛哥也谴责西撒哈拉独立阵线虐待摩洛哥战俘。

② 托比·谢利（Toby Shelley）指出：“绿色三月发表后的25年后，诸如拉尤恩（Laayoune）和斯玛拉（Smara）等城镇的本土居民与摩洛哥人的关系非常微妙，有时候显得很无奈，总是有分歧产生。”（Shelley 2004，82）

支持者对民族自决公投感到满足。[1] 然而，在没有与摩洛哥协商的情况下，这种解决方法难以实现。在摩洛哥看来，西撒哈拉是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撒问题悬而未决的后果

西撒问题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这里地处偏荒，人烟稀少，拥有重要的“国际分量”（international dimensions）（参见 Zoubir and Volman 1992）。实际上，其重要性在目前国际关系体系中日益增加。联合国在资金和政策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获得一种合法的非殖民化。联合国计划的失败损害了其威信。尽管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继续执行任务，但联合国的威信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西萨问题不解决，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在地区整合方面难以发挥其潜能。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未来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构建积极关系的前景密切相关。它们的双边关系将会非常敏感，直到西撒问题得以解决。二者牢固的合作关系对于马格里布地区稳定的秩序至关重要。摩洛哥想通过占领西撒哈拉部分地区，不仅实现想象中的“大摩洛哥”梦想，而且还可以否定殖民大国所规定的边界范围。然而，在非盟看来，这些边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摩洛哥历史先辈能够鼓舞其他国家想象或实现历史“边界”，在这个战火破坏的大陆引发了更多暴力。西撒问题在人道主义层面还有一些难民和人权问题，如扣押和释放战俘方面。此外，国际社会对西撒潜在的磷酸盐矿产与贵金属也非常感兴趣。[2] 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在西撒邻国萨赫勒的极端分子也让国际社会感到

---

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形象超越部族单一构成（supratribal image），但其主要由雷古巴特人组成，他们主要关注非雷古巴特人的萨拉威人（如 the Awlad Dulaym）（see ibid.，122）。

② 据估计，西撒哈拉地区的铁矿石、钒、钛储量丰富（ibid.，77）。2001 年，摩洛哥能源部门同各大公司签署合同，开发西撒哈拉沿海地区石油。2006 年，萨拉威民主共和国签署开发许可证。

不安。[1] 很明显，西撒问题解决的优柔寡断，妨碍了北非（和萨赫勒）的稳定、进步、繁荣和发展的潜力。

最近几年，联合国考虑了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和摩洛哥提出的解决计划（参见“摩洛哥和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同意谈判”；“联合国呼吁讨论西撒问题”）。2007 年 4 月 30 日，联合国安理会全体投票（1754 号决议）推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之间直接会谈［“无条件协商”（negotiations without preconditions）］。摩洛哥人仍然要求自治，但没有提及主权。萨拉威民族主义者认为，会谈是复活民族自决公投的一种方式，将为西撒完全独立提供选择（阿尔及利亚也持这种观点）。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和一支小规模维和部队已经接受联合国授权的新任务。安理会决议代表了自 2003 年以来国际社会解决西撒哈拉问题最重要的建议。现在迫在眉睫的是，美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和英国对该问题感兴趣并积极参与。[2] 2007 年 6 月和 8 月，摩洛哥与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举行直接谈判，强调了冲突各方的立场，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双方的直接谈判既

243

① 2002 年年末，美国发起泛萨赫勒计划［Pan-Sahel Initiative（PSI）］，并在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和乍得训练军队，遏制萨拉菲斯特呼声与战斗组织行动，控制撒哈拉地区的非法交易。据报告，2004 年 3 月，泛萨赫勒计划训练的乍得军队杀死 43 名萨拉菲斯特呼声与战斗组织（GSPC）激进分子。2005 年，泛萨赫勒计划被重新命名为“跨撒哈拉反恐计划”［Trans-Sahara Counter Terrorism Initiative（TSCTI）］，成员扩大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加纳和尼日利亚。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合作必须考察他们共同的历史，他们并没有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参见 Bensaad 2006，96—99）。2007 年 10 月，美国成立了美国非洲指挥司令部［US African Command（AFRICOM）］，并开始付诸实施。其主要任务是给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国家提供援助和训练军队。克莱门特·亨利（Clement M. Henry）指出，全球反恐战争（GWOT）迫使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国内实施高压政治。

② 更重要的是，正如观察家所言，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也卷入此事。罗伯·安纳代尔（Rob Annandale）坚持认为，西班牙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说出前面提及的“不守信用”（bad faith）］。他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建议：“西班牙通过放弃（休达和梅利利亚），以换取摩洛哥心甘情愿地允许全民公投，接受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从而有助于解决 1976 年的麻烦事。”（Annandale 2007）解决外交僵局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从双边讨论扩大到地区协商（如边界、关闭边界以及要塞），能够推进西撒哈拉问题的解决。海扎姆·阿米拉赫－费尔南德斯（Haizam Amirah-Fernández）指出：“许多西班牙人认为，由于西班牙从前殖民地迅速撤退，他们国家在萨拉威人举行自治的全民公决之前，负有让他们享有国际法权利保护的历史与道德责任”。（Amirah-Fernández 2008，350）

积极，又充满希望。2008 年 1 月，会谈重启，但僵局仍难打破。摩洛哥认为自治等于获得主权，民族自决决议等于独立。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也以重开战端相威胁。随着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采取阿齐姆行动［AQI（L）M operating］，国际社会越来越关心该地区，并可能对西撒哈拉问题采取强制性解决办法，或将引发其他问题。[①]

结　论

后殖民时代的北非国家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从政治层面来说，威权主义领导人自己垄断权力。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尝试民主化（Tentative democratization），但其政治体系是排外的，而不是包容性的。地方、地区以及议会制度和选举对行政权力所带来的威胁较小。这些国家的制度体系并不独立，如司法制度。10 年前约翰·沃特伯里（John Waterbury）就得出如下结论："北非局势看起来似乎不可避免，政府与政权不通过立法制定法律，他们必须与构成社会的经济、宗教与种族等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这足以结束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现状，激起谨慎的乐观主义。"（Waterbury 1997，170）尽管从埃及到摩洛哥的民众普遍存在着政治不满情绪，但政治参与也在趋向进步，如妇女深度参与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参见 Aït-Hamadouche 2008）。布特弗利卡治理下的阿尔及利亚逐渐回归到文官统治（civilian rule），穆罕默德六世在统治初期针对出现的社会敏感问题提出诸多改革方案，民众对现政权的期望值日益高涨。总的来说，"强制性的独裁主义"（robust authoritarianism）仍主导着北非的政治体系。伊娃·贝林（Eva Bellin）指出："中东与北非缺乏民主化的先决条件，即强大的市民社会、市场驱动下的经济体系、收入丰厚阶层和高识字率的民众、民主邻国的示范与民主政治文化，这就是该地区民主化失败的原因。"（Bellin 2004，141）。目前，北非

244

① 2008 年 1 月，由于阿齐姆行动（前萨拉菲斯特呼声与战斗组织）的威胁，考虑到 2007 年 12 月 4 名在毛里塔尼亚的法国游客被杀，巴黎—达喀尔集会被取消。

地区距离真正民主化还十分遥远。如果这里的确发生了民主化，那么也是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结果。

然而，由于各国内部的政治分歧，北非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观察家一再强调，该地区政治与经济领域都需要透明度和有说服力。然而，北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自由化措施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1]这些国家也需要部门与行业的多元化。由于油价猛增，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积累了庞大的财富。鉴于目前全球经济低迷，两国的租赁型经济体系（以不可再生资源为经济基础）都以销售油气为主，经济增长率面临着急剧下滑的危险。[2] 再者，两国在协调革命（*thawra*）和财富（*tharwa*）方面也面临困难。[3] 困扰这些国家的问题还有：失业、未充分就业以及经济分配的不公平。全球化也带来一些问题。北非国家与

---

① 阿泽迪尼·拉亚希（Azzedine Layachi）指出："经济改革推进新型政治与经济联盟，威胁旧的政治与经济联盟。"他继续说："这里没有成功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的蓝图。"（参见 Layachi 1998, 170—171）路易莎·艾特·哈马杜什（Louisa Aït-Hamadouche）和叶海亚·祖比尔（Yahia H. Zoubir）指出，1988 年10 月骚乱和1992 年1 月政变之前的阿尔及利亚："经济自由化措施不仅没有预料到政府控制的结束，而且标志着各种利益集团的非正式垄断的结束。当然，这一切不会发生"（ Aït-Hamadouche and Zoubir 2007, 127）。利比亚是一个租赁型国家（rentier state），尽管这在整个北非非常普遍，但德克·范德瓦勒认为："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仅能制造现存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全国市场。"（ Vandewalle 1996, 207）这些改革按照政治精英的意志进行，拥护威权主义政府，特别是那些腐败的利益既得者的制度，认为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潜在的政治威胁。另一方面，政府支持的这些改革措施都与选举争取选票相关联。

② 20 世纪 60 年代，拉希德·巴拉维（Rashid al-Barrawi）感知了一次"非洲的石油革命"（ oil revolution in Africa），马格里布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这次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见 al-Barrawi 1963）。鉴于石油涨价以及随后的埃及和突尼斯二流油田的开发，北非正在进行着另一次革命。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沿海地区继续寻找石油。毛里塔尼亚离岸地区的石油生产开始了，提高了该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地位与实在意义（这里拥有大量的铁矿床）。

③ 就利比亚情况来说，协调革命和财富的后果是巨大的："突然流入的大量资本迫使卡扎菲政权发布新经济和政治计划与指令……正式改革在筹划中，然而事实上与无限制的开销相一致的：他们努力维持着那些在政府看来是支持政权的利益集团，国家的主要开销为无限制的福利措施、军事采购和政府合同。"（ Vandewalle 1998, 83; see also Vandewalle 1996）协调革命和财富强调国家的"支配性"权力（"distributive" power）。阿尔及利亚也发生了类似情况。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油价下跌对这两个国家产生多重影响，特别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更大。纳齐赫·阿尤比（Nazih N. Ayubi）通过研究大中东背景下的协调革命和财富的政权，认为这是统治者的一场文字游戏（范德瓦勒也同意此观点）。

欧盟［即欧盟—地中海合作伙伴关系［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EMP）］和美国签署协议，预期到 2010 年（通过“巴塞罗那进程”）实现地中海自由贸易区［Mediterranean Free Trade Area（MEFTA）］，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地位。为此，北非国家迫切要求采取以财政与制度改革为特征的经济自由化措施。因此，这些纵向整合带来了复杂的政治与经济挑战。[1] 北非国家习惯于政治与经济的不透明操作，因此腐败链与庇护网较为模糊。此外，民众讨厌外国人对北非各国地方经济的控制，从而引发了北非国家的抗议和政治动员（参见 Khiari 2005，113—125）。[2] 另一方面，产品竞争会淘汰效率不佳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希望吸引外资，外来利益使民众想起 19 世纪曾使突尼斯和埃及政府不知所措的“静悄悄的帝国主义”（quiet imperialism）。因特网和移动通讯的成倍增长具有深刻的经济（与政治）意义。但人口增长及其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再加上基础设施的缺失，给北非国家带来许多困难。再者，人口过剩和荒漠化威胁着自然资源，如地中海捕渔业、脆弱的农业和牧区。阿尔及利亚的油气工业废水污染了沿海水资源。阿尔及利亚率先治理水土侵蚀与沙漠化，20 世纪 70 年代修建的“绿色屏障”（*Barrage Vert*）就产生了多种后果。此外，过度放牧破坏了宝贵的可耕地和牧场。土地开垦与恢复生产能力成为北非国家主要关心的问题。值得提及的是，突尼斯是北非第一个建立环境部的

---

① 1995 年 11 月，12 个北非与中东国家在巴塞罗那加入欧盟，并成立欧盟—地中海合作伙伴关系，该计划不仅执行地中海自由贸易区计划，而且还推进安全、市民社会以及我们所说的跨文化交往，如文化交流与合作。2008 年开始的地中海联盟也提及这些目标。马格里布联盟所提及的横向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还是一种难以捕捉的幻影。与欧盟国家相比而言，马格里布国家间的商业活动被忽略了。本杰明·斯托拉（Benjamin Stora）建议，应该对潜在的整合资源进行历史思考（以及跨文化行动）：“在未来联合的过程中，马格里布可能要逐渐重构其跨地中海文明固有遗产的基础；可能会推进那些居住在地中海两岸的‘西方人’、基督徒、犹太人或穆斯林实质性对话的可能性。”（Stora 2003，33）然而，诸如关税减免等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措施给北非虚弱的制造业部门带来特殊问题。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构也带来一些社会风险。再者，北非国家更关注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垂直整合所带来的潜力与影响，以及阿拉伯国家内部经济交往的前景（参见 Attinà 2004，149，and Escribano and Lorca 2008）。

② 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要求对合同和碳氢运输的垄断权，最近对撒哈拉地区赢利的生产公司征收暴利税（windfall tax）。

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紧迫性使关注现代北非的相关国家望而却步。

在社会层面，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女权运动人士要求对家庭法进行重大改革。[①] 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妇女要求竞选总统，摩洛哥政党也可能补充女性候选人和代表。然而，父权制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荒谬地将自己等同于伊斯兰教。北非的年轻人经常蔑视、疏离（*al-hagra*）本国政府，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影响他们的忠诚。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也限制了他们的社会预期。本杰明·斯多拉（Benjamin Stora）指出："今天，马格里布地区的许多年轻人认为，移民是实现社会稳定最有效的方式。"（Stora 2007，5）毒瘾也是北非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威胁着这些脆弱的人群。

后殖民时代是殖民主义的遗产。后殖民时代的北非要将过去与现代协调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②] 关于马格里布地区，尽管与埃及相关，但贾米尔·阿本·纳斯尔（Jamil M. Abun-Nasr）将殖民主义归咎于"独立国家领导人的狭隘选择……仅仅是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威"（Abun-Nasr 1987，408）。北非各国尽管出现了新生代，但他们"巩固"后殖民时代威权主义制度的选择和机会"非常有限"（narrowed）。北非年轻人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解放。[③] 随着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领导层年岁已高，这些国家的青年民众的要求会更高。

约翰·沃尔（John Voll）对此作出的评价较为恰当："此时此刻，246 我们看到一个划时代的转型。现代的冲突不再是简单的现代化策略与

① 2004年2月，摩洛哥政府重新修改家庭法，将妇女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赋予妇女财产税并可以在法院监管下自愿离婚。2005年2月，阿尔及利亚也修改了家庭法，规定男女结婚年龄均为19岁，坚持一夫多妻。在妻子的同意下，给予离异妻子和子女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尽管存在上述各种限制，妇女在阿尔及利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此外，60%的大学学生为女性。另一方面，妇女仅占劳动力总数的20%（Slackman 2007，A1）。

② 关于西撒哈拉和摩洛哥需要将其帝国历史想象与现实历史条件和区域地缘政治现实协调起来（如萨拉威民族主义）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③ 参见 Lawrence 2003 中关于阿尔及利亚青年人的研究。

各种战略。现在是一个为控制政治生活的特殊观念、为控制民众对政治的思考方式以及我们讨论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而斗争的时代。”（Voll 1997，15）雅克·贝尔克对埃及进行了四十多年的观察，反映了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的重大作用。他认为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被“真正的和事实上的争议所吸引，这些毫无疑问构成了自从皈依伊斯兰教以来最深刻的讨论。因为这一原因，据某些人对吉哈德（*jihad*，圣战）的解释，他们的冲突并不是同别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作斗争——反对他们自己的某些方面”（Berque 1967，394—395）。马利克·本纳比（Malik Bennabi）对贝尔克的说法进行补充，他认为北非和穆斯林世界需要意识到伊斯兰教的重要性以及作为推动社会真正“有效发展”（efficacity）的“社会动力”（social dynamic）的历史“真实性”（authenticity）。[①] 伊斯兰主义者及其诸多表述提出各种各样的替代选择方案，包括民主的方案。马克·泰斯莱（Mark Tessler）考察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和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投票，得出的结论认为：“伊斯兰教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似乎没有阿拉伯学生和伊斯兰社会的影响深厚。”他的研究表明“伊斯兰教并不像西方学者所一直坚持的那样，是民主化的障碍”（Tessler 2003，118—119）。马格里布地区长期观察伊斯兰主义的观察家约翰·恩特里斯（John Entelis）认为：“北非的民主诉求并不需要伊斯兰标识……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最效忠这些民主工程。只要所有的行为体都按照民主规则办事，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Entelis 2008，24）20世纪的国家认同应该重视另一个充满活力、跨国界的柏柏尔人主义（Amazighism）（参见 Maddy-Weitzman and Zisenwine 2007；Willis 2008）。[②] 谁将代替这些年岁较高、支离破碎的精英阶层？谁将是新的

① 主题参见 Bennabi 1976。

② 布鲁斯·马迪-魏策曼（Bruce Maddy-Weitzman）在研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运动时，质疑是否“主导地位的国家叙事”（dominant national narratives）能否适应“柏柏尔人元素”（Amazigh elements）（Maddy-Weitzman and Zisenwine 2007，66；也参见 Willis 2008）。

统治者？北非将是另一种充满危险和希望的改革模式。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经济危机的阴霾笼罩全球，其产生的后果将是多层面的：不仅仅是油价一泻千里，还有磷酸盐价格的暴跌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锐减。



结论：北非的危机与前景

就在本书结束之时，我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将伊本·赫勒敦的“群体情绪”（*asabiyya*）理论应用到现代北非。“群体情绪”在现代与当代指的是什么。他们能成为诸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类似的动员型意识形态（mobilizing ideologies）吗？[①] 如果这样的话，它们能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演变与发展吗？就像伊本·赫勒敦研究国家与王朝的基本情况那样。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不再像其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充满神秘感。民族主义是一股意识形态力量，但后殖民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对国家的想象也发生变化，现在受到伊斯兰主义的挑战。休·罗伯茨（Hugh Roberts）认为，阿尔及利亚处于“后殖民时代”（参见 Roberts 2003）。那么，今天的北非与伊本·赫勒敦所分析的北非有何不同呢？ 247

就马利克·本纳比（Malik Bennabi）来说，他能发现今天北非的“后殖民时代民众”能像“后穆瓦希德人”（post-Almohadean）那样被殖民吗？我相信他暂时会发现的。30年以前，阿卜杜拉·拉鲁伊（Abdallah Laroui）哀叹马格里布人“太关注现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是一种没有收益的投资，让外国人去做这项工作去吧！这些人不断地追问他们的历史从长远来看是否能塑

① 达勒·埃克尔曼坚持认为，“群体情绪可能是一种可以实际操作的宗教意识形态；因此，伊本·马特尔利用这一观点将意识形态与他们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Eickelman 1998，28）。

造他们的现在”（Laroui 1977，5）。北非仍然缺乏历史主义，这也是“殖民化”（colonizability）的主要原因。珍·德热（Jean Déjeux）曾提及阿西亚·德耶巴（Assia Djebar）的第一部小说《拉》（*La Soif*，1957），认为需要承认和超越狭隘的隔代遗产现象（constrictive atavisms）。德耶巴写道：“最糟糕的是这里死气沉沉，我听到的仅有定居移民和殖民主义。这是必须改变的事情，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告知他们。”（Déjeux 1973，23，引自 Djebar，70—71）前殖民主义者、欧美学者需要质疑他们的博学，经常舒适地接受与感知后殖民时代和现代北非。这使得雅克·贝尔克的毕生之作（*oeuvre*）特别有吸引力。他对自己的优势提出质疑。历史学家仅能提供“真实的一面”或者是“有效事实”（virtual）（参见 Berque 1964b，35）。

248

在贝尔克看来，将北非社会与工业（或全球）文明协调起来是一件难以完成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他在关于埃及的作品中写道：

> 不是如英国或法国等个别剥削者，而是没有提及的、具有普遍足够影响和非常必要的工业化文明，打扰了并破坏了埃及的认同感。这只有通过多层面的变革才能实现。因此，一个明显的矛盾就是，为了维持认同，埃及不得不显示自己的个性，但这却阻碍它提高适应世界大潮的能力。(Berque1972，502)

另一方面，马利克·本纳比（Malik Bennabi）在他的作品中认为，首先必须逐渐灌输原始型穆斯林认同，然后才能真正适应变迁中的世界。他在作品中对现当代世界的挑战反复作出回应，特别喜欢《古兰经》的话语，如“真主真正改变的不是这个人的表象，而是他们的心灵”（13：11）。当然，埃及人和马格里布人承认并挽救了陷于权力、认同和抵抗之间的权力角逐。

1988 年，埃及伟大的现代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与短篇故事对埃及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深刻且富有洞察力的观点。阿拉·阿斯万尼是一位牙医与作家，出版了《亚库比恩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2004）。他在书中对现代埃及政治

内在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进行比喻性的评论与特征研究。埃及女权主义者和社会学家纳瓦勒·萨达维（曾为2005年总统候选人）考察了性别问题以及他者（如美国人）如何构想认同。利比亚作家艾哈迈德·易卜拉欣·法基（Ahmad Ibrahim al-Faqih）撰写了三部曲，内容涉及利比亚从伊德里斯上台到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统治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不过，法基的作品主要以乡村与外国人为背景。易卜拉欣·库尼（Ibrahim al-Kuni）叙述了利比亚国内的乡村生活（参见 Ahmida 2000）。突尼斯犹太人艾伯特·敏米（Albert Memmi）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对殖民主义和认同进行了深入研究。另一位突尼斯人巴希尔·胡拉伊夫（Bashir Khurayyif）与其他北非作家一样，描述了现代主义对传统生活的影响。穆罕默德·哈迪·本·萨利赫（Muhammad al-Hadi ben Salih）指出了宪政社会党的贪污腐败问题。突尼斯女作家，如欣德·阿祖兹（Hind Azzuz）和莱拉·本·马米（Laila ben Mami），考察了妇女流产、性行为等问题。穆菲达·特拉提（Moufida Tlatli）的电影主题反映了女权主义者与政治的相关主题。阿尔及利亚的卡提卜·亚辛（Kateb Yacine）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写作，敏锐地感知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穆卢德·费拉恩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卡拜尔人的生活，记录了作者对他们的印象。阿西亚·德耶巴按照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描写了阿尔及利亚妇女的生活场景。他还是一名电影导演，曾是诺贝尔奖候选人。20世纪90年代内战的牺牲者塔希尔·贾乌特（Tahar Djaout），担心世俗与宗教的意识形态会束缚人类的想象。梅萨卡·阿卢阿什（Merzak Allouache）的《巴比伦枯城》（*Bab El-Oued City*，1994）是一部具有先见之明的电影，隐喻了阿尔及利亚后殖民时代的历史。摩洛哥的德里斯·克雷比（Driss Chraïbi）和塔希尔·本·杰隆（Tahar Ben Jelloun）是马格里布地区两位最伟大的小说家，后者因《神圣的夜晚》（1987年）荣获法国享有声望的龚固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法国的文艺奖金）（这也是北非地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2003年，本·杰隆的译著作《暗无天日》（*The Blinding Absence of Light*）（原文 *Cette aveuglante absence de lumière*，2000）（Ben Jelloun，2006）获国际都柏林文学奖（IMPAC）。本书主要描写了摩洛哥政治

249

犯所遭受的悲惨生活（参见第九章；Howe 2005，187—188）。法蒂玛·梅尔尼斯（Fatima Mernissi）是一位知名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她勇敢地捍卫摩洛哥妇女的权利，其代表作是《梦想的僭越：闺阁少女的传说》（*Dreams of Trespass*：*Tales of a Harem Girlhood*，1994）（参见 Fayad 2000，88—95）。另一位摩洛哥人阿卜杜勒卡比尔·哈提比（Abdelkebir Khatibi）质疑后殖民时代的二元性、主观性和辩证逻辑，并得出如下结论："有必要聆听马格里布人在（语言学、文化与政治层面的）多元化所产生的共鸣。"（Khatibi 1983，39）[①] 实际上，这些呼吁适用于整个北非。第八章和第九章总括了后殖民时代北非的危机，这一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即政治威权主义、经济不景气以及社会的动荡。从这么多人中精选出的男男女女表达了北非多种前景与希望，以及这些人的集体勇气与批判性的参与（也参见 Mortimer 2007）。再者，他们是阿拉伯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纽带。特别要提及的是，位于"西方"和阿拉伯—柏柏尔人世界间隙的马格里布的社会与文化混杂结构为跨文明间的交往、联系与理解提供了特殊机会和可能性。[②]

250 社会批判主义与历史主义代表了"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化"（post-

① 哈提比认为，接受多元主义应该是一种全球普遍现象（Khatibi 1983，14）。当然，多元主义也是贝尔克著作中的主题（参见 Berque 1998）。米雷列·罗塞略（Mireille Rosello）在马格里布文学中将"表述行为对抗"（performative encounters）描述为"特殊时刻"（exceptional moments），这是一种"新型学科定位、新式语言构建、新兴的交往模式，没有其他元素能依赖于他者的存在"（Rosello 2005，1—2）。哈提比与上文提及的许多作者，即阿西亚·德耶巴，都提及这项研究。关于梅尔尼斯和德耶巴更多内容，参见 Fayad 2000，85—108。

② 我利用"内部文明"（"intra-" civilizational）而不是"文明内部"（"inter-" civilizational），是由于北非和西亚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参见引言）。"西方"是一部歪曲地区之间的遗产与现实的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编撰学的建构（Hodgson），或者说，从我们的视野来看，是一部跨文化的历史（参见 Hodgson 2000）。北非共同体的移民潜力在协调社会与文化角色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从两位法国政府部长，即社会学家阿祖·贝加（Azouz Begag，阿尔及利亚血统）和拉希达·达提（Rachida Dati，摩洛哥和法国混血儿）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已经得到法国官方的承认。2005 年 11 月，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担任法国总理期间，贝加有机会担任部长，他批评了法国对北非青年人暴动的应对之策。达提是具有北非和阿拉伯血统的法国人担任政府重要部门——司法部部长的第一人。2007 年由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总统任命。法国北非妇女的更多信息参见 Keaton 2006 和 Killian 2006。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足球明星齐达内（Zinedine Zidane）也在改善法国与北非国家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他得到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尊重。

colonial colonizability）的结束。这里还有一个自由变量——跨文化主义。北非文明步入跨文化碰撞和相互交融后达到了最高点。这一点在安达卢西亚的文明共存的社会秩序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更在亚历山大、迦太基、凯鲁万、开罗、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特来姆森、西吉勒马萨、马拉喀什、非斯以及科尔多瓦的生活情景中生动展现。当代伊斯兰主义，特别是其极端形式，经常有恐外情绪、反对真实历史。对于大多数穆斯林来说，他们是反对伊斯兰的。[①] 本纳比的伊斯兰观念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无可指责的），他为阿尔及利亚、法国和埃及搭建桥梁，而没有任何法农主义（Fanonist）、心理存在主义的殖民或后殖民的复杂性。他以历史意义上的跨文化北非为研究个案，正如几个世纪以前的伊本·赫勒敦的做法一样。[②]

本纳比、拉鲁伊等人忠告北非人牢记他们的历史，因为辉煌的历史能够为现在提供启示。[③] 历史意识将用变形的殖民化，维护而不是削弱他们的独立意识。因为北非人（和欧洲人、北美人）理解他们是谁，他们必须理解他们是谁。对雅克·贝尔克来说，他既是北非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门外汉，也是知情人，需要与文献资料、他者和自我进行对话。他的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跨文化的。艾伯特·胡拉尼羡慕地写道："贝尔克告诉我们要区别历史的不同韵律；外国人试图将意志强加给他们统治的穆斯林国家，而这些人希望自主创新。"（Hourani 1991b，5）为了质疑欧洲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解释国家建构，阿里·阿卜杜拉提夫·艾哈米达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方案，即"恢复本

---

① 马尔尼亚·拉兹朗格（Marnia Lazreg）认为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再殖民化（recolonization），因为它在阿尔及利亚文化空间的目标与19世纪法国人的做法颇为相似，即替换本土标准规范和价值观以适应政治的需要"（Lazreg 2000，149）。他的观点引发了对"殖民能力"（colonizability）这一有趣话题的质疑。

② 今天，类似情况大量存在，如著名的舞蹈编剧西迪·拉比·切克欧（Sidi Larbi Cherkaoui），他是摩洛哥人和法兰德斯人的混血儿。实际上，社会、文化和情感上的混杂状态代表了一种相互认可和理解的战略工具。从战略层面来说，马格里布人，特别是那些从事艺术的马格里布人的角色日益重要。

③ 本纳比在强调了文化与历史的重要意义后，写道："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个体来说，他也没有自己的历史。"（Bennabi 1949，51）伊本·马特尔同意上述观点。

土社会的社会史，特别是这些人所进行的抵抗历史与各种生存战略……我们需要自下而上地回顾历史，理解诸如农民、部落民、妇女和无家可归群体……集中于生产、阶级构成、性别和民众文化”（Ahmida 1994，143）。阿尔及利亚的作家拉沙德·布杰德拉（Rachid Boudjedra）的作品《怀旧 1001 年》(*Les 1001 années de la nostalgie*，1979)，其主题是主人公被殖民主义剥夺财产后，试图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份。他将自己想象为伊本·赫勒敦的亲属。布杰德拉在整个小说中，要求诚实地评价穆斯林历史及其启蒙思想。与此相类似，阿尔及利亚学者布阿莱姆·桑萨尔（Boualem Sansal）在其《甜蜜记忆：怀旧 4001 年》(*Petit éloge de la mémoire*：*Quatre mille et une années de nostalgie*，2007)

251 中，对从法老时代的埃及到当代阿尔及利亚进行了简明又彻底的考察（参见 Mortimer 2008）。他说：“阅读历史并不够，我们有必要从内心和想象中搜寻历史。”（Sansal 2007，51）该书呼吁北非民众（和我们）欣赏他们丰厚的历史，特别是殖民时期被学术上称为中断历史、抑制记忆时期（参见 Harlow 1986，xx-xi；Lorcin 2006）。然而，现代北非的狭隘心态、政治威权主义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威胁着恢复记忆以及历史与现状的和谐统一。在本纳比看来，过去、现在和未来需要和谐共振，人类、土地和时代需要和谐共生。面对北非政治与文化蒙昧主义的多层危险，[1] 伪善虚伪和否定历史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危机。

洛娜·哈恩的作品写于冷战和非殖民化的大背景之下，他说：“北非人……需要我们，但我们也需要他们”（Hahn 1960，ix）。北非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战略区域。当然，研究该地区还有许多迫在眉睫的原因。从卡提卜·亚辛的《娜吉玛》（*Nedjma*）中，我们发现了一种风格，唤醒了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

---

① 这基本上意味着心灵启示和理性主义。按照穆斯林法艾沙里（Ash'ari）学派的立场（令人联想起康德的现象和本体认识论），伊本·马特尔认为，心灵启示和理性主义之间是一种既束缚又补充的关系。本纳比的毕生之作主要协调理性与启示。另外两名马格里布地区重要人物也深入考察人道主义和宗教在阿拉伯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作用，其中包括卡拜尔人穆罕默德·阿尔孔（Mohammed Arkoun）（参见 Arkoun 1984）和摩洛哥的穆罕默德·阿卜杜·贾布里（Muhammed abd al-Jabri）（参见 al-Jabri 1999）。

ner)、塔希尔·贾乌特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创作灵感。我们从乌姆·库勒苏姆的歌唱中发现了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从哈立德的作品中发现了拉埃乐王子。我们并不是与众不同，当然也不应该受到如此漠视。我们不是社会的对立者，我们必须理解自我与他者的游戏。① 雅克·贝尔克经过反思认为："现代人必须让自己的特殊个性与普遍人性相协调，不论是自我审视还是他者观察，都应该如此。"（Berque 1972，30）只要我们不断学习和聆听，这一宏伟计划既能令人兴奋，又能获得成功。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经写道："我最喜欢的历史景象是多音同奏。"（Braudel 1972—1973，2：1138）我们正逐渐地认识到布罗代尔的视野和他的歌曲。我翻阅（参见《导论》）并购买了罗伯特·普朗的《绝妙好辞》（*Mighty Rearranger*）。激光唱片上的乐器包括马格里布地区使用的小铜锣、大框架的圆鼓，以及图阿雷格人使用的三弦琵琶（tehardant）。如果你仔细聆听，就会听到撒哈拉地区音律混合着密西西比三角洲、英国乐队令人心碎的庆祝声音的跨文化融合。②

这就是北非的希望所在。

---

① 今天我们很少用"其他人"（Other）而是"他者"（Others）——例如，对欧洲北非社区的复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在阿祖·贝加、莱拉·赛巴尔（Leila Sebbar）等人的作品中均有体现。

② 2006 年末，普朗正准备到撒哈拉地区参加布鲁斯（blues）音乐纪录片（"Plant" 2006）。他将阿尔及利亚歌曲《西迪曼苏尔亚巴巴》（*Sidi Mansour Ya Baba*）混入齐柏林飞艇古典乐队（Led Zeppelin classic）《全部的爱》（*Whole Lotta Love*），这是跨文化意识的突出个案（ibid.）。他还与图阿雷格部落的蓝调乐队（Tinariwen）共同表演，后者也与滚石乐队同台演奏（Goddard 2007）。正如安迪·摩尔根（Andy Morgan）在其给蓝调乐队的签名纪念唱片 *Amassakoul* 上所叙述的那样，他们的声音唤醒了约翰·李·胡克（John Lee Hooker）。北非音乐混合多元化的另一个个案是跨国界的组织"坎塔拉"（Kantara），其特点是突尼斯人和阿巴拉契亚山人音乐的混杂（Fenner 2007）。类似组织的数量正成倍增加。

专业术语词汇表

Abid 阿比德，17、18 世纪摩洛哥的黑人士兵，意思是奴隶或仆人

Agha 阿加，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首领

Aguellids 柏柏尔人国王

Amazighism 柏柏尔人主义，主要是保护与促进柏柏尔人文化的运动，不过其内部存在着政治分歧

Amir al-Mu'minin 信士们的长官

Amir al-Muslimin 穆斯林的长官

Arkan 伊斯兰五功［*Shahada*（念清真言）；*Salat*（礼拜）；*Zakat*（天课）；*Sawm*（斋戒）；Hajj（朝觐）］

Asabiyya “群体情绪”，按照赫勒敦的说法，这是维持国家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情感

Asala 真实性

Autogestion 自我管理，指的是后殖民时代初期阿尔及利亚的财产处置政策

Ayat 《古兰经》的韵律

Baraka 福音、运气、祝福；关于苏菲派教徒和伊斯兰隐士的美好祝福

Barbary　巴巴里地区，指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摩洛哥的广阔区域

Bay' a　宣誓或用行为效忠

Beylerbey　奥斯曼帝国长官的长官；16 世纪阿尔及尔摄政区的领袖头衔

Bilad　乡村

Bilad al-Siba　化外之民

Bilad al-Sudan　黑人之地

Capitulations　穆斯林国家授予外国人经济、文化和司法（甚至领土）方面的特权

Convivencia　共存；特指伍麦叶王朝下的安达卢西亚社会

Coopérants　法国教师与技术人员

Da 'i　复数是 Da 'wa，规劝别人皈依伊斯兰什叶派的"号召者"；传教士（传教）

Dar al-Islam　伊斯兰的清真寺或穆斯林的土地

Destur 参见 *dustur*

Devoir social　法国殖民官员的社会职责；于贝尔·利奥泰的概括

Devshirme　奥斯曼帝国抚养基督教男孩为帝国服务的制度

Dey　奥斯曼帝国总督

Dhimmis　受保护民

Dustur　宪法

Effendiyya　埃及中产阶级

Evolués　浸染了法国教育的精英

Exode　指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期间北非的法国居民的逃离行为

Faqih Fuqaha（pl.）　教法学家

Fatiha　法谛哈，《古兰经》（诵读）的第一节

Fellagha　游击队战士

Fitna　内战

Foggaras　地下灌溉渠道

Al-hagra（*hogra*）　蔑视、排斥、疏离

Hajj 哈吉，麦加朝圣

Hadith 圣训

Hijra 希吉拉，指穆罕默德迁徙麦加

Hubus 胡布斯，伊斯兰基金会占有的土地；马格里布地区指的是瓦克夫（*waqfs*）

Ibadat 五功

Ijma 穆斯林社区在法律方面达成共识

Imam 逊尼派带头礼拜者；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的宗教与政治领导人

Iman 信仰、信念

Indigènes 本土民众；通常指阿尔及利亚人

Intifada 起义；抵抗

Infitah 埃及经济自由化

Iqta 伊克塔，封地、采邑

Jahiliyya 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蒙昧时代

Jihad 斗争、努力与圣战

Jizya 非穆斯林支付的人头税

Kalam 真主之言

Kandake 库什王后

Kapudan pasha 奥斯曼帝国舰队首长

Khalifa 继承人、代理人、哈里发

Khariji（*tes*） 分离派；阿里哈里在隋芬战役中作出仲裁后分离出的一个派别

Khedive 赫迪夫，总督；阿里王朝统治埃及用的头衔

Al-Kitab 《圣书》、《古兰经》

Kulughlu 库伦古伦人，土耳其人和本土居民的混血儿

Levant 利凡特，东地中海地区，包括黎巴嫩、以色列和土耳其和叙利亚部分地区

Litham 里萨姆，穆拉比德和穆瓦希德王朝的面部头巾

Maat 玛阿特，古埃及人的道德秩序

Madhab 与司法学校或苏菲社团有关的教法

Madrasa 中高级水平的伊斯兰学校

Maghrib 马格里布，非洲西北部，埃及西部的北非地区，意思是西部或摩洛哥

Al-Maghrib al-adna 近西（near west）；突尼斯、利比亚

Al-Maghrib al-aqsa 远西（far west）；摩洛哥

Al-Maghrib al-awsat 中西（The middle west）；阿尔及利亚

Mahalla 马哈拉，奥斯曼贝伊率领军队在突尼斯收税并显示权力的传统旅行方式

Mahdi 救世主

Mai 统治者

Malika 王后

Mamluk Mamlukun（*Arabic pl.*） 马穆鲁克，埃及王朝的奴隶士兵

Marabout 苏菲派和伊斯兰隐士

Mashriq 马什里克，东方，利凡特，西亚和埃及

Mawali 麦瓦利，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

Mawlay 摩洛哥君主制谢里夫的尊贵头衔（“我的主”）

Mubtada 动力变量；引起变化的确凿原因或导致社会和政治形态以及文明变迁的变量（与伊本·赫勒敦的思想有关）

Mujadid 穆贾迪迪，伊斯兰教的创新者；包括社会的再伊斯兰化

Mujahid 穆贾希德，自由斗士；源于动词 jahada，意为努力奋斗，特别指个人通过努力成为诚实的穆斯林

Al-Mulathamun 穆拉萨姆，（穆拉比德或穆瓦希德王朝）的蒙面人

Muqaddam 苏菲社团或兄弟会的领袖

Ojaq 欧加克，耶尼舍利军团

Pieds-noirs 北非的法国（欧洲）居民，特别是阿尔及利亚

Porte 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苏丹）

Pouvoir　阿尔及利亚的既得利益集团

Presidio　普雷西迪奥，军事要塞和飞地

Princips　罗马国家的第一批居民（屋大维/奥古斯都）

Qadis　地方法官

Qa'id　地方长官

Qanats　暗渠

Qataif　带有坚果和蜂蜜的油酥糕饼

Qur'an　《古兰经》

Rasul　使者，接受天启之人

Ra'y　法律事务中的个人见解

Reconquista　西班牙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

Renegade　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

Ribat　撤退的阿拉伯堡垒

Riconquista　意大利征服利比亚

Salafiyya　萨拉菲亚，指回归到穆斯林初期一代人的美德；认同穆罕默德·阿卜杜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

Sahel Coast　海岸线；将撒哈拉沙漠与非洲地区分割开来的半干旱地带

Salat　穆斯林礼拜

Sawm　穆斯林斋戒

Shahada　念清真言

Shari 'a　伊斯兰法

Sharif *Shurafa*（*pl.*）　穆罕默德的后裔

Shaykh　教师；领导人

Shi 'a　认为哈里发的继承人应该是阿里和法蒂玛家族的穆斯林

Shirk　多神论

Sidi　尊称，来源于阿拉伯语的萨义德

Sufet Suffetes　迦太基的地方行政官员，每年通过选举产生

Sufi　穆斯林神秘主义

Sunna　圣训记载的穆罕默德的习俗与传统

Sura　《古兰经》的章节

Ta'ifa　海盗领导层

Tariqa　苏菲社团和兄弟会举行的宗教仪式

Taqlid　仪式与传统

Ulama　乌里玛，宗教学者

Umma　乌玛，穆斯林社区；现代国家意识

Vizier　维齐尔，总理或首相

Wafd　华夫脱，代表团

Wazir　参见 vizir

Wilayat　省份

Zahir Dahir　摩洛哥的王室法令

Za'im　首领

Zakat　天课，穆斯林的慈善事业

Zawiya Zawaya（*pl.*）　扎维亚，从事宗教研究的客栈与清真寺



参考书目

Abd al-Qadir. 1858. *Le Livre d'Abd el-Kader intitulé Rappel à l'intelligent, avis àl'indifférent.* Translated by Gustave Dugat. Paris: Benjamin Duprat.

Abdel-Malek, Anouar. 1969. *Idéologie et renaissance nationale.* 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Abun-Nasr, Jamil M. 1971.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hmida, Ali Abdullatif. 2005. *Forgotten Voices: Power and Agenc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bya.* New York: Routledge.

——. 1994.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1830—193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hmida, Ali Abdullatif, ed. 2000a. *Beyond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aghrib: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 2000b. "Identity and Alienation in Postcolonial Libyan Literature: The Trilogy of Ahmad Ibrahim al-Faqih." In *Beyond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aghrib: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Ali Abdullatif Ahmida, 73—84. New York: Palgrave.

Aït -Hamadouche, Louisa-Dris. 2008. "Women in the Maghreb: Stereotypes and Realities."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Fernández, 202—226. New York: Routledge.

Aït -Hamadouche, Louisa, and Yahia H. Zoubir. 2007. "The Fate of Political Islam in Algeria." In *The Maghrib in the New Century: Identity, Religion, and Politics*, edited by Bruce Maddy-Weitzman and Daniel Zisenwine, 103—131.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Albertini, Eugène, and others. 1937, 1955. *L'Afrique du Nord française dans l'histoire*. Lyon: Editions Archat.

Albrecht, Holger, and Eva Wegner. 2006. "Autocrats and Islamists: Contenders and Containment in Egypt and Morocco."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11, no. 2 (June): 123—141.

Alloula, Malek. 1986. *The Colonial Harem*. Translated by Barbara Harlo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lSayyad, Nezar, Irene A. Bierman, and Nasser Rabbat, eds. 2005. *Making Cairo Medieval*.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Amin, Galal. 2000. *What Happened to the Egyptians? Changes in Egyptian Society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Amin, Samir. 1966. *L'Economie du Maghreb*. 2 vol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Amirah-Fernández, Haizam. 2008. "Spain's Policy towards Morocco and Algeria: Balancing Relations with the Southern Neighbors."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Fernández, 348—364. New York: Routledge.

Anderson, Lisa. 1986.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nandale, Rob. 2007.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Angus Reid Global Monitor: Politics in Depth, 17 June. http://www.angus-reid.com/analysis/view/16152.

Aqqad, Salah. 1966. *Al-Maghrib al- 'Arabi: al-Jaza'ir, al-Tunis, al-Maghrib al-Aqsa.* Cairo: Maktab al-Ang (j) lu al-misryiyya.

Arkoun, Mohammed. 1984. *Pour une critique de la raisin islamique.* Paris: Maissonneuve et Larose.

el-Aroui, Abdelmajid. 1990. *La Kahena: Fiction, légende et réalité, ou, La Conquête de l'Ifriquiya par les Arabes: Tragédie en cinq actes.* Tunis: Published by the playwright.

al-Aswany, Alaa. 2004. *The Yacoubian Building.* Translated by Humphrey Davies.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Attinà, Fulvio. 2004. "The Barcelona Process,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Lesson of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9, no. 2 (Summer): 140—152.

Augustine. 1961.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R. S. Pine-Coffin. New London: Penguin Books.

Austen, Ralph A. 1979. "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A Tentative Census." In *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edited by Henry A. Gemery and Jan S. Hogendorn, 23—7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Ayache, Albert. 1964. *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Ayubi, Nazih N. 1995. *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Badran, Margot. 1995. *Feminists, Islam, and Nation: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Bakri, Abu Ubayd (Abou-Obeïd-el-Bekri). 1965. *Al-maghrib fi dhikr bilad ifriqiyya wal-maghrib wa huwa juza' min kitab al-masalik wa-l-mamalik/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In Arabic with French translation by MacGuckin de Slane.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reproduction of 1911—1913 edition.

Baldinetti, Anna. 2003. "Libya's Refugees, Their Places of Exile, and the Shaping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8, no. 1 (Spring): 72—86.

Barakat, Halim, ed. 1985. *Contemporary North Africa: Issue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

Barbier, Maurice. 1982. *Le Conflit du Sahara occidental*. Paris: L'Harmattan.

Barbour, Nevill. 1959. *A Survey of North West Africa (The Maghrib)*.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6. Morocco.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Baron, Beth. 2005. *Egypt as a Woman: Nationalism, Gender, and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Barrawi, Rashid. 1963. *Thawrat al-batrul fi ifriqiyya*. Cairo: Dar al Nahdat al-Arabiyya.

Baruma, Ian, and Avishai Margalit. 2004.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Bellin, Eva. 2004. "The Robustnes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36, no. 2 (January): 139—157.

Ben Jelloun, Tahar. 2006. *This Blinding Absence of Light*. Translated by Linda Coverdale. New York: Penguin.

Ben-Jochannan, Yosef. 1991. "Moses: African Influence on

Judaism." In *African Origins of Major World Religions*, edited by Amon Saba Saakana, 1—32. 2d ed. London: Karnak House.

Ben Khalifa, Sadok. 1992. *Le Maghreb à la recherche de son unité.* Tunis: Imprimerie de l'U. G. T. T.

Bennabi, Malek (Malik). 1949. *Discours sur les conditions de la Renaissance algérienne.* Algiers: En-Nahda.

——. 1954. *Vocation de l'Islam.* Paris: Seuil.

——. 1976. *Les grands thèmes.* Algiers: Omar Benaissa.

——. 1989. *Pour changer l'Algérie: articles de presse.* Algiers: Société d'Edition et de Communication.

Bennadji, Chérif. 2003. "Chronique politique 2001."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39 (2000—2001). Paris: CNRS, 127—145.

Bennoune, Mahfoud. 1976. "Algerian Peasa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MERIP, No. 48: 13—14.

——. 1988.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lgeria*, 1830—1987: *Colonial Upheavals and Post-Independence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saad, Ali. 2006. "De l'espace euro-maghrébin à l'espace eurafricain: le Sahara comme nouvelle jonction intercontinentale." *L'Année du Maghreb* (2004). Paris: CNRS Editions, 83—100.

Berkey, Jonathan P. 1998a. "Culture and Society during the Late Middle Ag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375—4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b. "The Mamluks as Muslims: The Military Elit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slam in Medieval Egypt." In *The Mamluks in Egypt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ited by Thomas Philipp and Ulrich Haarmann, 163—17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nal, Martin. 1987 (1991, 2006).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3 vols. Rutgers,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erque, Jacques. 1955. *Structures sociales du Haut-Atla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64a. *The Arabs: Their History and Future.*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1964b. *Dépossession du mond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1967. *French North Africa: The Maghrib between Two World Wars.*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1972. *Egypt: Imperialism &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London: Faber & Faber.

——. 1974. *Maghreb: Histoire et sociétés.* Gembloux: Duculot.

——. 1978. *L'Intérieur du Maghreb: XVe-XI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 1982. *Ulémas, fondateurs, insurgés du Maghreb: XIIe siècle.* Paris: Sindbad.

——. 1989. *Mémoires des deux riv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1998. *Une cause jamais perdue: pour une Méditerranée plurielle (Ecrits politiques* [1956—1995]). Paris: Albin Michel.

——. 2001. *Opera minora.* 3 vols. Paris: Bouchène.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Bierman, Irene A., ed. 2003. *Napoleon in Egypt.*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Bonner, Michael, Megan Reif, and Mark Tessler, eds. 2005.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Algeria: Lessons for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London: Routledge.

Bookin-Weiner, Jerome. 1993. "Corsairing in the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North Africa." In *North Africa: Nation, State, and Region*, edited by George Joffé, 3—33. London: Routledge.

Botman, Selma. 1998. "The Liberal Age, 1923—195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285—3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djedra, Rachid. 1979. *Les 1001 années de la nostalgie.* Paris: Denoël.

Boukrouh, Nour-Eddine. 2006. L'Islam sans l'Islamisme; vie et penseé de Malek Bennabi. Algiers: Samar.

Bourquia, Rahma,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eds. 1999. *In the Shadow of the Sultan: Culture, Power, and Politics in Morocco.*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rienne, Louis Antoine Fauvelet de. 1993. "The French View of the Events in Egypt." In *Napoleon in Egypt: Al-Jabarti's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1798, excerpted from de 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Paris and Boston: Napoleon Society, 1895), 1: 158—191.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ing.

Bovill, Edward William. 1995.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Princeton, N. 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Brace, Richard M. 1964. *Morocco, Algeria, Tunisia*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Braudel, Fernand. 1972—1973.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s. Translated by Siâ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Brett, Michael. 1999. *Ibn Khaldun and the Medieval Maghreb.*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Brett, Michael, and Elizabeth Fentress. 1996. *The Berbers.* Oxford, United Kingdom: Blackwell.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BBC). 2007. "Divisive Egypt Reforms Approved." 27 March.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

east/6498573. stm.

Brown, L. Carl. 1974. *The Tunisia of Ahmad Bey*, 1837—1855.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own, Peter. 1967.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1.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uckler, F. W. 1931. *Harunu'l-Rashid and Charles the Great*. Cambridge, Mass.: Mediæval Academy of America.

Budge, E. A. Wallis, ed. and trans. 1928.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ravels of Rabban Sâwmâ, 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the Mongol Khâns to the Kings of Europe, and Markâs Who as Mâr Yahbhallâhâ III Became Patriarch of the Nestorian Church in Asia*.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Bulliett, Richard W. 1975. *The Camel and the Whe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ke, Edmund, III. 1972. "The Image of the Moroccan State in French Ethnological Literature: A New Look at the Origin of Lyautey's Berber Policy." In *Arabs and Berbers: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North Africa*, edited by Ernest Gellner and Charles Micaud, 175—199.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mpany.

——. 1976. *Prelude to Protectorate in Morocco: Precolonial Protest and Resistance*, 1860—191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nett, Victoria. 2007. "Spain Arrests 16 North Africans Accused of Recruiting Militants." *New York Times*, 29 May, A9.

Caesar, Julius. 1955. *Alexandrian, African and Spanish Wars*. Translated by A. G. Wa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us, Albert. 1970. *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Translated by Ellen Conroy Kenned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Çelik, Zeynep. 1992. *Displaying the Orient: Architecture of Islam at Nineteenth-Century World's Fai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7. *Urban Forms and Colonial Confrontation: Algiers under French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The World Factbook: Morocco.* www. cia. gov/cia/ publications/factbook/geos/mo. html. Accessed 29 January 2007.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966. *The Adventures of Don Quixote.* Translated by J. M. Cohen.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Chamberlain, Michael. 1998. "The Crusader Era and the Ayyubid Dynas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211—2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ristelow, Allan. 1992. "An Islamic Humanist in the 20th Century: Malik Bennabi." *Maghreb Review* 17 (nos. 1—2): 69—83.

Clancy-Smith, Julia. 1994. *Rebel and Saint: Muslim Notables, Populist Protest, Colonial Encounters (Algeria and Tunisia, 1800—190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8. "Where Elites Meet: Households, Harem Visits, and Sea-Bathing." Drafted chapter printout presented to author from *Mediterranean Passages: Migrants and Mobil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North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2009).

Clancy-Smith, Julia, ed. 2001. *North Africa, Islam,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Almoravids to the Algerian War.* London: Frank Cass.

Clegg, Ian. 1971.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Alger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Clover, Frank M. 1993. *The Late Roman West and the Vandals.* Aldershot, Hampshire, Great Britain; Brookfield, Vermont: Variorum.

Cole, Juan R. I. 2003. "Mad Sufis and Civic Courtesans: The French Republican Construction and Eighteenth-Century Egypt." In *Napoleon in Egypt*, edited by Irene A. Bierman, 47—62.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 2007. *Napoleon's Egypt: Invad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Combs-Schilling, M. Elaine. 1999. "Performing Monarchy, Staging Nation."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Sultan: Culture, Power, and Politics in Morocco*, edited by Rahma Bourquia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176—214.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mmuniqué d'Ennahda publié à l'occasion des rencontres d'Aix en Provence (23—25 mai 2003) et signé par Ameur Laraiedh, chef du Bureau politique d'Ennahda (extraits), traduction Eric Gobe "Revendications et combat pour les libertés en Tunisie: vers un pacte national de l'opposition."" 2005.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1 (2003). Paris: CNRS, 329—333.

Crecelius, Daniel. 1998. "Egyp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y M. W. Daly, 59—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mer, Earl of (Lord) (Evelyn Baring). 1908. *Modern Egypt.*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Daly, M. W. 1998a. "The British Occupation, 1882—192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239—2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ly, M. W., ed. 1998b.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mis, John. 1983. *Conflict in Northwest Africa: The Western Sahara*

Disput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Danielson, Virginia. 1997. *The Voice of Egypt: Umm Kulthum, Arabic Song, and Egypti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vis, Stephen. 1997. *Hammer of the Gods: The Led Zeppelin Saga*. New York: Berkley Boulevard Books.

Deeb, Mary-Jane. 2007.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ya." I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edited by David E. Long, Bernard Reich, and Mark Gasiorowski, 432—455. 5th ed. Cambridge, Mass.: Westview Press.

Déjeux, Jean. 1973. "Meeting of the Two Worlds in the Maghrib." In *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Contemporary Maghrib*, edited by I. William Zartman, 21—30. New York: Praeger.

de Larramendi, Miguel Hernando, and Fernando Bruno. 2006. "La frontière hispanomarocaine à l'épreuve de l'immigration subsaharienne." *L'Année du Maghreb* (2004). Paris: CNRS, 153—171.

Denoeux, Guilain P., and Abdeslam Maghraoui.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Morocco." In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Africa*, edited by Azzedine Layachi, 55—88. Westpor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

de Villiers, Marq, and Sheila Hirtle. 2002. *Sahara: The Extraordinary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sert*.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Diamond, Jared. 1999.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Diehl, Charles. 1966 (1896). *L'Afrique Byzantine: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Byzantine en Afrique* (533—709). New York: Burt Franklin.

Donohue, John J., and John L. Esposito, eds. 2007. *Islam in Transition: Muslim Perspectives*. 2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nbar, Charles. 2000. "Saharan Stasis: Status and Prospects in the

Western Sahara." *Middle East Journal* 54, no. 4 (Fall): 522—545.

Dunn, Ross. 1989.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nn, Ross, ed. 2000. *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Dupuy, R. Ernest, and Trevor N. Dupuy. 1977. *The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from 3500 B. C.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Dykstra, Darrell. 1998.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1798—180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1113—1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zielska, Maria. 1995. *Hypatia of Alexandria*. Translated by F. Ly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2005. ViewsWire. Morocco Economy: EU Fishing Deal Signed. 24 August. http://proquest.umi.com/pdqweb? did = 892279261&sid = 2&Fmt = 3&clientld = 1953&RQT = 309&Vname = PQD.

——. 2006. ViewsWire. Morocco: Country Forecast Summary. 7 December.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 did = 1188627041&sid = 3&Fmt = 3&clientId = 56639&RQT = 309&VName = PQD.

——. 2007a. ViewsWire. Algeria: Country Forecast Summary. 26 April. http://proquest.umi.com/pdqweb? did = 1264629541&sid = 2&Fmt = 3&clientid = 56639&RQT = 309&Vname = PQD.

——. 2007b. ViewsWire. Libya: Country Fact Sheet. 24 April. http://proquest.umi.com/pdqweb? did = 126407691&sid = 9&Fmt = 3&clientid = 56639&RQT = 309&Vname = PQD.

——. 2007c. ViewsWire. Libya: Country Forecast Summary. 24 April. http://proquest.umi.com/pdqweb? did = 1264607701&sid = 9&Fmt = 3&clientid = 566639&RQT = 309&Vname = PQD.

——. 2007d. ViewsWire. Algeria: Country Outlook. 3 April. http://proquest.umi.com/pdqweb? did = 1264634751&sid = 2&Fmt = 3&clientid = 56639&RQT = 309&Vname = PQD.

——. 2007e. ViewsWire. Egypt: Country Fact Sheet. 3 April. http://proquest.umi.com/pdqweb? did = 1264533621&sid = 11&Fmt = 3&clientId = 56639&RQT = 309&Vname = PQD.

——. 2007f. ViewsWire. Tunisia: Country Outlook. 3 March.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 did = 1264467261&sid = 6&Fmt = 3&clientid = 566636&RQT = 309&Vname = PQD.

——. 2008a. ViewsWire. Egypt: Country Forecast Summary. 15 April. http://proquest_ .umi_ .com/pqdweb_ ? did = 1473231511_ &sid = 30_ &Fmt = 3_ &clientId = 56639_ &RQT = 309_ &VName = PQD.

——. 2008b. ViewsWire. Libya: Country Forecast Summary. 7 April. http://proquest_ .umi_ .com/pqdweb_ ? did = 1473174311_ &sid = 2_ &Fmt = 3_ &clientId = 56639&RQT = 309_ &VName = PQD.

Eickelman, Dale F. 1998.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3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rentice Hall.

Einhard and Notker the Stammerer. 1969. *Two Lives of Charlemagne.* Translated by Lewis Thorp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Elleh, Nnamdi. 1997. *African Architectur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Islam. Database: http://www.encislam.brill.

Entelis, John P. 1986. *Algeria: The Revolution Institutionaliz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2008. "Democratic Desires and the Authoritarian Temptation in the Central Maghreb."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Fernández, 9—30. New York: Routledge.

Entelis, John P. , ed. 1997.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scribano, Gonzalo, and Alejandro V. Lorca. 2008. "Economic Reform in the Maghreb: From Stabilization to Modernization."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Fernάndez, 135—158. New York: Routledge.

Esposito, John. 2005.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Revised 3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vans, Martin, and John Phillips. 2007. *Algeria: Anger of the Dispossess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ahmy, Khaled. 1998. "The Era of Muhammad 'Ali Pasha, 1805—184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139—1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non, Frantz.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lated by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 1968.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al-Fasi, Alal (Allal). 1954.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Arab North Africa.* Trans lated by Hazem Zaki Nuseibeh.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Fayad, Mona. 2000. "Cartographies of Identity: Writing Maghribi Women as Postcolonial Subjects." In *Beyond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aghrib*, edited by Ali Abdullatif Ahmida, 85—108. New York: Palgrave.

Fenner, Louise. 2007. "Kantara's Message of Peace Blends Tunisian and American Music." 1 June. http://usinfo.state.gov/xarchives/display.html? p=washfile-english&y=2007&m=June&x=20070601132636xlrennef0.1257135.

Ferrié, Jean-Noël. 2002. "Succession monarchique et désenchantement de l'alternance partisance."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40 (1999). Paris: CNRS, 215—231.

Finch, Charles S. 1991. "The Kamitic Genesis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n Origins of the Major World Religions*, edited by Amon Saba Saakana, 33—58. 2d ed. London: Karnak House.

Folorunso, Caleb A. 2003. "Views of Ancient Egypt from a West African Perspective." In *Ancient Egypt in Africa*, edited by David O'Connor and Andrew Reid, 77—92. London: UCL Pres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Franzen, Cola, ed. 1989. *Poems of Arab Andalusia.* Translated from Spanish versions of Emilio García Gómez.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Frend, W. H. C. 2004. "From Donatist Opposition to Byzantine Loyalism: The Cult of Martyrs in North Africa 350—650." In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edited by A. H. Merrills, 259—270.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Fuller, Mia. 2000. "Preservation and Self-Absorption: Italian Colonisation and the alled City of Tripoli, Libya."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5, no. 4 (Winter): 121—154.

Gellner, Ernest. 1969. *Saints of the Atl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llner, Ernest, and Charles Micaud, eds. 1972. *Arabs and Berbers: From Tribe to Nation n North Afric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mpany.

Gelvin, James L. 2003. "Napoleon in Egypt as History and Polemic." In *Napoleon in gypt*, edited by Irene A. Bierman, 139—160.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George, Judith W. 2004. "Vandal Poets in Their Context." In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New Perspectives o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edited by A. H. Merrills, 133—144. Aldershot; Burlington, Vt.: Ash-

gate.

German, Richard, and Elizabeth Taylor. 2007. "Economy." In "Egypt," *The Middle East nd North Africa* 2008, 54th ed., 359—377. London: Routledge.

Gershovich, Moshe. 2000. *French Military Rule in Morocco: Colonialism and Its Consequences*. London: Frank Cass.

Geyer, Georgie Anne. 2003. *Tunisia: A Journey through a Country That Works*. London: Stacey International.

Gladiss, Almut von. 2004. "History." In *Islam: Art and Architecture*, edited by Markus Hattstein and Peter Delius, 166—171. Cambridge, UK: Könemann.

Goddard, John. 2007. "If Mick Jagger Spoke Tamashek: Tinariwen Bring Their Nomadic Desert Music, and Their Rebel Aesthetic, to Town." *Toronto Star*, 15 November, E03.

Gold, Peter. 2000. *Europe or Africa? A Contemporary Study of the Spanish North African nclaves of Ceuta and Melilla*.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Gomaa, Tayseer. 2002. "Who Is Behind the Camera? (Post-Colonial Visual Anthropology, rientalism, and Latter-Day Egyptomania)." Translated by R. Kevin Lace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North Afric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Studies* 1, no. 1: 67—106.

Goodman, Jane E. 2005. *Berber Culture on the World Stage: From Village to Vide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David C. 1962. *North Africa's French Legacy*, 1954—196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6. *The Passing of French Al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Lady Duff. 1969. *Letters from Egypt* (1862—1869). Re-edited with additional letters by Gordon Waterfield.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Green, Peter. 1990. *Alexander to Actiu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sell, Stéphane. 1920—1928. *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8 vols. 4th ed.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Hahn, Lorna. 1960. *North Africa: Nationalism to Nationhood.*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Haikal, Fayza. 2003. "Egypt's Past Regenerated by Its Own People." In *Napoleon in Egypt*, edited by Irene A. Bierman, 161—180.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al-Hakam, Ibn abd. 2004. *Futuh misr wa-l-maghrib.* Cairo: Maktabat al-Thaqafat al-Diniyyat.

Halm, Heinz. 1997. *The Fatimids and Their Traditions of Learning.* London: I. B. Tauris/ Institute of Ismaili Studies.

Hamdani, Abbas. 1962. *The Fatimids.* Pakistan Chowk, Karachi: Pakistan Publishing House.

Hanna, Nelly. 1998. "Culture in Ottoman Egyp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87—1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3. "Introduction." In *Napoleon in Egypt*, edited by Irene A. Bierman, 5—12.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Harlow, Barbara. 1986. "Introduction." In *The Colonial Harem* by Malek Alloula, translated by Barbara Harlow, ix-xi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rten, Stuart. 2003. "Rediscovering Ancient Egypt: Bonaparte's Expedition and the Colonial Ideolog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Napoleon in Egypt*, edited by Irene A. Bierman, 33—46.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Hattstein, Markus, and Peter Delius, eds. 2004. *Islam: Art and Architecture*. Translated by George Ansell and others. Cambridge, UK: Könemann.

Hazard, Harry W., comp. 1954. *Atlas of the Islamic History*. 3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ers, Jacques. 2003. *The Barbary Corsairs: 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 1480—1580. Translated by Jonathan North. London: Greenhill Books.

Heggoy, Alf Andrew (with Robert R. Crout). 198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lgeria.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ess.

Henry, Clement M. 2008. "Reverberations in the Central Maghreb of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Fernández, 294—310. London: Routledge.

Herodotus. 1978.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Aubrey de Sélincour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Hess, Andrew C. 1978. *The Forgotten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ill, Derek, Lucien Golvin, and Robert Hillenbrand. 1976. *Islamic Architecture in North Africa*.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Hillenbrand, Robert. 1976. "Introduction." In *Islamic Architecture in North Africa* by Derek Hill, Lucien Golvin, and Robert Hillenbrand.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Hitti, Philip K. 1970.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10th ed. London: Macmillan.

Hodges, Tony. 1983. *Western Sahara: The Roots of a Desert War*. Westport, Conn.: Lawrence Hill & Company.

Hodgson, Marshall G. S. 1974. *The Venture of Islam*. 3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0. "Hemispheric Interregional History as an Approach to World History."

In *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edited by Ross E. Dunn, 113—123.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Hoisington, William A., Jr. 1984. *The Casablanca Connectio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1936—194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995. *Lyautey and the French Conquest of Morocco*.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lland, Tom. 2005. *Rubicon: The Last Years of the Roman Republic*. New York: Anchor Books.

Homer. 1996. *The Odyssey*. Translated by Robert Fagl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Horne, Alistair. 1987.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Rev. ed. New York: Penguin.

Hornung, Erik, and Betsy M. Bryan, eds. 2002.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Treasures of Ancient Egypt*.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Hourani, Albert. 1991a.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b. *Islam in European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we, Marvine. 2005. Morocco: *The Islamist Awakening and Other Challen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mbert, Jean-Marcel. 2003. "How to Stage Aida." Translated by Daniel Antoine and Lawrence Stewart Owens. In *Consuming Ancient Egypt*, edited by Sally MacDonald and Michael Rice, 47—62. London: UCL Press.

Hutt, Antony. 1977. *North Africa: Islamic Architecture*. London: Scorpion Publications.

Ibn Battuta. 1929.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 A. R. Gibb.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Ibn Idhari (al-Marrakushi), and Abu'l Abbas. 1948—1951.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et de l'Espagne musulmane, intitulée Kitab al-Bayan al-mughrib [fi akhbar al-Andalus wa-l-Maghrib]*. 2 vols. Leiden: E. J. Brill.

Ibn Khaldun. 1967.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2 vols. Translated by Franz Rosentha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8—1969. *Histoire des Berbères et des dynasties musulman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4 vols. Translated by Le baron de Slan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Ibrahim, Hassan Ahmed. 1998. "The Egyptian Empire, 1805—188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198—2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kram, Khalid. 2006.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s*. London: Routledge.

Imber, Colin. 2002.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4a. *Tunisia: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04/360. November.

——. 2004b. *Morocco: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04/164. June.

——. 2005a. *Arab Republic of Egypt: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05/179. June.

——. 2005b. *The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2004 Arti-*

cle IV Consultation—Staff Report; Staff Statement; and Public Information Notice on the Executive Board Discussion. IMF Country Report No. 05/83. March.

——. 2005c. *The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Statistical Appendix.* IMF Country Report No. 05/78. March.

——. 2005d. *Algeria: Statistical Appendix.* IMF Country Report No. 05/51. February.

——. 2007a. *Arab Republic of Egypt: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07/381. December.

——. 2007b. IMF Working Paper. "Buoyant Capital Spending and Worries over Real Appreciation: Cold Facts from Algeria." 21 pages. December.

——. 2007c. *Tunisia: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07/319. September.

——. 2007d. *The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Statistical Appendix.* IMF Country Report No. /07/148. May.

——. 2007e. *Algeria: Statistical Appendix.* IMF Country Report No. 07/95. March.

——. 2007f. *Algeria: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07/61. February.

al-Jabarti, Abd al-Rahman. 1970. *Tarikh Aja'ib al-Athar fi-l-Tarajim wa-l-Athar.* 3 vols. Beirut: Dar al-Faris.

——. 1975. *Al-Jabarti's Chronicle of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15 June—December* 1798. *Tarikh muddat al-faransis* bi-misr, muharram-rajab 1213.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hmuel Moreh. Leiden: E. J. Brill.

——. 1993. *Napoleon in Egypt: Al-Jabarti's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1798. Translated by Shmuel Moreh.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 1994.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Aja'ib al-Athar fi'l-Tarajim wa'l-Akhbar*). 4 vols. Edited by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Translated by D. Crecilius and other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Jabri, Mohammed ‘Abel al-. 1999. *Arab-Islamic Philosophy: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Translated by Aziz Abbassi. Austi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exas.

Jackson, Robert B. 2002. *At Empire's Edge: Exploring Rome's Egyptian Fronti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nkowski, James. 2000. *Egypt: A Short History.*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Jasanoff, Maya. 2005. *The Edge of Empire: Lives,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the East*, 1750—185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Jensen, Erik. 2005. *Western Sahara: Anatomy of a Stalemat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Joffé, George, ed. 1993. *North Africa: Nation, State, and Region.* London: Routledge.

John, Bishop of Nikiu. 1916.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Translated by R. H. Charles.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Julien, Charles-André. 1970. *History of North Africa: Tunisia, Algeria, Morocco: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1830. Edited and revised by Roger Le Tourneau. Translated by John Petri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ably, Mohamed. 1999. "Legitimacy of State Power and Socioreligious Variations in Medieval Morocco." Translated by Seth Graebner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Sultan: Culture, Power, and Politics in Morocco*, edited by Rahma Bourquia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17—29.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ddache, Mahfoud. 2003. *L'Algérie des Algériens: de la préhistoire*

à1954. Paris: Editions Paris-Méditerranée; Algiers: EDIF, 2000, 2003.

Kaegi, Walter E. 1998. "Egypt on the Eve of the Muslim Conques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34—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rabell, Zachary. 2004. *Parting the Desert: The Creation of the Suez Cana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Karsh, Efraim. 2007. *Islamic Imperialism: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eaton, Trica Danielle. 2006. *Muslim Girls and the Other France: Race, Identity Politics, and Social Exclu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eddie, Nikki R. 1968. *An Islamic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Writings of Sayyid Jamal ad-Din "al-Afghan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nnedy, Hugh. 1996. *Muslim Spain and Portugal: A Political History of al-Andalus.* London: Longman.

——. 2007. *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Keys, David. 2004. "Kingdom of the Sands." *Archaeology* 57 (no. 2) (March/April). http://www.archaeology.org/0403/abstracts/sands.html.

Khadduri, Majid. 1963.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Khatibi, Abdelke (é) bir. 1983. *Maghrib pluriel.* Paris: Denoël.

——. 1985. "Double Criticism: The Decolonization of Arab Sociology." *In Contemporary North Africa: Issue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edited by Halim Barakat, 9—19.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ab Studies.

Khiari, Sadri. 2005. "Les balbutiements du mouvement altermondiali-

ste au Maghreb."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41 (2005). Paris: CNRS, 113—125.

Killian, Caitlin. 2006. *North African Women in France: Gender, Culture, and Ident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ish, George, ed. 1978. *A Source Book in Ge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napp, Wilfrid. 1977. *North West Africa: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urvey*. 3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coste, Yves. 1969. *Ibn Khaldoun: naissance de l'histoire passé du tiers-monde*. 2d ed.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Larguèche, Abdelhamid. 2001. "The City and the Sea: Evolving Forms of Mediterranean Cosmopolitanism in Tunis, 1700—1881." *In North Africa, Islam, and the Medi 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Almoravids to the Algerian War*, edited by Julia Clancy-Smith, 117—128. London: Frank Cass.

Laroui, Abdallah. 1977.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An Interpretive Essay*.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wless, Richard I. 2007. "History." In "Libya,"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8, 54th ed., 768—794. London: Routledge.

Lawless, Richard, and Laila Monahan, eds. 1987. *War and Refugees: The Western Sahara Conflict*.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Lawrence, William. 2003. "Representing Algerian Youth: The Discourses of Cultural Confront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with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Islam since the Riots of 1998." Ph. D. dissertation, Fletcher School, Tufts University, Medford, Massachusetts.

Lawson, Fred H. 1992. *The Social Origins of Egyptian Expansion during the Muhammad' Ali Perio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yachi, Azzedine. 1996.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 Algeria." In *North Africa: Development and Re-*

form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Dirk Vandewalle, 129—15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8. "Conclusion: The Maghreb in Transition." In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Africa*, edited by Azzedine Layachi, 165—172. Westport, Conn.: Praeger.

——. 2005. "Political Liberalisation and the Islamist Movement in Algeria." In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Algeria: Lessons for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edited by Michael Bonner et al., 46—67. London: Routledge.

Layachi, Azzedine, ed. 1998.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Africa.* Westport, Conn.: Praeger.

Lazreg, Marnia. 2000. "Islamism and the Recolonization of Algeria." In *Beyond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aghrib: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Ali Abullatif Ahmida, 147—164. New York: Palgrave.

Le Gall, Michel, and Kenneth Perkins, eds. 1997. The *Maghrib in Question: Essays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Leo Africanus. 1970. *The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Africa and of the Notable Things Therein Contained.* Translated by John Pory. 3 vols. New York: Burt Franklin (reprint of the Hakluyt Society 1896 edition).

Le Sueur, James. 2001. *Uncivil War: Intellectuals and Identity Politics during the Decolonization of Alger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e Tourneau, Roger. 1961. *Fez in the Age of the Marinides.* Translated by B. A. Cleme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1962. *Evolution politique de l'Afrique du Nord musulmane, 1920—1961.* Paris: A. Colin.

——. 1970. "North Africa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

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2, edited by P. M. Holt and others, 211—2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inson, Charles. 2004. " $50 Billion Later, Taking Stock of US Aid to Egyp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2 April, www.csmonitor.com/2004/0412/p07s01-wome.html.

Lewis, Bernard. 1974.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Volume 1: *Politics and War*. Volume 2: *Religion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82.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2002.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Liauzu, Claude. 2005. "At War with France's Past." Translated by Donald Hounam.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http://mondediplo.com/2005/06/19colonisation.

Livy (Titus Livius). 2006. *Hannibal's War: Books Twenty-One to Thirty*. Translated by J. C. Yard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loyd, Alan B. 2000. "The Ptolemaic Period (332—330 BC)."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edited by Ian Shaw, 395—4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rcin, Patricia M. E., 1995. *Imperial Identities: Stereotyping, Prejudice and Race in Colonial Algeria*. London: I. B. Tauris.

Lorcin, Patricia M. E., ed. 2006. *Algeria and France, 1800—2000: Identity, Memory, Nostalgia*.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Louis, William Roger. 2006. *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Scramble for Empire, Suez and Decolonization*. London: I. B. Tauris.

Lyautey, Hubert. 1900. "Du r Ôl e colonial de l'armée." *Revue des Deux Mondes*, 156 (15January): 308—329.

MacDonald, Kevin C. 2003. "Cheikh Anta Diop and Ancient Egypt in

Africa." In *Ancient Egypt in Africa*, edited by David O'Connor and Andrew Reid, 93—106. London: UCL Pres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MacDonald, Sally, and Michael Rice, eds. 2003. *Consuming Ancient Egypt*. London: UCL Press.

al-Madani, Ahmed Tewfiq (Ahmad Tawfiq). 1968. *Al-Harb al-thalathamia'at bayna al-Jaza'ir wa Isbanya*, 1792—1492. Algiers: SNED.

——. 1984 (1931). *Kitab al-Jaza'ir*. Algiers: al-Mu'assasa al-wataniyya.

Maddy-Weitzman, Bruce, and Daniel Zisenwine, eds. 2007. *The Maghrib in the New Century: Identity, Religion, and Politic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Maghraoui, Driss. 2004. "The 'Grande Guerre Sainte': Moroccan Colonial Troops and Worker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9, no. 1 (Spring): 1—21.

Mahdi, Muhsin. 1964. *Ibn Khaldu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ic Foundation of the Science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l-Makkari, Ahmed ibn Mohammed (Ahmad bn Muhammad al-Maqqari). 2002.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2 vols. Translated by Pascual de Gayango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1840 and 1843 by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anley, Deborah, and Sahar Abdel-Hakim. 2004. *Traveling through Egypt: From 540 B. C.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in Cairo.

Mantran, Robert. 1970. "North Africa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2, edited by P. M. Holt and others, 238—2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sot, Afaf Lutfi al-Sayyid. 2007.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2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tinez, Luis. 2000. *The Algerian Civil War*, 1990—1998. Translated by Jonathan Derric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5. "Why the Violence in Algeria?" In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Algeria: Lessons for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edited by Michael Bonner et al., 14—27. London: Routledge.

Mattar, Philip, ed. 2004.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s. 1—4. Detroit: Thompson Gale.

Mazot, Sibylle. 2004. "Decorative Arts." In *Islam: Art and Architecture*, edited by Markus Hattstein and Peter Delius, 154—157. Cambridge, UK: Könemann.

McDougall, James. 2006. *History an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ism in Al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Dougall, James, ed. 2003. *N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North Africa.*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8, no. 1 (Spring).

McNeill, William H., and Marilyn Robinson Waldman, eds. 1983. *The Islamic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cer, John. 1976. *Spanish Sahar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Merrills, A. H., ed. 2004.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New Perspectives on Late Antique North Africa.*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Messier, Ronald A. 2001. "Re-Thinking the Almoravids, Re-Thinking Ibn Khaldun." In *North Africa, Islam,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Almoravids to the Algerian War*, edited by Julia Clancy-Smith, 59—80. London: Frank Cass.

Messier, Ronald A., ed. 2008. "The Worlds of Ibn Khaldun."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13 (Special Issue), no. 3.

al-Mili. Mubarak bn Muhammad. 1963—1964. *Tarikh al-Jaza'ir fi-l-qadim wa-l-hadith.* 3vols. 2d ed. Algiers: Maktabat al-nahda-l-jaza'iriyya.

Military Journal of General Buonaparte; Being a Concise Narrative of

His Expedition from Egypt into Syria, in Asia Minor: Giving a Succinct Account of the Various Marches, Battles, Skirmishes, and Sieges, including That of St. John D'Acre, from the Time He Left Cairo, until His Return There.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the Memorable Battle of Aboukir, and Recapture of the Fortress. 1800. Baltimore: Warner & Hanna.

Miranda, Ambroxio Huici. 1970. "The Iberian Peninsula and Sicil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2, edited by P. M. Holt and others, 406—4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Timothy. 1992. "Orientalism and the Exhibitionary Order." I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edited by Nicholas B. Dirks, 289—31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oaddel, Mansoor, and Kamran Talattof, eds. 2000.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Islam: An Anthology of Modernist and Fundamentalist Though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ohrmann, Christine. 1961. *Etudes sur le Latin des Chrétiens.* Vol. 1: *Le Latin des Chrétiens.* 2d ed.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Momigliano, Arnaldo. 1975. *Alien Wisdom: 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ntagne, Robert. 1973. *The Berbers: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Organis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Seddon. London: Frank Cass.

Moore, Clement Henry. 1970. *Politics in North Africa: Algeria, Morocco, and Tuni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Moreh, Shmuel. 2003. "Napoleon and the French Impact on Egyptian Society in the Eyes of Al-Jabarti." In *Napoleon in Egypt*, edited by Irene A. Bierman, 77—98.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Moore, Clement Henry. 1984. "The Maghrib." In Vol. 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Africa from c.* 1940 *to c.* 1975, edited by Michael Crowder, 564—6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occo and Polisario Agree to Talk." *Al-Jazeera*, 1 May 2007. ht-

tp: //english. aljazeera. net/NR/exeres/7EB6326C-8585-4A7C-A1BA-15D84D984907. htm.

Morsy, Magali. 1984. *North Africa* 1800—1900: *A Survey from the Nile Valley to the Atlantic*. London: Longman.

Mortimer, Robert A. 2006. "State and Army in Algeria: The 'Bouteflika Effect.'"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11, no. 2 (June): 155—171.

——. 2007. "Algerian Identity and Memory." In *The Maghrib in the New Century: Identity,*

Religion, and Politics, edited by Bruce Maddy-Weitzman and Daniel Zisenwine, 36—49.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2008. "Boualem Sansal: Novelist, Polemicist, Eulogist."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13, no. 1 (March): 119—125.

Mundy, Jacob. 2006. "Neutrality or Complic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1975 Mo roccan Takeover of the Spanish Sahara."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11, no. 3 (September): 275—306.

Munson, Henry, Jr. 1999. "The Elections of 1993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orocco."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Sultan: Culture, Power, and Politics in Morocco*, edited by Rahma Bourquia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259—281.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Muqaddasi. 2001. *The Best Divisions for Knowledge of the Regions*. Translated by Basil Collins. Reading, UK: Garnet Publishing.

Nasr, Seyyed Hossein. 2003. *Islam: Religio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perSanFrancisco.

Nassar, Hala Khamis, and Marco Boggero. 2008. "Omar al-Mukhtar: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Case of the Militant Group That Bears His Nam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13, no. 2 (June): 201—217.

Naylor, Phillip C. 1990. "Maghrib Unity: Illusive or Elusive?" *Africana Journal* 15: 305—315.

——. 1992. "Spain and France and the Western Sahara: A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Study of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Western Saharan Conflict*, edited by Yahia Zoubir and Daniel Volman, 17—51. Westport, Conn.: Praeger Press.

——. 2000a. *France and Algeria: A History of Decolo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2000b. The *Wider West: A Survey in Trans-Cultural Context.* 4th ed. Vol. 1: *From Antiquity to the European Age of Exploration.* Boston: Pearson Custom Publishing.

——. 2001. *The Wider West: A Survey in Trans-Cultural Context.* 4th ed. Vol. 2: *From the European Age of Exploration to the New Millennium.* Boston: Pearson Custom Publishing.

——. 2006a. "The Formative Influence of French Colonialism 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Malek Bennabi (Malik bn Nabi)."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5: 129—142.

——. 2006b.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lgeria.* 3d 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Nickerson, Jane Soames. 1968. *A Short History of North Africa: From Pre-Roman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Norris, H. T. 1986. *The Arab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Sahara.* Harlow, Essex, and Beirut: Longman and Libraire de Liban.

"North Africa, History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05.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 http://search.eb.com/eb/article?tocId=9110707.

Northrup, Linda S. 1998. "The Bahri Mamluk Sultanate, 1250—139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242—2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Nouschi, André. 1970. "North Africa in the Period of Colonizat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2, edited by P. M. Holt and others, 299—3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Connor, David, and Andrew Reid. 2003. *Ancient Egypt in Africa*. London: UCL Pres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uali, Aomar. 2007. "Algeria's Dominant Party Keeps Power." Associated Press.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5/18/AR2007051800341.html.

Ouannes, Moncef. 1999. "Libye: Chronique intérieure."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36 (1997). Pari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Owen, Roger. 1993. "Egypt and Europe: From French Expedition to British Occupation."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Reader*, edited by Albert Hourani, Philip S. Khoury, and Mary C. Wilson, 111—12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rgeter, Alison. 2000. "Anglo-Libyan Relations and the Suez Crisis."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5, no. 2 (Summer): 41—58.

Parker, Richard B. 1981. *A Practical Guide to Islamic Monuments in Morocco*. Charlottesville, Va.: Baraka Press.

——. 1985. "Appointment in Oujda." *Foreign Affairs* 63 (Summer): 1095—1110.

——. 1987. *North Africa: Regional Tensions and Strategic Concerns*.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 2004. *Uncle Sam in Barbary: A Diplomatic Histor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Pazzanita, Anthony G., and Tony Hodges. 1994.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estern Sahara*. 2d ed.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Pennell, C. R. 2000.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London: Hurst

& Company.

——. 2003. *Morocco: From Empire to Independence.* Oxford, England: Oneworld.

Pérennès, Jean-Jacques. 2000. *Pierre Claverie: Un Algérien par alliance.* Paris: Cerf.

Perkins, Kenneth J. 1997.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unisia.* 2d ed.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 2004. *A History of Modern Tuni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ters, F. E. 1972. "Islam as a Western Civilization." *Arabic World* 18, no. 3 (May-June): 13—19.

Petry, Carl F., ed. 199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1, *Islamic Egypt*, 640—15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yrouton, Marcel. 1966. *Histoire générale du Maghreb.* Paris: Albin Michel.

Pitock, Todd. 2005. "Open Desert: Libya, Africa's Newly Reformed Rogue State, Rolls Out the Magic Carpet." *Forbes FYI*, October, 100—106.

"Plant at the Crossroads." 2006. *Rolling Stone*, 14 December, 18.

Pliny. 1942. *Natural History.* Vol. 2 (Books II-VII).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lutarch. 1986. *Plutarch's Lives.* Vol. 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Plutarch's Lives.* Vol. 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Poem of the Cid: 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panish Text. 1975. Introduction by Ian Michael. Translated by Rita Hamilton and Janet Perry.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ohl, Walter. 2004. "The Vandals: Fragments of a Narrative." In

Vandals, Romans and Berbers, edited by A. H. Merrills, 31—48.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olo, Marco. 1958.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lated by Ronald Latham. New York: Penguin.

Porch, Douglas. 1984. *The Conquest of the Sahara.* New York: Knopf.

Polybius. 1962.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 2 vols. Translated by Evelyn S. Shuckburg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rice, David Lynn. 1979. 63: *Western Sahara.* Georgetow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Pritchard, James B., ed. 1958.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ochaska, David. 1990. *Making Algeria: Colonialism in Bône*, 1870—19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ocopius. 1953. *History of the Wars.* Volume 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Quataert, Donald. 2005.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2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Qutb, Seyyid (Sayyid). n. d. *Milestones.* Damascus, Syria: Dar al-Ilm.

Rabinow, Paul. 1989. *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aven, Susan. 1993. *Rome in Africa.* 3d ed. London: Routledge.

Raymond, André. 1970. "North Africa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2, edited by P. M. Holt and others, 266—2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ebs, Stéphane. 2006. "Long Dig." *Natural History* (May): 14.

Reid, Donald Malcolm. 1998. "The 'Urabi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Conquest, 1879—188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217—2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Whose Pharaohs? Archaeology, Museums, 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Napoleon to World War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tner, Robert K. 1998. "Egypt under Roman Rule: The Legacy of Ancient Egyp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1—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vet, Daniel. 2002. *Le Maghreb à l'épreuve de la colonisation.* Paris: Hachette Litteratures.

Roberts, Hugh. 1993. "The FLN: French Conceptions, Algerian Realities." In *North Africa: Nation, State, and Region*, edited by George Joffé, 111—141. London: Routledge.

——. 2003. *The Battlefield Algeria*, 1988—2002. London: Verso.

Robinson, Ronald, and John Gallagher. 1961.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Rogerson, Barnaby. 2001. *A Traveller's History of North Africa*, 2d ed. New York: Interlink.

Roller, Duane W. 2003. *The World of Juba II and Kleopatra Selene: Royal Scholarship on Rome's African Frontier.* New York: Routledge.

Rollman, Wilfrid J. 1997. "Introduction." In *The Maghrib in Question: Essays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dited by Michel Le Gall and Kenneth Perkins, xi-xxv.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osello, Mireille. 2005. *France and the Maghreb: Performative Encounter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Rosenthal, Erwin I. J. 1979. "Ibn Khaldun as a Political Thinker." *Maghreb Review* 4, no. 1 (January-February): 1—5.

Roussillon, Alain. 1998. "Republican Egypt Interpreted: Revolution and Beyond."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198—2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bin, Barry, and Judith Culp Rubin, eds. 2002. *Anti-American Terrorism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edy, John. 2005.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2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uedy, John, ed. 1994.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Ruf, Werner. 2004. "Sahara Occidental: un conflit sans solution?" *Annuaire de l'Afrique du Nord* 40 (2002). Paris: CNRS.

Russell, Terence M., ed. 2001. *The Napoleonic Survey of Egypt (Description de l'Egypte): The Monuments and Customs of Egypt.* 2 vol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Russman, Edna R., and others. 2001. *Eternal Egypt: Masterworks of Ancient Art from the British Museu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usso, John Paul. 2005. *The Future without a Past: The Humanities in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Saakana, Amon Saba, ed. 1991. *African Origins of the Major World Religions.* 2d ed. London: Karnak House.

as (al) -Saffar, Muhammad. 1992. *Disorienting Encounters: Travels of a Moroccan Scholar in France in* 1845—1846 (*The Voyage of Muhammad as-Saffar*). Translated by Susan Gilson Mil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har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05.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 http://search.eb.com/eb/article?tocId=9108296.

Said, Edward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St. John, Ronald Bruce. 1998.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ibya. 3d ed.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 2008. "Libya: Reforming the Economy, Not the Polity."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Fernández, 53—70. New York: Routledge.

Sallust. 1967. *The Jugurthine War. 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Translated by S. A. Handford. Baltimore: Penguin.

Sanders, Paula A. 1998. "The Fatimid State, 969—117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151—1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nsal, Boualem. 2007. *Petit éloge de la mémoire: Quatre mille et une années de nostalgie.* Paris: Gallimard.

Savage, Elizabeth. 1997. A *Gateway to Hell, A Gateway to Paradise: The North African Response to the Arab Conquest.* Princeton, N. J.: Darwin Press.

Schade-Poulsen, Marc. 1999. *Men and Popular Music in Algeri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chroeter, Daniel J. 1999. "Royal Power and the Economy in Precolonial Morocco: Jews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Foreign Trade."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Sultan: Culture, Power, and Politics in Morocco*, edited by Rahma Bourquia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74—102.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grè, Claudio G. 1974. *Fourth Shore: The Italian Colonization of Liby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aw, Ian. 2000a. "Egypt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edited by Ian Shaw, 314—3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w, Ian, ed. 2000b.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elley, Toby. 2004. *Endgame in the Western Sahara: What Future for Africa's Last Colony?* New York: Zed Books.

Silverstein, Paul A. 2003. "Martyrs and Patriots: Ethnic,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Kabyle Politics."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8, no. 1 (Spring): 87—111.

——. 2004. *Algeria in France: Transpolitics, Race, and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lackman, Michael. 2007. "A Quiet Revolution in Algeria: Gains by Women." *New York Times*, 26 May, A1, A6.

Smith, Richard L. 2006. *Ahmad al-Mansur: Islamic Visionary.*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Sonbol, Amira. 2003. "The French and Egypt's Medical Profession." *In Napoleon in Egypt*, edited by Irene A. Bierman, 115—138.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Sorkin, Michael. 2001. *Some Assembly Requir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rr, Chester G. 1991.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4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illman, Norman A. 1998. "The Non-Muslim Communities: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198—2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ora, Benjamin. 1991. *La Gangrène et l'oubli: La Mémoire des années algériennes.* Paris: La Découverte.

——. 2001. *Algeria, 1830—2000: A Short History.* Translated by Jane Marie Todd.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3. "Algeria/Morocco: The Passions of the Past,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ation that Unite and Divid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8, no. 1 (Spring): 14—34.

——. 2007. "The Maghrib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Maghrib in the New Century: Identity, Religion, and Politics*, edited by Bruce Maddy-Weitzman and Daniel Zisenwine, 1—9.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Strabo. 1949.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8. Translated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ymcox, Geoffrey. 2003.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gyptian Expedition, 1797—1798." In *Napoleon in Egypt*, edited by Irene A. Bierman, 13—32.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Taha, Abdulwahid Dhanun. 1989. *The Muslim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of North Africa and Spain*. London: Routledge.

al-Tahtawi, Rifa 'a Rafi '. 2004. *An Imam in Paris: Account of a Stay in France by an Egyptian Cleric* (1826—1831). Translated by Daniel L. Newman. London: Saqi.

Taleb (Ibrahimi), Ahmed. 1966. *Lettres de prison*, 1957—1961. Algiers: SNED.

Tessler, Mark. 2003.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Morocco and Algeria." I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Experiences, Struggles, Challenges*, edited by Amin Saikal and Albrecht Schnabel, 103—126.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Ann. 1987. *Barbary and Enlightenment: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Maghreb in the 18th Century*. Leiden: E. J. Brill.

Tlemçani, Rachid. 2008. "Algeria under Bouteflika: Civil Strife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arnegie Pap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 //www. carnegieendowment. org/publications/index. cfm? fa = view&id = 19976&prog = zgp&proj = zme.

Toledano, Ehud R. 1998.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252—2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yldesley, Joyce A. 1996. *Hatchepsut: The Female Pharaoh.* New York: Viking.

"UN Calls for Talks on Western Sahara." *Al-Jazeera*, 30 April 2007. http: //english. aljazeera. net/NR/exeres/BAF5B976-0D1A-42B6-A70D-77491213A403. htm.

Valensi, Lucette. 1977. *On the Eve of Colonialism: North Africa before the French Conquest*, 1790—1830. Translated by Kenneth J. Perkins.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Vandewalle, Dirk. 1996. "Qadhafi's Failed Economic Reforms: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a Rentier State." In *North Africa: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Dirk Vandewalle, 203—22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98.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Building.*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6.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dewalle, Dirk, ed. 1996. *North Africa: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Vansina, Jan. 1984. *Art History in Africa: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 London: Longman.

Voll, John O. 1997. "Sultans, Saints, and Presidents: The Islamic Communit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In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edited by John P. Entelis, 1—1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alker, Paul E. 2002. *Exploring an Islamic Empire: Fatimid History and Its Sources.* London: I. B. Tauris.

Wallerstein, Immanuel M.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3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altz, Susan E. 1999. "Interpre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Morocco."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Sultan: Culture, Power, and Politics in Morocco*, edited by Rahma Bourquia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282—305.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rmington, B. H. 1954. *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9. *Carthage*. Rev. ed. New York: Praeger.

Waterbury, John. 1970.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e Moroccan Political Elite: A Study in Segmente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7. "From Social Contracts to Extraction Contrac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In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edited by John P. Entelis, 141—17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att, W. M. 1972.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Medieval Eur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elch, Galbraith. 1972. *North Africa Prelude: The First Seven Thousand Year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ublishers.

Wellard, James. 1964. *The Great Sahara*. London: Hutchinson.

——. 1967. *Lost Worlds of Africa*. New York: E. F. Dutton.

Wheatcroft, Andrew. 1995. *The Ottomans: Dissolving Images*. New York: Penguin.

White, Gregory W. 2008. "The 'End of the Era of Leniency' in Morocco."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Fernández, 90—108. New York: Routledge.

Whitlock, Craig. 2007. "Algeria's Voters Uninspired as Limited Democracy Slowly Evolves." *Washington Post*, 16 May, A09.

Wilbour, Charles Edwin. 1936. *Travels in Egypt (December* 1880 *to May* 1891): *Letters of Charles Edwin Wilbour.* Edited by Jean Capart. Brooklyn, N. Y.: Brooklyn Museum.

Wilfong, Terry G. 1998. "The Non-Muslim Communities: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175—1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Caroline. 1993. *Islamic Monuments in Cairo: A Practical Guide.* 4th ed.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Willis, Michael J. 2008. "The Politics of Berber (Amazigh) Identity: Algeria and Morocco Compared."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Yahia H.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Fernάndez, 227—242. New York: Routledge.

Wilson, John A., trans. 1958. "The Hymn to the At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 edited by James B. Pritchard, 226—2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nter, Michael. 1998. "Ottoman Egypt, 1525—160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edited by M. W. Daly, 1—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The Ottoman Occupat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Islamic Egypt*, 640—1517, vol. 1, edited by Carl F. Petry, 490—51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f, John B. 1972. *The Barbary Coast: Algeria under the Turk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Wright, Gwendolyn. 1991. *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artman, I. William, ed. 1973. *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Contemporary Maghrib.*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Zartman, I. William, Mark A. Tessler, and others. 1982. *Political Elites in Arab North Africa: Morocco, Algeria, Tunisia, Libya, and Egypt.* New York: Longman.

Zeghal, Malika. 2008. *Islamism in Morocco: Religion, Authoritarianism, and Electoral Polit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Holoch. Princeton, N. J.: Markus Weiner Publishers.

Zisenwine, Daniel. 2007. "From Hasan II to Muhammad VI: Plus Ça Change?" In *The Maghrib in the New Century: Identity, Religion, and Politics*, edited by Bruce Maddy-Weitzman and Daniel Zisenwine, 132—150.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Zoubir, Yahia H. 2000. "Algerian-Moroccan Rel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Maghribi Integration."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5, no. 3 (Autumn): 43—74.

——. 2004a. "The Resurgence of Alger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9, no. 2 (Summer): 169—183.

Zoubir, Yahia H., and Haizam Amirah-Fernández, eds. 2008.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Zoubir, Yahia H., and Karima Benabdallah-Gambier. 2004. "Morocco, Western Sahara and the Future of the Maghrib."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9, no. 1 (Spring): 49—74.

Zoubir, Yahia, and Daniel Volman, eds. 1992.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Western Sahara Conflict.* Westport, Conn.: Praeger.

索 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本书边码）

A

C

D

E

G

H

I

J

K

L

M

N

Q

R

S

T

U

X

Y

Z

译者分工：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地图列表 、对读者的几点说明、前言、导论、第五、六、七章、结论、注释、专业术语、索引，并负责全书通读、修改和校对。

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一、二、三、四章。

李铁（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第八、九章。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北非史＝NORTH AFRICA
作者=作者:菲利普·C.内勒著；韩志斌，郭子林，李铁译
页数=391
SS号=13361386
出版日期=2013.08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